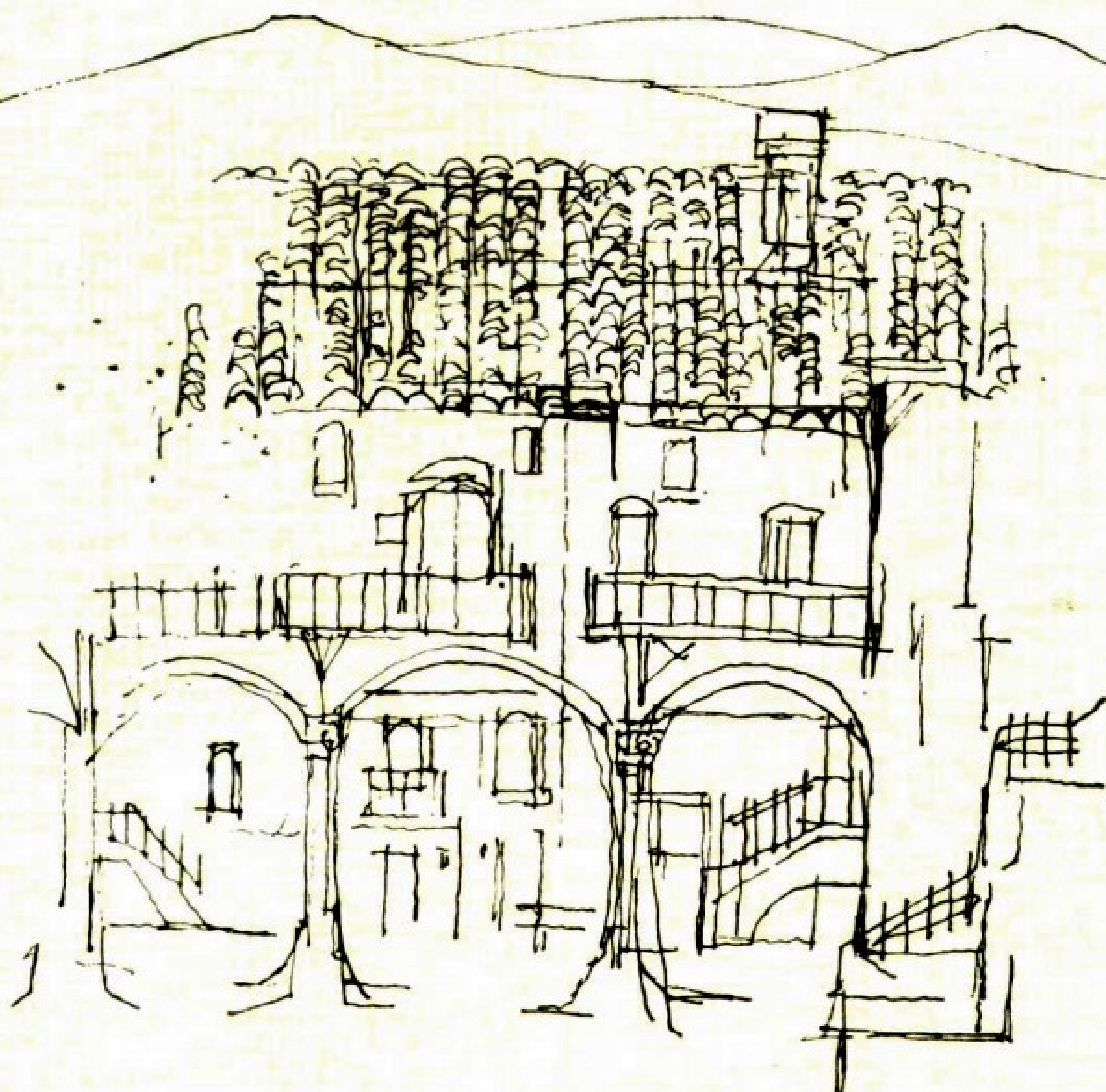


BI EN ZHUANG



比恩庄

〔西班牙〕维利亚隆加 著

比 恩 庄

又 名

玩 偶 厅

〔西班牙〕洛伦索·维利亚隆加 著

江 山 锦 康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一 年 · 北 京

新
平
和
解
學
PDG

Llorenç Villalonga
BEARN
O
LA SALA DE LES NINES

根据Edicions 62 i "la Caixa" 1988 年在
巴塞罗那出版的卡塔兰文第七版翻译。翻译出版过
程中,得到卡塔兰文学院的资助,享有翻译出版权。

比 恩 庄
BI EN ZHUA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9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4}$ 插页2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077-6/I·981 定价 3.80 元

前 言

洛伦索·维利亚隆加的小说《比恩庄》，以十九世纪末叶西班牙地中海上的马略卡岛为背景，描绘出该岛一个贵族家庭日趋没落的衰败景象，是现代卡塔兰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讽刺作品。

洛伦索·维利亚隆加于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出生在马略卡岛帕尔马市的一个中产家庭，一九一九年后，到西班牙本土的木尔西亚、萨拉戈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一九二八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一九三一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夫人之死》，一九三二年又发表用卡斯蒂利亚文写作的悲剧《费德拉》。

尽管维利亚隆加成了一位精神病学专家和精神分析医生，在国内外的医学界中间很有声望，但是他对文学的爱好并没有减退，反而更加高涨。他不仅勤奋写作，而且经常回到故乡马略卡岛探视，不脱离生活的泉源。为此，他在一九三四年创办了文学刊物《微风》，在巴塞罗那出版。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接连在该刊发表用卡斯蒂利亚文写作的剧本《西尔维亚·奥坎波》和小说《迪隆夫人》。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维利亚隆加退居马略卡岛的山村比尼萨伦，认识了特雷萨·吉拉培女士，于一

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结婚。新婚夫妇在该村居住三年，直到一九三九年内战结束。但是战争结束以后接下来的却是文化受到压制的沉默年代；不仅卡塔罗尼亚没有文学可言，在整个西班牙也是一片寂静。维利亚隆加被认为是战争期间倾向于胜利者一方的人物，在这三年里他并没有停笔，而是写了一系列以内战为题材的短剧，然而由于他讥刺和嘲讽的笔调，当时根本不可能发表，直到一九六五年，才编集成《腹泻集》出版。

然而也就是在比尼萨伦隐居期间，维利亚隆加创作了他的杰作《比恩庄》：对比恩庄和比恩镇的描写，有许多细节可以在比尼萨伦找到明显的影子，而女主人公玛丽娅·安东尼娅的轮廓则几乎完全脱胎于维利亚隆加在这座山村里娶的妻子特雷萨。

五十年代开始以后，佛朗哥的专制统治逐渐趋于松动，西班牙本土文化的复苏，使得文化界有识之士逐渐关注卡塔兰文化。在他们的呼吁和帮助下，维利亚隆加以卡塔兰文写作的短篇小说集《帕尔米拉小说集》于一九五二年在马略卡岛的帕尔马市出版。四年之后，小说《比恩庄》的卡斯蒂利亚文版出版，然而直到一九六一年，卡塔兰文原文的版本才问世。从此以后，维利亚隆加恢复了创作活动，但是只用卡塔兰文写作。他于一九六七年辞去省立精神病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开始撰写回忆录，后来又连续发表了五部小说。但是不久因患动脉硬化症长期卧床不起，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八日逝世。

小说《比恩庄》是维利亚隆加的讽刺文笔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部作品。他通过在庄园里土生土长的一位家庭忏悔神父的目光,评论比恩庄主人夫妇的奢侈而乖僻的生活,既流露出对往昔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惋惜,也表现了对时代变化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恐慌和无知。世代居住在马略卡岛落后的山村比恩镇的地主安东尼奥和安东尼娅夫妇,因为怕家产分散,是表亲联姻。但是尽管如此,安东尼奥对新知识、新发明的兴趣,以及安东尼娅对服饰和饮食的讲究,仍然使庄园失于管理,日益衰败。作者并没有写出对逝去的光阴的留恋,也没有暗示主人公对死亡来临的恐惧,而是通过十九世纪中叶欧洲政治的进程,科学的发展,文化的普及而预示了卡塔罗尼亚的未来。主人公安东尼奥自称为“百科全书派”,青年时期倾向于法国的启蒙运动,甚至还加入过欧洲的秘密共济会组织,这一切虽然都是新鲜的东西,然而他的思想深处却仍然是逐渐灭亡的贵族阶级的阵地。维利亚隆加在这本小说里对这种矛盾的描写使用的是带有原宥之情的讽刺,而不是他自己青年时期对这种贵族阶级思想的断然蔑视。因为创作这部小说时,他已经近六十岁,与他娶的马略卡岛土生土长的妻子也已经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因而他的轻蔑和鄙视已经随着岁月转变成了怀恋和幻想。隐藏在他的讽刺后面的希望,仿佛朦胧的神话:比恩庄和比恩镇的落后,将会和整个马略卡岛一样,而整个马略卡岛的落后,又将会和全卡塔罗尼亚一样,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如同神话那样得到奇妙的进步。

欧洲评论家往往把《比恩庄》与意大利著名作家朗佩杜萨的小说《豹》并列，认为它们都是为残留的欧洲贵族阶级所唱的挽歌。的确，这两本小说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其背景均为十九世纪中叶生产落后的地中海岛屿：西西里和马略卡；其主人公也均为封建贵族阶级的没落的后代：萨利纳亲王和安东尼奥夫妇；而其主人公也均被新的时代打上了新的烙印：萨利纳亲王是天文学家，发现过新的恒星；安东尼奥是发明家，发明过使用蒸汽的“自动车”。但是他们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属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对此，两者却是不同的结局，不同的反应。萨利纳亲王无时无刻不畏惧死亡的来临，终于在弥留之际见到了召唤的天使，而安东尼奥却是由于安东尼娅误食了巴黎落泊归来的侄女遗下的毒药死去，因而痛恨生活的无情而自杀。这就是五十年代中叶欧洲文学中出现的两部著名浪漫主义小说主题思想的不同之处；也是处在不同的经济文化恢复的条件下西西里岛的朗佩杜萨，和马略卡岛的维利亚隆加的区别。

维利亚隆加的作品，为了便于发表，才用卡斯蒂利亚文写作。但是，只有在他用加塔兰文写作时，才真正能够充分发挥他的风格。他的第一本小说《夫人之死》就是用加塔兰文写作的。以后到他能够自由发表作品时，他就一直使用故乡的加塔兰文了。

维利亚隆加也以善于撰写短篇小说闻名。一九八六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全集》。

编 者

目 录

序曲.....	1
第一部 浮士德的启迪.....	7
第二部 安宁的比恩庄.....	145
终曲.....	307

序 曲

比恩庄神父堂胡安·马约尔致西班牙红衣大主教的秘书堂米格尔·赫拉贝特的信：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当这封信及随信所附的这本小册子到你手中的时候，你是否已经得悉这个不幸的消息：大约两个月前，先生夫妇在神秘莫测的情形下去世了。一时间，书记官、公证人和债权人蜂拥而至，挤满了比恩庄。大家都惦记着死者的物质财富，其实死者一无所遗。心里还能想到要为死者祷告一声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我忙得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直到晚上，才总算剩下我独自一个，其时我脑子里好像一团乱麻，乃至我感到没有力气替死者请求上帝保佑。假如不是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为他们做弥撒的话，我真要以为他们已经一身轻松地到了另一个世界。亲爱的朋友，在这样的时刻，人类的利己主义似乎把舍己救人的思想统统拒之门外。过了一天半之后侄子侄女们才来到，先生夫妇已经下葬了。多年以来他们早就不到比恩庄来了。我敢肯定，米格尔，诸如在《首领报》上登个什么“哀伤的家属”云云的

讣告，无非是些遮人耳目的花言巧语。堂娜玛格达莱娜对大厅里的瓷器赞不绝口，而她的兄弟们则对萨科瓦松林兴致盎然，他们以为那座松林早就被砍光了。我认为没必要告诉他们，如果不砍掉的话，也早就卖掉了，关于死者最后的想法我也一概回避，后来还是马德里方面传来死者的遗嘱（我只告诉你，我十分清楚，他们从未立过任何遗嘱）。他们还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珠宝首饰，对家里可能有的钱财十分垂涎。可是，比他们先到一步的法官把所有的箱子柜子都贴上了封条，这省去了我许多唇舌，不必对他们作出什么解释。最后，那位侄女想看看那间有名的玩偶厅，我揣摸着死者的意愿，便推说钥匙已经丢失。他们略带狐疑地离开了，我再也未见过他们。倘若他们知道在我房间堆满纸张和破旧杂物的一个角落，我藏着先生在半年前给我的一千五百杜罗时，一定会加倍地不相信我的。先生给我这笔钱的时候，有过明确的嘱咐，稍后你就会知道这些具体的细节。在随信附去的这本小册子里，我竭力想说明的就是良知。在读它之前你应当好好想一下：我在小册子里所叙述的一切，你都应当把它看作是推心置腹的表白。如果你不打算接受我的衷肠（我预先提醒你，它会让你不知所云的）的话，我敢肯定你会读不下去而把它烧掉。

米格尔，你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生死与共的真正朋友。你的慈悲我将时刻铭记在心。在痛苦的时刻，因为不幸刚刚发生，我就把这不幸——姑且不称它为罪恶吧——向你和盘托出。因为它使我对尘世更加无所留恋。我认识你那天，

正好是海梅的事发生后一星期。没有父母兄弟的我，在你身上首先发现的是亲属之情，尔后便是在见解上神奇地灵犀相通，我们的天父所能给予两个人的最大恩典莫过于此了。无论是你还是我（恰如神学院院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的：一对田园派）都忘不了在院里的朴树下，一起滔滔不绝地谈论圣奥古斯丁和笛卡儿的学说的情景。在这个超凡的世界奇观面前，我们的智慧同时受到启迪而盛开。对这个超凡的世界，却有人轻率地予以否定。可是，一旦它隐约可见之时，简直就成了上苍活生生的化身。堂安东尼奥有时对我说：他就是这么个人，等老了反思一生之时，就会发现一生之中，就像一份辣酱那样，唯独缺少一样调料，那就是魔鬼。先生总是这样，说出话来不愿人家太当真，却总让人家去捉摸。如果确实魔鬼没有到过我的生活中来（你我都清楚并非如此），那就是上天对我最为特殊的恩宠了。堂安东尼奥慷慨大方，自信而坦荡。他有过许多错误，而他所有的错误都来自对上天的虔诚，对人和自然的热爱。由于他的用意是好的，他这些错误应当得到原谅。他的尸骨已经成灰（他的肉身从未吝啬过享乐），此刻只剩下他的灵魂在活生生的上帝面前等待判决。

我必须向你展示先生夫妇的逝世在我心中造成的疑团，向你叙述先生把一千五百杜罗交给我时对我的嘱咐。先生居然能积攒下足以养活一家人的这么一大笔钱，简直不可思议。他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虽然俗话常说虎死架子在），对他这样一个规避尘世、长年深居简出的人来说，令

人联想到他把何等巨大的关切与热望寄托在对我的嘱托之上。若是那些清查死者账目的债权人和律师们一旦发现我——昔日的猪倌，今天除了弥撒便一无所有的穷神父——居然在自己房间里藏了这么一大笔款子，准会以为是我偷的，而且天晓得他们会不会把先生夫妇的死归咎于我。先生夫妇尽管已经上了年纪，可就在几个小时以前还活得好好的啊。然而，同我所面临的一大堆道德问题相比，这些忧虑简直不屑一提了。红衣大主教是西班牙教会的首席权威，而我，米格尔，绝对相信你会把这件事呈交主教大人圣裁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先要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不那么简单，我不得不从头讲起。虽然也有不少严重的错误，往昔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妙。描述一下它的种种独到之处，对我这颗孤独的心也算是一点慰藉。我必须承认，而且我们也应该向主教大人禀明，在那些漫漫的长夜里写下这本小册子的动机，恐怕不单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疑虑，而且也把重现我刚刚失去的熟悉而可敬的人物当作一大快事。

整个世界都随着这些人物的逝去而烟飞灰灭。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看着我降生而行将被拍卖的土地，因为那些债权人已经声称不愿再等待。至于那些侄儿侄女们，一则无钱来赎那些典押品，二则已习惯城市生活，对这些地方根本不愿过问。也许还有唯一的一线希望：一位亲戚刚从美洲回来，他靠纸盒子发了大财。简直难以置信，靠卖纸盒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物，但他确实衣锦还乡，一身珠光宝气。他还存心在大庭广众之间炫耀一番，开着一辆电动

汽车。那车跑起来横冲直撞，已经压死了两头绵羊。我听说，在他的名片上，名字下面还有一个头衔：“包装师”。开始谁也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才有人弄清楚是指那些不寻常的纸盒子。也罢，这个人物，姑且就这么称呼他吧，估计会买下这座庄园，以免落入外人之手。我心中了然，先生夫妇对于“包装师”之类是不甚以为然的，何况，据说这位阔佬的母亲在他出世之时是与她的丈夫，一位落入歧途的比恩人分居的，这已惹得议论纷纷满城风雨了。岁月教诲我们审时度势要达观透彻。对于我这个已经虚度半生的人来说，这位卖纸盒子的比恩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不速之客。但是，显而易见，眼下正在形成新的一代，他们要在自己的岁月里把这片古老的土地同这个冒险家本人联系起来，去体验对这两者（他们会以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根深蒂固的）的感情，如同我自小便体验对于堂安东尼奥的感情一样。细察庄园的档案资料，这一类的事情并不鲜见。因为现实仅仅植根于我们自身而最终却又通过像一个名字那样神奇那样平凡的什么向后延续。正如老师教我们的那样，上帝是通过圣子创造了世界的。

先生真真让我着迷。而他的夫人，是那样善良美好，她从未使我萌发兴致去注意她那被上帝和魔鬼所争夺的灵魂。在这场争夺战中谁是赢家迄今毫无定论。也许是我对她的永恒的热爱之情源自这种痛苦，也许是这种痛苦，按照先生的说法，是使佳肴变得美味可口所不可或缺的调料。

为了便于理解这个问题，我把我的叙述分成几个部份，

就像是一部小说。第一部份题为《浮士德的启迪》，解答他们那有争议的生活的动荡时代。第二部份其实讲的是这片山区的宁静，可以题为（虽然有些误差，因为这种宁静是表面的而非真正的）《安宁的比恩庄》。至于第三部份，可以算作尾声，那是我最近接受了一次奇特而迷茫的采访后写下的。

请允许我最后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若发现我叙述过程中有生硬唐突之处，请勿见怪。你该明白，我必须如实地介绍先生其人，对他的是非功过不添不减。从我把他交给教会去评说的那一时刻起，虽然世人皆不理解之时最终还有上帝的理解，我也将永不再能披露事实的真相了。

1890年，比恩

第一部

浮士德的启迪

—

就我记忆所及，你从未来过比恩庄。那就让我告诉你罢，这庄园是山里一座古老的遗产，离开也名叫比恩的镇子不远，那里约有四百口人。究竟是庄园用了镇子的名字，还是镇子跟了庄园的称号，无人知晓。每年的圣米格尔节也就是东家节那一天，布道士都提到这片土地自从征服美洲的时候起就归先生世家所有。“我们的门第，”堂安东尼奥常说，“古老得无案可查。它的渊源隐没在茫茫的黑夜里，使我们声名显赫。”然而，使他们毋容争辩地备受尊崇的这种传说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先生的先辈们对于做学问毫无兴致，唯独我这位东家例外，简直言必称法国。还不到一百五十年前，先生的曾祖中也有一位叫作堂安东尼奥的，又顽固又霸道。关于他有许多流言，其中免不了使他背上些并不确实的罪名。老一辈的人还记得这样一首歌谣：

天上有个耶稣，
莫雷里亚住着个异教徒；
地狱有个魔鬼，
比恩住的是堂安东尼奥。

先生对此置之一笑。“起码，”他说，“这家伙没有虚度光

阴。”先辈中的其余各位，都庸庸碌碌，无功无过。他们住在乡下，对于城里舒适雅致的生活不是一无所知，便是嗤之以鼻。同样，城市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从镇上到比恩庄约莫要步行一个钟头。不过，由于地势起伏不平，只有到了跟前才能发现这座庄屋。庄园离热闹的尘世几乎有百里之遥。这儿土地贫瘠，遍布乱石和丛林。三十九年前我便来到人世，父亲是农民，母亲是打短工的。我记忆中对双亲已经毫无印象，据说我母亲长得很美，有一双黑眼睛。我刚刚懂事就被派去牧猪，不过，几年之后，先生就让人送我到帕尔马城的一所学校去上学。这件事我还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赶着猪群到圣冯特附近去，恰好碰上先生夫妇回来。他们很长时间不在庄园，现在一回来，一种敬畏之心或者说是腼腆之情使我总躲着他们。除了圣米格尔节在教堂里，我简直不敢正眼望他们。节日那天，在教堂的祭坛前面，给他们摆了两张红绒大椅子。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美极了，瘦削修长的堂安东尼奥，显得细弱，虽然长相丑陋，却有几分像她。他们是表亲。尽管他们总是笑容可掬，却让人油然敬畏，因为他们显得与农夫们迥然不同，光采夺目。迄今我也猜不透这是什么缘故。衣着固然有影响，但我以为这是一种神奇的超凡的东西，它来自比恩这个封地的名字，来自节日教堂讲道台上恭敬肃穆的气氛。通常情况下，临近圣米格尔节的时候，山区都要下雨。因此，印象当中，这个古老家族的历史总是同先辈的征战业绩和牧草初绽的嫩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瞧，托内特，多漂亮的小伙子。”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

先生默默地瞥了我一眼。他的夫人佯作不知。

“我想不起来了，”她又说，“他到底像谁来着。”

先生依然不开口。第二天，我便被送到城里，在特亚提诺斯学校寄读。直到四月复活节放假我才回来。先生夫妇都不在庄园。女佣弗兰西娜告诉我，先生“坐船走了”，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则到比恩镇的别墅去了，那是教堂旁边一幢石砌的大房子。从女佣的话里，我看出来其中有奥妙，实际上这是几百年来最难以置信的事情。大家都在悄悄地纷纷议论，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一无所知。其实，当时我即使能打听到什么，充其量也只能是些皮毛。几年之后，风暴平息了，当他们重归于好之后，先生在一些近乎忏悔的长谈中，才渐渐透露出那件事情的精神原因。那些长谈，我真不知道能否算作忏悔。我在他家里当了这么多年家庭神父，而且亲眼看着他在我怀里死去，但我迄今也不敢肯定先生在他一生当中是否作过哪怕是一次忏悔。我明白，你听了一定会像我一样感到十分吃惊的。他有一个明晰而多变的心灵。正因为他很诚恳，谁也说不上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如同无法预测一块镜子会映出怎样的影象一样。令人不解的是，那些也许是为了了解真理的所有方面而不因循守旧的人，却成了最险恶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何况，先生夫妇自小就习惯于用和蔼亲切的方式待人，这就更令人费解了。对于那些方式，本来不必过

于认真，但它们却使普通人六神无主、心诚口服。一般人，包括我在内，都不可避免地认为只有粗野无礼才是表明坦诚，却不懂得礼貌的奥妙与俗套之别。先生却不是难以捉摸的人。记得我对你说过，譬如，他在晚年戴一个白色头套，穿一身方济各会的灰袍子。同他有过交往，听过他那有时并非很有裨益的谈话的人，从他那身灰袍子上只看到确实确实存在的一种不和谐，但他们也应当看到同样确实确实的和谐(与世隔绝的生活，热爱精神的题材)。对于只会讲一种话的人他们惊叹不已，却根本不相信天生就会平时就能操几门语言的人。虽然他有些行为十分糟糕，但总的说来他不失为一个好人。而且他认为糟糕的结果是由于脑子不够而不是因为心眼坏。他不承认自己心眼不好。

他常对我说：“你不明白吗，那些奸诈的骗子什么时候认为自己是骗子的呢？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使自己处境坦然，这其实不是出于邪恶而是错误。该相信了，胡安：车夫翻车是不慎而不是成心。”

毫无疑问，他为此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忘了有时聪明也会被聪明所误。他所接受的都是十八世纪那一套，时时不忘理性二字，尽管他的气质比表面看来更富有诗意而更易自相矛盾。

“我承认，”先生说，“理性是盏微弱的灯。但不能因此便去吹灭它，而要剪去灯花让它更加明亮起来。”

他认为特尔图利亚诺的《荒谬的信仰》(他和他的法国老师们都把它误作圣奥古斯丁的了)是谬论。他擅长诡辩。

我曾带着成见去研读他的教材，却常常被其精妙之处所吸引。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八岁时被人送进去的那所学校毫无精神可言。教学是陈规俗套，我的同学皆仪态平庸，缺乏潇洒风度。等我一回到这里，就被他身边洋溢着自由与礼仪的气氛所陶醉。他从不争吵从不生气。虽然他身上有二重性，对于手下人的过失是决不放弃体罚。我见过他用马缰抽打工头，把身强力壮的工头抽得嗷嗷直叫。一打完他就和本堂神父议论这种刑罚。本堂神父斥之为陈旧体制，违反基督博爱精神。这种刑罚却几乎是周期性的，通常情形下，每当月圆月缺就得来一次，因为没人说工头的好话，而工头嘴里又不干不净地说些十八世纪的古辞典里没有的词。在那种场合，先生指着挂在门背后的缰绳时那种和蔼自然的神态以及工头把它递上来时那恭恭敬敬的样子，使我既害怕又好奇。

“看吧，”堂安东尼奥说，“这一次你能记住多长时间。把衬衣脱下来，坐到凳子上去，低下头。”

工头把脑袋低了下去。看着这么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居然心甘情愿地让堂安东尼奥这样瘦小而且年过半百的人抽打，心里真不是滋味。无论是物理法则还是生物法则都无法接受这种场面。我想，被人斥之为卑鄙的工头的这种恭顺，是服从于道德的力量，服从于使主仆都同等荣耀的各种事物（纪律，传统，等级）的一种秩序。

打完以后，先生对工头建议说，如果感到皮肤火辣辣的话就抹上点儿油。然后先生又埋头读他的古典作品去了。

先生教给我法语，一开始学的是拉辛和莫里哀。多亏了他，一位从不愿食言的乡下穷神父才不致于至死也不知道费德拉是怎么爱的，塞丽梅娜是怎么笑的。我想，上帝宁愿要我自觉的奉献也不愿意要愚昧无知的人来服务，因为这种服务其实算不得奉献。

他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我清楚，中伤他的人会对他的许多方面进行指责，甚至会对他略略陈旧的十八世纪文化加以嘲讽。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其速度在本世纪末达到飞快的程度），我们必然会觉得他的学识轻浮浅薄，纯属业余爱好的性质。实际上，他并未奢望过成为别的什么。但是，重要的并不在于其文化知识而是在于其天才的直觉，这往往使他几乎是先知先觉。我毫不迟疑地这样写，而且比恩的大多数村民也都纯朴地认为：这位聪敏多疑、缺乏意志而且平庸冷漠的人似乎有些，愿上帝宽恕我，有些走火入魔。

二

我认为有必要对你描绘一下事情发生的舞台。也许你会惊讶，这座庄园是农舍与宫殿的混合物。那些年月的庄园主在聚积家产时都把必要的附属设施集中在房子周围。我姑且略去油坊、畜栏、草场和谷仓不提。说实话，我的东家对这些颇不经心，造成家业衰败，因而给许多好人也带

来损失。他本人也清楚自己经管不善。“我们这些人都该撒开手了，”他喟然慨叹。他是指那些庄园主。在这一点也仅仅是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敌手让·雅克·卢梭所见略同，而在骨子里他依旧自视清高，恰似塞内加把知识的荣耀置于人类亲情之上一样。我不是说他不爱那些农民，但他确实不愿与他们平起平坐。他本人就声称回避那些“不必要的接触”。对于这句略带神秘的话，我有理由认为它是指并非寻欢作乐的肉体接触。情欲把一名牧羊女捧到圣殿之上，然而，一旦短暂骗人的情欲的快感烟消云散，这位高贵的人便会逃避牧羊女，并以利己主义的最无情的冷酷把她遗弃给悲惨的命运。光阴荏苒，也许有一天被遗弃的受害者会同引诱者狭路相逢。她，一个成熟的姿色褪尽的女人将会恭恭敬敬地向他问候，称他为“您”。而这位旧情人则会带着淡淡的往昔的欢情欣然接受，决不会请她改变称呼。他的良心丝毫也不会受到谴责。或许那位女人曾经病倒过，而他则通过维加里奥先生送过一张五杜罗的钞票；或许他保护他的私生儿，供其上学给其食物丝毫不讲价钱，但他绝不会让出比天下所有财富都要珍贵的东西：一个堂堂正正的姓氏，一副清清白白的声誉。世上有权势的人都这样，铁石心肠，冷酷无情，包括那些自以为最公正的人。米格尔，原谅我胡乱插上这么一段话。至于我的东家，我必须声明，他并未把自己看作白璧无瑕。至少，他从不虚伪。不过，说到承认过失坚持过失，如果不是什么顽固不化的滔天大罪，又有什么要紧呢？

我们感兴趣的舞台是宅第中的重要位置。一进门便是一个朝南的大院子，那里有牲口棚以及工头和仆役们的住房。院子尽头是一道拱门，虽然知识渊博的人都说它是属于十四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却显得微不足道。这道拱门通向另一个较小的院子，那里有一道宽大的门廊，一道楼梯直通楼上。门廊的一角有一只乡下人用的炉灶，被一道高约六拵的短墙把它和其它部分隔开，周围有些石砌的凳子，上面铺着羊皮。从前这儿大概是当厨房用的。不过，随着习惯的改变，越来越讲究奢华，厨房已经搬到另一个更不起眼的地方去了，但有时还在这儿烤烤羊肉，或者烧一锅水等等。冬天这块地方很暖和，即便是那扇可以望见我前面提到的两个院子的门一直敞开到晚上也不冷。靠着这个炉灶有一扇高窗朝向一间内室。我之所以特别写上这一笔，是因为它在我的叙述中颇为重要。按照进门的方位说，左侧是一个正方的大厅，里面有一架钢琴。大厅又通向餐厅。

楼上是先生夫妇宽敞明亮的客厅和卧室。楼梯直通一条长廊，廊壁上开着三扇门：一扇在正中，两端相向各有一扇。三扇门都有古典式的三角形门楣和门柱。房子的这一部份约在七十多年前就已更新改建。正门通向一间椭圆形的屋子，几乎毫无摆设，装饰图案是清一色的庞贝式，由一扇天窗采光。从这里可以通到主厅。厅里设备齐全对称，两座阳台（它们之间有一座大理石壁炉）向着花园。大厅左首是新房，右首一扇门通两间小厅，被先生充当了卧室和工作室。这些房间通过一座旋梯直通花园。主厅富丽堂皇，

墙贴蓝缎，镶满镜子，陈设着许多上好瓷器。以前它一直关闭着，因为从正房穿过几间房间和一条通道便可由一道隐蔽的小楼梯达到楼下餐厅隔壁的小会客室。但是，自从一八八四年一月我们从罗马回来以后，这座蓝色的主厅便成了先生夫妇度过最后光阴的卧房。就是在这儿，他们死在我的怀里。夫人带走了她那对于我并不总是热情洋溢的善良温柔，先生则携去了他那伟大的精神及其令人茫然的谜。一八八四年以前，这座主厅曾是一座圣殿，今日它又重放光芒了。我真愿意拿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全部家财从债权人手里把它赎回来。这些债权人很快就会来亵渎它；他们根本不晓得这儿孕育过的一切，不晓得这些墙壁及威风庄严的壁炉意味着什么。先生曾经多少次躲在壁炉旁边佯装午睡，实际则在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他是靠着未来和往昔生活，两者对他具有同等的魅力。他对我说，现在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遐想与怀旧之间的一个点。这似乎表明在他那无知的灵魂里一直存在着对永恒的渴求。

长廊两端的两道门，一道通往藏书室的陈设简单的前厅；另一道通往几个房间，其中有一间是小祈祷室。到了雨天，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就用不着穿过大院子到门口的祈祷室去祷告做弥撒了。这个小祈祷室以前是穿堂，从那里有一道秘密梯子通向玩偶厅。这个玩偶厅以后我还会给你讲。自从先生夫妇死后，我们所有这些活着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再到那里去过。

以上我把事情发生的场所对你简略地描述了一下。你

自己还可以加上森林，山岭，贫瘠的土地，陡坡巉岩，上面长满普通而芬芳的植物，秋天棕鸟在这儿栖息，春天夜莺在这儿歌唱。别忘了还有大自然的景观，阳光，云彩，雨水，月夜，还有诗人眼里体现造物主之伟大的壮观的暴风雨。

三

直到进了神学院，我也没弄明白先生夫妇分居的原因，当时看来他们是彻底分离了。他们曾经收养了第二个甥女。她是个孤儿。他们送她到蒙特佩耶尔的一所学校去受教育。她叫埃克西玛，大约比我大十岁或者十二岁。她美得无可挑剔。恰如先生所言，真像一只小猫那样伶俐可爱，那样无所顾忌并且缺乏道德观念。当时正是一八五九年。雷塞布打算在苏伊士开运河，古诺则准备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浮士德》。堂安东尼奥及其夫人曾经出游，到过法国和意大利。他们在巴黎的一些好友鼓动他们去看首演。遵循路易·拿破仑的政策，古诺打算以此剧来博取俾斯麦普鲁士帝国支持者们的欢心。虽然老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已不再构成威胁，但出于对他们的仇恨，第二帝国投入了柏林的怀抱。据说，那时柏林还保持着腓特烈们的自由传统，也就是拿破仑王朝津津乐道的传统。第二帝国这一致命的错误本应在色当清算，不过，眼下倒是一片无忧无虑，处处歌舞昇平。林荫大道上的人都是反奥地利派和民族主义派。萨多瓦一役之

后，人民不由自主地对普鲁士人喝采。在色当清算前三年，奥芬巴赫还出乖露丑地在舞台上大演已经气息奄奄的封建主义代表作《盖罗尔斯泰因女公爵》，为普鲁士帝王的霸权效犬马之劳。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急躁暴烈的种族的象征。这个种族宁愿同邪恶签约而在今生今世获得天堂，也不愿意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福。古诺对这个传说大加吹捧，颇得土伊勒里宫里人们的称赞。报纸也大造声势。先生对此发表议论说：

“我已经四十八岁了，玛丽娅·安东尼娅，你也不是一个小姑娘了。我们应该出其不意地去看看这位德国博士的秘密。我们会变得年轻的。”

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这种事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是绝不答应的，连开玩笑也不行。

“不要胡言乱语，托内特。你喜欢炼狱之火吗？”

“不，当然不。不过，重新变得年轻……”

“闭嘴。”

“考虑考虑吧……”

“我不想考虑。”

突然之间，先生和甥女踪影全无：他们跑到巴黎去了。先生变成了浮士德。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虽然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想睁一眼闭一眼，这一次也无法装聋作哑了。不过，还没有发生不愉快的场面。先生回来发现夫人搬到镇上的别墅去住了。没过多久，本堂神父便登门把这一友好的分居通知他，并要他出具分居认可书。

“夫人，”神父说，“希望您能在她的律师起草的这份文件上签字。他还委托我说明这不是对您的不信任，而是为了双方更加方便。”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先生应道，“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我。”

他连看都没看就在文件上签了字。

甥女留在巴黎了，使这场风波更加热闹。据说，她在那里成了帝国一位年轻公爵的情妇。堂安东尼奥有本事使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堕落，却无力把她带回岛上来。公爵富有，仪表堂堂，而且比先生年轻许多。堂娜埃克西玛以一种仿佛她生来就有的巴黎式的厚颜无耻把一切都对先生和盘托出。如果先生还活着，他一定会像讲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故事那样对我讲上千百次。“你带我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埃克西玛对先生说，“你别指望我现在会撇下他，我要快活到五十岁。你回比恩去好了，不用管我，你是那么明白的人……”那些最有头面的人物都巴结她。听说皇上也想认识她呢。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回来了，还企望着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会像往常那样只字不提，并准备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爱她，如同那些海员，每到一个港口便爱上一个女人（先生本人的话），然后在航程中把所有这些女人加以归纳，把她们模糊变幻的各种模样具体化到永恒的、唯一的自己的女人身上。然而，事情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请您告诉她，本堂神父先生，”堂安东尼奥表示，“一切由我负责。有些事情用语言说不清楚，不过，有时候，随着

时间的推移，却能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意会。假如有一天我的妻子能忘掉这件事（当然，这不太容易），那么对她来说，我就必定永远是个始终如一的人。”

本堂神父缺乏幽默感，不过，堂安东尼奥似乎觉察他的脸上有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的确，必须等待意会的时刻自己来临，恰似神的启示一般。

十年过去了，他们分居了十年，虽然相隔并非遥远。堂娜玛丽娅·安东尼亚住在镇上古老的别墅里。这别墅属于她，是她从母亲这一边的家族里继承下来的，前面已讲过，她和先生是表亲。她每天去做弥撒，不忘降福，缝制祭礼穿的披肩。先生则足不出户，埋在书堆里。当时我在神学院读书，每逢节假日则回来过。比恩对我来说简直是座宏伟而神秘的大厦。它是我所见到的最好宫殿，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它再好的了。用古剑作装饰的藏书室里，羊皮纸上记载着这一家族辉煌的业绩。可是，那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业绩呢？我真想揭穿这个谜。我尤其想到那间长年锁闭连提都不能提的神秘的玩偶厅里去探个究竟。我不止一次打开通往秘密楼梯的门，上完了通到玩偶厅的十四层阶梯，可是那儿还有一道门紧锁着，从锁眼往里瞧纯系白费力气，因为里面有窗帘，什么也看不见。费了不少唇舌问，也挨了不少拳头，总算从玛多·弗兰西娜嘴里掏出只言片语，才推测到先生夫妇祖辈有一位发疯死在里面了。听到有人说我的东家曾经供几个小孩上学，却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是什么原因，这也使我奇心大发。

一八六六年秋(我刚满十五岁),先生给我介绍了海梅,要我一定要像对待亲弟弟那样待他。

“他一直住在一所学校里,”先生对我说,“也许他读的书和你一样多,不过,他从来没有玩过球,也没见过什么鸟枪,什么捕棕鸟的网。现在正是季节,你最好带他到山上去。他需要跑一跑,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海梅比我小两三岁,显得像个小孩。我则不一样,是个大人了。虽然先生的要求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我对他的态度却像仇人一般。他有一头金黄头发,显得十分聪明机敏。他怕骡子,怕水牛,连绵羊他都害怕,既不会游泳,也不会掷石块。在让他胆战心惊的比恩庄这个天地里,我成了他唯一的保护神,一天到晚缠着我形影不离。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对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儿我一开始就反感。我觉得他女里女气(在法国叫作扭捏作态),一点也没有男子汉敢作敢当的气魄。正如先生所说,年轻人是十分敏感的,而且过分的自尊。“胡安尼托,是岁月,岁月在启迪我们的时候也腐蚀着我们,把我们变得厚颜无耻。”除了容不得半点含糊的男性的自尊之外,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总会让我这一类的人妒火中烧。海梅是来同我争夺先生的心的。我在家里的地位不牢靠,全看主人高兴不高兴。而且还有更其复杂的原因,是一种面对危险人物的自卫本能。这种危险人物我不了解,其软绵绵的样子却让我生气。其实,那位可怜的孩子需要别人去爱他。遵照先生的指示,我尽力帮他去除怯懦,鼓励他勇敢。他开始不怕掷石块了,我又在

池塘里教他游泳。他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个星期以后，他已判若两人，每天下午都来看我们的先生祝贺我。

“看看你什么时候能变得象胡安那样强壮，”先生对他说，“你不是说想当一名炮兵吗？”

这些话鼓励了海梅，他一天到晚光想着练体操，跑步和爬树。虽然他身体孱弱，但他不甘落后。日光和空气使他皮肤变黑，驱尽了城市生活给他留下的苍白。这是外表的变化。爬山的时候他喘不过气来，还要坐下来休息，这仍然使我觉得他娇里娇气。现在我也不敢肯定我当时是否存心不愿改变看法，我已经说过，我那时的恶意实在不可捉摸。另一方面，随着朝夕相处，虽然开始时对他的那种蔑视依然存在，我对他也不由得生出几分佩服来。他在国外受过教育，法语比我讲得好，会作亚历山大体的诗，熟悉罗马的历史。他的头发那样金黄，他又是那样聪明，这令我惶惑。假如他在孩童的嬉戏里想同我较量的话，我真希望能够具有多亏了他才首次隐约显现的那些道德品质。大家都说竞争是进步的源泉。那一回，却成了死亡的根由。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迄今还分不清哪些是有意的哪些是无意的方面。实际的情况是，虽然海梅的皮肤晒黑了，但他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糟，这我是清楚的。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极度兴奋状态下度过的，无论我怎样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他总是跟着我干。越是筋疲力竭，他越是挣扎着不肯认输。在争斗中一下子就被打败对他来说特别的痛苦，我便像猫逗老鼠那样故意拖长时间，表面让他高兴，实则

是置他于死地。我们打架通常都是在被圣栎树围起来的又大又有诗意的场院里进行。你知道，那一天，我们玩得比平常久。突然，我发觉海梅的身子无力地松弛了，脸色白得像张纸。他对我说很困，就在稻草上睡着了。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去喊他吃晚饭，发现他已经死了。看着我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谁都会起疑，先生却没有失去理智。对这件事，他心里看得比我还清楚，却从未再提起过。医生诊断是心脏病突发（“可他怎么能知道……”我听见先生喃喃地说）。我痛苦到极点，却不能通过忏悔来求得安慰，因为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只要我把经过一说，无论谁都会原谅我。我们在一块儿玩。他累了。心脏病突然发作。十五岁的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反省良知。但我隐约知道自己的过失严重。我和海梅的关系确实奇怪。在我的心底潜藏着残忍和狂暴，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是沉睡的。我们都习惯于把孩童的玩耍当作是无害的，其实不然，很少有人会在打闹中感觉不到虐待狂的冲动。所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愿意玩那些本质是无知的但太接近于性感的游戏了，我觉得它们同基督精神格格不入。海梅和我一样的骄矜。刚认识那些天，我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我把很伤十二岁儿童自尊心的一个词扔到他脸上去：扭捏作态。在打闹中我总是要赢他，这没什么光彩的。在精神上，应该由他来给我上一堂像英雄般去死的课。也许我不是用一拳而是用一个词把他杀死的。他的法语比我好。

四

先生不喜欢城市。他出生在自己的山村，在圣路易的十万子孙大举入侵后不久他在马德里完成了学业。

“那是最冷酷的专制主义年月，”先生说，“接踵而至的便是无拘无束的无政府主义。复辟时期的法国人认为，没有专制这儿便无秩序可言。他们说得不无道理。然而，他们却十分乐于建立一种最温和的制度，安古莱马公爵派人捕捉摄政王和乌尔格尔大主教便是明证。《基督教真谛》一书的作者夏多布里昂本人就对摄政制大加挞伐。总之，所有法国人都觉得我们的专制主义者过分愚笨。尽管如此，很快他们就觉得费尔南多七世并不那么专制，并且发生了教徒反叛事件，那是在卡塔罗尼亚的崇山峻岭中策划酝酿的。当时我大概十九岁。那真是一场大混战，本来团结一致共同对付自由派的人之间展开了殊死的厮杀。

“我相当清醒，没有过分责怪堂费尔南多，他的名声同他女儿堂娜伊莎贝尔的一样，今日遭到普遍的指责。”

“想想吧，”先生又对我说，“大家对他的指责五花八门，矛盾百出。有的说他是独裁者，有的说他依靠民众；有的说他对自己宠信的公爵们言听计从，有的说他虚心到向贝罗泉的卖水人讨教。倘然如此，那些民主派理当对他顶礼膜拜才是。可是，在西班牙有民主派吗？从独立战争至今，这

儿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

要他承认脱离宗教组织简直是不相信巴别塔，确实不太容易。虽然有礼节方面的约束，可我那时正处于爱争论的年龄。我的东家所抱怨的那种无政府状态，那种大混乱，难道不是一七八九年开始的百科全书精神的自然产物吗？

“请您想一想，”我斗胆向先生说，“正是反对拿破仑的那些人颁布了可恶的加迪斯议会宪章和新闻自由。我们战胜了枪炮，但是侵略者却用混淆视听的毒气来毒害我们。”

“见鬼！”先生叫起来，扯着我的一只耳朵，“乳臭未干，你就敢下这种断言。”

不过，不知什么缘故，我觉察到他对这种断言心满意足。他不仅满意，而且还喜欢，并因此而生出一种奇怪的虚荣心，要把我养得又苗条又壮实。他还向神学院院长建议，允许我去游泳、打球，要我同古希腊健美的竞技者雕像一争高下。他甚至在家里搞了个健身房，好让我在假期里锻炼。对今日被称作体育的东西的崇尚，我总觉得对于一个教士不太相宜。你和我，米格尔，曾直言不讳地多次谈论过这一点：一副强健有力的体魄命中注定是用于爱情和战争的，而这两者均与我们毫不相干。出于羞愧，我不敢对他坦诚相告：有一副健壮的筋骨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罪。另一方面，他并不受贞操观念的约束，并不视淫荡为洪水猛兽，就像异教徒戈蒂耶询问苏尔巴兰笔下循规蹈矩的修士们那样：何故如此亏待自己的肉体呢？

不承认原罪之令人痛苦的神秘，是我们最大的无知，

无论如何，我不能把引诱我犯罪的那种亵渎神明的用心归咎于先生，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尽管他对某些事情不太相信，倒是很想看到我面对激情的冲击能表现得坚强勇敢，也很愿意通过那位善良的小伙子去体验一下被异端邪说和寻欢作乐所不齿的精神冒险。因为，他不愿意舍弃世间的一切。如果他想让我变得英武强健，他尽可以听任自己的体质衰弱无力，当然，对于迷人的女色及诡辩家的雄辩他也并非无动于衷。一位天真、虔诚和纯洁的竞技者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幅有趣的图象(仅仅是图象)，那是格雷文展览馆里的又一具新蜡像。

早在巴黎的风波之前许多年，先生就断绝了同他全家的几乎一切联系。尽管他处处小心谨慎，他那先进的思想仍然溢于言表。谁也摸不透他真实的想法，但是人人都在猜测。甚至有人指指点点，说先生在圣诞节时把为他祈福的神父轰了出去，虽然他对神父一向热情款待，每年还送他一枚金杜罗。有人还说先生把教堂的一名侍童打了两个耳光，却把侍童与他的伙伴在做弥撒时打闹一节省略不提。那些最精明老练的人则宣称他是共济会的人。

“假如这样继续下去，”他曾对我说，“我最终也会像我的先辈那样被编入歌谣。”

那些卑鄙齷齪的灵魂当然使他不快。另一方面，他的夫人从来就是地地道道的比恩人。也许她以为乡下总是要比城里安稳些，这一点她是想错了。不论原因如何，他们呆在比恩庄的时间一年比一年久，最后就寸步不离了。

“我真不知道塞奥区有什么好的，”先生常对我这样说，“当然，对那些不在那里居住的外国人来说它还是挺有意思的。我真想让他们大冬天就住在九尺长的门厅里，一丝儿阳光也见不到。”

他这么说倒是大实话。另一方面，城市勾起了他对与夫人一起游历过的那些城市的缅怀。他喜欢热那亚辉煌的宫殿，他觉得要比佛罗伦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远远胜过巴黎，尤其在道德精神方面，简直天下第一。

“那是个智慧的国家，”先生常说，“坎波亚莫尔把它描绘成‘天才与战争的国家’。无疑他是想到了波旁家族，同时想到了波拿巴。至于这位波拿巴，虽然已被置于残废人之列，但他既不是法国人，也已威风扫地，一钱不值。他像多少独裁者那样到来以上帝的名义胡作非为。他的权势维持了不到二十年，而在那些凯旋门的墙上(萨拉戈萨，瓦格兰姆，奥斯特利茨)刻着他的那些胜利其实不过是些失败。他是个冒险家，而法国恰恰代表着延续性。总有一天人们会把他从现在安置他的圆形陵墓里刨出来的。”

我问他陵墓里的尸首朝什么方向安放没人知道，是否确实。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先生答道，“不过，我不能让你对这些奇迹一无所知。一切都建在路易十四陵墓底下，建筑师是布鲁安特和曼萨尔特。波拿巴，”先生很少叫他拿破仑，“被安放在五、六副棺木里面，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其中有一副是铅制的。红斑岩的石棺放在一个新古典派风格

的绿色台座上，坐北朝南。可是，由于它和周围的石棺摆放得那样匀称有致，根本搞不清将军(他从不叫他皇上)的头朝哪儿。这似乎确认了拿破仑式的冒险是有头无尾的。”

夜幕降临了，我们都呆在花园里。这是一个宁静的夏夜。他默不作声，抬头望着夜空。月光下，他那古典式的假发一片银白。

“多年以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夜晚……”他呢喃着，可是他突然改换了话题，大谈起古老的法兰西王国的宫殿来。

“拿破仑三世，”他说，“之所以能住得舒舒服服，并不是因为他那什么都不知道叔叔，而是由于梅迪西斯的卡塔利娜。土伊勒里宫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公主兼艺术家的个人杰作，她想住得离那闹闹嚷嚷车水马龙的卢浮宫远一些。后来，卢浮宫和土伊勒里合二为一，并且建起了名为水榭的画廊，由于法国的国王们在那里为列队而来的病人们治病而著称于世。”

我一脸的惊奇，

“治病……？”

先生微微一笑。

“他们既非医生亦非神仙，可他们是国王，介乎于两者之间。今天我们生活在讲真科学的世纪里，对此当然很难理解。然而，从长远来讲，科学不可能摆脱其巫术性。”

“可是，法兰西这个理智国家的国王都是巫师吗？”

“我再说一遍：他们是国王。看着他们穿了教堂玻璃窗

上那种大红大白的王袍走在胆怯的人群里，用手轻轻地抚摸那些人的脑袋，嘴里念念有词：‘国王抚摸你，上帝治好你’，那该多有意思啊。”

“他们能治什么病呢？”

先生又笑了笑。

“他们有超凡的能力，应该能治百病。不过，我不知为什么缘故，他们专治淋巴结核和甲状腺肿。”

先生顿了一下，接着说：

“大概是因为这些病能不治而愈。”

那么他们就是一群骗子啦？先生这时神情严肃，我不敢问出声来。不过，他好像猜到了，也许是他也有这么一个问题，便轻声答道：

“谎言和真理构成一个整体。夏尔科说：歇斯底里的喜剧是歇斯底里自身的一种真正产物，严格说来不能把它视作喜剧。谨慎比谎言好。阿尔培大帝时代的智者把鸡蛋塞进细颈瓶里，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是靠口诀神咒，一是用醋把蛋壳泡软。好的巫师肯定把两者兼吸并蓄，双管齐下。”

我实在忍不住了：

“如果把蛋壳泡软了把鸡蛋塞进瓶颈，巫师的符咒不就多余了吗？”

“你是这么想的吗，孩子？可是，巫师要保证他的法术万无一失啊……”

先生岔开了话题，免得又是一场争论。

“夜色多美啊，”他叫起来，“你喜欢这些山吗？”

“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答道。

夜色确实很美。我真想建议先生一起祈祷。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闭上眼睛，凝神运气。我们的身后飘来一股茉莉的芬芳。

“我也生在这里，”先生说，“而且我相信自己也会死在这里。夫人迟早会厌倦镇上的别墅，回到她多么喜欢的这块地方来的。”

这是先生首次提到他们的分居。

“至于你嘛，”先生接下去说，“因为你要成为家庭神父，我们最后的时日就靠你了。”

我坐在他脚旁，摸着自己的一只耳朵。

“不过，上天保佑，我们还能活好多年呢。要是能从这儿飞到巴黎，又从巴黎飞回这儿，中间哪儿也不停，那该有多好……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气球会得到完善，我们就能乘气球遨游太空了……”

他就是喜欢这样不停地胡思乱想。

五

在神学院里，我们有一位很好的音乐教师。这位毕神父崇拜现代作曲家，是个瓦格纳迷。当时瓦格纳在西班牙还几乎不为人知。毕神父认为瓦格纳代表了音乐的未来。

“他把一切都彻底改变了。”毕神父热情洋溢地对我说。

对于一个温和保守的人来说，这种崇拜之情有些出奇。而他对俾斯麦和好战的德国推崇备至就更令人不解了。说真的，今日酷爱西格弗里德和瓦尔基里亚斯之夜骑扫帚而飞上天空的女巫的人可就多了。

“这丝毫没有有什么可奇怪的，”先生对我说，“俾斯麦亲王出身寒微。威廉一世也不过是勃兰登堡潦倒侯爵的一位传人。想当大人物的梦想专爱招惹无名之辈。那个被传得走了样的故事，说什么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在凡尔赛宫的镜廊里当了皇帝，肯定也传到了这些无名之辈耳朵里，深藏于心了。瓦格纳正是这种不可能持久的事物非常状态的产物。”

学着我的老师们的腔调，我壮着胆子问先生，他是否认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武力上德国都是世界第一强国。

“我当然丝毫也不这样认为。从一个未来的教士嘴里听到这种想法倒是令我奇怪。普鲁士文化仅仅是俾斯麦同天主教决一死战的文化。”

他说得很有道理。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德国描绘成一个廉洁正派的国家呢？年轻人都要求问题要有答案，而我则自己回答自己：“因为法兰西是个腐败的国家。”报纸天天谈到法国的道德败坏和无政府状态。确实必须承认，如果文学和戏剧是一国人民的标志的话，那末圣路易的祖国就不能以勒南，孔普特，大小仲马，左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名字引为自豪了。

“你还忘了贝纳迪塔·苏比隆，”先生说，“忘了卢尔德的奇迹，夏都布里昂，让·克鲁依塞特这位《基督纪年》的作者，还忘了路易·维伊奥……”

心之所想总是要表露出来的。除了上帝之外，没有绝对的东西。我陷入迷茫之中。

“瓦格纳同波拿巴一样，”先生接着说，“是放肆不羁的人。因而不是伟人。因为伟大就在于举止适度。我承认他们两位都熟悉自己的职业，在各自的专业范畴内表现出高超的技能。但他们都没有前途，恰恰是由于他们看不到事物的全貌。我们习惯于把离奇的事称作天才而不说荒唐，其实都是一回事。对瓦格纳的崇拜热必定会像对波拿巴的崇拜热一样很快过去。”

“只有靠近上帝才能看到圣容。”我叫起来。

先生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语声。

“他们两位都是放肆无度的人，不懂人类的灵魂。谁能忍受得了西格弗里德颠来倒去的重复，瓦尔基里亚斯震耳欲聋的喧嚣，尤其是那冗长无比的舞台场面？一顿饭吃三十个菜谁的胃也吃不消。法国人很快就对他们的英雄厌倦了。就连那么亲波拿巴的贝朗瑞本人也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他那个时代的感受：

恐怖的黑夜，动乱的白昼，
鼓声，鼓声，鼓声，鼓声！
迄今还使你们害怕地听着，

鼓声，鼓声，那可恶的鼓声？”

我根本不认识瓦格纳，对他丝毫不感兴趣。但对于德国霸权的道德官司我却十分关注。先生认为俾斯麦帝国维持不了多久，普鲁士是外强中干。其国民尽是专家，目光却并不远大，辨别不出精神上的差距。

“这样的人民，”先生说，“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实际上是群乌合之众。”

可是，一盘散沙恰恰也是我的老师们给法国人作的鉴定。

“巴黎是地狱的分店。”毕神父对我说，“法国人不信神，放荡堕落，只知寻欢作乐。七十年代的战争就是上帝的一次警告，但他们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自杀性的蛊惑，社会主义已渗透进共和国，最终会弄得一塌糊涂。”

毕神父总是把伏尔泰和勒南的名字挂在嘴上。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尼采，也不知道当时尼采是否已经写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反基督》。当然，谈到社会主义，谈到唯物主义地解释历史(过了许多年我才想到这一点)，似乎他不知道四八年革命的启蒙家卡尔·马克思是德国人。

开头我已说过，先生是先从文学入手教导我的，他的教诲也同神学院的格格不入。我们的老教师们都爱夸张，经常使用道德败坏、荣耀、桂冠等一类的词汇，并且单调得令人生厌地不断重复。把古代诗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些形容词都不值得一提。神学院简直就是语法学院。什么变

格啦，副词啦，动词啦，补语啦，不停地往你耳朵里灌。而在比恩庄，从来也不提这些。

“小伙子，可得十分留意语法。”先生笑着对我说，“语法家都是忠厚的泥瓦匠，他们用句法的灰浆把石块一块一块地垒砌起来。泥瓦匠也只是看到了这一点。至于由建筑师设计的大楼整体，他不感到兴趣，连想都没想过。”

先生给我的那些稿纸里，委曲求全、自我克制简直随处可见。这自然和浪漫主义不共戴天，浪漫主义主张通过呐喊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文学至少可以，”先生写道，“通过浅显易懂亦即聪明的方式来表达精神面貌。一个好作家只能努力达到这一点，别无他法。谁若不想这样做（例如雨果的《欧那尼》），那就连当个抄写员都不够格。”又写道：“对平民百姓来说，一旦理解了就不再是超凡的天才，他们总是把夏都布里昂看得比拉封丹重要。”

提到拉封丹，先生在去世前几个星期对我说，文人总是把自己看得过重。“也许拉封丹是极少的例外。其实，那只是一位业余爱好者随手写来消遣的，根本没把自己当成天才。他首先寻找的是乐趣。我认为艺术有些像婴孩，他们的降生不是靠理智也不是靠道德准则，而是由于偶然的一夜快活……”

我问，他是否一个肤浅的人，他的生活是否同寓言里所颂扬的精神相去甚远。

“那当然，”先生说，“在他写的寓言里，道德的力量并不大。主要的是才智、欢乐，格律和韵味的不断变化。举

个例子吧，指出猫的缺点并不是要鞭打它，那就荒唐了，因为谁都有弱点，恰恰相反，倒是因为好玩。他本人就是一只猫，懒惰、自私、桀骜不驯。他把家产挥霍一空，连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爵位也卖掉了，一直寄人篱下。现在你该明白了，假如他不是像猫那样有某种长处的话，想获得这一成功谈何容易。”

我没问他的长处是什么。先生接下去说：

“他总能找到保护人。时间最长的一位是萨布利哀夫人。他们互相会意的方式颇令人奇怪。拉封丹住在一位有权势的先生家里，一天他见东家死了，便抢在下葬之前赶紧上街去了，因为他需要找份工作。回来时在街角碰上了萨布利哀夫人，夫人急匆匆地对他说：‘我正找您呐，您上哪儿去呀？’‘夫人，我正要到您家去呢。’”

这样不讲尊严使我的脸都红了。我虽然没开口，先生早料到我心中激荡之情了。

“拉封丹没有尊严，”先生说，“这是事实。但他也有其美德……你先别忙于生气，”先生笑了笑，“你想一想，尊严也可以是骄傲自大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是一种致命的缺点……是滑稽可笑的。”

这些话我听起来简直像开玩笑。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也无法理解，致命的缺点同时又会滑稽可笑的。然而，在伟大的上帝面前，骄傲自大确实就显得是一切罪孽中最可笑的了。

我们在星光下谈论着。夜深了，他伸过手来让我吻。我

起身的时候，先生还对我说：

“你应该同拉封丹和解。假如我下辈子转世专门从事写书的话，我一定引用一句他那有名的亚历山大风格的诗句作为座右铭：

在无尽的欢乐中加一点荣耀……”

我找遍了诗人的全部著作，也没找到他那亚历山大式的诗句。显然，要想在拉封丹的全部诗作中寻找一个诗句，无异是大海捞针。我不知道先生那非凡的记忆是否已开始衰退，尽管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一点。无论如何，假如亚历山大式的诗句是假的，那它倒真该确确实实存在，把它编造出来更证明了寓言的作者和它实在灵犀相通

六

按照先生的吩咐，我的健身房设在两道夹墙之间，由一架藏在墙里的小梯可以通到藏书室。这是间宽敞的拱顶房子，设有各种各样的器械，一个墙角里立着一具古代竞技者的塑像。

“你应该练得像它一样，”堂安东尼奥曾这样对我说，“你的宗教使命同体操丝毫不冲突。”

尽管我的天性被现在称作体育的活动所吸引，我对先生的看法却有异议。你很清楚，米格尔，关于我的使命纯

粹是碰运气。先生比谁都该更清楚。我栖身教会恰恰不是因为品德，而是由于我的自尊心无法接受命运安排我要在人世扮演的角色。我满了十二岁以后才发现这一点。我不清楚先生夫妇是否怀疑我的抉择(多亏了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大力规劝)违背我的感情和性格。虽然先生有高深的人道学问，很可能他至死也未能理解我，毕竟我们是处在截然不同的地位。对他来说，生活是轻而易举的：他一生下来一切就都是现成的，先辈积攒的财富使他不愁衣食。这使他成了追求享乐的人，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也许还在另一个世界上(上帝的意旨)享福的人。体育对我来说是受罪。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对自由自在的人来说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而对已经立下誓言恪守贞操的人来说则不然。许许多多禁欲派作家都主张使肌肉疲劳以驱除肉欲。却并不尽然。长年以来，我频繁地狩猎、爬山，只吃粗茶淡饭，不仅毫无效果，甚至适得其反。我敢说，体育锻炼是贞操的大敌，它不仅不能遏止反而刺激身体的机能。目前美国新教的旨在使教士阶层“现代化”的倾向，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还没到早上九点，我已经在单杠上做我的锻炼了。这时有人敲门，吓了我一跳。我问是什么人，因为我无法去开门。回答我的是先生的声音：

“是我，胡安。”

我没有在意，大汗淋漓，几乎是赤裸着身子，便一跃向前去开门。堂安东尼奥笑咪咪地出现在门口。他一把围

住我的脖颈，把我拉到雕塑跟前。

“太好了，”他说，“只是希腊人(当然是指大理石雕的)不出汗就是了。”

我脸红了，请他允许我去穿衣服。

“闭嘴，”先生说，“随我来。”

他亲自把一条浴巾披到我肩上，把我领到窗前。百叶窗半开半闭。我还要交待一下，健身房正对着工头住房前的小院。

“在这儿我们可以听听兽医说些什么。”先生说。

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说好了叫印加的兽医过来阉几头猪。

“他已经干完了，他们要给他倒水洗手。且听听这位共和派有何高见。”

实际上，这位兽医是个社会共和派，与业主们和“先生们”都誓不两立。他约莫二十五岁年纪，却是坐一辆归他自己所有的漂亮车子来的，说起话来装腔作势。他走进院里，挽起两只袖子，露出一件质地上等的衬衣。他一边在放到石凳上的一个小盆里洗手，一边同周围的人攀谈。

“这个洗手盆真够原始的。”他说。

“这比什么都好，”玛多·弗兰西娜答道，“这样你就不会把地毯弄脏了。”

“比恩庄的先生们真够落后的，连个浴室都没有……”先生高兴地抓住我的胳膊。

“他们有浴室，还有锌皮的浴盆，有镜子。”玛多·弗兰

西娜说。

“现在一只澡盆花八个杜罗还买不来呢。”工头也帮了一句。

“怪事，”印加来的人说，“因为这些人总认为浴室是罪过。”

“我没说洗不洗澡，我只是说有澡盆。你是什么人，这么爱管闲事。”玛多·弗兰西娜打断了他的话。

“那澡盆一定是摆摆样子的。”

“与你无关。”

“印加有什么，城里就有什么，在比恩庄也有什么。”工头插话。

“这房子似乎不小，”共和派说，“可你们的房间太旧。死气沉沉的。”

先生把嘴凑到我耳边：

“他开始激他们了。”

“我可要警告你，拿先生夫妇的房子来我都不换。”

共和派笑了，笑意不善。

“他们也不愿意，工头。”

“他们也不愿意，”玛多·弗兰西娜跳了起来，“各人有各人的身份，身份不同，住的也不一样。”

“什么先生先生的，都老掉牙了，该靠边站啦。”印加来的人继续说，“只要瞧一瞧他们是怎么种地的就够了。刚才路过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葡萄园糟糕透了。”

“那是有虫子把葡萄根咬坏了才死的。”

“害虫就是那些先生们，他们到城里去挥霍，却让土地荒芜。”

“或者到巴黎去挥霍。”先生喃喃自语。

那位印加来的人开始大骂那些不干活的人，并且说他比许多有产业的人活得都要好（我发现他避免用“先生们”这个词）。接着，他神气活现地宣布，每头猪要比头一年多收半个瑞尔。他洗完了手，在华贵的衬衣上面罩上一件新的绒上衣，出去找他的车。我必须写清楚，他只差带一个给他开车门的随从了。

“这家伙要我们的命呢。”先生脸上带笑。“你穿好衣服，快来用早餐，有巧克力呢。”

我们正要离开餐桌，门厅里出现了本堂神父堂安德雷斯先生，我们顿时猜到他的来意。年年狂欢节前一个礼拜的星期二都是如此，他在镇上受不了这个节日，便跑到这儿来过，这已经成了一种默契。

“星期二就要到了，”堂安德雷斯说，“我想应当来问候您，顺便谈谈这件事。”

“见到您我真高兴，堂安德雷斯先生。您若不介意，我们就在灶前坐一坐。胡安，你也别走。你很快就要当教士了，也该熟悉一下这些‘问题’了。”

我心里想，对于一个如此重要而且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问题，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本堂神父自然不会很痛快。这是教会与士绅之间由来已久的一场争斗，一场明争暗斗，每年又以妥协告终。

本堂神父开始了他简短的演说，历数狂欢节这个源于异教的节日的危害，并且毫不卖弄地就此作了历史的总结。

“教会不会同意搞狂欢节。光是把脸蒙住了可以无法无天，甚至做些当面谁也不会做的令人羞耻的事情……”

“别忘了，”先生委婉地说，“尽是开开玩笑，无所谓的玩笑罢了。”

“在某些场合确实是这样的，”本堂神父点头称是，“不论是舞蹈还是欢乐本身都不能被看作罪过。经书上还说，大卫还在约柜面前跳舞呢。不过，遗憾的是，我们都非圣洁的天使，那些玩笑开始的时候常常像先生所说是无所谓的，后来就变成罪过了，尤其是当我们戴上假面的时候，挡不住上帝的慧眼，也能挡住凡夫俗子的目光。”

同往年一样，本堂神父不无道理地加以反对的，是让戴假面的人逍遥法外。而先生则不愿接触这个话题，因为他认为戴假面正是整个狂欢节最精彩动人之处。

“请考虑一下，堂安德雷斯，”先生说（这是他十分典型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取消狂欢节，那么四旬斋也得取消了。”

“四旬斋是为了忏悔，不光是因为狂欢节的缘故，还因为任何一件罪过……”

“什么样的罪过无关紧要，”先生巧舌如簧，“可总得有罪过才能守四旬斋吧。”

“另一方面，”本堂神父自顾自地往下说，“故意装出本不存在的感情来，哪怕就是开玩笑，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听任人们去撒谎而不是别的，这样说来，狂欢节就是教人弄虚作假的课堂。”

先生沉思了一下说：

“特斯皮斯创造出希腊闹剧的时候，梭伦断言这种演出是不道德的，其理由恰如您刚才所言，它教人作假。‘它使人习惯于背信弃义，说谎骗人……’但是梭伦认为特斯皮斯并非创造了什么‘新东西’的巫师，只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加以具体化明确化罢了：人已经慢慢变得不单纯，欧洲的灵魂复杂化了。复杂化的一个标志恰恰是想像看戏那样看看实际上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弄虚作假。谎言同世界一样古老。大家都想在一面镜子里照照自己。”

“人类越来越放纵自己了。”本堂神父堂安德雷斯说。

这一回轮到先生不理睬他，自顾自说下去：“早在特斯皮斯之前很久，雅各就骗过自己的父亲，装作以扫从父亲面前走过。为此他用羊皮裹住自己的双手，因为以扫的毛发很长。这种作假行为旨在获得好处，无疑应当受到谴责。但是，特斯皮斯扮演一个角色并非要人们就把他当作那个被扮演的人，而是当作演员看待。他只是想玩一玩，乐一乐，他公开就这样讲。同梭伦的看法相反，特斯皮斯是最坦诚的人。堂安德雷斯先生，难道您从未想过，我们的人民娱乐得太少了吗？劳动者应该得到补偿。胡安，你怎么想的呢？”

我认为，他这番话同一个小时前那位印加的共和派说法相去不远。共和派那可恶的骄横样子还历历在目，我根

本无法去深思这种煽动性要求的危害。本堂神父先生默不作声。堂安东尼奥自言自语一般说下去：

“我认识一些人，特别是女士们，他们从不涉足舞会，葬礼却是每有必到。长此以往，这必然会影响到性格。我们就会越来越懒，最终除了去死便什么也不会了。”

“上帝恩赐所有的人都会善终，堂安东尼奥。”堂安德雷斯说。

“阿门。”先生应道，“不过，那得在有了一些经历之后。如今我已经不年轻了，我该向您说句心里话，对这些人我颇为同情。那天我听到两个小伙子在花园的柏树下促膝交谈。我是在自己房间的窗口听见的。其中有一位情愿拿一条腿去换一只表。他就这样愚蠢地胡说八道，仿佛从不知道有一副正常健壮的体魄是多么宝贵（说到这里先生的眼睛盯着我）。我告诉您，”先生转向本堂神父，“他们都不是小孩：两个人的年龄都已经到了……”

“宽恕无知。”本堂神父先生念念有词。

堂安东尼奥先生似乎不耐烦了。

“堂安德雷斯，我们不能把人类永远囚禁在净界。这些人穷苦，无知，没有教养，终日庸庸碌碌。一年才一次的这点儿小小消遣，我们不该再吝惜了。”

“他们就是犯了该谴责的罪过也不管？”

“恐怕，包括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说去年丢了一只银勺。先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不是对你讲过比埃尔愿意拿条腿换只表吗？如果他

们连一条腿的价值都不懂得，你还想让他们把丢一只银勺的事放在心上？”

“所以他们也没有分寸，必须给他们一定的限制，堂安东尼奥。一蒙上脸，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先生您是知道我怕这样的节日的。”

“那当然，堂安德雷斯，必须盯着他们。您在镇上是无力避免他们胡作非为的。”

“镇上只有一个老看守，另一个卧床不起，还有一位司事……”

“我知道。这儿的看守就多了。尤其是有玛多·弗兰西娜在，必要的时候，她一个人就足够对付所有的人。堂安德雷斯，不是我想让他们来跳舞，何况我明明知道您不同意办舞会……”

“起码不能把脸蒙上才行……”

“堂安德雷斯，好事就做到底吧。他们爱怎样就怎样。然后，在四旬斋的时候，让他们祈祷、反省就是了。我说过了，我可不愿意让他们来闹个天翻地覆，把我的勺子都偷走。不过，假定由于您提过的那些理由不准在这儿庆祝狂欢节，您清楚，我总是听您吩咐的，玛多·弗兰西娜不会答应……”

我不知道本堂神父是否看出先生的乖巧，明明打算在庄园大搞他本堂神父所不同意的狂欢，却还装出唯命是听的恭顺样子，真可谓得了便宜还要卖个乖。本堂神父一点儿也不傻，尽管出于谦虚，有时权充大智若愚的姿态。

“不胜感激。”堂安德雷斯喃喃道。

堂安东尼奥作为胜利者，显得十分慷慨大度：

“要知道，我心底里也不同意搞这些狂欢，其唯一的借口就是一年才搞一次。总之，随他们搞去吧，反正我谁也不邀请。不过，倘若星期二他们都来，把我的庄园都抢了，我也不会向他们开枪。无非是开个玩笑罢了。眼下这类的‘抢劫’也太普遍了……正是用的这个词。”

同往年一样，事情也以妥协而告终。

七

那是九月革命前不久的事。先生同堂娜埃克西玛花掉了一大笔钱，他正打算把城里一处多年来一直关闭着的房子卖掉。为此，我们于一八六八年夏末搬到城里。在此之前，先生通过本堂神父征求夫人的意见。堂娜玛丽娅·安东妮娅的回答像她本人一样毫不含糊：

“假如有一天我们重新共同生活——眼下我连听都不想听到这件事，我会提出条件不准离开山区的。城里说长道短的人太多了，我们哪里还顾得上去听这些飞短流长？在这儿，这场风波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没人去谈论它了。我想，托内特能把房子卖掉，把债还清，没什么错。”

我们在帕尔马城呆了约莫五个星期。卖房的事令侄子们大为不满，他们把房子当成是他们自己的。尤其是堂娜

玛格达莱娜，简直不满至极。那是塞奥区的一所老房子，一个哥特式的院子，一座石楼梯。门厅里挂满了画，客厅里摆设齐备而讲究，墙上裱着锦缎，壁桌镀着金漆。对于虽属名门望族收入却不高的基督徒来说，这房子是有些过份奢华。

“无论如何，”先生说，“只等我们一闭眼，侄儿们就会卖掉它的。他们不愿学习，不图上进。而她呢，又和一个船长结了婚……”

堂娜玛格达莱娜和一个外地人结了婚，据说他除了自己的专业什么都不管。那几位兄弟成天到赌场里去玩，要不就打扮得衣冠楚楚，抽着上等雪茄，到处闲逛。他们妄自尊大，只看那些武侠小说。先生夫妇对他们无法忍受，却又不愿取消他们的遗产继承权，因为自己没有子嗣，还希望家谱能够自自然然地续下去，算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因此，他们从未想过立遗嘱的事。在城里住的时候，先生夫妇尽量避免看见他们。房子一卖，相互的关系实际上就断了。

帕尔马当时是座破败的城市，到处是窄小的街巷和修道院。三五年的革命怒潮破坏了一些修道院，其中包括圣多明各修道院，当时是最富有、最具艺术性的。堂娜伊莎贝尔二世（有人称她为天使）王朝使这些行动登峰造极。最后，无视教会神圣权利的乱民，不是受到领导人的支持而是因为无人过问而变得愈加猖狂，他们并不就此罢手。在九月革命期间，我们看见他们推倒了女王本人的雕像。她本该给

我们带来自由的，遗憾得很，由于她心地善良，结果只是造成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阿尔科莱亚战役后不久，我参与了那场破坏行动。我们游完城墙回来。那是个凉爽多云的下午，令人想起比恩庄的秋色。我怀念那些棕鸟，怀念已经遍布绿茵在雨中微笑的土地。我从港口望去，眼前出现的并不是那种可爱的景色，而是一片一动不动、虎视眈眈的海洋。我们顺着玛里纳街往前走，看到在波尔内的伊莎贝尔纪念碑旁边，一群歹徒用一根绳子拴住女王的腰部，又笑又喊地要把雕像扯倒。陪同我们的教士们（他们听从了在那里袖手旁观的卫兵们的劝告，大概上头有令不许他们多管闲事）要我们向后转顺墙根走，进卡拉特拉瓦大门。我因为一开始就挤到前面去了，没发现大家退回去，突然之间我一个人被撇在那里。这时候，一个码头装卸工朝我走过来，以保护人的口气笑着对我说：

“小伙子，别害怕。你要是大主教，就不会让你这么轻松了。不过，眼下你还什么都不是嘛……”

我当时一点儿也不害怕，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正好说反了，老兄。正因为我什么都不是，你对我怎么样都行。不过，我要是主教先生的话，你连我的衣服都没胆量碰一下。”

“你这个畜生是想吃我一个耳光吧。”装卸工吼起来。

“我不想。不过，有这串念珠嘛，”我把它晃了晃，“我谁都不怕。”

一见十字架，那伙人放开了我，并用一个指头指指额头，似乎在说我神经错乱了。我在一张凳子上坐下，在那伙人仇恨的目光下祈祷起来。至今我还说不清楚，我当时那么冒失是想干什么。一方面，我觉得有力量打倒那个装卸工，打起来会使我觉得很解气。但我也清楚，真的把他打伤了，我会内疚得再也无法安宁。自从海梅的悲剧发生以后，一切暴力的想法都会使我心惊胆战。假如要我在侵害与被侵害之间两者择一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那位恬不知耻地要保护我的又黑又小的家伙很可能已经结了婚。我仿佛看到那样一幅情景：他负了伤走回家门，家里穷困不堪，一群孩子肮脏瘦弱……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意思，把令我血液沸腾的战斗冲动驱散得无影无踪。在比恩庄，是通过爬山，夜间到池塘里游泳，或是到森林里狩猎来平息这些冲动的。在神学院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而我坐下来祈祷这种挑衅行为（因他们斥之为挑衅）完全是由于那种冲动在年轻人身上造成的不安。不知什么时候，我一边为不幸的女王祈祷，一边看着那伙人汗流浹背地拼命拉也拉不倒那雕像，他们既没有力气，也不知道怎么拉，我感受到一种十分强烈的诱惑：我也去扯那雕像，做他们做不到的事。因为我长得瘦，谁也看不出我到底有多大的力气。我仿佛看到那伙人越来越惊讶，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喝彩，而魔鬼也在对我说，在革命时期能博得众人的钦佩对教会也是有益的。我闭上双目，凝神运气。一声轰响使我睁开了眼。雕像被扯倒了，西班牙女王的身躯被摔成碎片落在离

我不远水沟的污泥里。一座以其祖先以其忠诚而辉煌于世的城市刚刚身败名裂。

趁着我们还在城里的时候，有一天先生带我去看一出歌剧。那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意大利剧团，演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演员们唱得好极了，歌剧本身也无可指摘（不像其他剧团那样扭着身子演）。可是，扮演罗西娜的那位女演员十分过火，连那些细微的动作都同一个出身于体面家庭的有教养的年轻小姐格格不入。我把我的感想告诉了先生，他笑我缺乏处世经验：

“而且，你凭什么说她就是属于一个体面家庭的呢？”

我的天哪，又凭什么非得说不是呢？文学论著里不都说戏剧应当是风俗的学校吗？

先生还带我参观了圆厅。它的墙壁是用镜子镶成的。它有两座回廊，由四名衣服穿得很少的大个子女人撑着，人家告诉我，这是受到庞培风格的启发而雕刻出来的。在有舞会的日子，乐队便在回廊上奏乐。说来真难以相信，一个如此有节制的社会，甚至可以说在维持本世纪风俗方面如此顽固不化的社会，竟然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听任人们频繁光顾不偏不倚地建筑在圣多明各修道院原来地基上的俱乐部。

“不管怎么着都是一回事了……”那些令我奇怪的人这样说。先生呢，倒是以不变应万变。

“生活会教你习惯一切的。任何事情都有其原因，因而也是正常的。等你当了教士，在忏悔室里你会明白许多事

情的。”

年轻人很难妥协。先生的见解与我的观点仍然各奔东西。我们之间不仅在年龄上有四十年的差距，而且在文化素养上亦有天壤之别。我总是说，而且你我也谈论过千百次，先生们的伦理道德与穷人的相比总是要来得舒服一些。基督的学说起初是在最普通的民众心中得以传播的。超人的可悲创造者尼采怀着十分典型的普鲁士历史观说，基督精神不过是奴隶的暴动而已。他的口气十分轻蔑，因为他的高尚气质已消失殆尽，一心只想摆脱异端邪说束缚在他身上的精神枷锁。要想不犯过失，士绅们需要具备许多美德。我们应当为他们比为平民百姓祈祷得更多，照经书上的说法，天国迟早都属于平民百姓。

阿尔科莱亚战役之前的日子里，到处都在大谈政治，虽然地方报刊谨慎地规劝人们少作议论，待局势更加明朗以后再说。然而，议论难以避免。科耶拉侯爵是最熟悉城里情况的人之一，他既年轻，又好动。他经常到马德里去。据说他对拉托雷公爵塞拉诺将军颇有影响。他当过自由党（不久他又成了保守党）众议员，虽然时间不长，因为当时朝代的更迭速度快得惊人。他十分善于辞令，他那些有地位的支持者们——他开始拥有支持者了——说，如果伊莎贝尔二世听过他的宏论的话，连王位都会托付于他的。流言蜚语说他和堂娜奥布杜丽娅·蒙特卡达调过情（那时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粗俗的词了）。她是一位十分傲慢的女士，同比恩家族的第二支血脉病弱的一位有过短暂的婚姻，因而同

先生夫妇也沾上了亲。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分支的长子们都有男爵头衔，他们想把比恩家族说成同内默尔斯王子及纳瓦拉国王联过姻。先生的意见，那种说法没有根据。确实，档案文件里没有可资证明的凭证。然而，我们没有权利去否定它，堂安东尼奥在回忆录里涉及它时，有些失于轻率。同堂娜奥布杜丽娅调情非但没有使侯爵声誉扫地，反而身价百倍。大概没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照先生的看法，“两个都是笨蛋”)，那位奄奄一息的比恩人对损害自己的飞短流长也一无所知。侯爵在自己雄辩家的光轮上面又添加了一顶堂璜的桂冠。这顶桂冠他戴了一辈子，虽然那些妒忌他的人到最后也未能证实如此荒唐如此难以置信的事。上层社会就是这样，尽管自称为天主教徒，也免不了时有雅兴。驱动天底下和蔼可亲无忧无虑的人们的，未必就是邪恶，而是与邪恶同样有害的轻浮。

上面所说的破坏行动之后，帕尔马当局力图维护社会秩序。然而，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逼人深思，也证明了人的本性是多么不可信。先生的一位表妹从圣卡耶塔诺修道院出来，走到卡拉塞斯街的时候，被迫躲进一个门洞里，避让一支“民众示威”队伍。走在队伍前头打着一面旗子，头发散乱、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的女人，竟然是在她家里干了近四十年的厨娘。我还听人讲起皮纳的一位老太婆，她住在维沃特大厦的阁楼上，是位圣徒。圣欧拉利亚教堂的本堂神父由于有些迟了，正急匆匆地赶着要去主持弥撒，这位老太婆却对他轻声说：“道袍绊腿走不快，我

们替你把它脱了吧。”令人惊异茫然的是，她也是去参加这位本堂神父主持的弥撒的，而且像平时一样虔诚地望完了弥撒。我还听到一件事，不过我不很相信，说什么比尼亚马尔伯爵的车夫对他说：“从现在起，我当伯爵您就当车夫吧。”有一件事倒是确实有的，尤契玛约尔的一户人家得到通知，说他们的房子要被烧掉。这一家有个女儿正得了伤寒。他们急急忙忙地把病人连同珠宝细软塞上车，立刻往帕尔马逃去，到了一座山岗上就望见整座楼房都被火焰吞没了。火势凶猛，连几家邻居都被烧着了，那位出主意放火报复的人的房子也同归于尽，本人也气得神经错乱而死。革命犹如闪电，是一股脱缰的盲目的力量。愿上帝解救我们大家吧。

在比恩庄也有造反的企图，例如，有两个胆大包天的共和派未经先生允许便去敲钟。可是这儿的人都明白事理，那两个家伙刚刚下到广场，便被大家乱哄哄地团团围住，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一下把他们吓坏了，再也不敢折腾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把先生夫妇这样贵重的房产拿去出卖，似乎不太合适。侄儿们建议拖一拖再说，也不无道理。堂安东尼奥谁也不听，一意孤行。除了急需钱用外，他还急于离开城里，一心只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八

九月二十八日，房子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手了。一方面是因为手头紧，另一方面也因为不懂得待价而沽。房子一脱手，先生就准备上路回庄园。我陪着他。第二天便举行家祭。自从先生夫妇分开居住以后，只有在这种场合见面。而且双方都商妥，为了免于闲话，仍旧在祭坛前并排放着两张大椅子。仪式结束后，本堂神父过来问候他们；三个人走出来，面朝镇上，在门口交谈了一阵。不一会儿，先生看看表，大声说：

“时候不早了，从这儿到比恩庄还得走一阵子呢。”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也接口说：

“尤其是这些路又陡又弯太难走。多亏那些骡子都走惯了。”

他们客客气气地道别，直到来年才再见面。那一天，他们的谈话拖长了，谈了些最近发生的事。据说堂娜伊莎贝尔二世已经到法国去的说法失实。不过，第二天她倒真是走了。本堂神父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多心的堂安东尼奥便尽量不谈政治。

“您认为假如共和国到来的话，人们会怎样反应？”

“肯定都得发傻。”先生答道，“我们得忍受军乐队啦。演讲啦，不过，不会发生什么要紧的事的。”

突然之间，镇上对先生夫妇之间发生的事比对女王的命运更感兴趣。当堂安东尼奥刚刚钻进马车，他的夫人刚刚走进教堂旁边的家门，就像往年一样，议论就满天飞开。

“他们不像吵架的样子。”

“谁说他们吵架啦？他们好得简直不能再好啦。”

“那他们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

“那是两回事。”

“他们就像城里人一样，面和心不和。”

“看他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夫人太委屈了。那甥女的事……”

“还有芭尔芭拉·蒂塔娜的事呢？”

“那是瞎扯。”

“瞎扯？”

“瞎扯和妒忌。”

“那么，先生房里的灯一夜亮到天明难道也是瞎扯吗？”
一个声音因为气愤而激动，又由于害怕而压抑。

“一晚上亮着灯？”女人们问，“那么晚还干什么呢？”

“你们女人都不知道？”又气愤又害怕的那位说道，“那我也不知道。”

“要知道这些得问玛多·弗兰西娜。”一个十分神秘的声音说，“不过，她太狡猾。”

“我一直就听人说，”一位老太婆叫道，“半夜三更亮灯的人是要招邪的。”

本堂神父堂安德雷斯忽然出现：

“行啦，该闭嘴啦。你们也不怕闪了舌头。该回家做你们的汤去啦，都什么时候了。”

在这片森林里，表面上生命在单调地逝去，实际上，它却蕴含着精神的生活。先生的生活是在书堆里度过的。人们毫无根据地指责他和玛尔加里塔，一位比他早一年去世的金发村姑有什么瓜葛。当时他已经开始穿褐色的袍子，由于秃顶，戴着路易十五式的假发。他很瘦削，并且脸上也像伏尔泰一样布满了皱纹。沸沸扬扬地传说他要破产了，但他很清楚什么是会导致他破产的理由。自一八四八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以来，他就认为世界将按一种新的方式加以组织，资产阶级的时代即将完结。他觉得，获胜的将是社会主义。有一天下午，他就是这样对本堂神父先生说的。

“愿上帝拯救我们，堂安东尼奥。”堂安德雷斯说。

先生像预言家一般说道：

“也许名字不同，人们会用另外一种称呼。但是，想与时代洪流抗衡的政府只能加速这一洪流的到来。”

关于那些士绅们，他也有一些不那么恭敬的看法，我说不准是现代派的呢，还是封建的。根据他的观点，重要的家族，宛如葡萄美酒，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自我形成的。帝王们常常不过是些冒险家，更有甚者，他们有什么权利来颁发贵族的证书呢？

“海梅一世是不是他父亲的儿子，尚未得到证实。”他对本堂神父说。

“这些事情听着真让人害怕。”

“堂安德雷斯，别相信这个。没有人对这些感到兴趣。”

本堂神父经常来看他，并竭力想说服他把那包罗万象的藏书室拆了。堂安东尼奥提起向主教府提出的阅读禁书的请求。关于这一请求的答复迟迟不来。我不认为本堂神父会利用自己在教会里的影响有意拖延这个大概是否定的答复。也许主教府不愿拒绝这一请求，但也无意批准它。我认为，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担心堂安东尼奥读些什么，不如说他们更担心他写些什么。大家都在传说，说他是在写回忆录。庄园里的人还议论纷纷，说他天天熬夜不睡觉。普通百姓之间的这种习惯往往造成不信任，他们还总盼着出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事实上，他是已经写好了一些回忆录、故事和杂文。他的愿望是在死后逐步拿出来发表。因此他才在去世之前几个星期把文稿以及一千五百杜罗交给了我，并提醒我，回忆录还不全，他要边写边交给我剩下的部份。说真的，他也没有多少可加的了。我真想劝他把这件事随便托给谁都行，我作为一个神父替他出书不见得合适。

“先生，我觉得我们谈论过的一些问题似乎不合教义。”我对他说。

“别这么看。你相当熟悉神学，从好的一面来介绍它你更是绰绰有余。我写作的时候从不考虑神学，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问题。可你的观点迥然不同。我授权你为我的作品作序，畅舒己见。如果

我的作品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反教义的，你可以把它当作坏典型，当作‘不可为之’的典型介绍给读者作参考。甚至，假如我的死也是不‘正确’的话——死亡是无快乐可言的，”先生苦笑着说，似乎预感到末日正在来临，“你可以把它说成是我生命的必然结果。这样一来道义就获胜了。我想，从文学角度来说，这两相对照的做法会使我的作品更有吸引力。”

“您不需要我去增加吸引力。何况……”

“何况什么？”

“我完全理解您。我可以写一篇序言，表扬您的文学艺术，同时对您的错误和狂热表示遗憾。”

“这样一篇批判性的序言也许抵得上你的俸禄。它会让主教大人开心，于我也丝毫无损，相反……”

他的信念遭到反驳遭到破坏，他并不感到痛苦。不过，既然如此，他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使自己的作品永存呢？我太熟悉先生的思想了。他的思想随着时光的流逝一步一步地向有害的苏格拉底的怀疑主义演变。他认为理想没有多少价值，或者不如说有一种相应的价值，没必要去抬此压彼。这种友善的态度深含着一种根本性的不道德，被雅典人斥为毒草的不道德。显然，即使人家批驳他的错误，他也不能生气。这不是捍卫一种学说而是像在健身房里发挥才智，通过艺术手段使自己经历过的一切、自己爱过的所有人能流芳百世。因为，假如要对自己的生命做总结的话，他满可以这样写：“活过并且爱过。”既然如此，难道我还能

颠倒是非，把不关先生痛痒的东西故意小题大做，而对与先生关系重大、理所当然的问题却只字不提？

“我可以照您的意思写一篇序言，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挣到一份俸禄，不过，我在您身边受到的教育并未白费：我是披肝沥胆，坦诚之至。”我对先生这样说。

他用手出奇轻柔地摸摸我的头发。

“我的孩子，除了你我再也没有别人了。我的朋友全都已经作古，对我的侄儿们我提都不愿提。一切都照你自己的意愿去办吧。”

他把回忆录交给我，让我好好读一读，还有那笔钱。然后他要我让他一个人呆着。我虽然不敢肯定，但似乎看见他脸上有一滴泪，他却依旧那样安详，脸上挂着笑。我奇怪地瞧瞧他。他用手绢擦擦眼睛。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声调自然地说：

“我好像得了结膜炎。”

于是，我才知道他哭了。

九

回忆录纯属先生本人经历的写照。你想像得出我仔细阅读之后的情形。拉封丹拿手的亚历山大风格的诗句“在无尽的欢乐中加一点荣耀”，似乎代表一种乐观的精神。对先生来说，某些方面的研究实在是一种享受。他的作品既有

即兴的新鲜感，又有真诚的魅力。在每一页里，表面的漫不经心中跃动着非凡的才气，打个比方说，简直如同一匹骏马，虽然静止不动，其内里奔腾之气却尽溢其表。无疑，回忆录中也有并非无可指责的隐私，甚至还有仅仅在忏悔中才不显得厚颜无耻的不懂事理。例如，一位正人君子打扮停当要去赴情人之约，一瓶汽油(他还以为是香水呢)从天而降，浇了一身，不得不重新更衣。这是要说明什么？我们该怎样理解呢？“身上全浇湿了，”他写道，“因为汽油从衬衣领口往里流，我只好洗了个澡。等我赶到约会地点时，那可爱的甜蜜的人儿等烦了，已经踪影全无，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她肯定遇到了另一个没有汽油味儿的情人。”在如此荒唐的叙述中，不乏闪耀着激情和勇气的可贵思想。所有的人，包括最低贱的在内，由于生命的短暂都渴求永生不死，不仅在天国如此，更渴望在人世长留。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渴求体现在家世代代相传这一点上。堂安东尼奥无子嗣可传，起码还没有被承认的子嗣。他的姓氏(虽然知道姓名是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但对其古老的姓氏仍然大惊小怪不敢相信)将随着他的辞世而断了世系。他确实神秘地供养保护过几个孩子，但这种利他主义并不能使他心安理得。姓氏这一神奇的符咒没有了，父权及家庭关系又从何谈起呢？对一个心地如此善良的人来说，不承认自己的非法子女，我觉得未免过于残酷，专横得不可思议。不过，米格尔，我对他评头品足是最不合适的。另一方面，像先生那样的人不愿意再投胎肉身，那是令他们沮丧的，他们情愿

永存于体现为书本篇章的非物质世界里。他相信理智，只有理智才使他觉得踏实，才使他不虚度无情的光阴。回忆录收集了其不朽的部份。他将回忆和环境都说得非常明确。为了回忆录他做出了许多牺牲，其中也包括他所钟爱的萨科瓦松林，但总算感谢上帝吧，他被免去了亲眼目睹松林被砍伐的痛楚（我刚刚得到通知说，后天开始砍伐）。我重复一遍，他积攒了一千五百杜罗说明他是把回忆录看作重于一切的。最近，这儿的生活有些拮据，但是，饮食有度的堂安东尼奥对此并不在意，一向节俭惯了的夫人也不牵挂。而我有时候则必须想法匀出两个钱来，免得早上他们吃不上巧克力和蛋卷。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尽管近来记忆力不太好，但她还保留着极高的口味，对有时过份普通的早餐质量冷嘲热讽。

“呵唷，胡安，这也叫巧克力？我无法相信这是瑞士巧克力。”她笑吟吟地说。

“夫人，从瑞士好久没来东西了。”我回答。

堂安东尼奥抬起头，漫不经心地叫道：

“没来？那你干嘛不到巴塞罗那跑一趟，买够一冬天的？”

先生夫妇富有田产家业，然而收入却是寥寥无几。他们在国内拥有的免税产业及租金收入主要是名誉性的。其中一部份租金来源于从事社会福利的宗教团体，因而业主早就不收了。其余的部份则是向那些实际上无力支付的人收取。地里的主要收成是不值一文的栎树果实及盈利较高

的油橄榄，不过，可惜的是油橄榄难得有丰收的时候。松林倒是长期牢靠的收入，只要不提前砍伐就行，但也时时不得已而为之。

除了多年前的一次风灾严重毁坏橄榄及先生过份的开销之外，上述情况已使他们负了债。还有一件怪事。虽然入息无几，贷款的数目却很多，邻居们一旦攒下些钱便交给先生，先生则给他们合情合理的利息。他一般把资本用于必要的方面以维持家境，但是，说实在话，有时也使用不当。这样的经营管理方式，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破产。我见先生有时候是为了不使那些不知把钱放到哪里去的穷人为难，才接受那些不求自来的贷款的。可是，即使动机是好的，其后果却不堪设想。有一年，寒流使全部收成毁坏，债主却纷纷前来要债，先生不得不求助于城里的一家银行，开始了第一次典押。有时我问自己，在经济状况糟糕透顶的情况下他干了些什么，他是否牺牲了他妻子的安乐来出版他写的东西。如此答案不是滋味，我情愿把它悬起来。尽管生活放纵无度，先生却一直爱着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现在他老了，可以更加认真地端详她了，他感到心里甜甜的。她是受之无愧的，纵是曾几何时那一度疏远与冷淡，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岁月使她更臻完美。回忆录里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又重新见到曾经在比恩庄的森林里一起玩耍的那位七岁的表妹。“那时她有些固执，爱发脾气，但她的气很快就消，平静得若无其事。她发火的时候变得难看，似乎有些斜眼，一时间倒使她显得更美，更加突出

她那全欧洲最会笑的嘴唇的魅力。”

先生以肖像画家的技巧及荷兰画家的热忱小心翼翼地
进行叙述。他本人也很清楚，并写下了这样的议论：“恰如
印象派艺术表现光的扩散现象，肖像艺术意味着浓度和密
度，亦即热情。米莱不知近爱，在我看来他实际上就是丝
毫不懂得爱。女人并非光线作用下的阴影或亮点，她们生
来需要抚爱，无论是触摸、视线还是画笔。”稍后我将解释
他如何替他在夫妻关系中“次要的”（他就是这样说的）不
忠实行为强找理由，又如何近乎诡辩地硬要把这种不忠实
行为说成是可以成为合法妻子的一座丰碑。对他来说，只
存在一个女人，那就是自己的女人。而这个含混的词似乎
并不确指合法的妻子，而是指长时间在自己身边的女人。
“对自己所熟识了的怎能不产生爱情呢？”他问自己。这一乐
观想法是对上帝的完美与伟大之尊重。还有更精彩的简直
是正统的思想：“风流艳遇是那种近乎疯狂的好奇心促成
的，正是这种好奇心使我们的父辈从天堂里被驱逐出来。堂
璜摸索追求而终未能得……要想得到是需要时间的，需要
停下来，需要挑选。当我们在自己妻子身边坚守半生以后，
那时我们方可以断定她是自己的女人。”在这儿已经不提那
下流的“次要的不忠实行为”。这几个字我曾经想让他删去，
结果未能办到。我相信先生确实在他妻子身边坚守了漫长
的岁月而未曾想过要背叛她，但并非说他对自己动摇不定，
糟糕透顶的过去不曾真诚地懊悔过，这是他的作品不道德
之处。他把自己的这些行为视作自己对堂娜玛丽娅·安东

尼娅的爱情的一种考验。他这种看法给予我们在前面我不愿道破的一个答案：回忆录——她在回忆录里受到细致入微的描绘，柔情蜜意，荷兰白釉蓝彩的色调那样的和谐，无疑像他说的那样，构成合法妻子的一座丰碑。因此，必须想到，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已经化成灰，在比恩庄花园里生气的小女孩以及欧洲最会笑的嘴唇都只有在先生的手稿里才能找到。假如他为了求得一点生活情趣而经受了一些经济困难，难道我们还能指责他吗？

感谢上帝，亏得未曾发生这种情形，因为他们足不出户，没有任何花销。你知道，在这山区里，是以地里无需耕种而自动生长的收成聊以度日的。好久以前，有一位改良派议员曾提到我们农业的落后状态，慷慨陈词激烈抨击庄园制，极力主张分田地。他认为，每个农民应该拥有一公顷土地用作水浇地和种烟草，这在一个气候酷似（这是改良派议员的话）古巴的岛屿上是适宜的。他在议会大声质问：“北马略卡山脉的先生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拥有成百上千公顷土地，却只知为国家提供一些野草和几只臭山羊？”先生在报上读到这些质问，哑然而笑。

“胡安，你要是有一公顷山地，你怎么办？在这公顷岩石上可以养几只‘臭’山羊呢？”先生对我说。

议会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那种想在一个只有秋天才下点雨的缺水地区种烟草的想法是可笑的。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抬起头来：

“托内特，为什么把山羊说成是‘臭山羊’呢，这是怎么

回事？这是些多有用的动物啊，不用喂它，不用管它，就给我们奶和肉。”

说实在话，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在比恩庄农业不好，农学家无用武之地，除了自生自灭的东西（老橄榄树，圣栎树，松林，还有山羊）什么也种不出来。先生夫妇倒能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他们天生如此，尤其在最后的时日里，他们能入乡随俗，顺应环境，这实在是聪明之极。这年冬天，一场风暴又把林子毁了一大片。

“想一想我们有那么多柴可烧，你还不满意吗？”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对她丈夫说。

对待现实可以有一千种看法，先生夫妇却善于找到最恰当的一种。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头一回到巴黎，看到剧院里的舞蹈演员都袒胸露背，顿时目瞪口呆，茫然无措。然而，她并未不顾分寸地大喊大叫。

“真的，舞女穿得太少了，不过，灯光使她们变得像瓷人那样的假人儿了。”她说。

她在去世前一段时间，记性很差，思维混乱。但她依旧原封不动地保留着那贯穿她一生的一丝不苟的习性，而且愈益看重，重得甚至不近情理，因为她明白，它很快就要从自己的指缝里溜走。一个雨天的下午，她坐在壁炉旁边说，哪怕是给她五百杜罗她也不到花园里去。可是，刚过一会儿，她又带着疑问的神情盯着我们，仿佛要加重她的语气：

“好吧，要是给五百杜罗，我去。”

其实，她已搞不清楚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了。她在去世前一星期问我们，是给侍女送只钻石戒指好呢还是送条手绢好。我们劝她送手绢。

“倒也是，也许她更喜欢。”她说。

十

巴黎之行持续了大约半年，直到堂娜埃克西玛知道钱即将花光之日宣告结束。先生带了不少钱，但是甥女太会花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位出身名门的小姐，在一所只有道德楷模的优秀学府受过教育，到了十八岁时竟会如此堕落。假如我们把这归咎于毒害了那么多青年的坏作品，尤其是法国那些浪漫放荡的小说，其原因并不难解释。然而，堂娜埃克西玛似乎并不读书。既然她有足以令维克托·雨果和大小仲马同时黯然失色的非凡想像力，还有什么必要去读别人的作品呢？邪恶的灵魂在她身上披上一副最单纯的外表。在那轻快灵巧的外表下，潜藏着寡廉鲜耻，利己主义和贪婪……都说她有副好脾气，其实她缺乏性格。先生写到她的淡漠时说她是“不会生气的女人”（其实她是缺乏羞耻心）。朋友，请原谅我的话太粗鲁，等你读完小册子你就会明白我是否公正。臭名昭著的左拉企图以遗传学来为犯罪辩护，因为在污泥和眼泪中垂死挣扎的这—个世纪的最后新闻，便是罪犯得以赞颂，受害者成了罪人。这便

是《悲惨世界》、《茶花女》，以及这一类的其他许多小说的主题。我们无法接受这种理论，它是企图使天主教伦理沉沦的浪漫主义的骨血。但在认真阅读了家里所有档案材料后，我必须承认，家族中既有像里戈贝托主教和尊敬的玛丽娅·弗兰西斯卡女士这样的楷模，也有其污点。有一些尚能保住秘密不致外泄，但也有一些像堂娜埃克西玛的祖母即先生的亲姑母堂娜阿依娜的行径，却传了出去。在这个世纪中期，比恩家族中有一位死于狱中。为此，爱以名喻物的受俸神父比尼梅利斯便常常撇着嘴道：“比恩庄，凤凰乌鸦共一巢。”意思是说这一家里什么样的人都有。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连那些最显贵的家族也不例外。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教益，即做人必须谦恭。

巴黎之行的目的或曰托辞是去参加《浮士德》的首演式。第二帝国时的巴黎远比第三共和国时富有奢华得多。通过阅读回忆录以及在炉子边和先生小声冗长的交谈——其时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则在祈祷或织花边，我体会到了当时巴黎的灯红酒绿。那些交谈简直可以当作一场忏悔，如果不是因为客观阻止了痛苦之情像一枝神秘的玫瑰从中冒了出来的话……

他说：“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强烈的诱惑，要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特别是我们这些早就已不年轻的人。巴黎充满了魔力。到处是耀眼的金币，明亮辉煌的街道上仕女如云。意大利剧院阿尔波尼的《梦游女》大获全胜，歌剧院则在上演久负盛名的法国歌剧《先知》。被皇后欧仁妮所宠爱

的雷塞布计划贯通两大洋。豪斯曼修公路，铺铁路，发明电话，缝纫机……以富有著称的法国从未达到过如此豪华舒适的程度。

或许还可以加上放荡不羁。在基督教欧洲的历史上，堕落首次公开展现在舞台上、包厢里以及从森林到圣马丁门那些招摇过市的马车队伍里。奥芬巴赫创作的一种庸俗喜剧使喜欢新鲜事儿的观众眼花缭乱。皇后的服饰比她的品行更使人叹服。然而，真正的街头女王却是里戈巴什，一位跳康康舞的可怜女人。照阿拉尔孔的说法，她不是艺术家，也并不漂亮，她唯一的长处就是能把腿抬得那么高，以至一脚就能把她崇拜者的草帽踢下来。

当时巴黎最好的下榻处是坐落在卡普青大街的格兰德饭店，旅客们一到，头一件想的便是每人每天付十八个法郎住到那里去。昔日的歌剧院也不像今天这个样子，它在佩勒泰街，比现在这座要远，但是堂娜埃克西玛还嫌太近了些，因为从饭店到那里不必坐车，显不出排场。先生还由于街上太吵乃至无法入睡，决定搬到明星区的一家小旅馆，有花园，有浴室，还有电铃。三十年前，那些地方不像现在那么人多，是殷实消闲之辈的贵族区。可是，一无所有的堂娜埃克西玛却从不考虑价钱问题。

先生对我说：“她要一件白鼬皮大衣，许多衣服，双驾马车随时在门口恭候……虽然我觉得这实在有些过分，却从未扫过她的兴。”

堂娜埃克西玛觉得那里太如人意了，简直如鱼得水。那

是个情妇也叫作风流女人的时代，是英国马戏及娱乐节目的时代。小仲马在《茶花女》中以玛丽娅·杜普利西丝为原型，塑造了不朽的玛加里塔·戈蒂埃。这是一部吹捧堕落的作品，用最艳丽的色彩来衬托它。堂娜埃克西玛(除了肺结核之外，如果说灵魂不健康的话，她的身体还是健康的)如同小仲马笔下的女主角一样，是一位时髦的女王，是令人眼花缭乱、瞬间即逝的明星，在那个虚伪的社会里恰似帝国本身一样光芒四射。有一个关于拿破仑的笑话，先生说它是真实的。拿破仑三世曾经当过有名的共济会会员、众议员维埃拉德的学生。这位老师竟敢送给他一本有如下题词的书：“昔日的上帝已不复存在，今日的人类才是上帝。”学生看看题词，望望老师，又看看题词，思索了一下，终于叫出声来：

“胆子不小，不过，说的倒是实话。”

人高于上帝。这个笑话说明了构成第二帝国特征的人文主义。我们的阿拉尔孔在其《从马德里到那不勒斯旅行记》中写到渗入日常风俗习惯中的物质主义，已经高踞于国王宝座之上，并且使多少人伤心落泪。

这样一个舞台对于堂娜埃克西玛的成功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她是扰乱心神的致命的美色，是反叛与战争的呐喊。她的王国一现即逝，终于随着色当的败绩和公社的恐怖而倒塌。不久，皇帝便幸运地死去了，而她却还苟且于世，仿佛命运注定她还要继续作孽。

《浮士德》于一八五九年三月首演，尽管做了大量的宣

传，却成绩平平。观众不懂得欣赏古诺谱曲的精妙之处，直至十年以后重返舞台才认识它的价值。相反，戏剧却令人目不暇接。在国际政治方面，皇帝似乎蒙上了眼罩（在这点上酷似拿破仑一世），使他不相信天主教的奥地利会转而投入不信教的普鲁士君王的怀抱。众所熟知，在日耳曼的传说中《浮士德》是最地道的普鲁士式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就足以使皇帝去保护它。皇后穿一袭白衣，珠光宝气地去参加首演式。堂娜埃克西玛坐在与她相邻的包厢里，也是一袭白衣，却没有一件首饰。由于她们是同时进场，在观众中引起一阵哗然。不管是否巧合，这简直是对皇后的忤逆，许多人就是这么看的。堂娜埃克西玛比欧仁妮皇后更年轻更苗条，在风姿和天然美方面也胜过皇后。“她是那样成竹在胸，”先生写道，“乃至不带首饰（那是因为她没有）也被当作英国人说的‘给优者的不利条件’，当作埃克西玛对皇后的一种让步。社会风气轻浮，人们喜好追逐新奇。这场竞争的胜券竟落到埃克西玛的手里。没有几个人在听歌剧，因为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两个西班牙女人身上了。我一直在想，演出效果之所以平淡，全怪她们。幕间休息时我去问候古诺。我想表达我对他的钦佩之情，但他只顾对我谈埃克西玛。‘先生，我十分渴望您能带我去见见那位女士。’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男人，四十出头，十分谦恭。我们到了包厢，就在那儿当着全巴黎的面，他吻了她的两颊。响起了一阵掌声，我觉得欧仁妮皇后脸色大变。但她紧接着就笑了一下，只听她对周围的女士们说：‘她真漂亮。’路

易·拿破仑早就拿起望远镜对着我们一股劲儿地观望，其实这并不太合适，因为我们就在他的隔壁包厢。后来我听说，别人告诉了他我们是西班牙人。他们猜想我们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巴黎就是如此慷慨热情。没过几天，古诺便到明星旅馆来。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宫廷骑士，路易·拿破仑的心腹，据说也是皇后的宠儿。这位骑士坎波·福米奥公爵，似乎担负着一项特殊至极的使命。对一个如此富有如此时髦的人委以重任，皇上未免太天真了些。”

接着便是关于这件风流韵事的一些怪诞而大胆的看法，我还是不说为佳。先生并不想隐晦他对帝国的声威及社会风尚的鄙视。他写道：“一切都是虚伪的，仿造的，剽窃的，就像庞培风格，像狮身人面像和巴迪内的铜像。拿破仑一世用根棍子碰碰一位洗衣妇，就把她变成公主。正是出于他的意思，坎波·福米奥的父亲摇身一变就成了公爵。据说有一位朋友问起公爵，得到的回答是：他到画家那里去了，要画他的祖先呢。”

也许这并非真事，因为先生开起心来的时候具有极丰富的想像力。在缺乏道德观念的人之间，事情怎样发展是可以想像的。堂娜埃克西玛和那位年轻的公爵一拍即合。

“托内特舅舅，你这么个明白人不会不理解吧？”

情感能把人变糊涂。对先生来说，坎波·福米奥是位不速之客。他那骄横的态度，那单片眼镜，还有那普鲁士皮靴的咯咯声，都令人难以习惯。所有这一切，在马略卡的这位老先生眼里是那么可笑。可是，堂娜埃克西玛偏爱一

位更年轻的男人，这就足以使这位哲学家大为不快了。

“等坎波·福米奥让我腻烦的时候，我就去见皇帝。”埃克西玛又说。

“你真会找人。”她舅舅答道。他不喜欢第一帝国，对第二帝国就更讨厌了。“你真是个疯丫头。随你的便吧。反正你想干的事你总是要干的……”

“这就对了，托内特舅舅。因为我猜到你现在不会以道德的名义来对我说话的。你不知道雷赛布也爱上我了吧？”

他们客客气气地告了别。他以阅读萨罗亚斯特罗的学说聊以自慰，并且怀着对俄穆斯和亚里曼同样的好奇心回到马略卡。先生认为，不仅波拿巴无权登上王位，而且路易·拿破仑根本就不是波拿巴。

“天下谁都知道他并不是他父亲的骨血。”

他总认为父子关系是值得商榷的。到他临终时，他简直怀疑普天下所有的父子关系了。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似乎更加坚定了他的看法。霍滕西娅王后——在他看来也不能算是王后——同弗休尔海军上将有过相当公开的关系，而路易·拿破仑确实不像拿破仑一世，倒像一个真正的荷兰人的模样。奇怪的是，只承认自然法的先生，居然谈起王位法，对一个人，对一个自由生灵的非法身世大加指责。心思就是这样的矛盾。

有时候先生又会大叫：“实际上，大家都是父亲的骨血，至于这个父亲是叫佩德罗还是叫巴勃罗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什么能像家世那般掺假的了，如果还相信什么家世的话，

那就简直不可思议了。假如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有着几百年的档案资料，他们就会明白许多事情的。孩子，”他摸着我的头说，“不必为出身贫寒而难过。我就能肯定自己是比恩家族的一员吗？”

十一

堂娜埃克西玛留在巴黎了。短短的几个星期里，她的名气就远远超过了阿尔波尼和舞后里戈巴什。她俨然是位老练的妇女。面对路易·拿破仑的频频进攻，她并不让他得逞，而是告诉那位公爵，她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走大门的，假如皇上想在土伊勒里宫见她，只消下令举行一个正式的接见仪式，她将很乐意在那里向皇帝和皇后表示她的敬意(提到皇上的时候她特别强调使用复数)。坎波·福米奥对此话惊讶不已，连他这样爵位显赫拥有百万家产的人，也从未敢这样梦想过。他只好如实而又委婉地把话转呈皇帝。似乎他还更加忠实地把话转达给特巴女伯爵^①，他与她关系甚密。女伯爵是位反应敏捷的人，而且在歌剧院里已经注意到了堂娜埃克西玛对她丈夫产生的影响，她对自己的这位同胞感激之至。“对一位西班牙女士是儿戏不得的。”她对坎波·福米奥说。这位年轻自负的公爵真想弄个

^① 皇后系西班牙人，拥有西班牙爵位。

明白，一位西班牙女人的荣誉应该高到何等程度。对正式接见一事尚未拿定主意的皇帝，得到如此意外的回答顿时觉得热血沸腾，心痒难熬。于是，欧仁妮皇后一下子失去了丈夫和“美男子”。

堂娜埃克西玛在巴黎的各种奇遇中，先生常常讲到她与当时赫赫有名的里戈巴什舞后之间争斗。他写道：“我记不准确她们之间的不和是怎样开始的，因为我已经回马略卡了。不过，既然两个人都渴求相同的东西，互不相让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大概是在马比耶公园舞后曾对坎波·福米奥暗示要跳一支康康独舞，尽管她已看到有一位女士陪伴着他，或者是故意要这么做。她的企图失败了，她便觉得受了侮辱，一八六〇年她的回忆录发表（不是她自己写的，因为她不会写作，而是由一位也并不很在行的记者埃内斯特·希路姆捉的刀）时，她插进一段侮辱埃克西玛及我们家族的话。胡安是（先生写到这一段还想到我，真令人感动）惯常使人想起比恩家族的人都是尊贵体面的，如果不从征服美洲算起的话——因为这不得而知——至少从十五世纪以来比恩家族就占有一席体面之地了。我们同里戈贝托主教，同比恩的堂拉蒙，同‘皇后陛下’，门第同样显赫。当然，除了家族的楷模之外，也有一些例外……”

他又写道：“你知道我的姑母也就是埃克西玛的祖母堂娜阿依娜的故事，也知道我叔父堂贝纳多死于狱中，那是一所外国牢房，在乡下，有花园有浴盆，但毕竟是座监狱。关于我的曾祖父堂安东尼奥，你已经知道人家给他编的歌

谣。你没事的时候翻翻那些档案，你还会发现更多的东西，不过，都是一些有意忽略的情节罢了。我们族徽的铭文(那是十八世纪末增添的，其时文明世界里已经不提这些事情了)是这样的：‘宁死也要保持血统的清白。’铭文的作者比恩族的堂帕乌和蒙塔内尔……”(这儿有三行字被抹掉了，只能辨认出两个字：“自己。”下面接着叙述说)“我们在巴黎仍然像在这山里一样把自己视作贵族，想把我们说成出身高贵者也大有人在。然而，我们却很成问题。我们花钱很厉害，尤其是开头。埃克西玛太漂亮，而我则太宽容。当我们很快就把钱花光的时候，当埃克西玛同坎波·福米奥交好的时候，情况就清楚了：我们只不过是冒险家。不过，由一个康康舞女来点醒，终究让人不舒服。埃克西玛(“这位不会生气的女人”)这一次可真气坏了。命运给她提供了报复的机会。里戈巴什每天晚上在马比耶公园演出的最受欢迎的‘节目’便是‘梳头’。她穿着睡衣出来，邀请观众中经过抽签选中的两位先生为她梳头。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长及腰下，没有哪位蠢货或者时髦的俱乐部会员不想证实一下自己摸过这头发，而且这头发是货真价实长在她头上的。参加抽签要付五十法郎。由于是件蠢事，所以场面就更加令人开心。这位舞蹈家每天早上都要驾一辆轻便马车到森林里游逛，而且经常不断更换马匹，越老越喜欢小马驹。那天早上大出风头的是匹四岁的典型西班牙骏马，她还像同马比耶公园的崇拜者那样与它干那蠢事，结果一头栽到一棵刺槐上。乘车经过的埃克西玛把昏迷过去的里戈

巴什救到附近一家餐馆，向人要了把剪子，把她的长发咔嚓咔嚓绞了个精光。餐馆的侍者见状大惊失色，等醒悟过来要阻止埃克西玛的罪过时，为时已晚，无法挽救了。虽然里戈巴什头上毫无伤痕，埃克西玛还是仔仔细细地给她包扎得严严实实，并用一杯咖啡使她苏醒过来，还殷勤备至地把她送上马车，虚情假意地和她吻别。事情飞快地传开了。舞蹈家提出起诉，这使埃克西玛的名声更加响亮。里戈巴什完全黯然无光。等到她的头发重新长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理睬她了：她已经完全死去，人们只打算把她埋在《小鲁斯》字典的三行字里而已。”

最后这句话，更像出自路易十五王朝一位女侯爵之口而不像马略卡的一位绅士所说。它是死亡给堂安东尼奥带来的启迪：三行字就把她埋在百科全书的一个字母条目里了，连这不幸女人的灵魂都不曾提到过。

十二

《浮士德》首演之后，先生只身回到马略卡，他夫人拒绝和他在庄园共同生活。就这样短途相隔，他们分居了十年，但在精神上他们却超乎想像地更加融洽。那些分离的年月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来说，并未白白虚度。她忙于祈祷及料理家务。重归于好之后，她常对自己的丈夫说（她毕竟是比恩家族的一员，而且善于苦中寻乐），她对他

并不很挂念，因为只顾缝床罩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实话，尽管不尽真实。她从宗教里吸取力量使自己坚强起来。她对拯救自己胸有成竹，我在她去世前夕听了她的忏悔，对此确信无疑。要使身体健康，必须有一套保健学，那就是生活要有规律，要锻炼；要想精神健康，也必须有一套保健学，那就是奉行教义。唯物论者认为祷告是浪费时间（这些时间他们都用在互相拜访和喝咖啡时的谈天说地上了），认为唸诵《玫瑰经》时喊五十次福哉玛利亚毫无意义，因为喊一次就够了，都表达了。按照他们这种纯理性的观点，也没有必要去教育青年，只须把罪过与美德开个清单交给他们让他们看着办就行了。然而，我们知道，这毫无道德价值。没有榜样，没有实践，准则就毫无用处。一位哲学家帕斯卡甚至这样规劝一位女士：要想有虔诚之心就必须从用圣水划十字开始。先生承认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坚强，因为她“同天国的神处得很好”，而他（这是他自己的话）则“只同地上的神和睦”。毫无疑问，上天的神灵施恩于她，使她得到大家的热爱和尊敬。大家都认为她胸怀坦荡，毫无保留，“总是把自己的心捧在手上”。其实，在她朴素的外表之下还是有着必要的保留，才能在一个小山村里居住十年而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在巴黎对歌剧里的袒胸露背都能原谅的她，面对全镇的喝采却不能容许侍女戴着颜色鲜艳的大披巾去望弥撒。她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一切习俗，甚至连荒唐得认为大披巾也有正经不正经之分的习俗也照样尊重，那就意味着她也保留了这些看法。她很有

教养，但不能断言她就是彻里彻外的真诚。纵令是的话，也并不完全像。先生呢，倒是实实在在地把心捧在手上，并且毫不隐晦自己的过失，却没人这样看他。由于村子小，什么都很难遗忘，这些善良的农民习惯于略带防御性地过日子。他们情不自禁地总要遮掩自己的过失，尤其是那些不一般的过失。熬夜读书被当作是荒唐的事儿，而他们已经把先生看作是个荒唐的人。尽管他最体谅人，但是农民不理解他，觉得他笑里藏刀。先生对这一切了然于胸，常常自我解嘲。

“你给学校的老师写什么的时候，千万要把‘打开’这个词写成是以‘有’同一字母开头，因为他常常把它搞混淆，否则你就会被当作笨蛋。要学会适应环境……”先生常这样对我说。

可是他自己却并不去适应。他从巴黎回来之日，正是人们对他和玛加里塔大肆中伤之时。他十分不妥当地想教她读书、弹钢琴。她是位金发姑娘，淡蓝色的眼睛，真像《浮士德》里真正的玛加里塔。在歌德的作品中，玛加里塔是位受骗的姑娘，生下一个男孩，又把他杀死了。比恩庄的这位玛加里塔却没生过小孩，也没杀过人。她到庄园的当年就死了，被葬在花园里的一棵玉兰树下。先生曾吩咐立一座白色大理石墓碑，后来没有办成。然而，刻碑工却是来过几次量尺寸看地形。从来没有人认为先生的动机是纯洁的，也没人认为先生同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没有子嗣就会收养这位姑娘。那些共和派（情况很乱，在比恩庄就

有两位，由于马德里的局势混乱而变得胆壮了)竟敢在喝咖啡时扬言要控告堂安东尼奥，他们从先生那里得到的从来就只有好处而不是别的。“可怜的家伙，你们败坏先生的名誉，也就是败坏全镇的名誉。”具有真知灼见的教堂司事对他们说。但他们顽固坚持自己的乌托邦论调，既不承认领主，也不承认教皇和国王，最糟的是还有不少体面的人居然听他们的。堂安东尼奥足不出户，整日埋在书堆里，可以对这些充耳不闻。但对住在镇上的夫人来说，想这样做就太难了。不管怎样，她还是做到了。她缝床罩，养绣球花，耐心地等待人们厌倦了这些议论。

玛加里塔死后不久，芭尔芭拉·蒂塔娜这位瘦削而早熟的疯丫头，也神经失常了。因为她经常到庄园来，那些饶舌的人便说是先生使她中了邪。

“你瞧，胡安，我现在又成了巫师了。”先生说。

“这就向您证明了自由派要求大选的危险性。”我有些不敬地回答。

“不要扯得太远，孩子，也别仓促下结论。人民没有文化，对人苛刻、粗野，其责任主要在领导阶级身上。在民主取得彻底胜利之前，必须经历一下有知识的独裁时期。”

这种独裁必须是先进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亦即革命的，但绝不能是自由派的。虽然先生以自己的思维方式认为它们的争斗是暂时的，究竟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我不想向他表示我不太相信一时的历史空缺意味着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仿佛历史上有过什么最后的“以后”。其

实，人类的愚蠢使他大为震惊，这不无道理。

“假如我会魔法，也犯不着去勾引像蒂塔娜那样丑的女人。”他接着说。

她呢，早就爱上了他，终日生活在一种神秘的痴妄幻觉里，觉得堂安东尼奥是天使。这种幻觉一直持续到几年前她死去为止。

蒂塔娜的中邪把那些善良的农民吓坏了。他们既省吃俭用，又粗野无礼。不止一次，当我们穿过加里加乱石滩到镇上去的时候，他们便从树丛里跳出来截住我们。这使先生不得不思索再三。谈到这件事时他这样写道：“与卢梭的论点相反，人似乎天生就残忍。或者是对别人残忍，那是虐待狂；或者是对自己残忍，那就是被虐狂。无论如何，必须对庶民加以监视。当拉斐特问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否喜欢刚刚冲进凡尔赛兵营的人民时，她回答是的，不过要用坚实的栅栏围起来。凌晨，她这种看法的尖锐性便得以验证，因为混乱的人群发现有一道铁栅栏开着，便冲到前厅要杀她。领主任何时候都不能主动，因为这些人皂白不分。对他们应当敬而远之，只有我们高兴之时方可表示亲热，因为爱可以使我们靠拢，而要想求得精神上的接近则无可能。我的意思是说，可以给他们吻，但绝不能把手伸给他们。”后来（他总在思考那砸烂我们两扇车窗的石块）他又写下这样一些话，对最新的德国哲学比对基督教义记得更清楚，而且重现了传说中的某位比恩家族的精神：“老爷不打人，迟早有一天仆人会造他的反。”末了他来了一句科学

的乐观而又十分晦涩难懂的话：“大概这一切都是神经紊乱所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一剂妙药作用于交感神经系统，使我们回到似乎从该隐之时就已匿迹的正常状态。”先生所指的并期望在化学物质中找到的妙药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有，它叫基督的友爱与谦恭。不过，我们暂且不去谈它吧。

十三

帕尔马的房子被拍卖(卖的钱不够还一半的债)以及我们的女王流亡异国以后的几个星期，我经上司允许在这儿留着，刚好碰上发生我下面要讲的事情。但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我有爱躲在门背后偷听的毛病。我们以前谈过这一点。这一方面是受先生传染而成的习惯，但也有其他原因。我当时大概十八岁的样子，对某些奥秘的无知使我变得极端好奇。这种天生的好奇心同完全因我个人的情况造成的好奇心混和在一起。你清楚，我没见过自己的父母。你也不会不知道关于我降生到人世的种种猜测。无论如何，孤儿无依无靠的状况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它会影响人的整个一生。然而，爱情及婚姻的果实可以弥补这一不幸。对当教士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女人能够代替母亲，圣母除外，同圣母只能通过虔敬和祈祷来联络。十八岁时我还不懂得舍弃尘世的感情，我的眼睛太好奇了。现在我总算明白在神学院时为什么受

到惩罚，因为我那股什么都想知道的劲儿同克制顺从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一天(具体地说，也确实值得说具体，是一八六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先生坐在门厅里的炉子旁边，周围堆满了书，正津津有味地埋头整理他的回忆录。他穿一件褐色袍子，也就是穿着这件袍子去世的；头戴路易十五式的假发，因为他的头发脱光了，觉得脑袋上凉嗖嗖的。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想还有另外的原因，对他来说，这假发是表面轻浮内里潜在强大力量的十八世纪文化的象征。当年法国君王抛开宠姬们，像化学家那般细致地分析寻找灵魂，夜夜跑到蒙特玛特雷山去。“在那里，这位不信上帝的人，作为上苍的一种惩罚，期待看到魔鬼的出现。”刚刚八点钟，我们吃完了晚饭。我到田野里去。夜色含着寒意。一道月光照亮了玛加里塔的墓。我正打算为她祷诵一段安魂弥撒，便见到本堂神父朝我走来。他已年近七十，但依然保养得像四十岁的人那么强健。我想起来了，早上就说他要来，只是没说是几点钟。他的为人就是这样谨慎宽厚，不愿意别人给他派车。他觉得在大忙的播种季节占用仆人和骡子实在于心不忍，他说不过就是“半小时的路”，虽然实际上要走将近一个小时。他边走边祈祷，是那样专心致志，从我面前走过都没看见我。他这个时候来，而且恰恰是在对先生的所谓巫术议论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肯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责任心敌不过好奇与焦虑之情，我从厨房门溜进去，躲进一间内室，它那高高的窗户正好开在堂安东尼奥在那里写作的炉子旁边。我的心怦怦地跳得厉

害，仿佛他们的这次会见将决定比恩家族的命运，也将决定我的命运，因为我的命运同先生一家的命运是那样紧密相联，时至今日，先生已经过世五个星期了，我还感到六神无主，茫然若失。像先生一样，我曾徒劳地想在书本的哲学里得到一些启迪，明确一下方向。就在昨天，我还在高乃依的书里读到这样的话，它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历史的一切后果，环境以及我刚刚提到的人生选择，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正如特伦托教士会议明确宣布的那样，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假如我们不相信优美的经文，那是多么严重的失职呵！

我从窗口可以看到本堂神父先生正走进来。在门口那块繁星闪烁的天幕上他那黑色的身影十分突出。在我下面，正对着炉子，就是埋在书堆里的先生。火焰映得他满面红光。这使他显出一副不安的样子。我从没相信过那些关于所谓巫术的谣传——先生夫妇过世以后似乎传得更厉害了，但他本人的行为无异于给这些谣传火上浇油。他在卧室旁边布置了一间小小的实验室，在那里做化验，过滤果汁。我一直没搞清楚他到底要在那些细颈大肚瓶里寻找什么。西班牙见识到的第一个虹吸管恰恰是在那些日子里来到这儿的。他谈起缝纫机，使玛多·弗兰西娜大惊小怪。之所以没安装电话，是因为负责这项工作的那位法国工程师要价一万法郎才肯到这个岛上来。他并不认为，对于一个必须在迷信的乡下人面前表现得审慎的老爷来说，这些古怪做法是有失体统的。他甚至根据福尔顿原理，造了一辆通

过水蒸汽就能自己动(自动车)的车子。教会当局好意劝他放弃那些工作，尽管未能狠心烧掉，他还是把这车子扔到角落里去了。他不仅没把它烧掉，有时还把它弄出来检查检查，改变一些装置。那天他正在炉子旁边仔细观察它，就在我鼻子底下。他在机械方面十分灵巧，他只是用一个类似炉子的东西把一锅水烧得滚滚沸腾不止，然后用两根铁管把蒸汽引到车轮附近，就使车开动起来并且在院子里整整转了一圈。这是我亲眼所见。糟糕的是别人也看见了，在镇子里传了个遍。我们这些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水蒸汽能够推动大功率机器，有许多备有这种装置的大轮船恰恰就叫汽船。从帕尔马到巴塞罗那就有一艘，几十年了从未出过事。还有也是利用蒸汽作动力而行驶的火车。这都是正常合理的发明，丝毫没有邪恶之处，而且正在改变现代生活。不过，你到比恩镇，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比恩镇去解释解释看。除非先生不出门，若是让人们常常在镇上看见他，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而且我也怀疑，先生一旦受到侵犯之时镇上那两位平民治安员会不会去保护他。这两位治安员因为不挣一分钱，成天食不果腹，其中一位还是瘸子。我并不是说大家不尊敬他，但他让大家惶恐不安，人一旦惶恐不安就会干出糊涂事来。尽管堂安东尼奥有那些风流韵事，还是有不少人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庄园来做工(我不相信那两位共和派说的，是什么故意送来的)。正是这些人，开始禁止她们到庄园来了，闹得庄园的小橄榄好几年都没人收。就是自动车在院子里转圈那天，先

生家的心腹、老工头也告别而去，从此不再回来。

堂安德雷斯在门口佇立片刻。他是位朴实的人，文化不多，天赋却极高。他用目光一扫，一切便尽收眼底：汽车，书本，褐色长袍，白色头套，都被炉子里的火焰染得红彤彤的。堂安东尼奥抬起头来：

“请进，本堂神父先生，到火边来。我早就盼着您来。是走路来的吧？”

他像平常那样宽厚热情，却未离开他的椅子。看来他不会随随便便就站起身，以免会见显得不严肃、不推心置腹。堂安德雷斯高兴地走过去：

“不过就是半小时的路嘛。”

其实要走几乎一个小时。先生责备他没有说好几点来，否则就给他派车了。神父微笑着解释说，一路上是边走边祷诵《玫瑰经》，边欣赏月色……他突然停下来，扫了一眼那些书：

“您总是没完没了地读书……什么时候我们来烧它一堆呢？”

先生不想被他缠住，夺路便溜：

“您知道，堂安德雷斯，我们已经向主教申请阅读所有作品的许可。也不知何时才能批下来，他们有些拖拖拉拉。”

“这种事情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决定的。”本堂神父答道，“我从主教大人秘书本人那里得知，正在研究您的申请。官里没有反对意见，不过……”

先生做了一个极富特色的手势，意思是要耐心。

“我们不能让犁拉牛，因果倒置。”

“这绝不会。”

先生搓搓双手，对申请迟迟得不到答复感到满意。对他这样一个固执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争论更让人心烦的了。神父嘛，已经老了，老得咬不动了。所以主教那里这么一拖，对他们两位都有好处。堂安东尼奥拿出一块又厚又软的羊皮，让他舒舒服服地坐到炉火旁的凳子上，而且彬彬有礼地问他光临寒舍的原因。有两件事情，本堂神父请求先讲比较次要的那件。

“您那些侄子不知想弄到什么勋位，如果您同意的话，他们想查一下档案。他们迄今所掌握的材料还不够充分。”

“可他们必须相信这些材料。”先生答道，“我们的家谱确实只能追溯到十六世纪。这些土地我们是在一五〇四年搞到手的，根本不是哪位国王所赐。”

“不过，你们的先祖参加过征服美洲。每次圣米格尔节我都是这么讲的呀。”神父愕然地反驳。

“得不到证实。如果比恩家族的人真的当过‘纳瓦拉土地和城堡的主人’的话，就不会留在马略卡。同堂海梅一起来的那些主要人物都回半岛去了。”

“可是，传说……”

“这倒是。”堂安东尼奥说，“您就像那位意大利公主……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她是一位比耶稣基督还要早的贵族，大概是罗慕洛或者雷莫的后人。”他笑了一下，接着说，“一名记者问她，她的家谱是否确实。‘至少，’那位公主

说，‘有三千年以上。’”

玛多·弗兰西娜带了工头的一个口信来。那天下午，工头因为无法支付雇工的工钱，急得又骂了句脏话，先生照例又抽了他一顿鞭子。挨打以后，有一两个星期工头都显得又精神又勤快，细心看守庄园，避免出现问题或者他自己去解决那些问题，似乎他的血脉畅通，头脑也清醒了。但他一直到第二天也躲着不愿见到先生。现在玛多·弗兰西娜带着口信，以工头的名义问先生，是否可以卖掉一些麦子以支付工钱，是否下星期一可以开始播种。很显然，不该说粗话，早就该这么做了。

“让他卖，让他播种，让他付钱。”

玛多·弗兰西娜退出去了。本堂神父委婉地责备堂安东尼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爷，懂得法文，又会作六韵步的拉丁诗，怎么能……堂安东尼奥亲切地笑了笑。他心里在想：“为什么六韵步的拉丁诗，甚至亚历山大风格的法国诗就一定要与抽鞭子誓不两立呢？”当然，他也承认，用鞭子抽人在十九世纪是不合时代潮流了。

“不过，您认为，”先生说，“还得要多少年，‘光明’才能到达这儿呢？此外，我开始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我的意思是说，随着年岁的增加，我也逐渐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哲学；它也具有宗教意味：我觉得，我们在修炼净化自己的同时也变得更残忍，因为一切都是相反相成的。十九世纪是大发明的世纪，也是最恐怖的战争的世纪。一切都要互相弥补。有正面必有反面。大慈大悲的上帝也惩罚许

多人。”

堂安东尼奥神情严肃：

“惩罚人的是魔鬼。”

“魔鬼？这一点我从来都看不太清楚。”

“或者不如说，是我们自己选择了邪恶之路。放荡不羁……”

“好吧，”堂安东尼奥话锋一转，“无论如何，本堂神父先生，造物总是和谐有致的。您瞧这繁星密布的天空。”

我的窗口几乎正对着通向院子的门，门洞开着，能够看到天空。这天空使人想起路易斯修士著的《宁静之夜》。

“来的时候在路上我就一直在观赏。夜色多美啊。”本堂神父说。

一阵沉默。先生似乎在沉思。

“地球在有节奏地运转，就像一架巨大的钟表机器。本堂神父先生，您喜欢机器吗？”

我感到神秘之翼在轻拂着我，这是一种罕见的巧合的神秘，因为恰恰在这一刻，我正在默诵先生的诗：

他完全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全然不管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

星移斗转静悄悄，

生命的时光在流逝。

神父说：

“根据我们所见到的，我觉得它们害处极大，堂安东

尼奥。”

“它们有利也有弊。世界就是矛盾的和谐。您瞧，您和我不是十分愉快地坐在炉火旁边吗？再过来一些，这儿还有一张羔羊皮。晚上开始凉了。明天准是遍地白霜，然后太阳一出，霜化了，树木花草就像刚刚用水洗过一样干干净净。”

先生搬出古老的东方学说来炫耀：善与恶，是唯一准则的两面，是上帝的两面。似乎还涉及到摩尼教这一异端邪说，它使得许许多多像成圣以前的圣奥古斯丁那样的聪颖之士误入歧途。但先生在表达的时候，十分善于不伤人，不怀恶意，也不加争论。这就使得他的错误加倍的可怕。

“本堂神父先生，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侄子们急不可耐地要查档案，想知道百合花的演变过程。其实，不过就是一百五十年前投靠了波旁王朝而已，唯一的原因就是在王位继承战争中他们获胜了。可是，波旁家族又怎么样呢？堂娜伊莎贝尔同神经错乱的修女们胡闹了个够之后，益发不可收拾。我觉得没有义务讨好这些侄辈们：看到我们家里钱花光了的时候，他们简直欣喜若狂。另外，我也不愿纵惠他们去干这些傻事，我真不明白谁会把这些念头塞到他们脑子里。”

“科耶拉侯爵先生，他好像是亲戚……至少堂娜玛格达莱娜是这么告诉我的……”

“科耶拉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亲戚。玛格达莱娜爱虚荣，以为沾上科耶拉就有什么光彩。这么说，现在是科耶拉在

煽动他们啰？”

“好像是他毛遂自荐。他在马德里交际这么广……”

“卡斯特拉尔和他是西班牙头号爱饶舌的人，”先生无可奈何地说，“最好让他们只在议会里讲讲故事。”

“堂娜玛格达莱娜让我代她表示歉意，他们没来看您，不过由于他们没有车……”

“告诉她，没关系，什么时候能来再来好啦。”

本堂神父先生满腹狐疑，因为他心里明白，事情毫无进展。

“好吧。但他们来之前想先得到保证，届时会受到热情款待，明白吗？”

“那还用说吗，本堂神父先生？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不过查档案绝对不行。我说过了，我不喜欢那些愚蠢举动。关于祖业的问题……”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神父准备撤退了。

“教义和天理都是这样说的嘛。”先生舒了口气。

他们接着天南海北地随便聊起来，仿佛有意避开双方都感兴趣的什么。我觉察出这只是大战的前奏，却想像不出到底会发生什么。堂安德雷斯突然叫道：

“我们还是来谈谈我此次造访的关键问题吧。”我把双手捂住胸口，想阻止心脏的跳动。“我很抱歉，堂安东尼奥，但我的责任迫使我……她到比恩镇来已经两天了……”

先生打断他的话说：

“我的外甥女。埃克西玛。”

十四

我紧紧抓住窗沿。堂娜埃克西玛在比恩镇！先生早就知道……我觉得简直要天塌地陷。堂娜埃克西玛竟然就在比恩镇，而且偏偏就在这种时候，年迈的先生似乎已经心绪平和，而大家也刚刚开始认为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早晚就要回来的时候……朋友，你准了解当时还未见过世面的十八岁的我心里该是多么害怕。当时风华正茂而且邪恶到家的堂娜埃克西玛，在我的想像中简直是魔鬼活生生的化身。在这山里我想过她千百次，就像圣安东尼在沙漠里想念示巴女王一样。堂娜埃克西玛那时还不到三十岁，恰似一朵盛开的玫瑰，令人垂涎。她激起那些阴暗而难熬的欲望。哪怕世界上最堕落的城市，最放纵的社会，对于这样一个天生邪恶的可怜女人也会钦佩得为她雕像立碑。

一阵沉默。我闭目祷告起来。等我回过神来，本堂神父先生正用嘶哑的声音说：

“她简直像位女王那样招摇过市。车马，仆从，天晓得………旅店里没有那么多佣人来伺候她。每天早上得给她准备一澡盆热水。镇上轰隆隆地响个不停。最糟的是病号和孩子，他们很快就没有吃的。我昨天就没吃到蛋卷：女佣告诉我，堂娜埃克西玛的车夫们闯进厨房，把蛋卷吃了一干二净。他们浑身上下挂满了缎带，简直像王子。尽是讲

法国话，谁也听不懂。”

“纵然如此，他们照样知道怎样搞到蛋卷。”堂安东尼奥喃喃自语。

然而，先生并非贪吃的人，也不喜欢对饭菜十分挑剔。在这一点及其他方面，他并不像法国化的人，倒更象个土老儿。他从小就受到教育，要节俭度日。就像那些森林一样，表面看来是供那些浪漫画家享用，但实际上只结一些零零星星的黑橄榄。本堂神父继续小声往下说：

“全镇都说（我想这没什么根据）堂娜埃克西玛是来接您走的。”

先生抬起了头。

“镇上都这么说？”

先生仿佛进入了甜蜜的梦境，乐滋滋的。这时他已不是那位一心渴望向大海要田、渴望攫取财富的鬼迷心窍的浮士德，而是浮想联翩的诗人。他难得有这样的表情。他说：

“我明白。我早就想忏悔了，您来得真是时候，本堂神父先生。”

然后，他似乎打算作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说：

“想喝点儿什么吗？一杯陈年红酒？”

堂安德雷斯接过一杯玛多·弗兰西娜倒的水。先生说得十分坦诚。确实，他同堂娜埃克西玛的联系一直未断。她到岛上来是想拿比恩庄再搞一次典押，然后两人带着筹到的钱双双再到巴黎去。

本堂神父听了哑口无言。半天才回过神来：

“这个女人太没有分寸了。谁让她打这些罪恶算盘的？”

“我。”堂安东尼奥平静地回答。

堂安德雷斯又一次瞠目结舌，只好呷了一口水。一时间他准以为自己前功尽弃，堂安东尼奥已经无可挽回地决意又要与堂娜埃克西玛搅在一起。我虽然也懊恼，但毕竟比他了解得多一些，所以并不这样看。先生的回答不过是对本堂神父那番话表示不满。他对“罪恶的”这个词十分反感，把它用在外甥女身上实在太不适宜了。比恩家族的人都习惯于把共同生活的女士们所可能做出来的糊涂事揽到自己头上。此外，本堂神父在气头上不说“女士”而说“女人”。然而，先生并不记恨，等神父喝完水，他又笑吟吟地望着他了。

“您肯定认为在某些事情上我很老成，”先生说，“十年前我已经感到自己已经老了，那是在一八五九年三月，埃克西玛缠着我带她去看《浮士德》首演，这在法国被称作是第一流的演出。您一定还记得。”

堂安德雷斯没有忘记，而且满怀伤感地列举起来：在教堂里举行了祈祷，看是否能避免这种蠢事的发生，还到圣米格尔游行了呢。当时有两名迷途知返的浪子引起极大的轰动：一名是刚刚宣称加入新教的理发师……先生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他自己也很喜欢回忆。

“是有两名浪子回头，不过我没有。或者说，我执迷不

悟昏了头。您根本无从体会带着像埃克西玛这样的一位女士去观看巴黎歌剧院的首演是何等样的滋味。”他说到“女士”的时候把目光盯住对方并且不露声色地微笑了一下，乃至对方全然不察。

他的话使本堂神父眼前浮现出第二帝国那位放荡不羁的浮士德的灿烂形象。那时我还没有去过法国。过了一些年，帝国崩溃以后我去了，我才觉得先生的话并不夸张。为了使你对那些风俗有个印象，我只讲这次旅行中的一件事，这件事使我见识了这座有不夜城之称的美丽都市是何等的堕落。最上流（尽管从道德意义上讲应称为最下流）社会的一位女士在爱丽舍大街上漫步，牵着一头皮带拴住的羔羊。据我所知，这种怪事在当时所谓的文明都市里并不鲜见。一位小伙子走过来，十分放肆地吻了她的手，然后问起她的丈夫来。“后面跟着呢。”女士指着羔羊说。确实跟在那后面的那位丈夫就走过来，热情洋溢地向小伙子问候，叫他为“我亲爱的”。路人见了都忍俊不禁。三位登上一辆车，直奔皇宫饭店去共进午餐去了。

堂安东尼奥在讲述过程中，并不隐瞒那些不道德的行为，毫无姑息自己之意。本堂神父静静地听着。当讲到皇上派公爵到明星旅馆去的时候，这位善良的神父简直听呆了。

“我还不知道有这回事呢。”神父轻轻地说。

“坎波·福米奥这位不速之客是帝国的显贵，既富有又英俊。路易·拿破仑未能如愿，而他这位特使却使我立即

相形见绌：他比我小二十岁。”堂安东尼奥说。

本堂神父想趁机宣传一下伦理道德，语调不由得严肃起来。

“唉，堂安东尼奥，青春是短暂的。我们每过一天，就接近死神一步。当我们老了回忆起干过的蠢事，我们会懊悔不已，痛苦难过。不是吗？心如死灰，嘴里也会苦涩。那时我们会反省。良心会怎么对我们说呢？”

我预感到回答会使他难堪。堂安德雷斯提出这样危险的问题实在太轻率了。我的推测果然不错。堂安东尼奥抬起头，说：

“良心也各有不同。我就认识一些人，他们为没有纵情享乐犯更多的过失而懊悔莫及。”

火光又跳跃着映照在先生身上。他仿佛生来就要同上帝的规矩作对。我真愿意他说出那些可怕的话并非出于真心，可谁又能担保呢？堂安德雷斯从椅子上直起身，愿上帝宽恕我，他仿佛心里有鬼。

“人类还不至于如此堕落。但愿您不会给我找出一个例子来。”他叫道。

先生的表情立时和缓下来，并做了一个很富特色的难以捉摸的手势：

“当然不会，屋里就您我两人……”

他只用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排除在外了。多么令人难过啊，朋友。不仅我住在家里（还有那些同是上帝之子的农民），而且先生还了解那些引诱我离经叛道的种种原因。—

想到我竟然这样被排斥在外，我便按捺不住自尊心，真想大声疾呼来表明我的存在。不过，他若是知道我在偷听而又不生气，他那不把人放在眼里的冷漠不是更令我伤心吗？

堂安德雷斯该满意了，虽然不是完全满意也不那么平静。他表面纯朴没文化，却一点儿也不傻。

“您不是说要忏悔吗？”他说。

“我觉得我正在忏悔。”堂安东尼奥说。

“怀着悔恨之情，永不再犯之意？”

先生避开前半句，只回答后半截：

“就像我这把年纪？我已经开始感到精疲力竭了。”

先生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实在令人羡慕。他从来就不是体格强壮之人，却没见他生过病。他字字斟酌地谈起他年迈的身体，经济的破产，意在引起别人的同情。堂安德雷斯却急于知道具体的情况，对先生的话有些莫明其妙，未察觉先生根本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物质和偶然常常使精神的注意力被转移。

“不过，堂娜埃克西玛是来带您走的，对吧？”他不安地望着先生。

“明年一月将再次上演《浮士德》。我给她写过信说我想再看一次这出歌剧。它由卡波尔主演。上次看了它，真使我有返老还童之感。”

“不过，它以什么方式使您返老还童的呢？”本堂神父话里有话地说。

先生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笑意。

“自然喽，我也因此而遭受了一些损失。妻子同我分居对我影响极大，因为我是一直爱着她的。打那时起，我就穿上这身褐色的方济各教士的道袍了。”

莫非这是一种誓约？我疑惑。他从未对我讲过，并把这个秘密一直带进了坟墓。可是，如果说道袍是他用来向妻子恳求和好的一种方式，那十八世纪式的假发又该作何解释呢？

“您夫人是位圣女。”神父说。

“我也承认。堂安德雷斯，一切都是代价的。您知道这句格言：浮士德为了青春而向魔鬼出卖灵魂。然而，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浮士德为爱情而卖身，是上策，有人则认为是罪过，该下地狱。”

“我就认为该下地狱。”神父说。

堂安东尼奥笑了笑。

“也不一定，本堂神父先生。您清楚，要想获得拯救，只须忏悔就够了。”

“是的，因为上帝大慈大悲。”神父说。

“对上帝我们不该有怨言。我们祈求它赦免罪过，包括不可宽恕的罪过。”

“堂安东尼奥，我们应当满怀这种希望而生活。不过，若是认为浮士德……”

“您对他没有好感。我也一样。他是一位看不清楚的英雄。我们弄不懂德国人造出这个神话人物来的用意何在。那

些学识渊博的人说他是英国人，在我看来他从头到脚都是日耳曼人。肯定是德国人匆匆促促编造出来的。我上面提到的对浮士德的两种看法，其实就是一种骗人的把戏。罪恶的浮士德不过是墨菲斯特的一个牺牲品。”

“听到您能这样想我真高兴。”

“不过，浮士德是个骗子：他欺骗魔鬼。”

“对魔鬼是可以欺骗的。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不是？他离我们可总是那么近……”先生说。

堂安德雷斯忽然发现谈话走了题，同他来庄园要办的事情毫不相干。

“堂安东尼奥先生，您如今老了十岁，不能再闹一次回巴黎的丑闻了。我希望您慎重考虑。您要想想您的夫人。您不是说爱她吗？您若是这样做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和好。您明白吗？她已经打算忘掉那件事了，当然，只要您理智的话。”

先生虽然没有具体地加以回答，但也承认，假如回巴黎的话，大家都会以为那是因为甥女而非为了歌剧的缘故。

“然而，真实毕竟会胜过谎言：那是因为古诺的歌剧。”先生说。

他的意思是说，他尚未决定是否回巴黎。本堂神父不知说什么好。时钟响了九下，堂安东尼奥忽然叫道：

“我的外甥女告诉我，她一会儿来吃晚饭。我们还没见着面哪。我这样说是怕您不想碰上她。”

本堂神父站起身来。这会引起怎样的轰动！镇上又会

怎样议论呢？我害怕极了。堂娜埃克西玛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传奇人物，犹如堂璜之于许多尚未认识他就已迷上了他的姑娘。她的形象使我在许多年里都是心猿意马，差点儿叫我放弃了神职生涯。年少气盛的时候，人特别敏感，成年人就不会过早唤醒沉睡的机能，这种谨慎永远也不过分。先生确实有与众不同的谨慎。在他的手稿里我见过他的一篇文章，对神职人员的独身生活大加挞伐，主张他们像新教徒那样可以结婚，但他对我却绝口不提这些话题，怕毁了我的前程。不过，如果说他的言词是克制的话，他的行为却实在糟糕。谨慎和理智要我离开藏身之处回房里去，我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哪怕是等一个通宵，不亲眼看到这次会见（因为天冷，肯定会在炉火边进行），不看清这位女客，我绝不离开窗口。这种想法是那样强烈，使我无可奈何，集天下一切理由，也无法叫我改变。

先生想让神父安静下来，请他不要离开。甥女来的时候，可以听到车响。如果堂安德雷斯不想见她，从花园的门出去就行。这比甥女来到之前就走更保险，免得在庄园门口撞上她。

“一点不错，就这么办。我看还是别同她照面为好。”神父说。

神父又放低声音，开始仔细讲起走入歧路的姑娘的情况。他毕竟上了年纪，在数落她的奢侈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又多少掺进一些羡慕。堂娜埃克西玛到达前两天，城里一位贵族来到镇上的旅店里。他是外乡人，讲一口蹩脚的

法语，带来满满一大车家具和窗帘。女店主把他领到客厅，安排到底层的房间住，正好朝着广场，同比恩家族的别墅隔街相望。那位贵族——后来才知道他是帕尔马大饭店的经理——在两名助手的帮助下，立即动手裱上墙纸，挂起镜子，到处摆满花瓶和银烛台。大家都传开了，说是总督要来。女店主也急忙跑到本区教堂去借棉纱床单。本堂神父十分慎重，在弄个水落石出之前不想出借。

“等我弄明白之后，我当然就拒绝了。如果我有冒犯之处，还望您海涵。”

“应当请您原谅我。”堂安东尼奥说。

“那是我们的天职。”

“还要原谅我也许要做的事情。”先生呢喃着，几乎叫人听不清。

“这可不行。”

“说得对。这可不行啦。”

先生了解神父的弱点，神父讨厌进化，却喜欢听别人谈进化。为了投其所好，先生便讲起他的游历及那些发明来。

“我和夫人头一次到巴黎去，不是坐马车而是从巴约纳乘火车去的。法国的火车可多了，到处都是。您知道火车是怎么回事吗？那是一大串车厢同机车头连接在一起。这些车厢都是公用的。只要买一张票，谁都可以坐。记得坐在我们旁边的是希德奥斯的一位先生，样子挺像一位侯爵，人家说他是个店主。”

堂安德雷斯抬起头。

“那你们没有下车？”

“火车正在开呢。火车一旦跑起来，谁也不能让它停下来。”

“假如一个人看到一处他喜欢的景致想下来走走，或者到泉水边去吃点东西……”

“那不行。您没想到那样会使别的旅客不高兴了吗？”

“那末，就只好随别人的意而委屈自己了。”

“一点不错。这就叫社会主义。您瞧，这已经不是一种政治理论，而是一种技术上的必然。不管我们是否情愿，进化会导致社会主义。您通过邮局寄过信吧？”

“星期天给主教大人寄了一封。我亲自对邮局局长讲的，如今我们比恩镇也有一位局长了，是我们两人一起贴的邮票。”

“要是在从前呢，您得找个信使亲手把这封信送去。如今呢，您这封信同其它许多不知是什么人的也不知写些什么的信一起就寄出去了。同这封给主教大人的信一起还有其它完全不同的信，譬如，新教教徒写的啦。”堂安东尼奥说。

本堂神父提醒说，镇上没有新教徒，不过，众所周知，书记官的妻子同一位小伙子书信频繁，互送诗句。

“也许，这是百年来最大的丑闻。”神父说。

“我的还没算在内。”先生小声说。

神父乖觉地沉默了一阵，然后说：

“对了，堂安东尼奥，我已经盯了那辆车子好一阵了……”

他从一进来眼睛就没离开过它。这辆“自动车”比芭尔芭拉·蒂塔娜的魅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证实了先生在镇上得到的巫师的名声。堂安德雷斯惴惴不安地望着这件怪物。

“哪天我把它烧了。”先生含混地说。

“您先别急，”神父态度缓和地说，“不过，烧了也好……堂安东尼奥，请允许我提醒您，那间玩偶厅……”

“锁着呢，谁也进不去。”先生打断他的话。

堂安德雷斯不敢再说下去，还是接着谈本世纪的进步，他总觉得这些进步有些邪恶。

“无论如何，都是些危险的发明。”

“这些发明迟早都得应用。您没听说过电话吗？已经进行过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试验，这和气球一样。自从查特莱侯爵夫人在牛顿陪同下乘气球上天……”

先生拿出一幅纪念版画给他看。版画下面的那几行法文诗，总是令我心荡神驰：

由牛顿作伴，不朽的埃米莱升上天空，
在无边无际的太空里遨游，
丈量着宇宙。

“我不懂法语。不过我觉得好像是说要丈量宇宙。”神父轻声说。

先生点点头。

“把这画烧了吧，堂安东尼奥。”

“随您的便。”先生把画扔到炉火里。

这时我们听见了马车声。本堂神父匆忙告辞。当我期待着看到堂娜埃克西玛出现在院门口（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等着那令人迷乱的身形出现在满天星斗的天幕背景时再睁开）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的却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虽然也很绚烂：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神气傲然，浑身披红挂金，光彩夺目。是天使还是魔鬼？我根本没想到过。几年以后参观卢浮宫时，我才在普桑的画里见到英雄和天神，也是这样璀璨的法国穿戴。年轻人止住步，一磕靴跟双脚并拢，不可一世地喊道：

“维达尔夫人派我来问先生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待她……”

他把“接待”一词拖得很长，是用男中音唱出来的，而且一连加了几个颤舌音。

先生摘下只有在看书时才戴的眼镜，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这位光彩照人的随从任凭先生打量，纹丝不动，宛如一幅学院派的画像。过了一会儿，仿佛要用马略卡式的内秀来抵消法国式的骄横，先生轻声细气地回答：

“告诉夫人，请她进来。”

随从还没来得及退出，一股香气和令人眼花的色彩便涌进屋内。满面笑容的堂娜埃克西玛张着双臂走进来：

“托内特舅舅……”

十五

美是一种不幸的力量。异端邪说力图把美说成是生活的乐趣。我认为它是一种悲哀。文艺复兴运动把艺术的快感置诸高于一切的位置。这真是天大的错误，朋友。把人的肉体神化是对上帝的大逆不道。古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优美的动物雕塑：无知的羔羊，高贵的骏马，安详的母牛。参观完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出来，你会觉得神志清爽轻松，仿佛刚刚经过一次纯洁的洗浴。那些创造出如此美丽作品的艺术家并不想夸大事物，也不想毫无节制地刺激我们的感官。他们才是真正的古典艺术家。不安和罪孽是随着人道主义的盛行而产生的。有人说，艺术使一切都变得高尚，然而，女性美色的表演越富于艺术性越精彩，对人的感官刺激就越强烈，使人忘记还有一位超凡的道德的美神，只有她才能彻底地拯救我们。一位美丽正派的女人，穿戴适度，虽然也是一种危险，在我们沉重的生活里不失为一首优美的、给人以安慰的乐曲。而一位被奉若神明的女人，一位维纳斯，则是一种亵渎。宣称艺术总是圣洁的人，要么是伪君子，要么就是麻木不仁的诡辩家。艺术有时可以成为一席酒宴。圣安东尼的诱惑，帕夫努西的诱惑，都充斥着世俗和神化了的美色。乔尔乔涅，甚至连波提切利和米开朗琪罗作品中的女人都是美貌而该受到谴责的。

后两位不仅是艺术家，还是天主教徒。撒旦也知道用美貌来伪装自己，《圣经》里描写的魔鬼不也是很美的嘛。

埃克西玛艳丽夺目。她身穿一件意大利维罗纳的绿色大衣，披一件羽毛斗篷。细瓷一般的脸庞上浓妆艳抹。一双眼睛深邃勾魂；双唇是那样迷人。魔鬼是很美的。我虽然不知所措，还是发觉她和丑陋的先生有些相像。几年以后，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她说那位美人儿像的是我。人的判断力真叫人无法捉摸。

十六

“我们的壁炉……你还记得我们的壁炉吗，托内特舅舅？”堂娜埃克西玛说着坐到先生身边，“我就喜欢叫你舅舅。”

她已经脱去旅行大衣，露出一身奶色春装。她动作稳重，总是笑容可掬。这使我想起希腊原始戏剧里戴面具的角色，自始至终扮演着喜剧角色或者悲剧角色。她从来不说“不”字。“埃克西玛，不知道生气的女人……”她已经习惯于用微笑来得到一切。她如果不是缺乏感情行事像个机械人，那就是天生具有以感情作交易的才能。我有时想，像她这样道德上有愚蠢行为的人，是否该对自己酿成的灾祸负完全责任。假如不把他们当作故意犯罪而判决并罚以炼狱之火，死后他们是否会在净界的黑暗里对真理和谬误同

样加以嘲讽。先生把她比作一只猫，显然她并不是那么有理性。

这只猫坐到一张凳子上说：“你不再陪我到巴黎去了吗？明年初又要上演《浮士德》。”

先生身子略往前倾地望着她，细小灵活的眼睛周围已经像伏尔泰那样布满皱纹。

“埃克西玛，你用的‘重演’这个词是地道的法国式的。”

“莫非我就不是法国式的吗？”

“令人愉快的法国式的。坎波·福米奥怎么样啦？”

“别提他啦。纯粹是个朝三暮四的人。”

“我早就对你说过。”

“他还自作多情以为是皇后的恋人呢。你喜欢欧仁妮吗？你不觉得她是朵开得过份了的花吗？她像西班牙好女人一样热情奔放，但是贞节观念搞得她神魂颠倒……她特别喜欢叫喊她是正派女人。可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

先生闭上双目说：

“评头品足。”

“都说完啦。她不会当皇后的。”

“路易·拿破仑就会当国王吗？”

埃克西玛眨眨眼：

“他可是心满意足。他善于保持自己的尊严。你想想看，正式接见的事我到现在还没搞成功呢。哦，不过今年冬天我会办成的。他已经答应我了。我不愿意总是从小门进入

土伊勒里宫。”

堂安东尼奥说：

“他和俾斯麦的会见，我并不觉得有多少尊严。他不应该同普鲁士的外交部长而应该同普鲁士的国王交谈。他使法国在外国面前丢了脸。霍亨索伦（其实也不是国王而是侯爵）就比他强。”

堂娜埃克西玛默不作声，因为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先生发觉她有些厌烦，便拉起她的一只手。

“瞧瞧……这手镯？”

她抚摸了一下先生的脸。

“啊，你是怎么猜到的？这钻石很漂亮，你不觉得吗？”

“可以再大一些。还有什么？”

“还有这只戒指。”

“拿什么换的……？”

堂娜埃克西玛装出气愤的样子回答（必须实话实说），说出一句厚颜无耻的话来：

“先生，我可是个正派女人！”

“埃克西玛，你很可贵。你是上帝造出来的一件宝贝。”先生说。

“镇上都说我是魔鬼造出来的。啊，托内特，你跟我走吧。我已经买下了明星旅馆，你还记得吗？一切都会像上次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付钱的是我。我现在很富。”

先生没有回答。她捡起一本诗读起来：

“那个夜晚，你可曾记得？我们在静寂中互相注视……”

你成了诗人啦？怪不得你嫌国王的钻石小了。”

先生又做了一个他那特有的令人捉摸不透的手势。她笑了。

“诗人都是十分慷慨大方的。他们不送钻石，送星星送月亮……法国国王够可怜的，只能给我买这个。”

这是一种要求吗？她真的是为钱而来的？大家都知道先生夫妇经济拮据，庄园里大量的房地产都典押出去了。堂娜埃克西玛却是坐着马车来的，套的是英国马，雇了车夫和随从。她真是铁石心肠。我等待着她讲清具体的要求。假如她真的提出要什么的话，我真怕我那乡下人的脾气，看重物质财富（因为土地贫瘠，因为懂得既然生活困苦一切搬迁都会使情况更糟）而又暴烈的脾气，会不顾一切地爆发出来，给这位不速之客以应有的惩罚，尽管我对先生很尊敬。可是，我当时并不懂像象堂娜埃克西玛这样的女人不会伸手要，而是让你自动奉献甚至要求她接受。

先生抬起头。

“你是说你阔了？我接到的信说的却是坎波·福米奥破产了。”

“别气我了，托内特。我没有让谁破产。就是我让他破产了，我的餐桌上总还是不缺饭菜的。知道吗，那旅馆我还没付钱呢，但我同皇上讲过了，他笑了笑。好兆头，不是吗？”

“那么你现在不需要我帮什么忙了吗？你给我来信说……”

“噢，那时我还没对皇上讲呢。我不是告诉你，他笑了吗？”她急忙打断先生的话。

我舒了口气。门口忽然出现了激动异常的芭尔芭拉·蒂塔娜的身影，那些日子里她已经完全神经失常了。她身材高大而难看。一件黑色长袍一直垂到脚面。

“啊，埃克西玛，我的姑娘，让我吻吻你。你是天使，你是美人。我不能拿手碰你，我的好姑娘……”她叫起来。

她带着令人费解的激动开始用第三人称讲起来：

“外面有两位将军赶来一辆马车在等着她。世上的国王都向她鞠躬，给她让路。先生，您怎么说呢？在比恩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从来没有，蒂塔娜。”先生回答。

蒂塔娜埃克西玛吃惊地打量着她。

“您是芭尔芭拉·蒂塔娜？我真没认出来……”

疯女人朝她转过脸来：

“埃克西玛，本堂神父要把你请到祭坛上去。”

“正合适，芭尔芭拉。”埃克西玛笑起来。

疯女人出神地盯着她。

“先生，您摸摸她的脸，哪怕只用两个指头。”她小声恳求道。

蒂塔娜埃克西玛妩媚地说：

“芭尔芭拉，你来摸摸我吧。”

疯女人忐忑不安地碰碰她的手镯。

“啊，多漂亮的镯子啊……”

她跪下来，悄声祈祷。埃克西玛像对一头小牲口一样微笑着。

“她的神志丧失了吗？”埃克西玛问。

堂安东尼奥解释说，镇上的人都很纯真地对待她。她也似乎很快乐。

“好啦，我也有了一个圣女。”埃克西玛总是那样满不在乎。

“上帝会保佑你的，皇后。你行了善是要得到报答的。”蒂塔娜简直像在背诵什么似的。

“可是，芭尔芭拉，我可是个魔鬼呀……”

“你是天使，天上的神仙！我们都爱你。要不是你，我们永远也别想见到一位皇后。”芭尔芭拉一直把头低到碰着地皮。

她的感情是那样强烈，简直像在演一出喜剧。而她朗诵得又那么糟，像位蹩脚的女演员。我后来见过许多疯子，出乎我的意料，都是假装的。说实话，这还是堂安东尼奥观察到的呢。“当批评不占上风的时候，一切都会变成闹剧。”你若不信，可以看看世上那些恋人写的所谓“诚挚万分的”情书。难道不可笑吗？可怜的奥费莉娅难道不是一位矫揉做作的典范吗？

蒂塔娜忽然站起来，在埃克西玛脸上吻了一下。接着她趴到地上喊起来：

“我可以放心地去死啦！”

她仿佛昏了过去，但很快又站了起来，面向先生。

“你吻她一下！”她口气威严，昂首挺胸，俨然一位喜剧中的皇后。

“够了，芭尔芭拉。”

“吻她！吻她！”疯女人嚷道，抓起一把椅子就要往自己脑袋上砸。

先生吻了堂娜埃克西玛，蒂塔娜发出一声叫喊，跑了出去。

“她不知道自己已经神经错乱了。你不是说她就早爱上你了吗？”外甥女说。

“那是很早以前了……”先生承认道。

“那你呢？”

“我可是个君子。”

“你不喜欢她吗？”

“她总是那么丑。”

“是你的圣洁使她变成这样的。”

“她过得很惬意。而今天她所爱的似乎是你……”先生反驳说。

在巴黎学到了最时兴理论的堂娜埃克西玛十分在行地笑了笑。

“不，托内特，那是她替我设身处地的缘故。”

“见鬼！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先生有些愕然。

“我们在那边消息灵通着呢。”

这种场面使我心头如压千斤巨石。舅舅和甥女都像有权有势的人那样冷漠无情。这种冷漠无情，有时在我们这

些乡下孩子看来简直就是最严重的利己主义。他们活像两个外科医生，两个作活体解剖的人，只顾动他们的手术刀而不管刀下的人是否痛苦。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简直恨他们。他们是“贵族”，是敌人。我的气忿很快就过去了。受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他们也颇值得同情。法国宫廷里的嫔妃见到一只蜘蛛就会吓得昏过去，却到布林维勒斯去观赏绞刑，到达米恩斯去看磔刑。

十七

我正在这样沉思的时候，堂娜埃克西玛和堂安东尼奥都不见了。我猜想他们也许到餐厅去喝点什么东西，马上就会回来的，我便坐到一张旧摇椅上。由于一夜的激动弄得我筋疲力尽，不知不觉便睡着了。我不知这样过了多少时间。待我从不安宁的睡梦中醒来，发觉周围是那样的静寂，便又到窗口去张望。不见一个人影。那张凳子上，在先生一堆堆的纸张和书籍中间，放着堂娜埃克西玛的绿大衣和羽毛披风。在炉火的映照下，那些东西仿佛充满活跃的生命。这些衣物的主人很快就会回来，继续他们放荡的行为的。大衣，披风，书籍和炉火在夜的宁静中颤抖。两个罪人回来了，但不是来自餐厅而是来自楼上的房间。堂娜埃克西玛像平常那样心满意足，靠到炉火边，像刚到那时那样又叫了起来：

“我们的壁炉……”

她闭上眼睛，脸上挂着微笑。忽然间她问：

“你让我看看玩偶厅吧？”

先生摇摇头。

“为什么呢，托内特舅舅？你知道我一直那么想看看……我原以为你……”

一阵静默，她明白了，还是别再坚持为好。

“玛加里塔呢？”

“死了。”

“啊，是真的……”

“现在巴黎怎么样了呢？”先生问。

他们在没话找话，似乎两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多少好谈的了。她回答得很轻松：

“从来没有这么好。两年前那个展览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帝国经过二百年更巩固了。我们却正处在色当之战的前夜。雷赛布打算举行运河的通航式。奥芬巴赫的《在大道上》也取得了成功。你没看过《杰罗尔斯坦女公爵》吧？”

她小声模仿表演起来：

“这儿，

这儿是一把指挥刀，一把指挥刀，

我父亲的指挥刀……”

“就是说，路易·拿破仑替你付买旅馆的钱啰？”

“我不是告诉你，他笑了吗？”

“这……就这些吗？”

“他说：我们两人应该一起去见见财政部长。”

先生又做了个他特有的手势，显得有些吃惊，微微张开嘴，低下头，意思是说：这还不错。

“法国那么富有……六十万法郎对全体法国人来说算什么呢？微不足道……”堂娜埃克西玛接着说。

她还谈了她的经济计划和情感计划。

“有一个龙骑兵……”

“什么？”

“一名龙骑兵中尉，十分年轻，高高的个子，很穷……”

“你的心肠多好啊，埃克西玛。”先生打断她的话。

她假装对他的挖苦生气了，揪揪他的头发。

“我为什么对你讲这些事呢？你太坏了，托内特舅舅。”

“别把我的假发弄乱了。这些耳坠好吗？”

“好。怎么啦？哦，我可不想再对你讲什么了。简直像在忏悔。”

他对她说，她的车子到来的时候，他正在向本堂神父先生忏悔呢。

“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呢？那好吧，明天你再接着忏悔，你会有更多的事情好讲的。看看你会对他说些什么？”

“我会告诉他，来了一个魔鬼……”

“我不是上帝的宝贝，是美人吗？”

“卢息弗也很漂亮呢。”

“不过，他一定不是上帝创造的。”

“什么意思？”

“这些事情我从来就没搞清楚。”她眨眨眼睛。

堂安东尼奥开始给她讲解，但被她打断了：

“托内特舅舅，别说什么异端邪说之类的好吗？”

先生没理会她，只顾往下说：

“我觉得，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必定有某种协调，某种平衡……”

一个西班牙女人，尽管生性放荡，要她不信教简直是天大的怪事。堂娜埃克西玛神情严肃，搜索枯肠地想找出什么理由来反驳。

“住嘴，不是那么回事。”她终于叫道，“我是有原则的。”

先生说她的原则全用错了地方，她又笑了起来。不论怎样，只要关心到她身上，她就高兴。

“可是，我也不至于那么坏呀。”她说。

“你已经听过芭尔芭拉是怎么说的了。龙骑兵是怎么看的呢？”

“他说我是个天使。”

“你瞧见了把？我们还是应该设法达成一致，因为镇上可不这么看。”

然后，他又灵巧地改变了口气，问：

“喂，你见过缝纫机了吧？”

“我有一架。是人家从伦敦给我带来的，不过你猜得出我是不用的。”

“电话呢，你也有了么？”

“我每天都用，从床上打电话叫唤车夫。”

“你知道吗，你那些仆人把本堂神父的蛋卷都吃光了？
你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那个随从？”

“挺漂亮的，你不觉得吗？”

“够骄横的。”

“不假。可挺会办事。”

接着她讲到去看了玛丽娅·安东尼娅舅妈好几次，其实她们不断见面，只是互相漫不经意，也就互不了解。

“试想一下，像比恩这种地方，这已经不容易了。”

“我想你们两人会处得很好。”

先生出于礼貌才说“你们两人”，实际上他是专指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据堂娜埃克西玛自己说，她真想去拥抱安东尼娅。如同不具备其它许多精神上的优秀品质一样，她也不懂得记恨。她舅母也不是爱记恨的人，却知道举止要有分寸。在颇难驾驭的处世艺术方面，她堪称一位伟大的夫人。她对第一个跑来告诉她堂娜埃克西玛从巴黎回来了的人，谈到塞纳河，谈到圣母院的花玻璃窗。因为比恩家族的别墅坐落在广场上与教堂毗邻，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从阳台上不仅能看到旅馆的大门，连堂娜埃克西玛住的房间也尽收眼底。据本堂神父说，埃克西玛住的房间裱了大马士革式的壁纸，摆满了银烛台，点缀得像小教堂一样。可是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从不到阳台上去张望，阳台只在观看朝圣游行时才打开。外甥女的马车总是套好等

在门口，可是舅母习惯于从花园的那扇门进出，它通向另一条小街。

“我提醒你，她依然风采动人。”堂娜埃克西玛说。

“我觉得她一直就是这样。”堂安东尼奥答道。

他还加了下面这句古怪的话，与他清醒的头脑很不相宜：

“再过四分之一世纪，你也会变得和她一样。”

堂娜埃克西玛没有作声，心里乐滋滋的。先生抚弄着她的头发。此刻他倒真像一位正在推测未来的巫师。

“那时候你就满五十岁了，你的头发会变得灰白，你会受人尊敬，你会对人施舍……”他慢吞吞地讲解着。

堂娜埃克西玛对自己这种被假设的新形象报以一笑。这种到了五十岁再来修行从善的想法，她觉得不错，因为她还不到三十岁。

“我会受人尊敬，”她插空说，当别人谈到她的时候她是从不打断人家的，“那么等我死的时候……”

“等你死了，会给你举行隆重的葬礼，然后你就升入天国。”

她拥抱了他。

“你真好，你真慷慨……跟我到巴黎去吧。”

面对舅舅给她提示的道德规划她竟然给予这样的反应。他以嘲讽甚至有些遗憾的目光望了她一下。

“那龙骑兵呢？皇上呢？”

堂娜埃克西玛一挥手就把这两个幽灵撵得无影无踪。

“啊！现在你就别再编造什么困难啦。对你来说，一切都很简单，你是那么和蔼可亲……”

先生用伏尔泰式的微笑继续望着她。她不再作声，因为她喜欢别人亲近地望着她，而且生怕打断别人关于她的议论。堂安东尼奥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说出五个字来，我欣喜得浑身直颤：

“我不回巴黎。”

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似乎带些怒意。

“啊？现在你还这么说？我原以为……你是怎么啦，托内特？你是打什么时候变的？”

“也许是从现在开始变的。我得告诉你一些迄今我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女人说过的话。”

她欣喜若狂。正如先生在回忆录里所写，她比一只猫还要好奇。

“啊，托内特！你真好……你愿意把一个秘密告诉我？是不可告人的秘闻吗？你准许我对别人讲吗？”

“悉听尊便。”

“你真好……你真棒……快告诉我，快说吧。我听着呢，托内特舅舅。”

她像条蛇似的盘缠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轻轻地眨着眼。先生又说出了斩钉截铁的这句话：

“我不很喜欢你。”

我兴奋得喘不过气来。上帝真是大慈大悲。他的圣名真值得大赞特赞。堂娜埃克西玛也怔了好一阵子。随后，她

发出比刚才更加响亮的笑声，有些尖厉。

“啊，你真讨人喜欢，托内特舅舅……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这是你第一次对一个女人说这样的话吗？真新鲜……我也是头一回听人这样对我说。”

她虽然显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终于还是神态凝重起来，从手提袋里找出一面镜子。

“没有必要照镜子，埃克西玛。你美极了。”先生带着十分怀恋的神情。

“我也正是这么认为的。”

“你还可以继续这么认为。变化了的是我。而且，”他闭上双眼，“现在我看见你了……别出声。现在我们进了歌剧院。你穿着白色服装。古诺同我们打招呼。皇上也把眼睛盯着你。他拿起望远镜。你要是坚持的话，他当然会替你付钱买旅馆。六十万法郎……根本算不得什么。可是，手镯上的钻石太小了。你太美了，埃克西玛。没有人能比得上你那么美。”

他像古代的女预言家那样高声说着梦话。看到他这么古怪的神情举止，令人不由得想起关于他是巫师的流言。他的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他那有些颠三倒四的话是受到什么启示而发自内心。此时，埃克西玛悄悄站起来，朝院门探探头。她也一定很激动。先生继续说：

“什么也别说。别作声。从来也没有能够像今天晚上这样看你看得这么清楚的。我吻你的时候看不见你。要看就要隔一定的距离。把你的手给我。你在哪儿？埃克西玛！”

他睁开眼，发现只剩自己一个。埃克西玛已经温柔地走过来。

“我在这儿呢，托内特。”她坐到他身边。“我刚才在看星星。你是说，闭上眼睛离远一些你才能看清我吗？”

但是，先生的梦境已经消失了。

“你等一下，会让你大吃一惊。”他说。

先生从房间里出去了。堂娜埃克西玛走近那木头做的笨家伙面前，仔细地看。我听到她在小声说：

“一辆自动车？”

堂安东尼奥拿着一只盒子回来了：那是他母亲留下的一串钻石项链。这是家里唯一的一件值钱的东西。先生曾经拿出来给我看过几次说，到了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就把它卖了度难关。先生把项链递给埃克西玛，她高兴得跳起来抱住他的脖子。

“钻石项链！”她喊了起来。“托内特舅舅，你真好……啊，多么令人高兴哟……路易·拿破仑……”

先生微微一笑：

“我的钻石稍稍大一些。”

“可是，你为什么要送给我呢？你不跟我去巴黎？”

堂安东尼奥摇摇头。

“啊，从来还没有人是这样来拒绝我的。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托内特舅舅？”堂娜埃克西玛笑了。

“去同那个龙骑兵尽情欢乐。”

“你吃醋啦？”

先生痛苦地瞧了她一眼。他倒不是吃那位中尉的醋，这一点他在回忆录里写得明明白白：他刚刚懂得，靠着向魔鬼出卖灵魂是不能获得永生的，只有拖住时间，不让它动。而先生希望得到的永生（世俗的永生）必须由他本人去创造。想一切重新开始是来不及了，但留下回忆还是可以的。他已经不需要堂娜埃克西玛，只要她的形象就够了：回忆录，从比恩镇隐退，一支笔，墨水和纸。

“你瞧，小时候我十分喜欢玩跳绳。大一些了，就玩秋千……现在觉得这些都很可笑。可这并不是说要忘记童年。我总是津津有味地回忆我玩秋千的情景。”

“现在要想玩秋千可是太晚了。”埃克西玛说。

“别这么想。再要玩秋千是晚了，但回忆回忆并不晚……我不会离开这儿的。我很清楚我该做什么……我想你并不理解我。”他停了一下，又望着她。

她挨近他，用女性的甜言蜜语说：

“啊，托内特，你知道，我不过是只正月的猫……而你却是那么好，那么通情达理……听着，现在我是真正感到羞耻。啊，从来都没有过的事，二十八岁时感到羞耻……”

她把头靠在他肩上，小声说了些什么我没能听懂的话。

“对。”先生拿起那串项链，“瞧这个。你用这颗大钻石给他做只戒指。你那位龙骑兵多大啦？”

“二十岁。”

堂安东尼奥已经满五十八岁了。

“二十岁。”他想了想，大声说，“龙骑兵中尉。你怎么想

起来征求我的同意呢？”

她吻了他的手，被他的慷慨大度所感动。

“好吧。我们都别犯傻了。还记得我们的格言‘一切都别放在心上’吗？现在是十点半。你若愿意替我做件好事的话，就马上回镇上去。玛丽娅·安东尼娅还不会睡下。你替我去看她一下。”先生说。

“你别把我弄得颠三倒四的。”

“你一点也不颠三倒四。你会做得很好的。你告诉她，你是从这儿去的，见到我卧病在床，孤零零的一个人……”

“病得很重吗？”堂娜埃克西玛问。

“别说得太过份。玛丽娅·安东尼娅不喜欢走极端。”

“那……让她来吗？”

“不。那是她的事了。哎，有一句忠告：到了你舅妈家，可别让你那穿制服的将军去通报。”

“那我该怎么办？”

“你把车子停得远一些，一个人进去，就说：玛丽娅·安东尼娅舅妈，明天我就动身走了，在巴黎您要些什么吗？”

“我一定这么办。”

先生帮她穿上大衣，又替她把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免得让他夫人看见她的袒胸。他十分心细，总是那么稳妥适度，至少是在细节方面。堂娜埃克西玛消失在夜色里，只听见蹄声得得，挂铃叮当。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到一扇通厨房的小门跟前说：

“玛多·弗兰西娜，必须把夫人的房间收拾好。她捎信说过一会儿就到。看看还缺些什么，在梳妆台上放点香水。”

十八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过了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先生已经吩咐过所有人都去睡觉，包括玛多·弗兰西娜，她不愿去睡。我当然是例外。先生盼着夫人回来后就再也不走了。事情也正如所料。他十分满意，考虑了各种各样的设想，力争使她生活得痛快一些。

“她会嫌房子不够干净，因为她有洁癖。不过，收拾打扫房子也可以给她解解闷。我们应当告诉玛多·弗兰西娜去找些女人来粉刷墙壁。”

“您觉得她会留下来吗？”我壮起胆子问。

“那自然喽。”先生胸有成竹地回答，“她就是这么让人转告我的嘛。本堂神父先生会安排一切的。而你，吃完晚饭以后都干了些什么？”他又好奇地盯着我说，“在巴黎的外甥女来过这儿，你没见到她吗？”

“没有，先生。”我战战兢兢地回答。

“你没听见马车响？那就怪了，车上挂了那么多铃铛。”

但他马上就心不在焉了。他的心全拴在了他夫人身上。

“她想要一位神父。胡安，这你是知道的。可惜你还不能主持弥撒。你还要学会玩三人牌戏，她是那么爱玩。”

我们不时探头张望。终于，在夜的静寂里我们听到了车响。比埃尔，夫人的车夫兼总管吆喝着牲口过来了。同堂娜埃克西玛又是四轮马车又是穿制服的随从那样的奢华排场形成鲜明的对照，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是乘一辆套着干活用的骡子的破车来的。这种反差刺痛我的心。后来我还对先生说起过，但他似乎毫不在意。

“排场阔气与人品、与社会地位有什么相干呢？”

“您的外甥女，”我脸红脖子粗地回答，“不应当带着两个穿制服的随从来，因为夫人……”

“提到这些普通而自然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生那么大气呢？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不需要招摇过市。埃克西玛也不过是一位在法国被称作喜欢别人献殷勤的女人。你难道不明白她比我的妻子更需要排场体面吗？奥地利皇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她的女儿玛丽娅·安东尼埃塔，该让你知道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你知道玛丽娅·安东尼埃塔喜欢奢侈，追求时髦。她有一位女服装师——一位德国犹太人：贝婷女士。哪一天我们去巴黎的话，我带你去看看她的服装店，在圣奥诺雷街——老是怂恿她，给她火上浇油。仅仅在一年里就给她做了七十二套丝绸服装。这使得皇后写了一封信给女儿。信里说：‘这样的奢侈豪华与一位女王是不相称的。’杜巴里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先生听出了比埃尔的声音。车子还没进院，他忽然心生一计：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刚才我偷看他与堂娜埃克西玛会面的那间屋里。

“我们就躲在这儿看她进来，可别让她发觉。看看她是怎么进来的，带了什么行李（关于她的行李总有一种新奇感），看她有什么反应。快跟我来。不过，别忘了，”他笑了笑，“躲在门背后偷听总是不十分光彩的事哩。”

当马车进入第一道大门的时候，时钟正敲十二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已经有五十五岁左右了，但她依旧风姿不减，穿戴朴素，却富有魅力。

“比埃尔，先把祷告用的跪椅拿下来。”她的声音十分平稳。

“尘拂和长绒枕放哪儿呢？”比埃尔问。

先生用胳膊揽住我的脖子，笑着望望我。

“放在一起吧。把基督像摆在桌上，还有圣水瓶和小银罐。”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答道。

她坐到壁炉旁，望望那堆书，边浏览边吩咐。

“那些扫帚，”比埃尔抱着六把新扫帚进来，“你不能放到跪椅旁。我也不喜欢看到圣水瓶旁边摆香水。凡是梳妆用品都该放到一把椅子上。”

先生轻轻地敲敲我的脖颈。

“还有什么吩咐吗？”比埃尔问。

夫人吩咐他第二天到印加去请个神父来，顺便买些紫罗兰香皂。

“如果你找不到神父，就带个教士回来，好主持念《玫瑰经》。”

“要是没有紫罗兰香皂呢？”

“那就随便什么牌子的都行，但要好的。”

“晚安。”

“再见，比埃尔。到克鲁兹拐角时多留点神，因为母骡看不见。”

“它的眼力比您还好。它就是调皮。”

剩下堂娜玛丽娅一个人的时候，她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墙壁。

“怪了，难道这儿一个人也不在？”她小声地自言自语。

这时候先生认为该现身了，便像演戏一样自自然然地走了出来。他身穿褐色长袍，头戴发蓝色的假发，快步走在长长的门廊里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

“你好吗，玛丽娅·安东尼娅？”

她静静地依旧坐在那里，微笑着。

“喂，托内特。坐在炉火边上好舒服啊。”

“你真好，这么晚了还来。我的病情使你很着急吧？”

“一点也不，托内特。我还不了解你吗？”

真是棋逢对手，势均力敌。先生本想巧妙地谈起过去的事，却被夫人打断了。

“我们不谈这个，因为弄不好我们都会生气的。”

“说得对。梳妆台上已经给你准备了香水，也许还有紫罗兰香皂。”

“我刚才对比埃尔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你早就应当猜到的嘛。”

她当然早就猜到了。他们互相之间太了解了。堂安东

尼奥常说，了解和理解相当于谅解。当我想起他那绝顶的聪明与忠厚多少次使他亲近异端邪说，我觉得简直太可悲，太生不逢时了。我会永远记得（就是我第一次主持弥撒那天）吃早饭时，他凑近我耳根说，上帝与魔鬼之间仅仅是只有一层“误会”罢了。哪怕他就是朝我脸上打一拳，也不至于使我那样吃惊糊涂。我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一下子站起身，离开餐桌回到自己房间里，插上了门。客人们都惊呆了，他们没有听见先生那些亵渎神明的话。先生急忙派人给我送来一张铅笔写的便条：“巧克力要凉了。”那是一道命令。我没理睬他的命令，而是极有礼貌地回答说，当不肖的伏尔泰和耶稣会教士一起学习的时候，把冰块放到圣水池里，好让教士们去点燃壁炉。我还说，巧克力凉了我不在乎，但他那比冰还凉的话使我心惊肉跳；除非他沉痛地请求上帝宽恕他说过的那些十分不妥当的话，我绝不回到餐桌旁边去。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至今我也不得而知到底是美德还是傲气使我那样说。我牺牲了自己充满诱惑的青春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先生一定耸了耸肩膀。他读了我的回条，亲笔在空白处写下一个词“道歉”作为回答。我带着哭得红肿的眼睛立即回到餐桌旁，先生却当着众人的面笑着给了我两拳，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然后，他逼着我喝下一杯不知什么东西。

“神经就得这么治。这是我今天早上在一本德国人写的书里读到的。”先生说。

先生走到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身边，在她额上吻了

一下。

“我想知道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看看你怎样进来，怎样望这炉火，带来什么样的行装……你的行装总是那么有意思……”

“好吧，”她打断他的话，“我们什么都谈一谈吧。埃克西玛来看了我。自然，她又是那么装腔作势。还在临街的大门口就喊起来：‘玛丽娅·安东尼娅舅妈，您在巴黎需要点什么吗？’什么举止啊，对吧？在巴黎一定很流行这种做法吧？”

先生一时不知所以。

“那她该怎么做呢？”他喃喃自语。

“她应当更自然一些。总是带着两个穿制服的仆人转有什么用呢？我吻了她——我该做些什么呢？——也问了她是什么时候到比恩镇来的，尽管这几天走到哪儿我们都碰得上。”

“她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她说她刚刚得知我在镇上。你若是看见她对我讲起你的病情时那天真得像个孩子似的样子……”

“她很天真。我知道有人在传说她是来劝我把森林典押出去的。这是捏造，不然，她明明知道我身无分文，还邀请我去巴黎干什么呢。”

“可怜的托内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这两天她只是东奔西跑地想看看还能从你的庄园里弄到些什么，当她得知你的地已经不值钱，典押不出去，无油水可捞，才来邀请你的。不过，她还是从你身上榨出点油来了。”

一串钻石项链。只是从他手里弄去一串钻石项链。它的价值相当于比恩家族最好的一幢房子，连同家具在内。她并未伸手要，而是通过大方地邀请受害者便把它弄去了……先生低下头，有些惶惑地答道：

“是我母亲的那串项链。说到底，还是她的曾祖母的呢。如果我们分手那天你不把它还给我，自然就……你不舒服吗？”

“没有。不过，既然事已至此，你应当明白你母亲不会那样看的。”

他没有回答，坐到炉火对面，把脸埋在手裡。

“你肯定他们说过不想拿钱押这些地了吗？”

“镇长和书记官都对我讲了。所以，她没向你要钱而要了项链。”

先生认输了。与其说他想说服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不如说他更想说服自己。

“也不完全是这样，”先生慢慢抬起头，“她并没有伸手向我要项链。”

“她愿意你主动送给她，托内特。现在谁在那儿最受宠呢？”

“老样子，还是那个公爵。皇上好像也打她的主意。还有一位龙骑兵中尉，挺年轻，穷苦家庭出身……”

“多动听的故事啊。”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项链不落到龙骑兵手里才怪呢。”

“她说就送一颗钻石给龙骑兵做戒指用。”堂安东尼

奥说。

“她是这么对你说的？不过，这个女人有些怪。有的事情她不说出来。”

“我敢担保她是天真的女人。”

“也许是她碰上了一个天真的男人。”

他又坐下来沉思。

“两个小时以前，就在这炉火旁边，埃克西玛十分真诚，她请求我准许她送一颗钻石给龙骑兵。她的真诚是实实在在的，同我后来把整串项链送给她毫无关系。玛丽娅·安东尼娅，一切都会变。真诚的时刻同其它时刻一样会消逝。要想永远留住它只有靠自己。”

夫人像对小孩一样抚摸他。

“你太好了，或者是太傻了，托内特。”

“而你是绝妙无比的。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

“你这话说了多少次啦？”

“对，但不一样。你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吗？”

“假如你变得明智的话……”

“一定。”先生答道。

“假如你答应烧掉这些书……因为里面一定有许多坏书。”

“就看主教府怎么答复了。看看他们什么时候给予答复。”

“假如你忏悔……”

“可是我并不需要别的啊……”

“假如你能追悔……假如你能忘记……”

先生冷冷地瞧了她一眼。可怜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尽管她聪明，直感力很强，眼下确实不理解他。米格尔，你别以为我在讲大话，不过，确实如此：对于闯荡过江湖、什么样的人都能接触过的先生来说，最了解他的莫过于我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是事实。我当时就觉得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碰了一个危险点，而对这一点她最好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堂安东尼奥可以放弃一切，甚至把他的书房烧个精光，但他不可能放弃那些回忆。无疑，这些回忆常常该受到谴责，但是，它们已经在他的灵魂里生了根，无法消除。可以把它们高尚化，也可以诅咒它们，但不可能消除它们。先生最后的最忠实的情人，在孤独中陪伴他的情人，便是回忆录。为了它，实际上他奉献出了一切：金钱，名誉，甚至堂娜埃克西玛的美貌。于是，先生一听到夫人的那番话，便站起身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坐下来。

“这绝不可能。你别这样要求我，我什么也忘不了。”他说。

他的语气十分激烈。面对他的这种反应，夫人半天没缓过气来，擦了一把泪。然后，她一声不响地收拾她的行李。

“天一亮我就走，”她说，“我不提前走是因为我怕黑。你会把行李都给我送来的，对吧？”

他站起来，深情而温柔地抱住她。他又恢复了平时的

样子。

“傻瓜……你真像个小姑娘。竟然怕黑……”

因为他们在房间的另一端，说话声音又小，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很明显，他们又和解了。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尽管对她丈夫的某些方面不理解，但她采取忘记的策略，必要的时候就把问题束之高阁。她具有真正的外交天才，灵活机动的天才。丈夫的拒绝是双关的语义引起的，因为她提的是“追悔和忘记”，而他回答的是“什么也忘记不了”，似乎重要的是问题的后半部份而不是前半部份。很明确，他并不想追悔。为了避免承认如此痛苦的现状，夫人本能地撕开了遮盖问题的一层薄纱，开始继续商量别的问题。必须烧掉一些书。为什么非得等主教府的决定呢？难道不明白伏尔泰是坏人，狄德罗是无神论者？她走近炉火，一只手扶到先生背上。

“把这些玩艺儿烧掉，托内特。愿意吗？至少烧掉这本……伏尔泰……还有这本？勒南的。啊，这一本，《耶稣的生活》……”

“假如这样能使你高兴……”

先生二话没说，把她提到的那几本书一股脑儿扔到炉火里。他这样听话使得夫人喜在心头，笑在脸上。“托内特，这样简直太好了。他有些方面很怪，有时像小孩似的反应粗暴突然，不过他喜欢讨人喜欢。在主要问题上他肯让步，就不必对他吹毛求疵了。”她心里的这些想法并非是分析的结果，也不是来自爱情，但能镇静她的情绪，还可以起到

一把伞的作用。这把伞不能揭示什么实情，但能遮雨挡风。我继续站在窗口（现在是合法的，因为是先生本人把我引到那里去的），先生的那种听话的表现却骗不了我。几年以后，先生亲自对我说那些书于他无关紧要。

“人读书读到半截入土并不奇怪，但是一旦他的品格特性形成了，他就该写作了，该要儿女了。出名出一两次就够了，但要使学到的东西永存。”先生对我说。

十九

对于先生这种宽厚依顺的态度，夫人曾经激动一时。

“可怜的托内特，现在没有书了，你怎么办？”她叫道。

“可我有你呀。烧了书，你就留下来了。小心，你在烧堪皮斯呢。”

“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是什么？”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惋惜道。

“百科全书。可这几卷是《基督纪元》。它们都装订得一模一样。”

“你不该把它们装订成一个样子。多好看的炉火啊！”夫人十分满意。

先生不怀好意地笑笑。

“堂安德雷斯会怎么说呢？现在你可把他的美差搅了……”

她奇怪地望着他。先生便给她胡编乱造瞎讲一通。说什么本来堂安德雷斯打算烧这些书，这样他去见主教大人时，主教大人准会任命他当教区神父的。夫人问道：

“谁对你讲教区神父的事的？你讲的是真的吗？”

“是我自己想的。”

“唉……”

夫人继续把书往火里扔，虽然速度慢了一些。终于，她住了手。

“可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她当时有些内疚。先生故意让她内心不安，寻找借口拖住她，免得她一下子把书都烧光。堂安东尼奥拿起她的一只手，夸奖她那细削的纤指。

“我不知道你认为它们怎么样，你总是说我的一双手好看。可怜的托内特，现在没有书了，你怎么办？”

“现在一切都看我的了。歌德是文艺复兴前的艺术家。谁想得出浮士德会从海里要田来赎罪呢？比恩庄的一位女工认为能继承十万杜罗就是幸福，这没有错。但对歌德来说，他就应当有更深刻的思想。你还记得吧，我小时候玩秋千……”

“埃克西玛告诉我，你对她讲过这事。”

“她告诉你啦？看来你们的会面很亲切。”

“十分亲切。”

“我不会放弃秋千的，玛丽娅·安东尼娅。当然，想想而已。什么都不放弃。”

“可是，你不是已经同意我烧……”

“对，全烧掉。这些书对我已经毫无用处。现在该我来写书了。瞧着吧！……”

她狐疑地瞧了他一眼。

“但愿你别写些胡说八道。”她说。

“我尽力而为吧。我想描写世界的和谐，并为这种协调出把力……”

“瞧，这就对啦。”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叫道，她不想触到问题的最深处。“和谐一致……”

忽然间（她毕竟是个女人，尽管她自以为已经老了）她不怀好意地瞥了他一眼。

“托内特，你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埃克西玛找了个龙骑兵你心里舒服吗？”

“没什么不舒服。这很自然。”

“对她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是因为这个你才不去巴黎的吗？本来你可以排在第二名的，可怜的托内特。”她说。

“据我所知，我可以排在第四名。”

“噢，天哪！你前边还有三个？”

“你数一数嘛。公爵，皇上，还有龙骑兵。”

“原来如此，”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若有所思，“我们的外甥女可真够胡来的。我还吻了她呢……可我有办法？”

“记恨别人可不聪明。”他叫道。

“我对她一点也不记恨。现在她走了我更高兴。她爱胡

闹就让她离家远远地去闹好啦。”

“在那儿是不会闹出风波来的。大家都随心所欲。”

“她没谈起皇太后吗？”

“霍坦西娅？当然啰。还有皇上的婶婶鲍利娜·波拿巴……”

“看来谁都可以和埃克西玛来往。”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叫道，“我们的外甥女可真会交际，交上一位……”

她沉思起来。作为真正的比恩家族的骨血，她像丈夫一样认为他们是在漫长的世纪中形成的，故而毫不敬畏帝王的尊严。先生常说：“我们家族不欠哪个国王一丝一毫。相反，当卡洛斯五世去征服阿尔及尔（没有成功）路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的先辈还送给他八十只羊和两头母骡呢。他把羊都吃了，连谢都没谢我们一声。”确实，真正的比恩家族从没受到过什么酬报。堂安东尼奥讲起这些感到很自豪，也许（愿上帝宽恕我）有些气愤。他最听不得别人提到诸如科耶拉或圣马特奥之流的爵位，他们的历史最多也就追溯到本世纪初。

“有些国王不是好人。”夫人说。

“是冒险家。尤其是那些坏蛋。”

“还有另外一些。比如伊莎贝尔二世。”

“所以我不准那些侄辈们来查档案。”

“你做得很对。否则他们会把你弄个底朝天。他们满脑袋怪念头。几个星期前，那两个最小的路过镇上。他们去看我。我对他们很客气，因为一下子认不出他们来了。有

多长时间没见他们的面了啊。”

“如果不情愿，他们最好别来。自从他们看到我们破产以后……”

“慢慢来，托内特。感谢上帝，我还不至于一无所有。你知道我很爱你，不过我从不允许别人碰我的。”

先生笑了。

“精明女人总会有私房。你真叫人佩服，玛丽娅·安东尼娅。”

“不，你少来这一套。不过，你也别担心，只要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那盆汤。”

“你太像埃克西玛了。”他的语气有些伤感。

夫人有些惊讶。

“我从没听你这么说过。”

“指精神方面。”先生解释。

“精神方面？你疯啦？”

“没有，玛丽娅·安东尼娅。我的脑袋很正常……”

他没有说下去。他想的肯定是：女人总是有些相像。
“像在哪一点上呢，胡安？”他对我说过千百次。他总喜欢寻找事物的相似之处，如果不能直接找到，便通过对照来发现。舅母和甥女是那么不同，却有着母性的十足女性的共同反应：温柔地提供一盆汤。

“好吧，你准备留下来了么？”先生说。

“是的，只要你表现好。”

“我不想住城里，更不想住镇上。我要待在这儿。你会

觉得烦闷吗？”

“不，我有事做。我再做一幅床罩。”

先生的脸上亮堂起来。

“我们都做事，各人做各人的。玛丽娅·安东尼娅，你瞧着吧。你会看到院子里到处是秋海棠，葡萄架下会有你从未见过的那么好看的绣球花。我们再养些鸡。我们会多么快活啊。”

他温柔地拥抱她。

“玛丽娅·安东尼娅，我很爱你，但我们用不着说得太多。记住……”

他又不说下去了，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记住我们的格言——别往心里去。他接着说，

“我们去做些研究，晒晒太阳……庄园里的东西你都必须吃。”

“啊，天哪，这有什么关系。我倒是想要个神父。我已经要他们给派一个来。早上主持一下弥撒，你若愿意的话还可以叫他帮你和工头一起管管帐目。你一共欠了多少债？”

“确切的数字我也不知道。”

“起码，你付利息吧？”

“每年我们榨好油，债主们就都跑来拿走。”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思索了一下。

“以后就交给我和神父来管好了。因为我不要你管我的事，但你的一切都要由我来管。”

这正符合先生的信条：明明白白的独裁。没有什么好说的。因此，先生什么也没说。

“这所房子要赶快粉刷一下。”夫人说。

大事小事同样重要。星星也许是微生物。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刚刚采取了一项漂亮的行动：不记前嫌，照顾另一个人。但与此同时，她就提出要粉刷墙壁。忽然，她似乎注意到了那木头家伙，神情严肃起来：

“这是什么车子？”

先生不得不对她解释，这就是有名的“自动车”，几年前宗教裁判所劝他烧掉过。她用食指指着他说：

“托内特啊，托内特……”

但她好奇心切，想问问它具体是怎么开动的，她的气似乎消了。它跑过吗？

“可不是嘛。”他得意洋洋。“它自己就能走。所以才叫‘自动’车。瞧见了吗？在这里盛满水，盖上这个密封的铁盖。下面点上火。愿意看它在这儿兜一圈吗？已经半夜了，所有的人都睡了。”

“虽然大家都睡了，万一让人看见……”

先生一声不吭，把锅盛满水，放到炉火上。

“玛丽娅·安东尼娅，世界在前进。再过一百年，谁也不用母骡拉车了。等一下，我让你看样东西。”

他出去了，拿来一只虹吸瓶和一只杯子回来。那个时代在西班牙还没有人认识这玩艺儿呢。他是从一个走私贩子那里弄到的。因为它很新鲜，人们都以为是医疗器械。里

面装的含碳水或叫苏打水，那时是用来治隔日热和肺炎的，有人甚至把它当酒喝。

“多奇怪的瓶子啊。”夫人惊叹。

“不是瓶子，是虹吸瓶。试试，能治百病呢。”

“我没病。”

“无论如何，你试一下嘛。挺好玩的。”

她喝了一口。

“像白香槟。看来劲还挺大呢。不过，是怎么把它灌到封得这么严实的瓶子里去的呢？它不会炸吗？”

堂安东尼奥劝她留点神：不能碰撞，不能让它太热也不能太冷。她吓了一跳。

“你拿远点儿，托内特。不，我不喜欢。”

“在法国人人都喝这个。”

“可我们是在西班牙，托内特。”

这时，锅里的水开了，先生坚持开一会儿“自动车”。

“我觉得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假如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房间里转一圈呢？从那个角落开到壁炉边，再转回来。”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亚惊奇地望着这件怪物。

“它自己会转弯？”

“那当然啰。”

“看来这东西挺完备。有危险吗？”

“什么危险也没有。你要是愿意，我就把炉火点上，因为水是开的，很快就会产生蒸汽……蒸汽从这个管子里出

来。这儿有个活塞……”

“别给我解释了，我不想知道这么多。你说没有危险？”

“绝对没有。上去吧。”

我如坐针毡地听着。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要打退堂鼓了。我看见她东张西望，似乎在证实是否只有他们两人在场。家里所有的人都睡了。我明白，在这场虽然不会受到谴责但至少也是不合适的冒险中，她迟早会让步的。先生受到恳求，要他毁掉自己的发明。我说过，这种利用蒸汽的机器本身并无罪过。教会从未反对过一种合乎情理的发明。可是，一辆自动车对一八六九年的马略卡来说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怪物，尤其问题的实质是要打击一下堂安东尼奥那种危险的想像力。仅仅在几个小时以前，他曾若无其事把查特莱侯爵夫人乘气球去“丈量宇宙”的插画拿给堂安德雷斯看。堂安德雷斯要他把画烧掉，而表面最温顺（骨子里最倔强）的他当即便把画扔到火里说：“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很清楚丈夫的想像力，他的弱点就是酷爱发明，标新立异。虹吸瓶，二轮脚踏车和缝纫机，是他们坐在壁炉旁不知讨论过多少次的话题。出于女人的好奇心，她会忘记上天赋予她的把堂安东尼奥拉回到理智中来的神圣使命吗？但她天生善于应付一切，她敏锐的本能有办法协调欲望和职责，犹如一位诗人，既必须遵循韵律的要求，又善于体现出美妙的意境。

“我答应坐‘自动车’转一圈，但有个条件，明天必须让神父来，当着大家的面把它烧掉。”

先生望着她，奇怪地眨眨眼，使人想起埃克西玛来。

“我看没什么不妥。”他说。

像他这样一位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汉子为什么要装出如此温顺服帖的样子呢？他脑子里转的是什么主意呢？他真的舍得那辆“自动车”还是想以后再做一辆？我不知道当时英国人是否已经走在他前边，伦敦街头是否已经跑开了汽车。若然如此，那他一定知道，所以才表现得如此顺从。因为，假如他认为自己的发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话，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毁掉它的。几个星期以后，谈起烧书的事，他笑着对我说：

“胡安，尽管你还不是教士，我还是对你说实话吧，我骗了夫人。她答应我只要把书烧掉她就留下不走了。而我却不必像中世纪的哈里发那样，在烧书之前先弄个抄本。伟大的谷登堡通过他发明的印刷术保障了人类思想的自由，使得今日烧书等于是传播书籍。在比恩庄烧掉多少，在巴黎就会印出多少。”

先生和夫人上了“自动车”，并肩坐下，昂首挺胸，一动不动。

“我们还等什么呢？”她问。

“要等到水蒸汽的压力够了才行，不然机器转不动。”

“多奇怪的事啊……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一锅水，不管这锅有多大，能叫一辆车跑起来。别开得太快，托内特。”

“你害怕啦？”

“不厉害，不过像这样的话我还是有点怕。”

“自动车”开始发出奇怪的嘶鸣和轰响。它仿佛着了魔似的被一种巨大的内在力量鼓噪着。它简直像一头被捆绑的野兽，寸步不进，只是像圣奥罗西亚节的小马那样扭动颤抖。我敢担保，这种场面不是一位女士的神经所能经受得了的。我望了夫人一眼，她神情紧张，脸色有些发白，不过还算镇静。这怪兽继续抖动着，我真怕它随时都会爆炸，散成碎片。先生的脸色大变。此刻他的责任重大，因为关系到他夫人的生命安全。我看到他发疯一般使劲扳动两根操纵杆，终于扳动了其中一根，他叫道：

“快抓牢！”

“自动车”发出一声呻吟，猛地往前一窜。比恩庄家里的门廊很大。从先生夫妇所在的角落到壁炉之间少说也有四十步的距离。车子闪电一般向壁炉冲去。

“别这么快啊。”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

“你快抓牢了。”先生又说，想控制住操纵杆。

“快停住，托内特，我们要撞墙啦！”

我闭上了眼睛免得看到凄惨的结局。于是，在沉寂的夜晚只听见堂安东尼奥大惊失色的喊叫：

“我停不住它！”

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这喊声还萦绕在我耳畔。“我停不住它。”多少年来，先生在被称为无所不能的科学的虚假学说中寻找真理和生命。“当自然的力量威胁人类之时，富兰克林出现了，他捉住了闪电”，一七五四年法国出版的一本图画书里这么说，那恰好是在里斯本大地震的前一年。

哲学蔑视上帝的威力，创造了许多许多的偶像，因为它认为热爱耶稣是违背理性的，而对狄德罗、达朗伯、伏尔泰和孔多塞顶礼膜拜。当科学遭到挫折，当里斯本大地震表明人类面对上天的怒火而无能为力，当火车相撞或者出现了最恐怖的拿破仑式战争——法国革命的必然结果之时，科学便保持沉默，而它的崇拜者们只会慨叹：“我停不住它。”你无法阻止你自己惹的祸……卢息弗再也上不了天，因为没有人能办到。天哪，但愿事情本来就不是这样。

二十

一声崩裂的轰响使我睁开眼睛。“自动车”撞到了壁炉上。我往下看，只见先生夫妇跌倒在火堆里。不知怎的，我一下从窗口跳下，及时把他们救出了地狱。我先把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放到一旁，她没有伤着。然后，我举起了先生，他已失去知觉。我素来身强力壮，你知道，在神学院里每逢过节我总是负责搬钢琴。可惜的是，这身力气对我毫无用处，它同勇气毫不相干。而当我最需要勇气的时刻，总不见它的踪影。先生额头有一处伤，血流如注，流得满脸都是，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吩咐我把先生放到隔壁的沙发上。这对我来说实在轻而易举，因为先生轻得简直像根羽毛。我刚把先生抱到隔壁，便觉得天旋地转，昏倒在地。

“自动车”在壁炉里开始燃烧。

第 二 部

安 宁 的 比 恩 庄

—

米格尔，从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返回庄园、“自动车”在壁炉里燃烧那天晚上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在这山区平静的二十年里，我仅因陪先生夫妇到国外去而离开过庄园。在这第二部份我将十分平静地为他们而不是为我进行叙述。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已经着手编织她的床罩，而先生呢，因为无书可读，则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长时间进行写作。在吃晚饭之前，我难得见到他们。曾经给他当过保姆的玛多·弗兰西娜把早餐也送到他房间里去，直到最后由托梅乌取代了她。关于这位年轻壮实的仆人，以后我再谈，因为他惹出了一场灾祸。在一切灾祸之中，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常常显得不起眼，却会酿成祸根，甚至决定命运。这些原因是盲目的，互不关联，但这并不妨碍它们起到压力计的作用。托梅乌现在该有二十五岁了吧，上星期他和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女仆卡塔利娜成了亲。他肤色黝黑，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为此先生曾吓唬他要给他剪掉。由于他年轻，一位外国女画家非要给他画像，把他画进一幅神话里，周围是一大群仙女。这画后来被拿到城里展出，闹出一场轩然大波。女人有时显得疯狂，同

我们迥然不同，令人无法理解她们。过了六年便发生了现在这场灾难，但我们不忙讲它。

先生夫妇重归于好的初期，我还在神学院，只在假期回来。我满二十岁以前，夫人通过她在教会的关系，使我被任命为神父，但是过了好久我才授职主持弥撒。从此我便一步也未离开过这里，除了那次陪先生夫妇去旅行。如果上苍不反对的话，我真愿意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

我们的生活起初是单调呆板的，一切按部就班，没有空闲的时间。不过，这种规矩渐渐松弛下来，最后成了无政府状态，更像非天主教徒的生活。一切都还正常的那段时期，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每天八点之前起床，接着我们便到小教堂做弥撒，托梅乌帮我张罗。常常只有她一人参加。然后她便到花园去，我则到藏书室里埋头工作或阅读，直到午饭时我们三人聚在一起就餐。先生从楼上房间下来，假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刚刚从聚精会神的写作中出来，显得神采奕奕。他的精神总是那么好，他爱在吃饭时回忆他作过的旅行，对我讲罗马和巴黎的新鲜事儿。

“玛丽娅·安东尼娅，不回去看看我们可不能死。胡安需要见识一下世界。”见我反对，他接着说，“你若不愿意去拜见教皇，这对一个教士来说可是罕见的怪事。”

我十分渴望去罗马，但我知道我们没有条件负担这么一大笔开销。我虽然年轻，仿佛是一种默契，实际上成了庄园的管家。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把收支方面的事托付给了我。我们两人为庄园多多少少总算作了些补救，虽然

未能赎回大宗的典押。收成的大部份却都被充作典押的利息付出去了。我只离开过马略卡一次，那时我还在神学院读书，要到蒙塞拉特去。巴塞罗那的码头真令我眼花缭乱。那是一条从海边穿过整座城市一直通向蒂比达波的大道，两边尽是鲜花和琳琅满目的橱窗。我想像不出比这更大更繁华的情景，但我明白罗马一定会比这热闹得多。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对丈夫的建议不置可否。

“不过，我们是否年岁大了点儿，托内特？”

她开始变得有些守旧，而且对经济问题毫不在意。假如对她解释去一趟罗马要花很多钱，而我们的收入不允许，她便会漫不经心地说：

“也许你说得对，但我觉得一个教士必须去见见教皇，虽然我们钱不多。你就别说了，别像个孩子。”她敲敲我的手，“既然先生要带我们去，我们就去，不必牵挂什么。你别想什么钱的事。让他去安排好了。”

吃完饭以后，先生和我到树林里去散步。我们习惯带上猎枪，但我们几乎不打猎，因为我们更乐于坐到一棵圣栎树下，评论古代诗人。不知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善心，先生把法国古典诗人排在前列。

“他们是最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够出于蓝而胜于蓝。假如确有荷马其人的话，那他也就是一位真正的未开化的诗人，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更像民间叙事诗。苏格拉底则像理性的一位新暴发户，他刚刚发现理智。从历史上看，这是人类的支柱。然而，《冈迪德》与柏拉图的对

话相比，为什么不取前者舍去后者呢？”

先生是一位笃信发明无止境的人，造物的乐天派，崇拜上帝的伟大。不过，他的上帝常常是专断奇怪的。他谈起伏尔泰的宗教感，我心里很不平静。

“胡安，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

假如没有上帝，那就造它一个。

造一个上帝！这是对问题最清楚不过的歪曲了。谁来创造上帝？伏尔泰太肤浅。假如他今天还在的话，那他就不会被当作哲学家而可能被看作一名记者。”

七点整，我们在小教堂里念《玫瑰经》。所有人包括先生在内都参加。若是在夏天，先生做完弥撒出来总爱带条狗或几只猫在花园里逗留一阵。若在冬天呢，他便在壁炉边烤火，一直烤到人家来喊他吃晚饭。据说，天不破晓他从不躺下睡觉，不过这一点很难弄清楚，因为一吃完晚饭他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第二天两点才能见到他头梳得整整齐齐，心满意足的样子，仿佛世界是那么新鲜。他吻过夫人的手，便要问问我们晚上睡得怎么样，然后我们便按一定的模式向餐厅走去，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和我在前，先生略拖后靠夫人左侧。这种规矩，这种修道院式的准确性一直维持到前些年，大家开始起得晚了，作息间也乱了。到后来，响起开饭铃的时候，正要下楼到餐厅去，夫人才想起还没梳头，便唤来卡塔利娜，一起消失在左侧的门里。先生呢，还没洗脸，他要人送热水，消失在

右边的门里。就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呆在那里。没过一会儿，那个脾气不好的老厨娘上来告诉我，汤凉了，不吃米饭吃面糊。这样的灾难使我们都变得麻木不仁。说实在的，在庄园里的生活还是挺愉快的。那里曾经发生过那么多的事情（在精神方面还在不断的发生，先生在无所顾忌地拼命写作），却毫无不协调之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从未怀疑过这种宁静是坚如磐石的。由于上天格外的恩宠，她自身就具有宁静的气质，后来几年的杂乱无章对她成了一种新的秩序。比恩庄简直成了天堂。比恩庄，它的森林，绵羊和落日；它那经历了多少个世纪而成了金色的石砌古宅和古老的壁炉；它的春天和冬天，绣球花和白雪……几个星期以后我就将同这一切永别，我是何等的依恋啊！然而，米格尔，在这儿我又经受过无法言喻的痛苦。这个天堂对我来说不是终极的而是世俗的，是人类迟早要失去的。在这儿善与恶同生，可是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只看到可悲的二者之一。她那双蓝色的平静的眼睛与其丈夫的眼睛毫无相似之处；先生的眼睛小而灵活，周围布满皱纹，与我的也有天壤之别，我的眼睛太黑，没见过什么幸福。它们的沉着冷静不论在何处都会使人想起老贺拉斯的断言：“走遍天涯海角，这才是最令我开心的所在。”

二

比恩庄在二十年的时光里一直喜笑颜开。这二十年简直是一种永恒。今天，当我遥望它的时候，方才明白，在当今之世只有失落的天堂。现在我才体会到那圣栎林，落日以及圣诞节覆盖在萨科瓦松林上面的皑皑白雪是多么可贵。对那些离世的人我也有同感，我日益怀念他们。充满古老的田园式联想的比恩这个名字，同先生多年的习惯，同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不紧不慢的亲切渐渐溶为一体。夫人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对我显得热情备至。她在去世时是那么安详、顺从、不在乎得近乎主动，堪称楷模。她怀疑到自己要死的时候，根本不想去证实这一点，而是把自己仅存的气力用到一场神圣的忏悔里。我深信她已经升到天国。只能是这样。因为她是属于善于利用周围的因素建造一个天国的人。记得有一次在田野里散步，我们来到一所盖在庄园的“罗塔”^①里的茅屋前。里面住着一位名叫玛多·科洛玛的老太婆。她孤身一人，养一只山羊和一条叫作“叉子”的狗。那些爱大惊小怪的人预言说迟早有一天她会被人谋害，尽管谁也不相信会有人想杀害一位如此贫困、如此与世隔绝的女人。她告诉我们，她有几个外甥，住在离此半

① 指贵族无偿让给农民使用的小块土地。

里远的地方，每星期给她送两个面包。她靠奶汤充饥度日。她还让我们看了一株柑桔，一年四季果实不断，四棵石榴也是无与伦比的。山羊和那五棵果树便是她的全部家产。除了这些财产之外，她还有一个蓄水池，其水质是这一带最好的。有一次两个贼来光顾她家，可是一见她只有一只山羊而且品种还不怎么样，便懒得偷它（“这只山羊他们看不上眼，好像要他们花钱买似的。”先生对我说）。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想送她三只正在下蛋的母鸡，老太婆也谢绝了。

“再说也没什么好喂它们，‘叉子’和山羊也容不得别的畜牲呆在这个家里，还是别找这个麻烦。”

“那我给你送半斤糖来，你喝奶时用。”夫人说。

“这个行，夫人，真多谢您了。不过，用不着给我送这么多，因为我估摸着自己活不过明年啦，要是我死了，别让这糖糟蹋了，贵着哪……”

我们分手的时候，她俨然一位阔夫人的派头，送我们每人一个石榴。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已经到了门口，先生抓住我一条胳膊，打开一扇窄小的后门，让我探头往院子里张望。他指给我看葡萄架下的一株绣球花，同比恩家的一样美。我用目光向他探询。他笑了笑，举起一只指头按住嘴唇。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夫人扭过头问。

可是先生已经关上那扇小门，我们一起走出来。

“啊 托内特，”夫人说，“这个女人给了我多大的安慰

啊。假如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那些社会党人把我的一切都抢光的话，我就要像玛多·科洛玛那样度日。她那么快乐，缺什么呢？她没有大马士革式的家具，也没有镜子，可她有一张床一把摇椅。还需要什么呢？你看见了吗，那株绣球多美啊！（先生和我面面相觑，因为我们以为她根本不可能看见那株绣球。）我不知道是不是比我们家里的那株还要美。啊，托内特，巴黎的春天……还记得西特花市吗？”她怀着一腔激情走下几级台阶，一边接着说：“看看这些石榴甜不甜。”

先生一路沉思，接过她的话说：

“你会像她一样。她受人尊敬，知足常乐。‘叉子’和山羊总跟着她转。”

“我见她挂着一块带金链的圣牌。”夫人说。

“你怎么知道那是金的呢？”先生小声道。

“那圣牌我看像铜的，可链子是金的，而且很古老。你们男人都不注意……在家里我们有许多这样的链子，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你呀，可怜的托内特，这些事你一窍不通。”

天黑下来，我们都不说话了。传来召唤祈祷的钟声，我们便停下来祷告圣母玛丽娅。此情此景，三个人显得何等的志同道合。一时间，我们简直以为自己是永恒的，同目睹了二十代人的橄榄树，同依然完好如初的十五世纪的石砌钟楼，同群山的峰峦是那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记得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当先生临终前几个月把回忆录交付与

我的时候，我首先做的便是查一查他是否把这一点写进去了。果然在其中，而且是写得最好的一篇。先生不太喜好写景，但在召唤祈祷的美妙钟声面前，看到人们收工回家，看到家家户户冒出袅袅炊烟这样充满诗意的图景，他也总算激动了一回，在写景的段落中引用了维吉尔的诗句。他引用得那么自然流畅，宛如出自他自己的笔下。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细致入微的表情对我们揭示了这神奇的时刻（而且被详细地载入注定要成为名著的一本书里），而我们一直责备她表情冷淡。先生从这种揭示中提取出他哲学中的精髓。“我妻子同玛多·科洛玛的快乐那样灵犀相通，是因为她们两人都热爱自己亲人的缘故。”爱，在人类的感情中是最为博大的，便也最充满矛盾。关于它，有各色各样的理论。我在年轻时曾把爱与好奇心混为一谈。性的本能尤其使人想去探个究竟。想知道在爱抚之下另一个人会有什么反应，这种强烈的好奇心是无论什么也比不过的。这是快感与痛苦的源泉。这会导致贪图女色甚至变态的性行为：两个地狱。堂璜是最受磨难的，恰如法国人叫他的那样，是位“旅行家”，他奔波在沙漠里想弄清一堆沙丘后面是什么，结果总是遇到另一堆相似的沙丘。同性恋的好奇也是枉然的，因其渴想的目标只有在委身于人（因而变成最凄惨的滑稽可笑的女性角色）或像男人那样拳脚相加的情况下才有反应。这种爱的好奇心充满可悲的千篇一律的惊险故事。不能否认，当“旅行家”长途跋涉去寻找不该寻找的东西，当变态者想从一位男性（正因为是男性才不可能）那里得到

爱，其时他的头脑便似发高烧的人那样快速地工作，有时也能获得显著的文化成就。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成就总是病态之作。拿动物作样板不合适，毕竟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道德世界，而这个道德世界不以如此草率麻木的情感来充数。穴居人可以不要女人，因为她们浑身长毛而且同男人几无区别。今日的女性却是一种优雅而必要的产品，应该近前观赏而品味。岁月刚使我们从爱的好奇中醒悟过来，又让我们欣赏宏大的爱的习惯或者叫做爱的微型。“此处不观，别处观何？”肯比斯这样自问。荷兰画派的大师们正是这样理解的，他们便以微型画家的手法作画，同今日走红的可怕的巴比松画派背道而驰，他们也无须像冒险小说那样寻找什么“有意思的”题材，因为只要仔细观察一切都是美的。

读着仅仅在一年之前写就的这些篇章，我心里想，假如不是死神突然到来，先生必定在字里行间透出来的神秘主义方面有所进步。上帝慈悲，使我心中满怀希望，我相信必定有某种神秘的规律不会让两个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相爱的人到了另一个世界就两相分离，天各一方。《变形记》第八卷里写到，朱比特想奖赏把他误作乞丐而给以援助的费莱蒙和鲍西斯，就把他们都变成一棵树，让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生根，永远无法移动。

“肯定有这种规律存在。天国的人不会不讲礼貌，既然邀请了一位已婚女士，必然也会邀请她的丈夫。”先生有时这么说，

“假如他的行为不至于不配的话。”我应道。

“要是他那么坏……”

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在于此。他几乎从不争辩，因为他实际上很固执，而且同时又颇迷信。他认为，要想在一次简单的谈话中弥补“多年来堆积的种种错误”是困难的。何况，谁没有一些不合情理的、被认为是荒诞的而有时却是现实的想法呢？五十多年前，那位声名狼藉的乔治·桑认为马略卡人没有文化，因为他们认为肺癆是一种传染病。巴斯德和科赫却证明了那些无知的乡下人是对的。颇具自由派思想的先生本人也有自己的忌讳、自己的信条，不容争辩，甚至连提都不能提。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就在壁炉旁，先生不是断然拒绝满足堂娜埃克西玛的一种好奇心吗？这涉及到了玩偶厅，它确实是比恩家族史上不幸的一页。可是，在先生打算公诸于众的回忆录里，又有多少不光彩的事没有提及呢！

从零星的话语及档案中的一份文件里我得知，在十八世纪末叶，比恩家族中的堂菲力普，驻扎在阿兰胡埃斯的骑兵上校，也是御林军里的一位年轻龙骑兵，同一位制造玩具的意大利冒险家结下了友情，他专注于给那些玩偶穿衣服，并在“司令部的军旗室里”展出了“二十多个”。他“亲手制作那些漂亮的衣服，绣上装饰花边”。尽管拉巴斯王子劝他放弃如此少见的怪癖，并且为他出了不少力，他还是被开除军籍，回到比恩庄足不出户，与世隔绝地度过残生。即便是在这段时日里，他也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怪癖。他

写了许多信，仿佛同卡洛斯四世及普鲁士王室的人物保持联系。然而，先生在回忆录中对这样的事情只字不提。只是在最后的几章里，泛泛地提了一下他的矫揉造作的女人气，认为这是一种罗曼蒂克的蜕变。这种泛提也许会使人对他的祖先产生疑问。“当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的一些和姑娘们攀谈通信的同学，是怎样得到女性化的雅号的。长大一些之后，我又看到那些最有丈夫气概的人去逛妓院，辱骂姑娘们，把家具从阳台上扔下去。那些放荡之徒在潘普洛娜聚众胡闹，不要女人参加。他们常常在星期六喝得醉醺醺的，勾肩搭背哼着小调在街头游逛，见玻璃就砸。自从有一天晚上我在克里奥雅酒馆带走一个金发姑娘之后，他们便对我耿耿于怀。我这样做是出于害怕（因为那些胡闹除了令人讨厌之外，还很危险）和缺乏义气的缘故。他们对我说，‘你会明白的，男人讲的就是义气。’也许他们不无道理，但考虑到世界是复杂的，小鳕鱼互相咬尾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阳刚之气过盛会导致性变态。毫无疑问，在这些方面还是别太武断为好。在十八世纪是有许多上校会绣花，同时也是地地道道的美男子。”先生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这最后一句是先生用来暗指不光彩的事情的唯一的一句话。这种事常常在心理上造成混乱。据说，城里一位熟识的绅士来访后的第二天，比恩家族的堂菲力普便死在床脚下了，都说是暴卒。

三

尽管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很虔诚，她也和先生一样，有一副强脾气，真不愧是一对表兄妹。我是把这当作她的一项长处来说的，因为她善于控制自己。先生说他们族徽上的格言丝毫未提战争与流血，而是这样一句话：“扰乱我的声音我一概不听。”说实话，我从未听她说过这句话，不过她肯定常常这样做。

她具有所谓的真知灼见，她在心底里像古罗马人那样坚信男人是顶天立地的。

“你喜欢当女王吗？”有一天先生忽然这样问她。

她不加思索地答道：

“当马略卡的女王我倒挺愿意，一个小国家的。大国家的嘛，想都不要去想。”

多少年来，先生问过许多人是否愿意当国王，答复几乎都是否定的。

“真怪，有那么多人想得到每月能挣二十杜罗的一份工作，却没有什么人愿意当国王。当然，我的调查仅仅表明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渴望什么。我觉得最准确的回答大概要算夫人的了。看她来组织一个自己的王朝那才叫有意思哩。她对玛多·弗兰西娜一定会委以重任，让她当个内务部长或者警察头子，因为她精力充沛，镇上发

生的事她都知道。同教会的关系她会像卡洛斯五世那样亲自处理，不过我担心她最终会同教士们发生冲突。当然不会是太大的冲突。她既不会去攻打罗马，也不会同怀恨在心的波旁公爵结盟。她善于施展一些较为委婉的手段。”

实际上，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深藏着一种富贵不淫的气质。堂安德雷斯故去以后，又给我们派来一位堂弗朗西斯科接替其本堂神父职务。这位年轻人极富革新精神。我亲眼见到每天做弥撒的夫人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把他的话全当耳边风。当时，一些有碍教会道德的“时髦”风气开始从国外特别是美洲传到我们这儿来。那些到咖啡馆去或者也参加赛马的教士本身并无不法之举，只要你不吹毛求疵，能睁一眼闭一眼。这样说是不以为过的。不过，为了把人们引回教会而去适应这种“时尚”我看有些危险，因为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神父未能把迷途的羔羊领回到正路上来，反被这些误入歧途的人拉下水去。堂弗朗西斯科认为，造个俱乐部之类的场所让大家能读到《白与黑》（名副其实地介绍黑白两方面的事情）以及马德里的其它报刊，没有什么不妥。而这些报刊对我们山区艰苦简朴的生活来说并非完全适宜。他喜欢我行我素。我还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他在布道台上令我茫然地对教徒叫道：

“主教大人有一封致全体教民的信，必须在布道台上宣读。不过，因为这封信太长，我把信的大意向大家讲一讲。”

他作了一个十分简洁的概括。我必须承认，他概括得好极了。不过，他没有遵照命令宣读信的全文。他来到先

生家以后，从第一年起，他就不说“一个高贵的家族”而说“一个虔诚的家族”。

“堂弗朗西斯科，您把我们的高贵都剥夺了啊。”先生笑着对他说。

本堂神父搬出一大堆颇为民主的理由来解释。

“这些门第观念早就过时了。到二十世纪没人会理这一套。那时候社会主义高于一切。”

堂弗朗西斯科总想争出一些理由来，却不能够，终于不知所措。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在一旁笑起来。

“胡安，先生对二十世纪要发生的事情说得那么肯定。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她小声对我说。

“堂安东尼奥，请您想一想，假如社会主义学说胜利了，我们就会一团糟。我之所以不说高贵家族，恰恰是为了不给镇上那些多嘴多舌的社会党人什么把柄……”神父见风转舵。

“您做得太对了，神父。称我们高贵也罢，只叫我们是虔诚的也罢，我们还是我们嘛。”

堂弗朗西斯科没有注意到那个“只”。我觉得这个“只”字真叫人不好受。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抬起头说：

“先生说得很对。不管怎么叫法，我们还是我们嘛。”她那双蓝色眼睛里充满柔情。“祈求上帝宽恕我们所有的人吧。”

神父确信她是出于谦虚才说出这番话来的，因为他那一套现代派言行她并不在意。先生夫妇既不亢也不卑。他

们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他们自身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议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并非明智之举。对比恩镇来说，比恩庄一直就是尺度和准则。大概没有一个十五岁的姑娘不梦想同一位王子也就是比恩家族的人结婚，也没有一个小伙子不把比恩家族的女士笑着看他一眼当作一种恩赐。一个文明的世界，一个充满风范与想像的世界，犹如一个镶满镜子的大厅令人目不暇给，这样一个世界正是通过比恩庄才得以抵达这片土地，激励着进化，也刺激着去外界闯荡的骚动与渴求。先生的影响有时确确实实令人士气消沉。他那有些不恰当的保护（因为他慷慨大度，他的施舍常常超出自己的财力）使人觉得是不可能的。他曾坚持要玛加里塔去学弹钢琴。一位穷小伙子，命里注定要在这片山区度过一生，仅仅因为是金发，先生便要他来当英语教师。最后他被指责为巫师。我们这些天主教徒并不相信这些指责，不过，假如没有组成比恩这个名字的五个字母那神奇的声望，他也干不成那些事。许多正派的姑娘没有同自己年龄相配的小伙子勾搭倒和他勾搭上了，而他却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一想到那些不幸的姑娘，我就浑身热血沸腾，有一股要替她们报仇的冲动，也记起了塞内加关于慈悲是人心的一个弱点的论断。有一天，我觉得这是良心问题，必须把这一切都告诉先生——当时我还很年轻还不满十八岁。先生定定地望着我，带着嘲讽和新奇的神色。他的眼睛小，可目光极敏锐。他抓住我的手。我慷慨激昂，直抒胸臆。面对他的沉默我愈加激动，乃至语不择词，甚至夹进了一些辱

骂。他则越来越用力地握住我的手，似乎要试试我肉体的忍受力。然后他拍拍我的手臂和肩膀，对我的体质略表叹服和得意。我终于住了口，为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而骇然。他劝我读一读刚刚刊在一本法国杂志上埃雷迪亚的一首诗《握手》，便撇下我一个人走了。当我读到熙德威胁堂迪埃戈（传说是打了他）的时候，杂志从我手中掉下，我放声哭了起来。

然而，对于那些贫寒之家来说，他确像一位父亲。他了解并且尽力接济他们所需。为了这些人，有时他不惜负债。这些债务给庄园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在处理邻里之间的不和（这些乡下人不相信城里的律师而情愿找先生去解决他们的纠纷）时，他总犯铁面无私而不计后果的错误。如果败诉一方十分贫困的话，他便给于接济并要人严守秘密。这种事不止一回。纸总是包不住火，事情还是传开了。这一方面固然使他日益受到尊敬，另一方面也使人觉得他有些傻，一些大胆狂徒便设下圈套假装发生纠纷，把他口袋里的钱骗到手。在这一方面，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要比他精明得多，她只让人家从她这里拿去一些好听的话而已。此外，她还精于一套手腕，对她不爱听的事装聋作哑，从而省去许多伤脑筋的事情。我不是说她在故意演戏，因为她有时确实听力不好，耳朵有些背。但有时她的耳朵又特别尖。巴塞罗那的一位专家作过一次诊断，说这是间歇性耳聋。

四

一八八三年八月的一个清晨，经过一个极其炎热、动荡不宁的夜晚，我起了个大早，坐到圣栎树下读维吉尔的田园诗。天色还朦胧，透过晨雾远远地依稀可见一团玫瑰色的影子，那是马略卡教堂。太阳刚刚露头，金色的圆月还迟疑地不想隐去。这种捉摸不定的时刻令人茫然无措。我坐下来思索梅利贝奥的烦恼，他被迫离开了那片看着他降生的土地。梅利贝奥像我一样年轻而不幸，他出现在诗里，站立着注视维吉尔。维吉尔坐在一株枝繁叶茂的山毛榉树荫下。“你真幸福，维吉尔，可以这么快活地坐在这些树荫下休息……”梅利贝奥说。“牧羊人，这种休息是一位上帝给予我的。”维吉尔答道。“可怜的胡安，”当我第一次把这段诗念给先生听的时候，他对我说：“可怜的胡安，维吉尔说的上帝不是那位大写的上帝，而只是罗马三位执政官之一……不能让这位老诗人把你们骗哭了，不能骗你也不能骗梅利贝奥这样实心实意地赞美人的高尚之士。维吉尔去过罗马，他不乏心计，利用自己的影响，通过关系谋得奥克塔维奥免征他的土地。”伏尔泰把冰块放到了圣水池里。先生的话刺伤了我。

“您是说维吉尔是骗子而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气忿地脱口问道。先生抬起头，惊奇地望了我一

眼。

“小胡安，说话别太放肆。维吉尔是很有才华的。”

先生不说了，我也没再敢吱声。

我全神贯注进行思索的时候，一种沉闷的声音宛如远远的炮声使我惊觉。这声音似乎来自城里，由于那些日子又在传说卡洛斯派要暴动，我朝海湾望去，可是浓浓的晨雾使我什么也看不见。当这种假想的炮声从相反方向传来的时候，我决定去告诉先生。我顺着山梁往上爬以便也能监视另一面山坡，发现有一些人正在砍松树。早上六点钟就这么干，也太胆大包天了。因为我离家比离松林近，便跑回家向先生报告。刚踏入院门我忽然想起先生正睡着呢，便有些拿不定主意。工头听我讲完情况以后，建议向治安警察报告，或者我们全体出动，他和雇工们带上鸟枪，我则以总管和神父的双重身份，一起前往制止这伙歹徒。这两种办法我都觉得不好，尤其是前一种，不知为什么（以后你会知道这种直觉没有骗我）我讨厌外人掺和到这件事里来。终于无可奈何，只得叫醒先生。只要可以不去叫醒先生，我什么都舍得。我惶恐不安地轻轻敲他的门，而他应声回答说请进。当我看到他早已起身而且穿戴整齐时，我惊讶不已。他坐在写字桌前，手里握着笔，专注地看着什么。

“来，胡安，看你能否猜出这是什么。”先生递过来一张画。

他是那样兴高采烈，对我不寻常的造访似乎毫不介意。

我没看那张画，只想道歉。

“您一定会觉得奇怪，我在这个时候就敢来……”

“坐下，别瞎说八道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于冒失，我基本上总是护着的嘛……”先生笑着说。

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谈起文学来，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作家从来就没有大胆过，所以一般地说都比较平淡无味。

“大胆才能快活。好事的诀窍恰如女性的秘密。循规蹈矩没有一点胆气是什么也占有不了的（尤其是一个女人）。你不觉得吗？”

我难以忍受他的目光，只好低下头来。

“您知道在这方面我没有发言权。”

“这就对啦。我就喜欢你当个好小伙子。”

我心里有个疑团。先生是什么时候睡的觉呢？多少年来一直在议论纷纷，说先生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的。见到他那天才流畅的语言，见到他那样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给他的思想镶上宝石，我忽然明白先生是属于那样一类人，对这类人来说凌晨的时刻是灵感最丰富、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刻。这种效率渐渐减弱，到了晚上用完晚餐同我们告别“去写作”的时候，他准是困得倒在床上连灯都来不及灭。这是我最初想出来的解释，后来又有所修正：很可能先生睡觉的时候故意让灯亮着，以便早上他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让大家都以为他还在睡觉而不去打扰他。这样来让大家不去打扰他写作，显得有些过分，点灯毕竟费钱哪。

先生继续热情洋溢地高谈阔论着，我根本无法把松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你怎么看呢？十四年前我们烧了那么多的书，现在我连张地图都没有了。那天晚上夫人和我做得太过分了，连《基督纪年》和《肯比斯》都烧了。我需要一张罗马的地形图，如今我只好看能否凭着记忆画出一张草图来。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罗马不是巴黎，简直像条蜈蚣。拉丁文化的继承人已经不是意大利人了。现在衡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是以法国人的品质来作标准了。白金制的标准米尺保存在梅乌顿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瞧，这是波波洛门，米开朗琪罗的杰作。从这个大广场伸出三条街。中间这条是有名的科尔索街，你可能听说过，它把波波洛广场同罗马神殿连结起来。尽管它是城市轴心，但过于窄小了，想改造一下也不容易，尽是一些醒目有名的楼宇，虽然不像传说的那么富于艺术性。无论如何，只要进行翻修，这些大厦都是障碍。今日的罗马像座斜眼的城市，随着日月的流逝，它这种毛病会显得日益严重。”

他略略沉思了片刻，我趁机告诉他有一些陌生人在松林里砍伐。

“尽管如此，”先生接着说，我怀疑他是否听明白了我的话，“它不愧为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城市，哪怕只讲它的喷泉和雕塑。萨丰特松林已经卖掉了，”他补了一句。“只要酷暑一过，我们马上到意大利去。一名教士必须去见见教皇。”

我哑口无言。最后我还是开了口：

“原来您把松林卖啦？以前我们不是说好把这笔钱拿去抵一部份债的吗？您想一想……”

“过去我们是这样讲的，或者说你这样讲过……可是，要旅行就需要钱。胡安，这一次你就别考虑债务的事了，我手里一枚闲钱也没有。何况，”他见我板着脸，又加了一句，“我并未把整个松林卖掉，只把那些粗壮的松树卖了（就这些树值钱）。你放心吧。这片地很肥沃，过个十四、五年，一切又会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再过十五年，您就快九十岁了。”我说。

“要是我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先生答。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见教皇是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到罗马去看一看也是一种特殊的乐趣。可是，我们只剩下萨丰特松林可以偿还部份债务了。他把松林卖了怎么会没人知道呢？后来我才知道这笔交易是通过信件进行的，正是我自己投递的这些信件。邮局这一现代化的发明还真能派些用场哩。我鼓起勇气对先生说，事先应当同我们打声招呼，因为工头差点儿跑去叫治安警察。

“说得对。我把这个给忘了。三个星期前就卖出去了。”先生答道。

我猜想先生讨厌经济问题，所以守口如瓶，直到买主来砍树，给我们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先生以为事情过去几天之后我们才会发觉，没想到出于偶然当天早上就让我知道了。

“什么时候出发呢？”

先生笑了笑，伸出一条胳膊绕到我脖子上。

“别太着急，亲爱的。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安排呢。首先要活动活动，求得教皇单独接见。莱昂十三世是位出色的自由派的教皇，他在位五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他对出色的教皇表露出一片钦佩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发现他桌上放着最新的教皇圣谕。

“夫人知道吗……？”我问。

“自然喽。她什么都知道。”

我想起几天以前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过要让我“大吃一惊”。可是，她到底是否知道这样旅行一次要花掉萨丰特松林？我决心弄清疑团，便急急向先生告辞。刚走到门边，先生又把我叫住：

“喂，胡安，你还是谁也不告诉为好……”

“好的。”

他惊奇地望了我一眼。

“看看你是否真有那么机灵，我们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别让人知道您一大早就起床。”

堂安东尼奥笑了。

“这是忏悔隐私，不得外泄。你走吧。”

我来到壁炉大厅。还没到八点，卡塔利娜告诉我夫人尚未起身。她慌慌张张地用手擦着嘴唇。她满嘴都是巧克力。我随便说了她两句（还不满十四岁的孩子嘛），就靠阳台坐下来。过了一会儿，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便出现了。

她是这样打招呼的：

“胡安，我们可以收拾箱子了。”

她从卡塔利娜嘴里得知已经开始砍松树了，显得十分得意。

“胡安，这就是说，钱很快就要到手了。我当然不敢想能到手多少枚（她像我国真正的太太们一样，不管数目多大，一概以几枚相称），不过当我们急用的时候还能找出一些来，我已经知足了。去见教皇嘛，没什么舍不得的。你不高兴吗？”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可是这次旅行，眼下……”

“住嘴！”她用扇子敲我把我的话打断，“我不愿听你说我们老了。感谢上帝，我们还健康结实。”

她这么一敲便无讨论的余地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怀疑过她的脑子有什么问题，直至过了好长时间我才不情愿地承认这一点。卖掉松林使她感到乐观，同时也变得幼稚起来。事实上，无论是先生还是她都从未缺过钱。只要他们需要，钱就来了。这样的生活常常使得那些有权势的人得意非凡，心地冷酷，连耶稣基督都觉得拯救他们绝非易事。也使他们变得盲目。“你们破产了，那些典押会要了你们的命，一切都会被拿去公开拍卖……”我真想喊出来。但我不想扫她的兴，没有开口。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五

为这次旅行，足足准备了几个月。想求得莱昂十三世的单独接见不是简单的事情。教皇除了教会事务之外，还有许多文化活动。他集神与人于一身。他在休息之时还写些拉丁诗文。那些杰出的富有特色的教皇圣谕他都亲自动笔。在他尚未成为教士还被称作佩西公爵的时候，他受过极其良好的教育。他是位巧妙的外交家，坚持不懈地为把教会的精神利益同政治斗争分隔开来而努力工作。繁重的任务使他难得有空进行单独接见。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同意参加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集体接见，但是先生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计划。

“玛丽娅·安东尼娅，参加一次祝福我可不干。历届教皇都搞祝福，只要不……”他瞧了夫人一眼，不说下去了。他不愿折磨她。他差点儿又口若悬河地讲起中世纪的教皇是如何下达开除教籍令的。“所有教皇都搞祝福，”他急匆匆地接着说，“庇护九世已经祝福过我们一次，不过，莱昂十三世还是一个挺聪明的人哩……”

“托内特，少讲些异端邪说的话。祝福远比聪明重要得多。”

“随你怎么想好了。不过，既然我们花一大笔钱去罗马（他提花销提得真是时候）就不能失去同莱昂十三世的会

见。胡安还年轻，我敢肯定这次会见会对他大有好处。你自己不也很想……”

“那还用说吗？”

涉及到我的时候，先生太善于用自己的花言巧语来欺骗自己。既然一次祝福就可以在精神上大有裨益，那么半小时的谈话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像我这样已经三十二岁的成人。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忽然有了个主意。

“科耶拉可以帮我们安排一切。”

“科耶拉？这个牛皮大王？”

她对丈夫这种武断伤人的口气大为不满。

“天哪，托内特，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你的嘴巴少个把门的。科耶拉是牛皮大王吗？”

堂哈科沃·奥布拉多尔是科耶拉第三代侯爵，宫廷议员，也是本岛最有名望的人。所有的报纸都转载过他回答一位反对派议员时的演说全文。那位反对派议员称他为“诗人”，因为他力主建立一支比英国人更厉害的舰队：“诗啊诗，我真想潜入诗的这一神奇世界深处，去参加勒邦托之战……”据说，这是卡斯特拉尔精彩祷词中的一段。他还精通拉丁文，翻译过塞内加和西塞禄的作品。他还是位考古学家。“他真是十全十美（他那些女崇拜者这么说，他不仅有女崇拜者而且为数还不少呢），有身材，有长相，有风度……”可是，先生对他难以忍受。

“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人比蜗牛壳还要空洞。”先生对

我说过几次。

先生还讥讽那位女王封给他的侯爵爵位。

“连她也算不得女王，因为史册上没有她的位置，科耶拉的爵位就更是无案可稽了。大约一百年前，奥布拉多尔——这才是他们家族的真姓——家族是塞乌瓦笨得出名的人。由于他们只会张嘴胡说八道，有一天，就是奥布拉多尔的命名日那天，有人给他们送了一个套包。从此人们便叫他们为挽套——即科耶拉之家。他们并不把这当作一种侮辱，因为他们领悟不了那么多。当他们想起向堂娜克里斯蒂娜讨个封号（只要交五百杜罗或者少些也行，她都给）的时候，签名签的是奥布拉多尔·德·科耶拉。堂娜克里斯蒂娜忙中出错，删去了奥布拉多尔，这样他们便都姓了科耶拉。”

我觉得先生的说法是真实的，因为，虽然他说这都属于过去的朝代的问题，他对本岛家族的祖先还是很关注的。有时他会拿一些古怪的说法让我们吃惊，而往往他说的都是实话。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哈科沃是个人物。他的职务（以及他的爵位）使他在马德里很吃得开，到底还是靠他通过西班牙驻罗马大使馆谋得莱昂十三世教皇答应在年终最后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单独接见。

我们于十一月二日动身离岛，乘上一艘中途停靠本市的法国轮船，直驶马赛。恰如船舶代理公司做的广告所说，这轮船真是一座在水上漂浮的大厦。先生夫妇在年轻时候就走南闯北，自然毫不以为奇，可对于我这个仅仅在上神学院时因为去蒙塞拉特才出过一次远门的人来说，这艘轮船

简直像用妖术变化出来的。

堂哈科沃·科耶拉不仅给我们安排了同莱昂十三世的会见，还把我们介绍给船长。船长跑到甲板上来迎接我们，紧接着就把我们让进铺满红地毯的一间客厅。你真想像不出在那里会看到什么，我想描写一下也只能自叹心有余而力不足。金碧辉煌的灯具，闪闪发亮的镜子，长毛绒面的椅子，瓷器，电铃……甚至还有一台钢琴！就在那里，船长让人给我们每人端来一杯葡萄酒和一些小点心，并且问先生能否劳驾把他向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介绍”一下。后来听人解释才明白，这是一种法国习俗，虽然我们明明就在船长面前，但出于教养，船长必须装成尚未被认出，被大家所认识的是夫人，必须向她把船长议论介绍一番，在这个神奇的天地里，他是最高权威。端酒的是两名青年，站得笔直，头发梳得油光光的，黑裤子白上衣十分干净整洁，我记不清是否还戴了手套。虽然只需要侍候四个人，他们还是不停地从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穿梭，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当他们无事可做的时候，便分立在一只桃木橱柜两侧，这橱柜贴在一面镶满镜子的墙上，于是我们便看到四个一模一样的侍者，神态庄重，站得笔直，好像在参加朝圣游行。因为对于世界缺乏了解，对上流社会的习惯一无所知，我只是在想，我们在那里又喝又聊的时候，那两个小伙子完全可以割完十几捆麦子了。

船长说我们需要休息(实际是他有许多事情要做)，他

要告辞，吻了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手。临走时他吩咐一位总管引我们到舱里去。分给我的那间真让我面红耳赤，也是镶满镜子，洋溢着紫罗兰香水味儿，全铺地毯，窗帘都是粉红缎子的。我若是有勇气的话，真想叫他们给我另换一间。总管把床边的一个按钮指给我看，我知道那是个电铃。他说按一次会来一个男仆，按两次就来一位女侍。他出去之前还热情地问我是否需要些什么。我说卫生间（卫生间很整洁，有镜子，还有两条干净的毛巾）里没有水罐，请他给我送一个来。于是总管笑了笑，走到卫生间里，打开他们称作龙头的东西，水就哗哗地流出来了。

航行很愉快，海上风平浪静，没有人晕船。我们正在用餐的时候，客厅通餐厅的玻璃门打开了，我们听到有人在弹钢琴。那是一位小姐弹的，据说她在音乐学院获过一次奖。轮船是从法属摩洛哥启锚的，载有摩尔人，犹太人和黑人，只是不许他们坐头等舱。我从甲板上望他们，先生还想同其中的一位搭讪，那人的模样简直像食人生番。

到了马赛，我们原定便要在这儿休息三天，住进了坐落在有名的坎内比埃大街的格兰德旅馆。大街两旁尽是咖啡馆，戏院和各种各样的商店，应有尽有。我住的那间房裱了印花墙纸，上面是一簇一簇的玫瑰花和石竹花，让一位小姐住更合适，叫一个山沟里来的穷教士住真有些白糟蹋。同船舱里一样，这儿也处处是镜子、地毯和窗帘。

“胡安，你会很舒服惬意的。”先生探出头来对我说。

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仿佛墙上那些花是真的，令我头

昏脑胀。就连洗手间的水池也同船上的一样有那种龙头，似乎也印满了玫瑰花。那些镜子搞得我晕头转向。通走廊的那扇门在卧室的一侧由八块方形玻璃镶就，与它相对的阳台门也是八块方形玻璃镶的，乃至清晨我穿着睡衣想打开阳台门时稀里糊涂地开错了门，结果不是到了阳台上而是在走廊里撞上一位英国太太，她吃惊地望着我。

马赛是座有钱而发达的城市，气候温和，同我们这里相似。它的港口大概在地中海是首屈一指的。遗憾的是由于种族的混杂，还有那些过往旅人惯有的自由或称放荡，渐渐使得那里的道德准则日益松弛。这并非说那里没有好人，但那种放纵有时实在过份，乃至逢到什么节庆之时那些体面人家常常避到乡下去。当地人彬彬有礼，旅馆侍者一见我的教士打扮都立即向我施礼，叫我神父先生，弄得我茫然不知所以，因为我从未当过将来也肯定当不了教士。

我不想一一列举几年来法国文明在马赛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不过是我们后来所见的一个部份。我只想谈谈对于电的大量应用。它用于照明、医学、电报，甚至用于音乐方面，虽然有些难以置信。

十一月十五日我们乘上火车向文蒂米格利亚和罗马进发，途经佛罗伦萨，在那里我们原定停留一个星期。

“你会看到蓝色海岸有多美丽。那里的田野不种小麦或燕麦而种石竹花。”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对我说过。

遗憾的是夜幕笼罩了一切，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凌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景致：参天的大树，

流水，平原上绿草如茵，一群群花斑的奶牛安详宁静。我一直听说蓝色海岸会使人想起马略卡，而我目睹的一切却截然不同。就连那晴朗的天空和温暖的阳光我都觉得那样奇特。先生醒来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我觉得奇怪的是没看到海。上次我们几乎一直贴着海边走。”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

先生笑了笑。他看看表，问了一下火车上的向导，又计算了一下，说出下面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的话来：

“再过六个半小时，三点零二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抵达巴黎了。”

“我们不是去见教皇吗，托内特？”

“那当然。我们只是在巴黎休息一下。”先生答道。

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过，说实在的，这条路并不是最合适的。

“当然一点儿也不近，但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愿意在巴黎呆上一两个星期。”先生解释说。

我瞧了夫人一眼。巴黎这个名字使我立即联想到堂娜埃克西玛的名字。幸亏夫人没有不悦之色。

“托内特，这主意太好了。既然我们要飘洋过海，那就顺便吧。胡安，你觉得怎么样？”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节约。”先生对着我说，“到马赛我们才走了一半路程呢。”

“何况，”夫人也帮腔说，“我们都老了，不会再出远门啦。”

他们两人都盯着我看。见我不开口，夫人递给我一块糖，讲起教堂来。

“你看看圣母院吧，胡安。多好看的圆花窗啊！还有那座古老的教堂，也在西特街……叫什么来着？”

“叫圣礼拜堂。”

“对。多精美的建筑啊！那才真叫玻璃窗哪。还有，玛格达莱娜……它对面有一个很好的餐馆，你等着看吧……啊，只有正派人才到那里去，一般来说都是些男人：大使啦，政治家啦什么的。太太们去的很少。对吧，托内特？我们住在哪里好啊？”

“像上次一样，住卢浮。”

我对巴黎不熟悉，卢浮这个名字使我想到法国国王住的皇宫，因为自离开马略卡以后先生让我觉得什么荒唐无稽的事都可以变成真的。可是他说的卢浮仅仅是个旅馆而已，是首都最大的旅馆之一，肯定是紧挨着卢浮宫，在歌剧院大道的一端。离歌剧院不远便是格兰德旅馆，以前堂安东尼奥和堂娜埃克西玛就在那里下榻。路过那里的时候先生会有什么感想呢？对此事了如指掌的夫人怎么会答应每天下午都到同一座楼里的派克斯咖啡馆去呢？你知道我多么爱先生和夫人，我的笔不愿意写下什么微词，但我深信，他们不时地也会表现出有权势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冷漠无情。那些执政者，那些清白的领袖，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一尘不染，却没有也不可能有善良的心地。读一读某些人写的书，我们会被拿破仑的慈善心肠感动不已。唉，那位被

心腹们吹捧成光辉灿烂的伟大将军，有多少感人的业绩在流传，但在宣布战争、宁可把人们送向死亡也不愿接受一顶王冠的时候，他有过片刻的迟疑吗？承认拿破仑的传说动人心弦也许有些勉强，但是千百万人为他牺牲了生命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我心中惶然，怎么也不能承认先生所说，善与恶出自同一渊源。不，这是被彻底驳倒了错误。伟大的圣奥古斯丁曾经陷入异端邪说，但后来成为天主教正宗的最伟大杰出的卫士。无论如何，尘世的伟大之中总是蕴含着残忍。不如此又如何呢？一位外科大夫忍受不了病人的痛苦呼喊便可以截去他的病肢吗？火烧“自动车”的那个夜晚，我昏倒了，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只好救护我们两人。我想起来就脸红：我年轻力壮，是神学院也是庄园里最强壮的，现在还是，却要由一位年迈的夫人保持镇静，吩咐别人套上母骡去找医生，进行急救。米格尔，事情就是这样，诚实感使我不得不承认：先生夫妇即使像那些人那样行事，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履行他们的使命。

六

一八八三年的巴黎已经从色当之战及公社起义这两次大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了。有人怀念第二帝国时代的光辉及财富。对于我这个从山林中出来的人来说，那简直像魔法。第三共和国处处以俭朴为本。据说格雷维总统是个好

人。然而，要让人民改变自己的传统习惯是需要时日的。巴黎人都喜欢新奇和奢侈。旅馆里进餐时侍者多得像支军队在行动。在派克斯咖啡馆，给我们服务的是一名真正的土耳其人。我不想提坐落在歌剧院大道的巴黎咖啡馆，那里收费不是根据你吃了多少，而是按照多少穿燕尾服的侍者来收。所有这些场所收费都很昂贵，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挥金如土的顾客常去光顾。那种毫无意义的挥霍，毫无必要的无休止的吃喝，在有这么多人处于饥寒交迫的情形下，并非什么有教养的情景。我亲眼见过一对恋人，走进店里，坐下来，要两杯饮料，喝上一口，在桌子底下拉拉手，站起身，走出去，上了车，总共不过几分钟时间。

“那些阔佬有义务挥霍金钱。多亏这么奢华，许多穷人才得以为生。”先生说。

“可是，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托内特？你要一份冰淇淋，吃上一勺，剩下的人家全倒掉了，穷人能沾上什么光呢？你不要这份冰淇淋，把买它的钱送给穷人去买吃的，不更好吗？”

糟糕的是，有时头脑挺清醒的夫人一旦想起往昔的时光（但她不想现在的钱包比过去小多了）便想重温旧梦，她也就挥霍起来。

“我想我们该去维福餐馆吃顿饭了。”一天她从房间里走出来说。

这家餐馆是巴黎最好最贵的。先生也同意。我叫了一辆出租马车，车夫一听去维福就笑了。这家有名的餐馆在

罗雅尔宫北面，离我们住的旅馆仅有几步之隔。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还是上了车，仅仅跑了蒙特彭塞一条街就收了我们两法郎。我们在餐馆门前下了车，一名门卫过来开车门，还鞠躬致意。我们沿着铺了地毯的楼梯上楼。餐厅设在一间豪华的大厅里，墙上裱了壁纸，像红天鹅绒似的，还镶着金边。大厅占了整个楼面的空间，两边都有阳台，一边临街，另一边向着皇宫的花园。拱形的天花板上绘满了神话故事。无须赘述，大厅同楼梯一样铺满地毯。我们一进门，便有一位总管和两名穿礼服的侍者迎上来，接过我们的礼帽。菜盘和汤盘都是瓷的，托盘是银的，吃饭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其中一道主菜是锦雉，配上家常的绿色调料。我记得还有鱼片，说不上是炸的还是煮的，有黄油味道。还有冰镇淡酒似乎不会醉人，其实，愿上帝宽恕我，它同塞纳河的儿女们一样骗人。米格尔，我无法避开这样一个念头：一切都像一场滑稽戏。这座大厦是由黎塞留红衣主教修建的，曾经属于路易十四，后来转让给奥尔良公爵。也许就在这间大厅里研究过威斯脱法利亚条约的条款，那是马萨林的杰作；也许倒霉的菲利普·伊瓜尔达德就是在这儿密谋反叛路易十六的。今日，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光荣的也好可憎的也好，都在这绿色调料和被叫作骚特内斯的淡酒面前黯然失色了。总管和侍者热情得过火，显得不真诚。其中一位，像是他们的头目，把几只蜗牛当冷盘献给夫人，说：

“夫人，这六只蜗牛是特意为您从布尔戈尼运来的。”

若想描绘一下那些侍者毫无必要地来回穿梭，一口一个“对不起”、“先生”，一会儿递给你一只盘子，一会儿又给你撤走，一会儿往你杯里添酒，那是永远也写不完的。在那里，吃饭成了带等级性的仪式，这种仪式又是用鲜花和银托盘来进行的。我真想忘掉这些。但是有一样我忘不了，那就是这顿饭钱：那天我们三个人一共吃掉了三十二法郎，小费还不计在内。

我们在巴黎的日子过得颇有规律。在圣罗什教堂做完弥撒，我们便乘车去波洛涅森林散步，然后回旅馆用餐，先生夫妇到派克斯咖啡馆闲坐，我则埋头祈祷。我真不明白夫人会愿意到格兰德旅馆同一座楼的咖啡馆去。虽然那场风波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可是堂娜埃克西玛还住在巴黎，那都是她常去的地方，而且是首都最中心的地带，随时都可能出乎意料地碰见她就坐在邻桌。先生夫妇似乎对此毫不在意，恐怕连想都没想过。我在不停地想，约莫十五年前我见过她回比恩，一身绫罗绸缎，花花绿绿的令人眼花缭乱，后面跟着一位穿红制服的随从。在十五年当中而且是在像巴黎这样的都市里，时装式样足以变换了二十次。现在那些奢华的淑女们讲究穿着简洁而且喜欢深的颜色。但是，依然喜欢大红大绿招摇过市的也大有人在。堂娜埃克西玛会怎么打扮呢？我估计她少说也有四十岁了，但可以想见她是不会甘于充当家庭主妇的。问题是她有家了吗？她最后一次回比恩的时候，正值她含苞怒放、美艳照人的最好年华。也许她还很美，也许她已经离开人世。假如她死

了，她的灵魂会怎么样呢？对这不幸的女人我油然产生一种巨大的怜悯之情。她在少女之时就堕落了，对她的纯洁我曾经最操心。当我这样凝神沉思的时候，先生便像个魔鬼似的出现在我面前。后来读了他的回忆录，我才明白，他的心并非像我原来想像的那么冷酷。不过，要宽恕他的话，得做出多少保留啊！另一方面，堂娜埃克西玛血管里流的难道没有那位曾祖母的血吗（先生甚至可以当她的儿子）？堂安东尼奥难道不正是另一位传奇式的堂安东尼奥（他的名字被编入顺口溜至今还在比恩镇的乡下人中流传）的嫡传吗？

在讲述先祖轶事的顺口溜里，有着同中世纪的一位伟大诗人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的同样的哀伤和绝望。

乌鸦的利嘴，啄瞎我们的眼睛，
还撕去胡子和眉毛。

堂安东尼奥·德·比恩和托雷·罗哈剥夺了那些最体面的贫寒家庭的名誉和宁静。

大家都说，我也这么认为，顺口溜把越来越多的暴行都归咎于他了。也有些有识之士认为其中有一些并非影射堂安东尼奥，而是指十八世纪摧毁本地的一场真正的飓风。短短几年里，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了。歪曲历史的责任模糊不清了，当我们想从别人（我是说那些祖先）的行为中而不是从我们自身去寻找这些责任的时候，它们竟然胆怯地无影无踪了。因为我们的灵魂说到底，用现代语言来说就像

我们的护照上所写的那样，由“本人毫不推诿地亲自”负责。

一天晚上，我在梦里见到了这位不幸的女人，她老多了，但依然很美。在她那双曾经被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拿来与我的相比较的深沉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我问她是否很痛苦。

“我的痛苦暂时还可以忍受。但我知道它会越来越沉重直至最终而永恒的绝望。”她说。

我让她吻我念珠上的十字架，她莞尔一笑拒绝了。

“我还欠着二十四法郎的房钱呢。”她轻声说。

我惊醒过来，浑身大汗。堂娜埃克西玛的痛苦，据我的理解，不是火而是希望的彻底破灭，是灵魂的绝对空虚。她穿戴寒酸，原先春风得意的美丽身躯已经全无青春的踪影。

七

打那次恶梦以后，堂娜埃克西玛像个冤魂似的缠着我。我觉得她无处不在，像海神普罗托那样变化出各种形象出现在我面前。我虽然知道她是位上了岁数的女人，我在森林大道遇见她变成一位十七岁的姑娘，穿一身奶油色服装在玩陀螺。在卢浮旅馆的餐厅里，我又碰见她化成一位佛罗伦萨的女伯爵，带着两名孩子旅行。一天晚上当我半睡半醒地等待先生夫妇从剧院回来的时候，她又变成一只安

哥拉猫出现在我面前，眼睛和动作与她维妙维肖。

一天早上，当我乘电车的时候，一位身穿黑服，身材苗条匀称的女士引起我的注意，她在梅吉塞大街流览古旧书籍。虽然看不到她的脸，但我心头怦然一震。电车似箭一般飞驰而过。我要求停车，售票员说下一站是土伊勒里公园。那位女士离我愈来愈远。再过半分钟我就会看不见她了。正当我准备跳下车的时候，有人抓住我的胳膊：

“先生，这是不许可的。”

我的反应是不由自主的，过去从未发生过而且我想也不可能再发生：我给了那人狠狠的一拳，原来他是个便衣警察。尽管还未到站，电车停了下来。随着一声哨响，来了两名警察要我跟他们走。我满脸羞愧。我看着他们把负伤的便衣抬上车，他的眉头被打裂了。见他满脸是血，我恐慌得要昏过去。先生多次说过我是一个谜，因为我有非凡的体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年轻时就有了一身蛮力，只是在过节时才用它来搬钢琴），我的心却像一位娇小姐那样脆弱。感谢上帝，我总算自己走到了警察局，他们把我领到一个人面前。那人一见我身穿道袍便对我鞠躬施礼，握着我的手称我教士先生。请我坐下之后， he 和气地问我是否知道法国的法律。我还没答话他又笑起来：

“因为我想您不会是喝醉了吧……”

他见我吃惊的样子，笑得极有礼貌，给我倒了一杯酒我谢绝了。于是他又拿出一支烟，我还是没接受。最后他说：

“那好吧，教士先生，请您讲讲事情经过，我听着。”

说完他便斜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我开始仔细叙述。听到我跳车是要去会一位女士的时候，他的眉毛一耸。

“那是我家老爷的外甥女。”我解释说。

他睁开一只眼。

“教士先生，我没问您这个。”

他真把我弄糊涂了。

“我必须和她谈谈。经这么一折腾，我把她弄丢了，现在我上哪儿去找她啊。”

“您陪您老爷和夫人来巴黎却不知到哪儿去找那位看书的女士？”他问。

“是这样。”

“老爷夫妇不能把那女士的住址告诉您吗？”

“他们不知道。”

“啊！”警官叫道，竖起了另一道眉。

我发觉他连一个字也不相信。这使我心乱如麻。因为我不习惯撒谎，我的整个叙述从这一刻起简直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很遗憾，必须拘留您一段时间，先生。”警官对我说。“不过，在医生对警探的伤势作出诊断意见之前，您最好别离开这儿。您应该知道，伤害一名警探要受到什么刑罚……”

这种威吓非但没把我吓住，反而使我勇气百倍。

“不，警官先生。这一点纯粹是您的职责。对于刚才的事我深感内疚，对于一个只想履行自己职责的人我竟然使用了武力。我实在觉得卑鄙，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知道上帝会惩罚我的，法律对我所处的刑罚也许会减轻（但愿如此）我在死后应当受到的惩罚。”

警官惊异地望着我。

“实在太奇怪了……”他说。可就在此刻电话响了起来。他把听筒紧贴耳朵讲了一阵，然后挂好听筒对我说：

“医生说鼻子骨折。”

“严重吗？”

“不……不过，还是挺厉害的。教士先生……”

我的心都快要碎了。难过之中我只会说：

“警官先生，我不是神父。”

“啊，”他叫起来，“那您是什么呢？”

我察觉到 he 差点儿把我当成骗子了。

“我只是比恩庄的一个小小教士而已。”

“比恩庄的？”他狐疑地瞧我一眼。我掏出钱包，递给他一百法郎。

“我以老爷的名义请您把这笔钱交给伤者。”

“十分感谢。您们在哪里下榻？”

“卢浮旅馆。当然，夫人曾要我准时回去别误了吃饭。”

警官先生似乎有些踌躇不决。

“只要由两名警察陪您回旅馆，我可以给您暂时的自由，不过，这也许会冲撞亲王夫人。”他带着疑问的口气，

因为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位亲王夫人，我没敢开口。

“好吧，”警官先生最后说，“您可以走了。您一定希望别让亲王夫妇知道问题的实质。下次——这还算好意规劝——多留点神就是了。”

警官先生深信不疑，这一切都只是典型的巴黎式的风流奇遇。而对一个地道的巴黎人来说，他觉得追逐女人这样的风流事儿，即使发生在一位教士身上，也是可以罪减九等的。可是，他说的那些亲王是谁呢？还是他本人给我揭穿了谜底：

“请您向比恩庄的亲王阁下转达我们对他的赠予所表示的谢意。”

我如坠五里雾中，满腹牢骚也不知如何发泄。天已经晚了，我想见见就在附近诊所的那位警探。诊所不像我原来想像的那样近，而且让我等了许久之后也不让我到伤者的病房去。我把自己一直挂在颈上的罗什圣母的圣像留给了他。由于太晚了，我慌张地请求允许我打个电话给卢浮旅馆。要通电话后，总机的小姐却给我接到卢浮宫去了，她这一错又使我失去了宝贵的几分钟。等到总算接通旅馆，刚刚听出门房声音的时候，忽然冒出一簇火花使我失去了知觉，倒在地板上。等我醒过来后，我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把我拉回旅馆，我茫然失措，额上有一道青紫。一位侍者为我打开玻璃大门，在他向我鞠躬之后，我似乎听懂了他的话，他说亲王夫妇在花园里等着我呢。

我宛如在梦里听他说话。我不知道旅馆里居然还有花

园。幸好透过那些对着隔壁那间铺着红地毯、被壁毯帘幔包裹得像只盒子的大厅(那里有五株发黄的棕榈,故被称为花园)的玻璃,我望见了正在念《玫瑰经》的先生夫妇。饥肠辘辘的先生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

“真见鬼!我还以为你被哪位标致女士劫走了呢。你这道青紫是怎么回事?”

我不记得自己对他说了些什么,吃完饭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需要做祷告和凝神静思。我要思索如何交待那笔给了警官的钱。在比恩庄我攒下了一些钱,虽然不够这个数也相差不远。不过,说丢了一百法郎毕竟有些勉强。最合理最高尚的作法便是如实讲出经过,但我又觉得揭旧伤疤把外甥女这一棘手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似乎不太妥当。我翻过来覆过去地想得累了,迷迷糊糊便睡着了,眼前立即出现了堂娜埃克西玛。

“那位看书的女士不是我。”她说。

她比我在头一次梦里见到的更痛苦憔悴。我问她是否祈祷。

“不,已经太晚了。”说完她就不见了。

我起了身,走到阳台上。有两位先生依着法国剧院的柱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住的旅馆,清晰地跃入我的眼帘,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只能是警察,在这个时刻又在这么中心的地区,强盗没有这份胆量。忽然,其中一位对另一位做了个手势。堂安东尼奥出了门,穿过广场,消失在黎塞留街上。打手势的那位走近较年轻的伙伴说了些什么,然

后便走进旅馆。那伙伴剩下独自一人，点燃了一支烟，假装在看戏剧广告，正当他装出这副毫不在乎的悠闲样子时（似乎他猜出我在瞧着他，那哑剧是专门演给我看的），忽然急步朝黎塞留大街走去，因为堂安东尼奥把他拉下的距离太远了。过了一阵，进旅馆的那位也走出来，靠在原来的柱子上，佯装观看当晚演《费德拉》的演员表。他们的这些行动使我忐忑不安，决意站在那里继续观察。约莫过了一刻钟，先生带着一包书回来了。那位年轻警探保持适当的距离跟着他，嘴里叼着烟，假装张望过往的仕女们。

几小时后我下楼去吃晚饭，先生站在门厅里用马略卡话骂人，因为一名小听差嘴都合不拢地望着他，使他很不舒服。

“你这个丑八怪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敢挡亲王先生的路？滚开！瞧你就不是好东西。”

晚餐桌上，我不得不对额头的青紫作了一番解释。我扯了个谎，结果越扯越大，总也编不圆，我不由得想起毕神父教我们念过的祷词：

“在罪孽之路上，只要迈出第一步便难以收拾。”

然而，事情一环扣一环，最后闹到无法分清哪是第一步了。假如那位苗条的女士（我现在明白了，那不是堂娜埃克西玛）不到梅吉塞大街去看书，我也不至于要从行驶的电车上往下跳，也就不会打伤那名便衣警探。可是，我到底有什么必要同堂娜埃克西玛谈话呢？是要改变她吗？她会理睬一个乡下的小教士吗？她不会要求来看望先生夫妇，把

他们愉快的生活重新搅得一团糟吗？诚然，堂安东尼奥是已经老了，已经满七十三岁了，不过，谁能担保……？在这出戏里确实无法弄清起因了。是堂安东尼奥的轻浮，病态的遗传，还是环境，或者偶然？所有这些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谜底。在当时颇有名气的一位庸俗诗人说，如果“没有潮湿和酷热”有些罪过是不至于发生的。阿斯图里亚人坎波亚莫尔则偏爱中午。我想，在瑞典的话便可以把责任推给寒冷和雨水了。置上帝于不顾而去寻找什么原始的起因简直荒唐至极。简而言之，这就像重新挑起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打不赢的老官司。

吃饭后点心的时候，那名小听差走过来说，加雷雅诺先生打来电话找比恩庄的先生。我恰好讲完一股火花让我昏倒在地这一段。

“现在你必须去打电话？这位加雷雅诺是什么人？假如他有什么事，为什么不来找你？”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

这时我想起来了，午饭以后先生曾经对小听差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还以为我没听见呢：

“今天晚上你必须到餐桌上来，就说有人打电话找我。”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些话的严重性。先生出去了，很快就回来。

“这个小无赖……”他是指那小听差，“叫我们为亲王，真够讨厌的。气得我揍了他两拳。”

他这样说是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好不去注意电话的事。对于我，他是暂时得逞了，俗话说得好，一物降一物

嘛。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习惯在晚饭后喝一杯马黛茶，我听见一位总管对侍者小声说：

“把亲王夫人的茶端来。”

很显然，警长在监视我们。我们在旅馆住了将近三个星期，头一次在那里听到人家提及比恩亲王，那都是守在法国剧院广场上那些警探编出来的头衔。对此我十分讨厌。我有预感，而且事实很快就证明我是对的。我们所希望的宁静安闲的生活，渐渐被搅乱了。我搞不清警察是把我们当大人物在保护呢还是当可疑的坏蛋在监视。假设是前者，后者也就快了。

“找你的那位先生想干什么？”夫人问。

“是位老乡。我不认识他。但他知道我们要到罗马去，想托我一件事。明天我去看看他，他住在奥特魏尔。我若回来晚了，你们就先吃午饭好啦。”

这些谎言使我手脚冰凉。先生在搞什么鬼呢？夫人似乎很不高兴。

“我一天比一天老了，世界变化真大。可是，托内特，我觉得一切太不合情理了。强迫你去接电话已经够放肆的了。他怎么知道你愿不愿意接电话呢？末了还要你去奥特魏尔……”

“不是他要我去，是我自己主动说的。他的一个女儿病了。”先生信口开河。

“可你不是医生，托内特。这一切，”夫人把脸对着我说，“很可疑。你觉得怎么样，胡安？我看是先生在骗我们。也

许根本就没人给他打电话，是他瞎骗的好脱身。那好吧，我们去开开心，到塞纳河边去转转。”

他们很快就回房去歇息了，我留在门厅里。我想同门房谈一谈，看能否制止关于亲王的叫法。门房总是那么忙碌：他时而在记录，时而在计算，又要回答旅客的问题，又要接电话。你一张嘴用不着说第二句话他就全明白了，显得十分干练。虽然同其他伙计相比他堪称一个顶十个，但他总是忙个不停。虽然他脸上的笑容像印上去的一般永不消失，他那样子总让人反感。我还未走近柜台，他便抬起头露出满嘴的牙，恰似一条狼。

“……(先)生要什么？”

他只使用了一个半词，我迟迟疑疑地拿不定主意是否用一个词来回答他。我想快一些，一急反而开不了口了，这令他很不痛快。

“说吧，说吧……”他一边发出这样的音节，一边在纸上算着什么。

“对不起，打搅了……”

他没好气地瞧了我一眼，又露出那一嘴牙，仿佛准备把我一口吞下。

“请说，(先)生……”他扭过脸去向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士致意。我不得不直说了。

“我家老爷和夫人希望……”

“是。”他高声应了一下，按了一下铃，朝两个往外走的美国人露出他那口牙。这时又进来六位旅客，穿着考究，刚

下车。侍者们忙着给他们搬行李。门房已经不理我了。

“我家老爷不愿意别人再喊他亲王，因为……”我喊叫起来。

门房盯了我足有一秒钟，又把他的微笑献给一位领带上闪着-一枚钻石的人。

“好吧，不知名的先生，知道啦。”他急速地叫道。

我知道，想让他再多听一个字都不可能了。由于他脑子转得太快，他不知道先生不愿意别人叫他亲王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封号。尽管我把门房描绘得过于可恶，但我必须说明，我们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一直到离开旅馆那一刻止，再也没人当我们的面叫出亲王这个词。

八

我脑子里想着白天的遭遇，根本无法入睡。必须告诉先生，我把旅行费用弄丢了一百法郎，可我不知该怎么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提堂娜埃克西玛的名字。我身上值钱的东西本来只有一条金链子和一枚金圣像。金圣像已经送了那负伤的警探，光一条金链子值不了那么多钱。即便有人愿意出那么多钱，不知哪一天我又得撒一次谎，说把金链子弄丢了。还有，金圣像的事就可以不说了吗？拂晓时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到八点钟先生进来时我正睡得香呢。他坐到我床头：

“我来是跟你要三百法郎。”

我把眼睛瞪得滚圆，还以为在做梦呢。

“你别这样朝我瞪眼珠子，你绝对说不出你这个样子使我想起谁来。”

我忍住了没问他。虽然由我负责保管和管理资金，我并不和他算那笔账，离开比恩庄之前两天，他借口万一我们要分开需要应急备用，向我要过三十杜罗。因为我们总在一起，我真想不出他把那笔钱用到哪里去了。现在他又要钱，准是又有什么艳遇。除了外甥女之外，她会是谁呢？我忽然打定主意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他快活地听着。当讲到同警探动手的时候，他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脖子：

“你揍了那警察，亲爱的？他竟敢抓住你的胳膊？别对夫人说，不过你干得很漂亮。这个狂妄的家伙是怎么想的呢？”

想到一个外国人（虽然在这件事中，外国人是我们）胆敢揪住我的衣服，先生的法国风度便一扫而光了。他沉思了一会儿。

“你说你看见了堂娜埃克西玛？”先生问我。

“肯定是我弄错了。您知道她在哪儿吗？”

“不。我对她一无所知。”他说着往阳台上瞧。

我觉得他在撒谎，我的脸不禁红了。

“那么，您需要三百法郎是吗？我昨天把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让他们转交给负伤的警探。回到比恩庄我才能还您

这笔钱了。”

为了不隐瞒分毫，为了洗刷我曾经编过的谎言（以及那些我势必要编下去的），既然已经讲到了堂娜埃克西玛，我便把他和夫人送我的那枚金圣像的事也讲了。他乐了：

“我看你对这位警察很关心嘛。你可不能再说你巴黎没有什么奇遇啦。”他狡黠地瞧了我一下。“我也有。把我要的钱给我，不必再去想把你花在警察身上的那笔钱还我的事啦。可怜的胡安，你没看见我比你老得多吗？”

他的话里透出一副好心肠，使人无法隐瞒什么，我不知不觉地便问他我在比恩庄给他的那笔钱花到哪里去了。他不仅没生气，而且我的问话似乎毫无不当之处，他笑了笑。

“只剩下十杜罗了。”

当我听了他下面的话时，我明白自己本来就不该问，真有点后悔不该当初那么无礼：

“神父先生受委托，应该每个星期天给玛多·科洛玛一杜罗。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同他清账了。你和夫人真是那么天真，以为一个星期靠一只山羊和两只面包就能活下去？”

我掏出钱包，给了他三百法郎。一小时后在圣罗什教堂望弥撒，只有夫人一人参加。我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弥撒完毕，上帝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安慰：“吃饭之前，”我内心有个声音在说，“你就可以证实先生不是同你设想的那个人在一起。”我们回到旅馆，夫人依旧去塞纳河散步。每隔一

刻钟便有小汽船从卢浮大街开出。我们决定坐船到帕西去，然后登上那里的随便哪个小岛看看。

“你会看到那儿有多美啊，胡安。那些岛屿都是荒无人迹的，一到星期天便人山人海，可是今天不会有人。我们可以坐在一棵树下，在阳光与树荫之间念《玫瑰经》。”

塞纳河不仅是条著名的河流，而且因其平静的河水及沿岸茂密的森林而成为风景迷人的地方。河畔笼罩着一片葱郁肃穆的气氛。一过圣热尔曼，两岸便构成堪称闹市的谷地，古老的大道纵横交错，宏伟的宫殿鳞次栉比，而且猎物丰富。我们登上一个岛，确实不见人烟，但住满了啼鸣的鸟儿，为我们演奏着堪与大歌剧院媲美的协奏曲。旅馆的一位小伙子走在我们前面，拿着两个饰有金丝带的红天鹅绒坐垫（据说只是在爱丁堡女公爵来时用过），这是夫人特意要来坐船时用的，还叫了个小听差来拿它们。这使得我们在下人眼里身价倍增。我们念着《玫瑰经》，小听差则在草地上睡着了。听了一会儿鸟啼，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似乎自言自语地对我说：

“胡安，先生有许多十分奇怪的地方，我从来也摸不透他。”

她停顿了一下，见我张着嘴听，又往下说：

“无论你我都不相信他去奥特魏尔了。过去他撒谎撒得好一些。如今，他老了……也没心思去装模作样啦。”

她缄口了，瞧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曾经那么漂亮过，现在也开始长满皱纹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

“我只是不明白，关于去奥特魏尔的这出戏他演得那样糟，是因为他老了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他知道我老了已经不中用了，以为这样就足以应付我的缘故……”

她细致入微的分析令我感动。

“我们没有权利把去奥特魏尔的事猜测成一出闹剧。”

她那多虑的语气又恢复了昔时的活泼。

“我们没有权利去当傻瓜。可是，天哪，像他这把年纪的人，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呢？你比我了解他……”

“夫人，您说我？”

“对，胡安。我和他相处的时间长，离得近。可是你……”

她不说了，举首望天。天空呈现出一种捉摸不定的蓝色，犹如她的眼睛。据她丈夫说，她的眼睛继承了她的一位诺曼底先辈的特色，十分明亮，有时显得冷酷，但此刻却饱含着哀伤。假如她知道我所了解的使我保持沉默的那件事，一定会更加伤心。不过三个钟头以前，先主对我说：“我也有件奇遇。”还向我要了三百法郎。我眼前不禁又浮现出从前那种动荡不宁的生活场景。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丝毫不愿知道任何不快是出了名的，可是我们永远也无从知道她到底成功了多少。作为女人，尽管不表露出醋意，心里必然会有许多痛苦。现在我便看到一种更深沉更致命的痛苦：精神上不理解的痛苦。愿上帝宽恕我，我斗胆说一句，她在先生的面前，恰似一个野蛮人头一回站在钢琴面前一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表兄妹，有着同样的姓氏，还有部分共同的血缘。他们相爱。“可是，男女之间的情爱从来

就不是互通灵犀，而只是把相反的两极融而为一。”这是先生说过的话。夫人最后说的那句话叫我迷惘，我实在不知它所指为何。“对，胡安，我和他相处时间长，离得近。可是你……”她不会把这句话说完整，我也绝不会要她解释清楚。我的矜持未能阻止我热泪盈眶，我吻了她瘦骨嶙嶙的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您是有罪过的。”我叫道。

多苦的命啊。天哪，生来就要和古老的比恩家族共同生活……十四年前在困难之中我昏倒在壁炉旁，而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一位夫人，不得不做出一个强有力的典范。如今，还是这位夫人，已经七十高龄了，在塞纳河空无一人的一个小岛上再次战胜了我。听到我喊出的话，她那像法国小岛上的天空蒙着轻纱一般的眼睛，顿时变得像两朵春天的花，两朵轻盈的喇叭花，两小束毋忘我花。她的目光饱含笑意，似乎略带狡黠地望望在草地上半睡半醒的小听差：

“胡安，凭着上帝的爱，这个小伙子在博物馆里见过小教士吻侯爵夫人们的手……天哪，要是小汽船不再回来……我们不会害怕吧？”

她并不感到害怕。这时只听见好像从莱凡特方向传来一种沉闷的隆隆声。鸟儿尖声惊叫着四散奔逃。从波洛涅森林那边飘过来一只形状像雪茄的大气球。于是我想起报纸上登过一条消息，蒂桑德兄弟宣布要进行他们发明的可驾驶的电力飞行器第二次升空的科学试验。我向夫人进行解释，她听得津津有味。

“可是，一只气球飘在空中怎么控制得住呢？”

“据说同轮船一样，通过一副转动的螺旋桨和一个舵来操纵。”

夫人若有所思。

“我们这些头脑清醒的人是不会进行这种尝试的。然而，天晓得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们会不会乘气球旅行呢。好多年前，先生发明过一辆‘自动车’，我们都责备他。如今‘自动车’已经成了一种现实。”她说。

如今看到理想成了现实，她也许会为当日那样反对发明而感到内疚。可是，世界上所有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们过去是这样并且将来也是这样的。坚强而谨慎的夫人恰恰缺乏想像力。

高空气球渐渐飘近。它的形状和颜色都像雪茄，中间部分圆鼓鼓的，两头细得像个尖顶。也有些像鲸鱼。无论像雪茄还是像鲸鱼，都不好看。后来我才知道它有二十八米长，相当于马略卡的十七巴拉多一点儿，里面充满了比空气轻的瓦斯，这样它在大气层里就可以像木头在水中那样浮起来。听人说，这种瓦斯除了会爆炸之外，还有很强的毒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气球的肚子下面吊着一只巨大的篮子，似乎是用灯芯草编成的。篮子里面装着许多机器和装置。有三位先生站在那里，一边打着手势交谈，一边驾驶。其中两位长得高大粗壮，留着大胡子和唇须，简直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他们一定就是发明人蒂桑德兄弟了。另一位，我的天哪，竟然是先生，堂娜玛丽娅·安东

尼娅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默默地对视了一下。这条可恶的庞然巨鲸慢慢地从我们头顶飘过，低得足以让我们把上面的乘员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它像一只大黄蜂那样震颤摇晃着向南飘去，消失了。虽然先生在冒一个极大的险，我不由得大大松了口气，记起做完弥撒后听到的那个声音：堂安东尼奥没有和堂娜埃克西玛在一起。那三百法郎不是花在风流韵事上，而是到了蒂桑德兄弟手里，因为在法国和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一样，没有钱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

转眼间小轮船也来了，我们一言不发上了船，在卢浮大街登了岸，进了旅馆，小听差跟在后面抱着爱丁堡女公爵的那两个天鹅绒坐垫。人们像对真正的亲王那样纷纷给我们让路。守在法国剧院旁边的警探对我们进旅馆时的那种得意场面不放过任何细节，其中一位还在本子上记录什么。顺便说一下，“租用”那两个坐垫和使唤那个小听差就花了我们七十二法郎。当我去理论为什么要这么多钱的时候，他们回答我说，带着小听差就意味着特殊的“阔绰”，那是没有牌价的。（“啊，我的天，”堂娜玛丽娅·安东尼亚不无微词，“一个离地不过二尺高成天只会找麻烦的小孩子也算得上一种阔绰……我觉得付半个比塞塔已经绰绰有余了。”）

先生回来得稍微晚些。他显得异常激动，由于他生性真诚，除非特殊情况他从不撒谎，就迫不及待地想讲讲他的历险记。然而，他明白自己的妻子是断不同意自己这种行为的，也不愿发生什么争执——回忆录里写道，不存在

什么不可辩驳的看法——恰恰因为他比苏格拉底还要苏格拉底。由于他想像力丰富，他找到了一种既能遂自己心愿又无伤大雅的妙方，那就是再撒一次谎。

“奥特魏尔的那位先生非要带我去看电动驾驶的气球升空不可，还把我介绍给蒂桑德工程师兄弟。你们知道吗？这几天的报纸谈的都是这件事。蒂桑德兄弟都很热情客气。我一直上到驾驶舱，那里很舒适，椅子够三个人坐的……”

我们的沉默似乎使他有些愕然。罪过比铁还沉，这话一点不假。场面变得很难堪，可我不该介入。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终于介入了，她一边削着一只苹果，一边用比恩家族特有的语气说话。这种语气似乎很轻，曾经使我这个在他们身边长大的人上过多少次当啊。

“胡安和我都看见了 you 从塞纳河上空飘过，托内特。你就不怕出事吗？”

先生泰然自若地回答：

“不，因为那些装置很牢靠。你瞧……”

于是他给我们讲起气球上的装置来。夫人平静和善地听着。一场灾难就这样避免了。

九

那三百法郎没有花在堂娜埃克西玛身上。我们在巴黎

停留的一个月里(既然旅行的目的地是罗马,为什么要在法国停留一个月呢?)似乎没有人想起过她。我曾经劝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请求上帝保佑她。夫人光是听不开口,她脸上什么表示也没有。米格尔,我们永远也弄不明白贵族们的心思。他们铁石心肠,大概也只能如此。他们关心的是名字而不是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因此,有的贵族便比中产阶级的任何一位都更无知、更固执坚持自己的习惯,而绝不愿意祖上传下的、只与家世而不是与自己有关的声望遭到丝毫损害。当名字不被用来作诱饵的时候便成了坚固的盔甲。有权势的人一旦觉得自己坚不可摧的时候,就有可能连伦理和宗教的准则都丧失了。我说过,如果没有组成其姓氏的那五个字母的魔力,先生前半生也不至于有那种闹得满城风雨的荒唐生活。所以基督才说,如果我们愿意追随他,就必须舍弃尘世的荣耀而拥抱十字架。你还记得院长先生把我们当作社会党人的那一阵子吗?上帝保佑我未让我陷入刚刚死在伦敦的一位德国犹太人所主张的但是却被教会所诅咒的重要理论中。这位非宗教的传播者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观点的创始人,似乎不知道早在十九个世纪之前,降生了一位大师,其理论概括了对他人和对人类的爱,被社会主义宣布为自己的发明。作为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此人实际上是自相矛盾,因为他想通过阶级斗争来最终实现人类的友爱。而这些并不是救世主耶稣给我们指示的道路。不,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能被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信徒。另一方面,米格尔,我有时对绅士们的道德加以非

议，并不意味着我不爱他们，而是恰恰相反。“看到有一只羊跑到歧途上去了，谁能心安理得只顾照看一百只听话的羊而不去管它呢？”我对先生一直持有的热爱之情正是源于这一点。也许我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不那么操心，那是因为她无须我挂虑。正因为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所以他们对堂娜埃克西玛的做法我才觉得不人道。当然，埃克西玛的行为无可救药，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如此，怎么能避免想念她为她心痛如焚呢？当我问起先生是否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先生眼望天空，给我予否定的回答。这种回答令我冒火，因为我认为它是虚假的。如今我晓得了真情，又因别的缘故而气愤。能对一个曾经爱过的人这样无情无义吗？先生对她的下落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先生什么也不想知道。据后来先生对我的坦白，他策划巴黎之行是为了同蒂桑德工程师兄弟接头，他们发明了电动控制的气球来征服高空。这就是浮士德精神。当德国的浮士德未能在肉欲的罪过中找到出路，便转而向控制欲、行动、与海争地、发财……等等一切方面寻求获得解脱，唯独不遵循上帝的戒律。

预定动身的前几天，先生夫妇带我去看歌剧《曼农》。我们说好要在包厢休息室里听，那是一间豪华的小厅，墙上裱了高级红壁纸。大歌剧院是座现代化的剧院，坐落在与它名字相同的广场上，紧挨着卡普青街。佩莱特街上那间老剧院好多年前就毁于一场大火之中，仿佛上帝不仅要以色列当那场灾难来使帝国坍塌，还要让演出那个腐败社会

丑闻的舞台也随之化为乌有。我读过普雷沃教士的那本著名小说，写于十八世纪浪漫派之前的浪漫小说，作者是位正派人毫不轻浮，对自己书中主人公的错误深表同情。玛农这个名字似乎成了轻佻女人的代号，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剧中的女英雄如疾风中的劲草。其悲剧的根由恰恰就在于此，我不明白，那可怜的女人由于自己近似幼稚的恶作剧便要在另一个世界里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就在这个世界里她也不断受到法律的审判，最后凄惨地死在路易西安娜州的沙漠里。对此，为什么没有人感到开心呢？

堂娜埃克西玛就是属于玛农之类的人，而且其下场也会一样。有一次，我在斗牛场看到一个杂耍剧团在表演。一名女演员在表演走钢丝，挂得高高的钢丝绳上，她微笑着左摇右晃，全然不察面临的危险，结果一失足摔下来，脖子扭断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些曾对她大声喝采鼓掌的观众，是否觉察到了我们应负的道义责任。我去看了她，她已经死了，我为她祷告。她最多也只有十八岁，仿佛在其金发的光晕下微笑。再回到那位外甥女身上来，我难以预测她会得到什么报应。在梦境里，她曾对我说过，她的痛苦会日甚一日直至永恒的绝望。这些痛苦一定是指逐渐失去美丽的容貌和财富，这是宗教的安慰所无法缓解的。那些世俗的所谓成就日益疏远她，变得陌生。在一个月里未能在市心里见到她，实在有些不妙。灿烂辉煌的巴黎全无她的踪影。就在这个灯红酒绿、挥金如土的巴黎旁边，从马格达莱娜到圣马丁门，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巴黎，在这些巴

黎中，既没有大商店玻璃橱窗里对人微笑的绸缎和鲜花，也没有辉映夜空的灯光以及太太小姐们身上如同我们森林里的露珠一般晶莹闪亮的钻石。在某个连游客都不光顾的巴黎城里，也许在圣安东尼奥城郊，也许在卢森堡那边，在某个简陋的房间，除了一张床、一个铁制洗手架和一把椅子外便空无一物，堂娜埃克西玛在那个金碧辉煌的巴黎的剧院包厢里，明星旅馆，还有那总是恭候在门口的马车，大出了一番风头以后，正在掩藏她的失败，她那无可挽回的失败。她的保护人兼朋友，那位皇上，已经死了。报纸对那位潇洒的所谓公爵坎波·福米奥已经不再提起。她的美丽容貌与那被称为迷人的风采断难承受不幸以及上了四十岁年纪这双重的灾难。当我产生这些想法的时候，便在偏僻街道上穿着破旧的上年纪女士中间寻找堂娜埃克西玛。过去我想起她的时候，总是浮现出她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形象。我说过，在爱丽舍大街的一个傍晚，我曾见到她像个姑娘似的在玩陀螺。

所有这些越来越清晰明确的假想，终将变成真实而不快的现实。在动身去罗马前一天，当我们去圣罗什教堂望弥撒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走在街那边的人行道上。她的身段已经毁了，往昔的苗条已经踪影全无。她穿的鞋已经磨得十分厉害，鞋跟也歪了，布袋子里露出一只面包和一些蔬菜。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堂娜埃克西玛，潦倒了的埃克西玛。她的目光仍像我梦中所见那样深邃忧伤。一辆公共汽车开了过来挡住我的视线，这时她便拐进了金字塔街那个

街角，待我稍一犹豫决定追上她时，她已隐入里沃利街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进了某家商店。总之，我未能找到她。几年之后，我的天哪，我还要在比恩庄见到她，就在我正给你写信的这间客厅里。我还要最后见到她一次，在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她简直像副悲剧的假面具……圣弗朗西斯科·德·波尔哈在皇后的尸体面前发誓只爱这不朽的美色，可是那具被掩埋的尸体已经不是堂娜伊莎贝尔，只是毫无生命全无知觉的东西。而在那不幸的一天，堂娜埃克西玛却依然是她自己，只不过是皮包骨罢了。那布满黑圈深陷的眼睛和干瘪萎缩的嘴依然还是她的眼睛她的嘴。我觉得她不是一个死人，而是一个可怕的女人，然而她那突出的特征却和已经消逝的国色天姿糅合混淆在一起，以后在记忆中再也不可能保留她美丽的形象了。这一点以后我再谈，现在继续我的叙述。我怀着无限的惆怅回到旅馆。那儿正有一桩我终生最大的耻辱在等着我，奇耻大辱啊，米格尔，可不能写进比恩家族的档案里去。门房一看见我就把一个鼓鼓的大信封送到我面前。信封上有警察局的印章，是给先生的。

“这可是十分重要的，”门房恶声恶气地说，“您不在收条上签字我不能给您。”

我签了收条，跑到自己房间里把门锁上。我预感到事情严重，但从未受过这样的羞辱。我们被逐出巴黎，按照那一长串的理由，我们以招摇撞骗的罪名被逐出巴黎。而这些理由我根本无法理解。那上面说，“自称为”比恩庄的堂

安东尼奥的西班牙人和“陪同他的女士”(似乎怀疑她是合法的妻子)以及堂胡安·马约尔教士,据他本人交待是前两者的家庭神父兼特别秘书,均被请求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法国领土,因为他们有一系列的极端行为。这些极端行为简直可以构成一部可恶的小说。警方的报告说,先生夫妇冒充为比恩家族的亲王夫妇,在旅馆里要求殿下的待遇,出门游玩还要一个男仆抱着爱丁堡女公爵的那对金边红坐垫在前领路。还有一件是:“自称为”比恩庄的堂安东尼奥的这位先生还乘坐蒂桑德兄弟的航空气球升空,用的是贝纳多·维雅尔这个假名(这一点没错,因为他怕报纸登出来让堂娜玛丽娅知道了)。至于所谓的堂胡安·马约尔教士则是个危险的家伙,曾在卢浮大街为了女人的事殴打警察。

令人无可奈何,可悲可叹的是上述诸项几乎均为事实,不过我们肯定是严人宽己,我们的自我评价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有天壤之别,这不足为奇。还在五九年,一位声名狼藉的舞女就敢把比恩这个名字挂在嘴上。先生在回忆录里是这么写的。对那个堕落的女人来说,堂安东尼奥是……笔都不愿意写出来。然而,先生尖锐地对我们指出,这种看法毫不奇怪。在巴黎,比恩家族根本不为人知,不像有些事情,诸如堂娜埃克西玛的行为,公爵的造访,堂安东尼奥的春风得意以及他在一位新情敌给埃克西玛送了贵重礼物之后的突然失踪等等。这一切对于陌生人来说有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由舞女里戈巴什说出去了。“对此我不能接受,”先生多次这样对我说,“可是,当我看到别人这么叫

我的时候，我只好承认不无道理。我不知道那位每天晚上出卖自己的爱抚的里戈巴什是否用过另一个确凿无疑的形容词，这个词字典里也有。”

上天安排有方。警察逼我们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而我们原来就已经定好在第二天动身。我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让先生夫妇知道。我是这场耻辱的罪魁，理当由我一人单独承受，因为我不懂得从一开始就根除隐患。也无须掩盖我殴打治安警探的事情。我愿一人作事一人当，而且既然要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这座不夜城，我希望尽力让先生夫妇像真正的亲王那样，带着微笑，昂首挺胸地离开这儿。当我们穿过门厅的时候，恰恰又是那可恶的门房最后一次——带着多么残忍的嘲弄啊——这样称呼：

“你们好，亲王殿下。”

他这样说的时候把满嘴的牙全露了出来，老天在上，我真想给他几个嘴巴。但我没这样做，而是从颈上摘下金链子，低三下四地求他收下，并告诉他这是十分古老的金饰。一见这金子的分量，他脸上立即涨满贪婪之色，对着我们一躬到地。

“瞧你给先生们备的什么车？”他朝负责行李的年轻侍者叫嚷，“全巴黎就找不到一辆更古老的了吗？快去把爱丁堡女公爵的那对大坐垫取来，好让先生们舒舒服服地坐到车站。”

监视我们的警探一见那对皇家坐垫便恭恭敬敬走过来（荣华富贵对那些卑鄙的人来说威力何等之大）并且把挡住

我们去路的小孩轰走。其中一位警探还亲手给我们关上车门，开车时两名警探都把帽子摘下拿在手里。

“这些法国人多么彬彬有礼，多么令人愉快……”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

先生点点头。就这样，先生夫妇真像亲王一样微笑着，而我却带着一颗破碎之心，我们一起离开了巴黎。

十

一到罗马就令人大失所望。凡是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知道罗马是两种文化的首都的人，见到它那副尊容，看到处处残垣断壁、混乱不堪的景象，无不目瞪口呆。令我尤其痛心的是在教堂里旁若无人地夸夸其谈，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虔诚。绝大多数教民根本不下跪，即使是在领受圣体的时候。

“你还会见到使你怀疑自己在什么地方、怀疑历史的种种怪事呢。不过，尽管如此，胡安，这的确是罗马。”先生对我说。

过了几个星期我才真正明白先生的话。

先生很想住在格兰旅馆里，但由于在巴黎的种种事情使得我们钱袋瘪了不少，我说服他到科尔索的一家客栈去住。客栈女老板的过份热情使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不悦，说实在话，这种热情不太合时宜。女老板大包大揽，说她

有全城最干净最漂亮的房间，不过我们目光所到之处却无法证实她的话。科尔索是条最大的街了，就像我们巴塞罗那的兰布拉斯街一样，但它只不过是条窄小弯曲的街道。我们的房间就冲着这条街。气候潮湿，人行道上的石头缝里以及街角落处，都杂草丛生。

先生想让我先看一看罗马城的古老部份。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留在客栈里。下着雨，找不到车。我们便打着雨伞向神殿广场走去。它在科尔索大街的顶头，很漂亮。从那里我们到了古罗马遗址。同我幻想中的相比，多么令人痛心，简直毫无伟大之处！连大剧院本身我也觉得很小。

“罗马实在太古老了。这和酒是一个道理。好酒必须时间长，必须是陈年酒。可是千万要注意时间不能太长，不能过了头。罗马早就过头了。”先生说。

先生说的罗马是指凯撒的罗马。教皇的罗马。感谢上帝，教皇还没有死，不久便得到了证实。

莱昂十三世的接见，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定于年底最后一天举行。我们利用等待的两周时间去参观寺庙殿堂。先生说得对，那就是罗马。一位修士陪同我们。他头发金黄，身体强壮，地道的瑞士籍伦巴第人。他外表似乎不太热情（先生说，没人教过他笑），其实是我所见过的心肠最好、最想让别人快乐的人。他在罗马上流社会交往甚密，亏了我们才参观了一些令人叫绝的古老大厦。我根本没想到过，在这么一个难看的、破败不堪、遍地穷人的城市里，它的小巷居然还藏着这么好的建筑，里面的财富简直数不胜数。

一个接一个的大厅裱着精美的壁纸，各式各样的绘画一直画到天花板上，处处镂银镀金，挂满枝形吊灯和柄上镶着珠宝的宝剑。无论是蒙特内格罗伯爵家里还是维沃特侯爵家里。虽然他们的府第富有得像真正的珍宝馆那样曾经使臭名昭著的乔治·桑倾倒，也找不出如此珍贵的宝物来。不过，那些画并非幅幅都有教育意义，裸体像太多了，而且有的裸得太过份。关于这一点说起来话就多了，我不想赘述。我只谈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而且不提女事主的名字。如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怎么也想像不出的：在郊区一幢精美的别墅里——是一些亲王的财产，耸立着雕刻家卡诺瓦的一件大理石作品，那是一尊裸体女神，半倚半卧在一大堆靠垫上，手里拿着一只苹果。那尊女神竟然就是别墅女主人的雕像……

“意大利女人，”堂安东尼奥发表评论说，“一般来说，至少也和马略卡的女人一样贞洁。她们也像卡斯蒂亚女人一样讲究名声。不过，有时这名声和贞洁会在她们最料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失去。于是，她们也就显得有些过份了。”

午饭以后我们常到平西奥去。从波波洛广场可以乘车沿着两面大斜坡往上走。我们乘坐一辆四座敞篷马车。先生饶有兴趣地故意大声同车夫讨价还价，有时一路上就为一个瑞尔争个没完。一旦还价成功，他便拿出半个比塞塔作小费送给车夫。

‘各人有各人生气的样子。那些老头儿总是唠叨个不停，还说些难听的话，不过总还算顾点儿面子，是小声说

的，声音又嘶哑，也听不出他们说的是什么。至于那些年轻人嘛，脸皮就厚一些，当然也有一些像大姑娘似的。那天你没来，有一位年轻人朝我嚎啕大哭。糟糕的是他扔掉了缰绳，我们差点儿摔到悬崖下去。就因为我说了他一句：‘小气鬼永远也发不了财。’我没说错。后来他不要我付车钱。”先生说。

讨价还价也好，送小费也好，问题是现在只要一见我们来到广场上，车夫们就争吵起来，不知该让谁来拉我们。先生呢，则坐到一条石凳上笑眯眯地在一旁看热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则远远地躲在她的紫罗兰小阳伞下看着。

“事情过去之后他们准会发牢骚的。对吗，胡安？先生越来越变得孩子气了。现在他为什么要去惹这些人生气呢？总有一天他们会说出一些让我们听不进去的话来的。”

等车夫们吵够了，我们乘上随便一辆车，沿着平西奥山的斜坡往上爬。我们不时遇上那些去晒太阳的上流社会的仕女们的马车。平西奥的花园素来就十分出名，而且景色独异。玫瑰、柏树和雕像是值得一观的文艺复兴时期最灿烂的一景。无论是小径旁，栏杆上，还是亭台楼阁，都少不了一尊女神或一座力士。到处都是闪亮的白色大理石雕像。石雕人像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军团。当我们路过一条绿树成荫的大街时，看见那里的石雕简直摩肩接踵一个挤一个。先生说这已经构成了一种威胁。

“在罗马，总有一天雕像要比有血有肉的活人多，因为

人是要死的，而雕像可以长存。每一代人都添一些新的雕像，还不算那些挖掘出土的。假如有一天雕像超过了人，像导游说的：‘罗马有一百四十万人口，其中五分之四是石雕。’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旅行可以碰到许多奇闻轶事，而那个社会确实有些奇特。每天下午我们都碰到一位风韵犹存的女士的车，她从第二天起就像对熟人那样对我们笑了。第三天，她见我们下了车到一个望楼去看看，便十分热情地说：“我很高兴陪你们去，祝你们玩得愉快。”告别时她给了我们一张名片，还说只要我们需要，她愿尽力相助。她是位女侯爵。第二天下午她对我们说，她是独身，她的消遣是艺术，晴朗的日子便乘马车闲逛。当她邀请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开始认为她是个女骗子。她住在西班牙广场附近，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位老女人和两位穷酸的修士。在吃饭时她说她是巴贝里尼夫妇的表亲，但她又急忙说她不理他们，因此我们也就不便让她领我们去看那座有名的大厦了。女侯爵的宅第不十分富丽堂皇，倒有些像修道院，不过恰似它的女主人，尚有动人之处。先生认为那些画和壁毯都是逐步被取下来的，仍然留着一些精致的家具。女侯爵的艺术爱好很难具体指出是属于哪一方面。她似乎颇有艺术修养。她总带着一副忧郁的神情，使她显得高深莫测。有一天下午，她脱口说出认识一位复制别人的绘画以低价出售的女士，但她并未多谈，也无意把我们牵扯进去。没过多久，我们就再也没去看她了。我们认为她是位真正的女士，也许有

些瑕疵。

一天下午，那位年轻车夫，就是听了先生说他像个守财奴总在数钱便放声大哭的那位，见我们上了另一辆马车，便掏出一把匕首，若不是我拦得快的话，他就把它插进马胸膛里去了。

“瞧见了吧，托内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以后可别再和这些人开玩笑啦。”

“这是个敏感的民族。”先生略一思索便大声说。

“等到惹了麻烦，那才叫敏感的事呢。你就这么喜欢听他们叫骂吗？”夫人说。

事实正是如此。先生讨厌意大利文学（他认为比蜗牛壳还要空洞，比修女的格言集还要华而不实）却酷爱语言，透过语言可以感受到音乐，人民的各种反应。“让他们别写了。他们根本不懂如何表达精辟的分析。思维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太辽阔了。让他们别写啦，还是让我们来写写他们吧。”于是，先生便迫使他们讲话。由于先生不会意大利语，便只好用激将法的反作用原理，从《方法论》里头随便引用一句话朝他们扔过去：“酗酒是最糟糕的事，连这一点都不懂。”那些人以为先生把他们当酒鬼，一下子就炸开了，正如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所料，他们指手划脚，叫叫嚷嚷地冲我们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

“你们不觉得这比咏叹调或者比安得列亚·多里亚还好听吗？”先生对我们说。

“谁是安得列亚·多里亚？”夫人问。“是拉斐尔画的那

位吧？”

“他不是女人，是个男的。”先生答道。

由于意大利让他想入非非，他又说：

“一定是个青年男子，身强体壮，是位船长。阳光把他的皮肤晒得黑黑的，可是你瞧，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脑门上总盖着一缕缕的鬃发。”

对堂安东尼奥来说，事情和十八世纪一模一样。说他是幻想派的抒情诗人吧，他又太清醒了些。然而，这种抒情风格如同展现在拉梅乌的乐章里一样在他身上洋溢着。他所不屑的是不经雕琢的抒情，是空喊和那些惊叹号。

“你见过拉丁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惊叹号的吗？他们连惊叹号都不知道……对吉塔那（比恩庄的一头母骡）喊叫是对的，否则它不明白。当然，浪漫的公众其听力也不好。伏尔泰就曾对卢梭说：‘读您的作品，最后我们都会变成用四条腿在地上爬。’”

总的来说，先生觉得意大利是个举止放肆无度的国家。

“如若这些举动是指西斯汀教堂，那我们应予承认，还要感谢。天才有特权。但是，像米开朗琪罗这样的艺术家简直如凤毛麟角。摩西的雕塑体积庞大却并不伟大，倒不如说是种讽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总的来说是光怪陆离的。你听说过比奇吉请梅迪契赴宴更糟的事吗？宴会上使用的盘子全是金制的。用过之后，奇吉把这些金盘子全扔到台伯河里去了，但他事先在河里张开一张网，第二天这些金盘子又回到了他手里。梅迪契仍然同这种绅士往来，你

不觉得奇怪吗？当然不，因为虽然梅迪契家族自称是亲王，其实不过是商人罢了。在这一方面，他们倒可以和奇吉家族并驾齐驱。胡安，这同西班牙的绅士真有天壤之别啊！”

西班牙人在国外都是很爱国的。西班牙，我们常常把她说得很糟，但在国外看起来却是十分迷人的。就好像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和马略卡的大教堂，只有在远处才能感受到其雄伟。我觉得堂安东尼奥对那些小听差揍得太狠，对那些无耻的车夫挖苦得太厉害。大概他是不由自主地以这种方式来对一个曾被我们征服过多少次的国家重现我们的威风的。他出手很重，他的勇猛更让人生畏。我真担心，万一哪天碰上个无耻之徒，我就不得不插手了。

“你放心好啦。瞧你这副模样都快把别人吓跑啦。那天下午侍者拿着账单进来的时候，你那张牙舞爪的样子可真难看。我真想对他说：‘堂胡安要把你当钢琴一样从阳台上扔出去呢。’可惜我不会翻译这句话。”

“先生，请您注意，这可不是我的任务。”我应道。

“我知道。看到你这么好，有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因为我敢肯定你是喜欢……”

他突然闭上嘴不说了，弄得我满面通红。确实，魔鬼在诱惑我，想激起我那爱打架的性子。事情是从巴黎开始的，在梅吉塞大街，那位警探揪住我胳膊的那天；接着是在旅馆，门房低声说了一句十分挖苦的话来同我们道别时；而现在，就是这天早上，住在一墙之隔的几个大学生敲着阳

台的玻璃，用五线谱上所有的腔调来回足足喊了有一刻钟：“他妈的！是三个西班牙人！”一听到这些，我只觉得全身气血翻腾。我们的房间之间有一道上锁的门相隔。我真想一掌把这道门推在地上。圣母给了我力量是要我念《玫瑰经》的。当我祈祷完毕，听见我的邻居，两个那不勒斯人走出房间。我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听女侍说的。我不由得也向门口跑去。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人，简直是博物馆里的两具希腊雕塑，那辉煌时代的两名年轻人，他们的动作敏捷，一举一动都使他们判若两人。他们的这种轻盈敏捷是如此相似，乃至我后来回忆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想起来，他们成了一个整体。他们一见我，便停下来给我让路。他们脸上突然显现的凝重神情使他们的形象更其高尚，变幻出更多的人来。正在此时，一只猫“喵喵”叫了一声，两个人便笑成一团，半闭着眼睛，头上是公元前雕像式的鬃发。一时间，他们那匀称的男性身材又像孩童似的扭动起来，为免得跌到地上他们互相抓住对方。很快他们又恢复了希腊雕像的形态，身子紧贴着墙，用男中音说：“先生，对不起。”我对他们说，我们就住在隔壁。他们听了，宛若正派家庭的闺秀微微一笑。他们彬彬有礼地客气了一番，神色十分庄重地走了。可是，刚到走廊的一半，他们便勾肩搭背起来。刚刚走到楼梯口，那在几分钟之前令我火冒三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而这时我听起来却那样悦耳：“他妈的！是三个西班牙人！”

十一

圣诞前夜那一天，我们接到西班牙大使馆秘书处的一份公函，提醒和确认了教皇陛下要接见我们。随函还附来一份教廷接待处的通知，内容如下：“兹通知比恩庄的堂安东尼奥先生及其夫人和家庭教士兼秘书堂胡安·马约尔，教皇莱昂十三世陛下将于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赐见尔等。请着礼服。凭本通知入内。”

我建议先生夫妇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尽量深居简出，凝神静修，在精神上作好准备，以便迎接圣恩。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表示同意，先生则有所异议。

“我认为精神上的静修是必要的，但我们大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夫人和你最感兴趣的是教皇的祝福……”

“托内特，你知道我不喜欢打断人家的话，因为从小我就受到教育说那是最不礼貌的行为，可是现在我要打断你的话。我问你：对一个教皇来说，除了他的祝福，还有什么能让人感兴趣？你回答呀。我很高兴看看你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她那明亮的眼睛严肃地注视着先生。先生拿起她的一只手，用食指摸着她的指甲。终于，他开了口：

“我觉得，打断别人的话这种习惯自从共和国时代就有了。这是一种浪漫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毛病，那些

不守纪律的人都有。必须承认，从前更有教养。玛丽娅·安东尼娅，你祖父，也就是我祖父，常对我说，从小……”

“对，就是那竹竿的故事。”夫人第二次打断他。

先生盯了她一阵，松开了她的手。

“胡安也许还不知道呢，玛丽娅·安东尼娅。”他把脸对着我，解释说：“祖父当时是兄弟五个。他父亲堂拉蒙每天要他们在客厅里坐一个小时，同时还有他母亲、婶婶和教士。他母亲先谈天气，接着便是教士趁机大谈道德经。”说到这里，先生瞧了我一眼。“婶婶们不断插话，也要大人们插话。堂拉蒙则手执一根竹竿，哪个孩子若是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他便朝哪个孩子头上打一下。”

“是这样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堂拉蒙是很公正的。”

“假如不是到了老年他像《圣经》里的国王那样有些发疯……”先生不以为然。

“我的天哪，托内特，现在你又搬出《圣经》里的国王来干什么呢？你让死去的人安息吧。打断别人的话是最坏的毛病，我刚刚犯了两次。可是，不管竹竿的故事（胡安知道这个故事，因为你给他讲过几次）也好，现在又搬出《圣经》里的国王来也好，我现在记性开始变坏也好，我很清楚为什么打断你的话：因为你说教皇的祝福不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我要你对胡安和我解释清楚，你这些话该怎么理解。我知道你不管什么事都有办法对付，你若愿意的话胡搅蛮缠也行，但我愿意听听你的解释。”

先生又拿起她的手，摸摸她那个食指的指甲。眼看无法避开这一点，他干脆痛痛快快地说了出来。

“第一是，”他仿佛置身在共和国之前的时代那样一板一眼地说起来，“你打断我的话已得到原谅，我记得你只打断过一次而不是两次。”他记得很清楚是两次，但他感觉到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已察觉他为什么松开她的手不再摸她的食指。他接着说：“第二，我没说教皇的祝福不是胡安和你此行的主要目的或者说唯一目的。可是，莱昂十三世不仅是教皇，还是个卓越的人和干练的政治家。总有一天我要写一写这位刚刚向学者和历史家们公开了教廷秘密档案的人。我很想当面认识他一下，由于见面时间有限，我需要考虑该向他提什么样的问题。因此，玛丽娅·安东尼娅，我才说胡安建议的精神准备并非和大家理解的都一样。你们最好是祈祷，因为你们的信仰是神奇的，而我的信仰虽然也属于正统范围，”这时我瞧了先生一眼，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却要合情理一些。”

“托内特，到现在为止，一切都不错，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扯上什么神奇不可。胡安也好我也好，从来没搞过什么巫术。”夫人说。他们心照不宣地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在接见前的那几天，先生在记录着什么，显得专心致志。我则在波波洛广场圣玛丽娅教堂望弥撒，如同在巴黎的圣罗什教堂里一样，我唯一的教友总是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望完弥撒出来时，我们常常围着阳光沐浴下的广场

转上几圈，一边嘴里唸着《玫瑰经》。然后我们回到住处，一直呆到傍晚再次到圣玛丽娅教堂去。我们只是在餐桌上才见到先生。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也不加过问。接见前一天，从教堂出来，夫人把她的决定对我说了。

“胡安，明天我不和你们去见教皇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大吃一惊。

“您认真考虑过了吗？”

她微微一笑，仿佛是笑给她自己的，并且以此作为对我的回答。她已经考虑了好几天了，我早就应该猜到这一点。她说：

“后天在圣保罗教堂要举行群众性祝福，因为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领祝福，后天我去参加。至于你和先生，那是另一回事。”

我明白不能再问下去。她用的复数人称“你和先生”纯粹是个幌子，免得过于露骨。夫人不去见教皇并非我的缘故。先生肯定心里也清楚，所以他没有盘根究底。

我一晚上没合眼。那两个拿不勒斯人回来得很晚。他们兴高彩烈，隔着墙我都听到他们在笑。似乎不止他们两个，我好像听到女人的声音。我的惊吓症刚刚治好，可这也未免太过份，我打算第二天告诉先生夫妇。我听出有捏着嗓子发出来的假声，他们的笑声中充满淫邪。像罗马这样五毒俱全的城市，那两位堕落的青年令我不安。忽然，我悟到自己的错误：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演戏呢。这一发现本来应当使我心里安稳一些，可一想到就他们两个闹成这个

样子，这比想到有女伴陪着他们更让我心里难受。我确信自己睡不成了，便到走廊上，轻轻敲他们的门。一阵静寂，他们马上就把门打开了。其中一位学生站在床上，裹着一条粉红色床单，脸和眼睛浓妆乱抹。开门的那位则化妆成罗马士兵。我请他们发发善心别再闹下去了，他们却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安哥特太太，”扮成士兵的那位说，“我是她丈夫，她却欺骗我，和所有的男人好。”

安哥特在床上尖叫起来，双脚乱踢，头上像拉灵车的马那样挂满羽毛。

我提醒他们已经不是小孩了，想力图恢复秩序。士兵给我拿过一把椅子。他的伙伴仍然在嚷。士兵抓住他的一只脚把他拉倒了，于是两个人便在地上滚来滚去，厮打起来。我明白他们喝了酒，便离开了。我隔着板壁还听到他们一边厮打一边笑闹，足有十几分钟。然后就是一片安静。我熄了灯，在宁静的黑暗中，我不安地回想着刚才那荒诞的场面。

第二天，当我和先生登上那辆要把我们拉到梵蒂冈去的马车时，我感到深深的惶惑。同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一样，我也真不想去参加接见。先生对我说：

“胡安，我不知道接见将会怎样进行，也不知道会进行多长时间。你已经知道，我希望单独同教皇谈谈……”

车子沿着罗马凹凸不平的街道颠簸着向前行驶，一排排古老的宫殿在我眼前掠过，我有腾云驾雾之感。先生最

后的几句话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我对他说我不想去参加接见了，我在圣保罗教堂等他。他给了我一拳，揍得我心惊肉跳，因为车子是敞篷的。

“你别胡说八道了。这次是专门为了你才来的，好让你亲眼见见莱昂十三世。我唯一要求你的是，假如有机会让我单独和教皇呆一会儿的话……当然，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个可能……你是精明的人，见机行事就是了。”先生说。

他不说话了，我们来到了梵蒂冈。在皇宫的台阶下，瑞士卫兵穿着醒目的拉斐尔式制服。台阶以上便一律是神职人员，身着深紫色长及脚跟的道袍。我们穿过豪华的厅堂，里面尽是显要人物。出示了几次教廷的通知后，我们便被邀请到一间金色的大厅里，随即便有一个仆役领我们到另一间装裱精致的红色大厅。在那里我们只停留了片刻，时钟刚敲十一点一位神父手里拿着一张纸走过来热情地对我们说：

“请进。教皇陛下正在等候你们。”

他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玻璃门。

我不想描绘我的激动之情。先生走在我前头，他伸伸脖子，仿佛在比恩庄里那样沉着地用马略卡语说：

“在这儿我既没看到教皇，也没看到有什么东西。”

神父笑了笑，示意我们大胆往里走，随手把门关上了。这时，我们才发现掩在门后的一张桌边，莱昂十三世正在为我们祝福。虽然我又紧张又激动，教皇和堂安东尼奥如此相似，使我感到十分吃惊。因为这种相似，米格尔，便

我想起另一个我从未想到过、后来在报纸上登载过的相似的例子：本世纪最圣洁最杰出的人的雕像与巴黎剧院前厅里收藏的荷顿的某件雕像十分酷似。

十二

仪式开始是三鞠躬，然后先生作势欲吻教皇神圣的拖鞋，然而教皇陛下拒绝了，伸手拦住先生。轮到我时这种场面再次重现。接着，教皇仿佛是老相识一般问道，为何夫人没有赏光前来。我们根本没有料到教皇会这样问，但先生灵机一动说夫人身体欠安，也就对付过去了。这样，对莱昂十三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谎话。出于职务关系，我不止一次抱怨过先生。

“可是，一时之间怎么能把事情说清楚呢？何况，这种事对教皇来说无关紧要。”

“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我认为没有什么能为谎话辩护。可以说原因很复杂嘛。”

“可这样一来，莱昂十三世就会以为夫人不愿见他，或者还会以为她不是个好天主教徒呢。这不比我编的谎更不符合实情吗？”

“也许他会以为夫人不太舒服的。”

“我不正是告诉她夫人身体欠安嘛。”

先生的话无可指责。然而，当着基督在尘世的代表的

面撒了谎，我总觉得先生毫不感到痛心。为什么不像忏悔那样把事情和盘托出，告诉教皇，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不同意丈夫的理性论，所以才不愿意陪着一起来呢？很显然，有些事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楚的，可是，尽管莱昂十三是当今欧洲最忙碌的人，他也不能对一个人的健康漠不关心。

“对于您和夫人之间的芥蒂，也许教皇有办法解决呢。”

“也许会把我们赶到街上去，胡安。你看不见有千千万万的人吗？你怎么能叫他一个一个去关心过问呢？教皇问到夫人，那是出于礼貌，因为从大使馆得到的报告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教皇都把这份报告放在面前）有三个人的名字，而我们只去了两个人。你该适应适应，万一有一天你离开比恩庄（虽然他是随口说出的，我听了简直比要我去死还难受），也好知道有些问话纯属客套。”

大使馆确实给莱昂十三世送了一份报告，在接见的整个过程中，教皇陛下带笑容时时翻看着。

“马略卡，好一个世外桃源啊。我还是在许多年前到过那里……多美的海湾啊……你们住在比恩镇吗？假如我没搞错的话，那些产权从征服美洲时起就属于你们家族了。”听到这里，堂安东尼奥想表示异议，但是莱昂十三世继续热情地讲下去。“比恩是个显赫荣耀的名字。科耶拉……侯爵先生，”教皇停下来问科耶拉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十分爱好研究词源。

先生和我对视了一下。

“那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堂安东尼奥说。

教皇对这一回答表示满意。

“我知道您是位了不起的撰稿人，”教皇对先生说。“可是科耶拉这个笨蛋写过什么呢？”堂安东尼奥小声嘟哝着。“我还知道堂胡安酷爱古典拉丁文学。这儿，”教皇指指一个小门厅，“我还有个小小的藏书室，藏着维吉尔诗集的珍本呢。”

“啊，陛下，”堂安东尼奥趁机叫起来，“维吉尔是他最喜爱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藏书室您尽管用好啦。”教皇说。

“谁都知道陛下把梵蒂冈的所有秘密档案都向尘世的学者开放。如果陛下准许，胡安神父（这是他头一回封给我这个神职）将很高兴翻看这些维吉尔诗集。”堂安东尼奥答道。

“这再简单不过了。”莱昂十三世捕捉到了先生的含意。“去吧，我的孩子，去找找有哪些是您喜欢的。比恩庄主要走的时候，我们会通知您的。”

我鞠了一躬，向藏书室走去，在那里我呆了大概有三刻钟，直到他们来叫我。那是个八角形的房间，嵌着镶金边的浅绿色板壁。它有个阳台朝向花园。高高的拱形天花板装饰得一派生气。八面墙中的四面镶着书柜，书柜玻璃框也都漆成金色。房间中央是一张圆桌。整个房间布置得十分协调。由于我进来时很小心地把门关上了，突然之间我找不到门在哪儿。因为门和板壁被漆成一种颜色，浑成一体。

我想找到门，可是既无门锁也无门扣以资辨认。简直像魔术一般，因为我刚刚才从那些伪装得很好的板壁中的一个方格走进来的。终于，转了几圈之后我开始焦躁不安，我无意中往墙上一靠，门居然开了；里面尽是文件夹和墨水瓶。我把门关上，心里踏实了，现在我可知道了秘密，便小心翼翼地开另一个方格。一束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教皇和先生都不见了，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装裱过的办公室和写字台，而是一间小卧室，典型的修士的禅房，内有一张铁床，一座基督像，一扇高高的窗户，透过窗栏可以望见柏树梢。墙上一枚钉子上挂着道袍和鞭子。我吓得直往后退，恰似刚刚违心地撞破了一个秘密。莫非莱昂十三世就像先生所说外表恰似荷顿的雕像的教皇，真的神秘到如同中世纪的一位修士那样？我知道教皇的私生活很清苦。他接见我们的那间办公室同我们穿过的那些豪华厅堂便是鲜明之极的对照。对一个好天主教徒来说，各人的私生活都是神圣的，必须对之保持沉默。多年之前，当我还是神学院学生的时候，在比恩庄就听见先生同堂娜埃克西玛的全部谈话。我经不住诱惑，明知故犯，偷听了那些谈话。这一次又是先生的谈话比维吉尔的著作对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良知给我找出了千百条理由。为了一个灵魂的健康而对从不理解的人加以监视难道不是我的职责吗？这种特务行径本可以给我帮助，有利于完成我的使命。但是，凡是背离道德的事皆不可为之。我有足够的毅力埋头于古典著作而不靠近那些尚未搜索过的方格子。别以为我未付出任何代价，但

我将为自己那天早上在教皇宫廷里没有犯罪行为而永远感到满意。我正在这样自我安慰的时候，老天却让我痛苦地发现了一本书。当我翻看田园诗第二卷的时候，也许是由于一夜未眠而引起的情绪激动，也许是对那两位拿不勒斯人的回忆，我忽然在科里顿的诗里看到十分邪恶的观念，这些观念同我在神学院里学到的形而上学的解释迥然不同。就是如今我也不敢把这些观念归咎于那位曼图亚的伟大诗人，而情愿相信这是一种歪曲的结果。古典书籍在漫长的岁月里饱经动乱。老赫拉克利特说，一条河不能看见两次，因为每一次看见的水都是不同的。一切都是流动和短暂的，谁能担保自己掌握得住事物的真谛呢？

我坐到桌前祈祷起来，等着他们来叫我。现在我弄清楚了，我肯定是从右边的一个方格子进来的。我朝前望去，可以望见一个漂亮的御花园，有喷泉和雕像。但我怎么也忘不掉显现在蓝色天幕上那根光秃秃的柏树梢，那是我在一间简陋的修士禅房里望到的。时钟敲响了十二点。我听到一阵响声，一名仆役从左边的一道门走了进来。我又一次猜错了门的位置。莱昂十三世热情备致地和我们道别：

“您还年轻，很有才华。教会十分需要像您这样的神父。”

我们重新穿过一间又一间豪华的厅堂走到门厅去。一位夫人在那里同两位红衣主教在说话。她脸上罩着一方纱巾，看不清她的眉眼。我心里突然一震。走过他们身边时，有一位红衣主教介绍说：

“这位是阿夸·丁托女侯爵……”

我舒了口气。我们总算顺利地回到旅馆。

十三

先生躲躲闪闪地避免谈到莱昂十三世。当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问他接见的情况时，他只是说教皇十分热情客气，和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实际上，整整接见了一个小时。）先生一直是讨厌套话空话的。诚然，教皇陛下很热情，但当我们舒适地坐在开往文蒂米格利亚、二十四小时之内便可穿过半个意大利的火车上时，无论是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还是我，都期待着先生具体地讲讲莱昂十三世是怎么个热情法，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谈了些什么。可是先生没说这些，而是大谈起米开朗琪罗、布拉蒙特和胡利奥二世来。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满腹疑团，便也装出对本来不感兴趣的文艺复兴兴致勃勃，却把波尔吉亚和梅迪契混为一谈。她也想避开我们两人都关注的话题。只有一次，她的务实感和多疑的天性终于流露出来：

“托内特，你一定问过他，欺骗政府算不算盗窃。”

她从不喜欢交消费税。堂安东尼奥心底里想的同她一样，纯粹是为了开开玩笑，便一本正经地谈起纳税的理由来：

“政府需要钱。士兵和海军拿什么去养呢？”

“大家都需要钱。政府想要钱就得好好的求人而不是命令人。人家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

“卡洛斯五世的时候，”先生又大谈起历史来，“没要求过什么，但我们多少都给一些。光我们比恩庄就交了七十多头羊。”

“这就对啦，”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应道，“各人尽其所能，而不能像如今这样硬要，太没教养。”

先生歪歪脖子，做了个他特有的难以捉摸的手势，意思是说：“我服输啦。”他内心为有人驳倒他对社会主义的做法的辩护而满足。对他来说，最糟的就是现代派的政客，是既无文化又缺乏审美观的骗子。但在他的这种憎恶之中，最起作用的不是正义感，而是他那作家的气质。政治家和哲学家观察世界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实干家，后者则追求事物的真谛。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哪怕是最不信教的知识分子，都比政治家离上帝近一些，因为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几乎总是撒谎骗人。因此，先生总是反对政权。可这一回听到夫人说他一定问过莱昂十三世这个问题，便掩饰不住自己的反感：

“亲爱的，你想叫教皇怎么回答呢？欺骗总是欺骗。”

他说完便闭上了眼睛。夫人和我互相望了一眼。

“他困了。”夫人说，便欣赏起车外的风景来。可是，她没有看景色，先生也不是累了。先生只是想自己安静一会儿，不愿别人打扰他，所以他才说了那样两句空话。这样的空话与其说是像他那样有文化的人说出来的，倒不如说

更像科耶拉侯爵的口气。

当时速四十公里的特快列车向前飞驰着穿过风景如画的托斯卡纳和肥沃富饶的利古里亚时，先生的思想活动并不难猜透。没过多久，他就把想的什么告诉我了。我知道他肯定会这样做的，便丝毫也不去触及他的心事。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都不愿谈到和教皇单独接见的內容，其原因将永远是个谜。很显然，在接见中他一定提了很多问题，谈话一定很紧张。先生只提到接见的特点和方式，明明是在敷衍我们。他的气质毫不轻浮，很关心宗教问题，为此他甚至忽略了对庄园的经营而险些破产。他在事情的严肃性方面是决不让步的，而且，在未给这件事情罩上一层外衣使之变得不易觉察、虚无缥缈之前，他是绝对不会发表严肃的见解的。

“你相信吗，”他有时对我说，“尽管给蓬巴杜夫人穿上玫瑰色，她也只是个金玉其外的女人而已？”他知道，造成这种印象的是把她称作科蒂龙二世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他认为奥地利的玛丽娅·特雷萨是科蒂龙一世）。革命者们以自己的方式对她同考尼兹在巴比奥莱别墅的会晤加以曲解。我知道这别墅的名字意思是玩具，它能把他们隐蔽起来，他们的阅历尚少。可是，考尼兹和蓬巴杜夫人在那座玩具别墅的客厅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开玩笑似地谈论的问题，是“联盟的瓦解”，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王朝之间的友谊。假如共和国和拿破仑的两代帝国尊重那种政策的话，十三年前普鲁士就不会去侵略法国，法国也还能保有阿尔

萨斯和洛林。

我想，也许先生迟迟不愿谈及给他留下好印象的莱昂十三世，是要等到他心情平复，等到他那可爱的巴比奥莱别墅面目如初。这都只是我的猜想。若然如此，这种感情的转化势必会危及事情的真相。本质和表相能分离到什么程度呢？在描写那次接见的几个月里，先生在“创作”的艺术享受中，一定不知不觉地对那些讲出来的观点加以推敲润色，起码对当时的气氛、语气加以修饰，而使这些观点最终变得面目全非的。关于蓬巴杜夫人的政策的例子并不那么恰如其分，因为，虽然事实证明“联盟的瓦解”确实十分有利，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蓬巴杜夫人还是那位伯尔尼长老都没有如此深远的眼光，而科蒂龙二世也仅仅是因为哈布斯堡的玛丽娅·特雷萨在信里称她为“朋友”而飘飘然起来才那么做的。道袍是给教士穿的。回忆录里关于莱昂十三世看法都是经过仔细斟酌，有许多保留的。上天赐恩让我亲眼目睹教皇陛下挂着鞭子的私室，我敢担保先生关于教皇不信教的猜测是彻头彻尾的子虚乌有。在梵蒂冈宫廷里保存着几尊古代雕像，绝不意味着赞成它们该受谴责的表相。在远离好奇和淫邪目光的秘密博物馆里陈设那些作品，理由是一样的。可是，先生似乎不理解这一点，他对教皇的“艺术使一切都变得高尚”等等一类说法颇有微词。面对先生的提法（“信仰不是把我们引向真理便是把我们引向谬误，而理智却只会把我们导向真理”），莱昂十三世也不可能亲切地面带笑容予以默认，就像一听别人说天气很

好阳光明媚便马上接口谈起贝尼尼的喷泉来。

一路平安无事。大部份时间我们都自己呆在房间里。到了白天已经临近法国边界时，意大利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向我们告别。一位雍容华贵的太太一身珠光宝气，脸带面纱，手里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人还没到，她那婉转得如歌声一般的娇语先就飘了过来。一位检票员陪着她们。片刻之间，文艺复兴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异彩便随着她们全部出现在我们眼前。

“进来吧，小宝贝，问候这位先生。早上好，先生。您是意大利人吗？啊，太好啦。罗马人？西班牙人？啊，西班牙，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神奇的国家……是哪个地区的？安达鲁西亚的？我喜欢安达鲁西亚……”

接着她就哼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来。

“简直像只鸟儿……”先生低声嘟哝了一句。

这是一只巨鸟，一身孔雀的羽毛。一张脸如彩虹。转眼之间，她就向我们讲了她的身世和隐私，其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而且颇不正经。列车在绿色的群山中进行，穿过一条又一条的隧道。利古里亚的景色突兀峥嵘，引人入胜。薄薄的白云轻盈地飘过，后面气势汹汹地追来块块乌云。在云朵的追逐中，不时露出神奇的阳光，仿如古老祭坛的壁画上那在黑暗中照耀神像的光晕，宛若春天的薄雾把它那柔和的微光洒遍周围的群山。有时你觉得暴风雨马上就要降临，只听远处雷声滚滚，轻风送来潮土的清新。太阳出来欢快的笑着，一层薄纱又把它迷蒙住了，一阵纤细

的雨丝只是打湿了车窗的玻璃。然后，又是阳光明媚。

“我知道我受到责备，”性情似鸟的那位太太叫道，“可是，难道因为丈夫抛弃了我，我就只该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吗？啊，不。生活是美好的。我还年轻，我要快活快活。我只欠我女儿的。但是，任何人对我都无可指责。我是正派的……”

她擦了一下眼泪，时而笑时而哭。到边境时我们道了别。时髦太太拥抱亲吻了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我们已经分手了，她又回过身来说：

“我还有句话要对您说，夫人。您看起来还像三十岁那么年轻那么美。”

她又吻了夫人一下。

十四

一八八四年一月十二日我们回到家里，眼睛是看饱了，钱袋却空空如也。十个星期里，我们花掉一千七百杜罗的巨款，就是说，把卖松林得到的钱都花光了。橄榄的收成无几，要付清典押利息只有再典当一些东西。先生夫妇对这些困难似乎毫不在意。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显得一天比一天乐观。

“胡安，只要有一年的好收成一切就好办了，你就可以付清最后那笔账。这笔账是多少来着？你好像说过是一千

多比塞塔？”

“是杜罗，夫人。一千多杜罗。”

“那好吧，我们尽量节俭些。求得一个好年成，什么也不必说了。”

先生抬起头：

“向谁去求呢？”

“啊，托内特，有时候你真够怪的……”

于是，这个话题便被搁置一边了。

侄儿们都到码头去接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抵达的日期。尽管我们住得很远，他们还是显得挺客气。反正不过是些兔子的微笑，天生就有，真假难分。堂娜玛格达莱娜守寡了，和两个尚未婚配的兄弟住在拉塞奥区。因为我一直听说他们破产了，见到他们生活得很好，请我们吃巧克力的餐厅里摆满了银器，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堂娜玛格达莱娜打扮得很漂亮，也许有些过份，尽管还戴孝（丈夫死了不过三年），她只谈论歌剧和贵族。那两位兄弟呢，我们刚吃完早餐，他们就告辞了，说是有事。原来他们在农业银行供职。

“他们无所事事觉得无聊，又是人家找到头上来……我不喜欢，可是……”

“工作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堂娜玛丽娅·安东尼亚说。

“我早就说过，贵族迟早都会消亡的。”堂安东尼奥答道。

堂娜玛格达莱娜为了显示自己，开始谈起科耶拉侯爵

来：

“十五天前他从马德里到这儿来。有时和小伙子们一起喝喝咖啡。他老问教皇是怎样接待你们的。”

“教皇接待得很好。”先生说，“但哈科沃爱吹牛。都说他是西班牙的头号牛皮大王。我什么都没发表过，他却把我说成是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叫人会怎么想呢？”

“托内特，我看眼下这样说不合适。你去感谢他一下没什么不好。”夫人说。

这时门开了，正是侯爵先生，他简直是标准的贵族。

“我亲爱的亲戚们，”他落落大方地说，以为这样说先生夫妇就会高兴(因为他们毫无亲戚关系)。他一边吻着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手说，“我亲爱的亲戚们……我刚刚得到你们回来的消息。快给我讲讲，讲讲……”

“我正要去感谢你，还要揪你的耳朵。你为什么要让莱昂十三世以为我是个作家呢？”先生说。

侯爵先生放声大笑。

“可是堂安东尼奥，你以为你在比恩庄闭门不出，我们就不知道你在干些什么了吗？你将作为本岛也许是本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载入史册。对此你不必怀疑。”

他的善意让我反感，因为我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难以捉摸的保护。先生也发觉了，微笑着。

“这是很可能的，但必须等到我死了之后。”先生答道。

“这是多么凄惨的想法啊。”侯爵先生叫起来，像饱经世故的人那样热烈地拥抱他。“你能活到一百岁，会参加我们

所有人的葬礼。”

“你别瞎说了。你们这些政客和饶舌的人是永远也死不了的。”

“原谅他吧，哈科沃。”夫人插话说，“你是了解他那一套的。他太没教养了。”

“我们动身前一天，对你的演说我写过一篇评论。我引用了你的演说的开头：‘诗啊，诗……我愿沉浸在这神奇的诗的世界……’”先生又说。

刚才先生说到政客和饶舌的人时，侯爵先生还笑容可掬地听着。现在堂安东尼奥一引用他的演说，他脸上的笑容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他在议会的发言来看，我觉得他比我原来想像的要聪明些。他立即改变了话题。

他走了之后，先生叫道：“我没想告诉他，教皇对科耶拉一词的词源颇感兴趣呢。”

“科耶拉的词源？”堂娜玛格达莱娜问道。

“对。就像你所知道的，科耶拉就是那些最……的女人随身所带的……”

“罗马太漂亮了。”夫人急忙大声说起来，“有那座加利埃拉博物馆……”

“加利埃拉博物馆在巴黎，玛丽娅·安东尼娅。”

“还有大教堂……”

“这倒是。”

侄女希望我们留下来吃饭，可我们决定离开。托梅乌赶着车来找我们。我们到比恩庄时已经过了四点半，儿近黄

昏。路上托梅乌把镇上的一条新闻讲给我们听：一位英国女士刚刚租下了镇公所旁边的一幢房子。人家开价年租八杜罗，可她以为合同上写的是以星期计算，便每个星期六交给房东八杜罗。她什么也不说。她只吃瘦肉，凡沾油的东西她都不吃。她是位画家。

“她还画我。”托梅乌颇为得意。

托梅乌当时大概十七岁，我们一直把他当作丑陋的小伙子。他出生在庄园，自小就有一对像贝督因人似的分得很开的黑耳朵。看惯了他那一团乱糟糟的头发，又由于他习惯于只同母骡说话，我们根本没想到这个粗野的家伙正在变得越来越俊，出落成一个像样的男子汉了。他显得很果敢，虽然由于生性鲁钝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在哪些方面果敢。也许正是他的无能本身赋予他某种魅力。被介绍来找先生夫妇的那位女画家一见他，不是根据他的过去而是凭着眼前的他加以判断的。而这眼前的一刻还没有人（也许卡塔利娜除外）能捕捉到。我在前面提到过一群仙女围着一个男模特的那张画曾经引出一场风波。奇怪的是，女画家照着他画的时候只画了头部和一部份胸部，而且还穿着衬衣；可是，这些艺术家们的学问太多，等到展出的时候，那画上的他却变成了一丝不挂。托梅乌的本质并不坏，当他得知这件事的时候，羞愧得无地自容，藏到草垛里，一天一夜不吃不喝。神父先生来看我，对我们容许这样的事（我们其实一无所知）表示痛心。我们虽然说服了神父相信事情的真相，可别人还是不相信，他们继续把这种不体面的

事归咎于堂安东尼奥的理论和古怪行为。我相信堂娜玛格达莱娜是在城里嘀嘀咕咕最多的一个。

“他自以为多懂艺术，而且刚从意大利回来……”

我们从罗马回来时，画已经画完了，没过几天女画家就将它展出。可是那些诽谤中伤一直没有停止。六、七年之后，托梅乌那不吉利的迷人体魄（这一次同艺术毫无关系）压到了一个不幸女子身上，使她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而导致死亡，而且同先生夫妇的死也不无关系，再加上这一家族的彻底崩溃。

那位英国女画家名叫摩尔小姐，是一位有些糊涂的女士，满脑子奇谈怪论。我们回到家那天她就拿着一封给先生夫妇的信来了。她同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谈了一下午。虽然她说了半天，实际上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直到四十五岁她还是很纯洁很腼腆，这一年访问了意大利，她就觉得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了。

“那个圣母广场！”她以一种令我莫名其妙的无耻的纯真说，“啊，先生，那座天才的雕像，那些仙女，还有那些竞技者，在阳光下把自己的一切都赤裸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是五月，佛罗伦萨的五月，先生。鲜花和飞蝶……”她总是对着先生说，幸亏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在她的扶手软椅上打瞌睡。“我从伦敦来，那里经常下雨。我病了，回到旅馆。在那不勒斯没呆几天我就遇到一次最不平凡的经历。我希望您能明白。我的住处坐落在一处被充作鲜花市场的小广场上。住所对面有一家专卖店，我常去那儿买邮票寄

信。接待我的是位小姐。那天早上——空气温馨，花店的玫瑰简直像红色瀑布——女店员不在，店里坐着一位本镇的男子，大概三十岁左右。他的头发又黑又卷。”说到这里她瞥了我一眼。“他穿一件绿衬衫，领子敞着，粗壮的脖颈晒得很黑。我低下眉眼，找女店员：‘小姐……’‘哎，来了个没开苞的！’那男子说着就笑起来，露出一口白得耀眼的牙齿。接着便出来一个老店员。唉，先生，您是有文化的人，又敏感，您什么都明白，四十五岁了我还是正派家庭的闺秀。从来没有不相识的男人和我说过话。我也从没听过像您刚才听到的那样不合适的话。那种放肆无礼的笑和‘没开苞的’这个词在那个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三十岁男子，”说到这里她又看了我一眼，“和我，一个萎靡憔悴的小姐之间，种下了一种什么瓜葛。我回到住所，闭上眼睛坐在客厅里。我眼前只是闪现着强烈的颜色：绿色、红色、白色……粉红的玫瑰，粉红皮肤上雪白的牙齿，绿色的半敞的衬衫……我感到迷醉，满面潮红。别人请来的医生问我是否在太阳下晒得太久了。不是太阳的缘故，而是因为一句话……那些轻浮浅薄放肆无礼的词句，给我显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我已经四十五岁了！四十五年失去了，永远地失去了。我决定不再回英国。从那天起，先生……”

堂安东尼奥点点头。我感到羞愧和同情。在她讲述的过程中我曾想偷偷溜出去，可是女画家求我留下来。

“我请求您别走。您在这里我会好受些。现在你们明白我为什么画画了吧？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已经老了。我只能

成为一个旁观者……”

“人生几何，切勿虚度。”女画家一走，先生就叫起来。“清教徒主义是很害人的，胡安。我见过类似的例子，从假正经一下子就变成玩世不恭、放荡不羁。那些新教徒应该好好读读贺拉斯的诗，他们就会懂得青春不该虚度了。”

十五

摩尔小姐后来还来过两次。不过，打那次画展风波之后，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已经不喜欢她，先生呢，对她也不太感兴趣。

“她的神经已经不正常。”先生说，“她真可怜。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易卜生会用她来塑造一个当今让人喜欢的女英雄，但我不愿看到她。如果她再来，就让人告诉她我们不在家。”

口信很难转达，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先生夫妇只能呆在家里，别无他处可去。实际上也没有转达的必要了，因为她再也没出现过。她的生活很古怪，通常只在夜间出来，专走偏僻小道。我听本堂神父先生说，她曾想混进教堂去，头上什么也不戴，教堂管事只好把她轰出去。

“我听不懂您的话。”她用英语说。

“那您就该好好学学。”管事用马略卡语答道。他当然也不懂英语，但他机灵地挽住她的胳膊，毕恭毕敬地陪她到

门口。

另一方面，她似乎又不缺人性。当她得悉玛多·科洛玛生病时，便到她家去像个修女一样照顾她。几天工夫，她便以自己的行动感化了全镇的人。后来有人在交头接耳，说她这样做不是出于善心，而是因为老太太有个侄孙，这位英国小姐想画他。最后才知道，这位温柔的女士打了女病人。消息传来，先生夫妇把玛多·弗兰西娜派去女病人家，这个老女佣回来时悲愤交加。那天下午，由于神父先生不在，我只好替他去。等我回来时，先生给我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那简直是古典戏剧的轰动场面。当时我们在钢琴室，夫人正在练习弹《牧歌》，因为她不记得了。这时，玛多·弗兰西娜像痛苦女神一般闯进院子，一边像《阿依达》小号合奏那样大呼小叫，一边高喊着问我们在哪儿。夫人停下来望着我问：‘托内特，出什么事了？’我对她说：‘来了一阵飓风。’她盖上琴，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宛若要给她拍照一般，一副我们所十分熟悉的疑问和期待的神情。玛多·弗兰西娜气呼呼地走进来，还在门口就嚷嚷着要我们主持公道，就像索里利亚的传说中的伊内斯·德·巴尔加斯那样：‘先生，命令那个外国女人马上滚出去！都怪您允许她留在镇上！我只要求公平合理！’我没回答，怕打断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不太注意心理学，她抬起头，用她生气时那种温柔缓慢的轻声细语说：‘喂，嚷嚷什么哪？敢在先生面前这样说话，我看胆子也太大了些。到厨房去，煮杯咖啡

喝，然后睡觉。”“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我说，因为我怕玛多·弗兰西娜照她说的去做，我们就无从知道事情的经过了。”

先生最热中于这种事了。简言之：英国小姐把玛多·科洛玛打得遍体鳞伤。那位侄孙想反抗，结果遭到同样的下场。

“她把烧水的锅也打破了。”玛多·弗兰西娜继续说，“临走还踢了山羊一脚，从此它就再也挤不出奶来了。这个女人是比恩镇的祸害，这都得怪你们。”

总算让她上了床。精于此道的堂安东尼奥让她服了一些粉末。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溴化物。

这场风波的起因，实际上是那位英国女人想给玛多·科洛玛的侄孙画一幅像。可是，玛多·科洛玛知道托梅乌的那件事，便要加以阻拦。本堂神父先生进城去见州长，想得到一纸驱逐出境的命令。可是，州长是自由党，据说还被共济会和英国人的金子所收买，所以他对这场官司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艺术高于一切，而且摩尔小姐在她的国家里（尽管不是在我们国家）是位十分重要和有名的人物。

遗憾的是，像阿尔方索十二世这样宽厚仁慈的国王占着圣费尔南多的宝座，民心却向着一些无法无天的政治家的奇谈怪论。宪法不仅不代表而且还不相信国王的民主，这使得最称职的君主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他是真正忠实、信奉君王制的，上天不该让他硬着头皮接受一位共济会的州

长。当我这样写的时候，堂阿尔方索已经去世，高踞王位的是位堪称廉明典范的女士，她对待圣坛和王位的敌人那种迎合的态度，我表示双倍的遗憾。一百年前，自称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国吉隆德派把不幸的路易十六搁到一条死胡同里，其唯一的出路便是众所周知的断头台。在政治上，胆怯是很难得到怜悯的。投降敌人的政权，其动机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判断，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这一政权将立即不再成为政权。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以新闻自由为一方，以议会反对派为另一方，在它们之间古巴分裂派正高举大旗，谁也无法预料我们在海外的主权这一棘手的问题将如何了结。

假如先生还活着读到上面这些话，他一定会回答说，这个问题将随着我们的殖民地的丧失而了结，虽然这属于常规和时光自然推移的范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性主义者，他认为，一种总的制度里所包含的一切，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并且是公平合理的。虽然我一直对他的正统观念保留我的看法，我认为他这种行事方式表明他屈从于造物主的安排，因此也显示出一种基本上信教的精神本质。他那种有时被我称为“伊壁鸠鲁学说”的享乐主义可以被解释为顺应时势，教会却冠之以一个美丽动听的词藻：“克己忍让”。按照这种哲学，无论是家业衰败还是后继无人，先生都不觉得是种灾难。他坚信下一个世纪贵族不再有理由存在，坚信哪怕是有富人和科学家存在的情况下，人民也不会把他们当作楷模。坚信马克思主义（也许会改头换面、更名改姓）

将会成为本世纪的社会制度，至少在欧洲得到普及。不过，无需明说的是，在先生眼里，欧洲就是整个世界。世界对他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我对东方国家产生好奇心时，他曾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可以在这些国家见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对原始的感兴趣，在卡斯蒂利亚或者在意大利的某些村镇你会看到托钵僧和圣徒。就在巴黎，《埃尔娜妮》和像《悲惨世界》这样荒唐的小说的作者都是真正的圣徒，甚至可以用散文或诗歌来作出预言。然而，无论在非洲还是在印度，你都找不到一个普雷沃长老或者阿纳托尔·法朗士。”

尽管我觉得先生蔑视他所称为的“东方主义”是不公平的（正是从东方传来了《旧约》和《新约》），我不能否认他的话强烈地打动了。在任何一个国家甚至那些最高明的国度里，都有足以同非洲心脏地区的土著黑人相提并论的原始人。虽然先生想给予我精心的教育，我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发生在海梅身上的那场悲剧或那桩罪行就更说明问题了。你固然有一副慈悲心肠，如今我也明白，我当时那样做完全出于一种盲目的凶猛的冲动，不是一个野蛮人而是一头害兽的冲动。四十五岁以前一直很有教养很正派的摩尔小姐的例子，足以证明本性可以压倒文化以致达到何等的程度，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同时并存诸如英伦三岛和马达加斯加群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迥然不同的发展水平。人在自己身上就造成了世界的全部历史。

摩尔小姐没有离开，虽然她准知道没有人愿意见到她。

她在比恩镇一直呆到她不想呆的时候，因为有自由党州长的许可。她根本不在乎人们对她的敌意，带着一条奇特极了的狗，无所畏惧地继续她那孤独的漫步，颠倒吃饭睡觉的时间，记笔记写心得，不管谁的家她都要把头伸进门去张望一下，因为她太好奇了。总之，她的表现简直就像到了一个被征服的国家。

十六

我们旅行回来后不久，我确信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思维功能大大减退了。上天行事总是和谐平衡的。乍看起来，她宛若一位永远不该衰老的女人。当然，太阳似乎也该永不落山。但是，如果中午的阳光是灿烂的话，那么晚霞就是柔和的，夜色该是温软的了。

我记得在马赛见到一件奇怪的东西：电动的八音盒，同时又是一盏神奇的灯。灯在里面一亮，在一块不透明的大玻璃板上便会出现破晓时见到的那种美丽景致：在维苏威火山后面，朝霞微露。转瞬之间星球之王——太阳便冉冉升起，同时便响起一支优美的那不勒斯乐曲。树木苍翠，晴空如洗，大海似一面锦缎。太阳落山时，五彩缤纷的颜色也逐渐褪去。但阳光的消逝并不意味着美的消逝，现在是另一种美，同开始时完全不同的美。一切都隐在迷迷蒙蒙的软雾里，真是雾里看花。这时的音乐变得倦怠无力，断断

续续。中午的热闹时刻过去之后，是一片宁静的魅力，是休息的前奏。当太阳最终从左边彻底隐没时，音乐也停止了，曾经注视这场景观的灵魂会感到高尚和安慰，就像经历过事物完结的全过程一样。

先生夫妇的日子过得就像白天和黑夜那样融洽有致，我的生活呢也像他们的那样平静，不必担心到地狱里去受罪，以前我一想起堂安东尼奥就心惊肉跳，怕到地狱里下油锅。至于他夫人，我是毫不操心的。他们两人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她总是那样轻车熟路，丝毫不必担心她会迷路，会一事无成。相反，他总想发现新的领域，新的学说。有些圣徒和异教徒就是这样的。我无从知道后世将会如何评价比恩家族的这位最后骨血，我之所以说是最后的，那是因为在墨西哥的那支后继无人，而堂娜玛格达莱娜的兄弟又不愿结婚。我认为毋庸置疑的是，至少马略卡的历史（除了诗人之外，没出过多少作家，诗人倒有，而且不错）会有一些东西可写了。可是，是什么东西呢？科耶拉侯爵，这位宫廷议员，善于制造狂妄烟幕的大师，他的议员的光辉很可能会在一段时期里使先生的杰作黯然失色。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在帕尔马修的第一条街将取名为科耶拉而不是比恩。他并不为此伤心难过。由于他真正埋头写作，沉醉在工作中，他没有时间去难过。不过，我想，他的观点是那样客观，对这种是非颠倒的情况他能忍气吞声地接受吗？还有教廷呢？教会将如何评价先生呢？按他的说法，莱昂十三世对回忆录是基本同意的，直截了当地承认善与恶是

相反相成的。但必须弄清楚他是怎样提出问题的，教皇的原意又是什么。先生的杰作里虽然有不少下流的篇幅，但并未对任何教义作公开的指责。然而它的风格是诡诈的，我会像许多人那样被它所迷惑。只有上帝能明察秋毫，判断无误。

在最后几年里，先生夫妇在冬天起得很晚，因此每天早上十点之前望不成弥撒，而且很少到教堂去，而是在顶楼的小教堂里去望。雇工们自然不能参加，可是先生夫妇对此表现得心安理得。先生无所事事，除了教规限定的日子，他也不参加。我在客厅的壁炉旁边祈祷着等候夫人。我说过，那客厅很宽敞，有两座阳台向着花园。你简直无法想像那花园一派荒凉衰败的惨象。它是在一百多年前从树林里开辟出来的，近三十年来它又渐渐地重新变成树林的一部份。杂草树丛、圣栎树和野橄榄渐渐淹没了玫瑰和大丽花。夹竹桃在无人照料的情形下大难不死，勇敢地茁壮萌发着它的枝条，仿如一些在拳脚下长大的孩子，越是要吃苦受难，越是出落得英俊伶俐。这个花园在秋天曾经显得格外美丽（天哪，我用了“曾经”两字），灰色的雾气更衬出它的嫩绿，使它充满芬芳。雨天从壁炉边透过玻璃窗望去，更是如此。

“要不是因为那样做不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我根本不想动，连吃饭也不想去。真可惜你那位玛加里塔死了（她说“你那位”时并无任何恶意），托内特，她刚刚开始会弹钢琴啊。这会儿弹一点《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那有多好……”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从莫扎特的《费加罗之夜》里剽窃来的，其灵感来自博马舍的喜剧。”废寝忘食忙于写作的先生说。

夫人大惊小怪起来，她觉得这种结论未免轻率。

“你根据什么这样说？罗西尼要去抄袭两个陌生人的作品？托内特，你太爱说人家的坏话了。”

“你为什么说莫扎特和博马舍是陌生人呢？”

“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平静地回答。

当先生关在自己房里进行写作时，她总是和我促膝长谈。她已经很老了。不过，她脸上不时焕发出青春，流露出狡诈。这时她简直就像年轻了五十岁。有时候她真像个小女孩。对她这些神秘而又带些诗意的变化我不能不写上一笔。这件奇事发生在一个下午，堂安东尼奥说在那些现代化的剧场里，好的位置都被编上了号码。我们当时在花园里。夫人笑着朝他走过去：

“托内特，你怎么知道编了号呢？……”

先生正准备回答。夫人挨得更近了，笑容里充满狡诈和纯真，再一次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托内特？”

时光倒流，像一张照片底版那样停留在过去的某一时刻。

我昔时那种潜在的偏见，那种使我在塞纳河的一个小岛上对她说出一句不合体统的话（“我对您是一种耻辱”）的

潜在偏见，似乎一扫而光。现在她的脑力不济了，她的心倒显得质朴坦荡。

“胡安，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们家都经历过什么样的劫难？一场天灾把葡萄园全毁了，我们不得不借债……数目很大的债啊……而且还有不知多少亩的松林被烧光了。我已经记不清多少亩。有两年圣诞节我们连火鸡都没吃上。还有一次，过圣体节，我连新衣服都没穿。这我还记得，而且很清楚。你想想看，那时我刚满十五岁。现在我才明白，不吃火鸡不穿新衣服，大概是为了省些钱。现在我才这么想。我父母过去没这样对我讲过。公鸡倒是杀过，因为我们自家养得有。明明在城里有房子，却在比恩镇的别墅一连住了三年，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而我是比恩家族的骨血，是名门望族的心头肉……人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胡安。你怎么想的呢？也许你……”她打算谈我的童年，但她下意识地刹住了话头。“你瞧，都说住在镇上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从没得过病。在那些年月，士绅们都不愿承认自己没有生丁（她总改不了国内的这种习惯，一提到钱，哪怕是成百上千杜罗的大数目，也叫生丁），以为没人知道底细。比恩镇的别墅好凄清。你不觉得吗？只能看见教堂的灰墙。不过，我倒挺喜欢的。我想得很多，所以我常对自己说，我该同先生成婚，这样才能使两房的遗产重新合一。何况我们两人自小就在一起长大。糟糕的是表兄妹成亲生下来的孩子有时不是痴呆就是疯子。我们两人却没有子女。因此，胡安，我要终生感激上帝让我们的婚姻这么

圆满。我一想到我们什么都不缺，不欠谁一个生丁……”

我们没去想欠债的事。只有我心里清楚，为了不断支付典押的利息，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和先生在一起，我很幸福。不少别有用心的人说他喜欢姑娘，可这都是谎言。我们结婚时一起到巴黎去旅行。我还到过罗马、日内瓦，好像还去过葡萄牙。这个我不太有把握，我得问问。到塔霍，不是要经过里斯本吗？瞧，我是去过的。塔霍的水是绿的。里斯本有农人馆，还有世界上最好的马车陈列馆。你和我们一起到过罗马吧？我觉得好像是。先生同所有的车夫都吵遍了，他们没有一点儿礼貌。有一天，一个车夫还想拿刀捅死我们的马呢。威尼斯的船夫也很坏。在意大利我总是提心吊胆的，尽管表面上我强打精神。现在老了，我可以讲出来了。幸亏是和托内特一起去的。在罗马附近有座庙堂，里面有尊圣母像，你若拜她，她就赐你子嗣。我们去了，却没有孩子，看来我们不该有。若是非得生下痴呆和恶棍来，还不如不要的好……对吧？瞧瞧堂菲力普……”

从前那么果断、胸有成竹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如今说起话来常常用疑问的口气。她停顿了一下，我想趁机打听一下菲力普的事情。

“他真的是因为爱给玩偶穿衣服才疯的吗？”

“对。他十分喜欢年轻姑娘。但愿上帝宽恕他。”

她突然把话打住了，我再也未能从她嘴里多掏出一个字来。

十七

玛多·科洛玛，那位孤身独居的老太太，那些爱大惊小怪的人都说她迟早会被人害死。天亮后，人们发现她死在床脚边，似乎死于暴力。闻讯赶到的侄子们发现她的尸体尚有余温，杀人的动机显然不是谋财：屋里什么都不少，山羊、衣物和那条金链子都在，虽然金链子断了，它吊着的那块圣牌不知去向。这引起极大的恐慌。那些曾经草率地预测过这种罪行的人最为胆战心惊。对这样一个不会久于人世、和谁也无冤无仇的女人，谁会去谋害她呢？在本地，芭尔芭拉·蒂塔娜死了以后，就没有疯子了。可是，人们需要找出一个罪魁祸首来。恐慌过去之后，我获悉有人在传两个名字。头一个便是英国女画家。第二个呢（上帝可以作证，我听到以后毫不惊讶，因为我一直在担心这一类的事情），则是先生。

我们从未好好地问过自己，在世界上邪恶和愚蠢到底谁更有害。先生认为，说到底，邪恶可以说成是智力不足。我认为他的说法没有超出正统范围，因为真正同上帝作对总不是什么好买卖。就眼前这桩案子来说，我看主要应当归罪于无知。

“他天天晚上都不睡觉。”人们都这么说。

“他招神弄鬼。”

“他不参加弥撒。”

我可以担保，在教规指定的日子里他从未缺过弥撒，他甚至让人在卧室里（在最后的日子里由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一人独住）朝小教堂开一扇窗户，以便在生病时能看着做弥撒。这确实是在他的埃斯科里亚尔之行以后的事，在那里菲力普二世的阴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要叫历史和文学在他身上产生影响，似乎还须具备宗教信仰，我知道他是具备的，尽管是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至于指责他搞巫术活动，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他是个深受各种“光”的影响的人，他把狄德罗的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理智是盏十分微弱的灯光，巫师一来就给我把它吹灭了。”在慢慢将他吞没的一片反对声浪中，甚至有人指控他（不只是出于恶意，更是出于对事实的荒唐歪曲）放高利贷，其实是别人借贷给他，而且总是利息可观。

死者平常挂在脖子上的圣牌出现在离她家半里之遥的地方，用来包它的手帕经她亲属辨认确定是她的。法官先生在检查时发现，它根本不是什么圣牌，而是一块铜牌，上面有些无人能辨认的符号，似乎是东方的符号，大概是共济会的。这引起了纷纷议论。而且由于共济会的事一直被认为是邪恶晦气的事，天一黑便谁也不敢出家门了。不管是真是假，又有人重新要求州长把女画家撵走，虽然没人敢提撵走先生，但家里沾上的这块污点已难以擦掉了。玛多·科洛玛神秘的死亡，仿佛给我一种指示，一种预感。邪恶在虎视眈眈，会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平静的生

活和突然的变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来祈求上帝的庇护吧，我们只相信上帝的仁慈。我作为一个教士一直在宣扬的这条准则，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总是做得比我要好。

一听人谈到政治她就说：“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对这些事情操心。你们没瞧见，发生的都是该发生的事情吗？我看哪，要是大家只想今天的事情而不去考虑将来，事情就好办多啦。干吗为古巴的事情还要闹得天翻地覆地和人吵嘴？战争是一种罪过，何况人人都有输的时候。”

“当法国国王看到无力阻止诺曼底人的入侵时，不是顽强抵抗而是把诺曼底人的头目封为诺曼底公爵。不久，那些野蛮的家伙便适应了法国的习惯。”先生说。

“瞧见了吧？这个主意还不错。要是我呀，我也这么做。在诺曼底我们不是还看到过夏多布里昂的墓吗？”

“在英国，英国的圣马洛。”

“我还以为在诺曼底呢。”

同先生一样，对于我们所说的大事和小事她根本不予区别，她觉得都是一回事，而且往往对我们认为的小事格外重视。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堂安东尼奥为什么成天在那儿不停地写，“完全没有必要”。

“你的眼睛会瞎，会未老先衰。这都图的什么呀？是好让你的后辈开开心？世界上有那么多书……”

先生听她说到未老先衰，真有些忍俊不禁，因为他已是近八十高龄的人了。

“我是写你哪，玛丽娅·安东尼娅。”有一次先生对她说，
“我对我的作品的评价就像高乃依谈他的诗一样：

面对柔和的目光我倍感自豪，
哪怕千年之后你仍会使人欢畅。”

“啊，托内特，高乃依真相信千年之后还会有人读他的诗吗？更何况，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别人怎样看我同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

“说是一千年，实际是二百年或者一百五十年。”先生小声说，没有高乃依那么自信，“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玛丽娅·安东尼娅。现在我觉得它是那么灿烂，那么温柔，真想多活一些时候。就是这么回事。”

“我真想看看你写的东西，可是我简直认不出你写的字。你光是写我吗？谁也不写？”

“我也写别的女士，可实际上写的就是你。我从未欺骗过你……”

她吃惊地睁开眼睛。

“啊，托内特……”

“我说从未欺骗过你，指的是同我交往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像你。”

她沉默了一阵，仿佛在思索。

“既然是一回事，那你为什么还要欺骗我呢？……是不是你事先不知道呢？”

先生摇摇头。

“不是？”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穷追不舍，“事后也不知道吗？……可是，既然谈到这些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埃克西玛什么地方像我呢？”

“她那副好心肠。对我来说你们两人是一只盘子里的汤。”

“那贝纳尔女士呢？”

“她的脚和你的一模一样。”

“那个意大利女人呢？”

“她眨起眼来同你没有两样。”

由于他们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宜外人在场，我打算离开。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察觉了，狡黠地瞧我一眼，脸上绽出她三十岁时最美的笑容：

“胡安，你不觉得先生总爱开玩笑吗？”她怕我走，扯扯我的衣袖，“搬把椅子过来，帮我缠团线。给我讲讲报纸上都说些什么。你知道吗，我把圣诞节前的报纸当成昨天的看呢！”

回忆录确实是献给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先生写道：“我敢肯定，每次我欺骗（姑且这么说吧）她的时刻，我都在同我相好的那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她。”先生把这看作是婚姻幸福的象征。可是，有必要去做这种犯罪性质的证实吗？他自己作了回答：“一旦证实玛丽娅·安东尼娅在精神和心理上都是独特的女人，证实就成为多余。这就好像我们已经知道了体温，体温计就不必要了一样。可是因为要想知道体温，还是必须用体温计……别无他法。”我觉得，也

亲眼看到，他每这样经历一次，就越和他的妻子趋于一致。无论如何，我实难接受那种荒诞的说法：不能肯定费莱蒙是忠于鲍西丝的，恰恰因为他从未欺骗过她。

“这等于说光是黑暗的。”我顶了他一句。

“希腊人曾经证实雪是黑的。”他应道。

希腊人显然是诡辩学家。芝诺也证实运动是不存在的。莫非先生是位嘲笑一切的幽默家？虽然有种种表面的现象，如果真那么认为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他热爱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热爱为之献出自己半生的文学创作，丝毫也不像一个不信教的怀疑一切的人。更令我吃惊的是，他还相信乡下人的最无知的迷信。例如，他相信月圆月缺以及大气层各种变化的结果对人体健康及情绪的影响。也许这是因为他对官方科学缺乏诚意。

“整个医学都是巫术。如果它只是一门科学，那么医生就应该能够远距离给病人看病，如同一名工程师不必离开办公室就能建起一座桥一样。那就应该有专治头痛的药丸，专治咳嗽的药丸，等等。但是，头痛不止一种，而是有很多种，那得看是什么病引起的，而世界上的疾病数不胜数，和人一样多。医生每次看病都得‘猜’。不是总听到人说‘这个医生看得真准’吗？”

我趁他停顿时告诉他一些本地的流言，都是关于玛多·科洛玛之死，她挂在脖子上的圣牌以及先生的所谓巫术的。

“难道他们认为是我把她杀死的？”他冷冷地问我。

我有些手足无措，因为我没这样对他说过。

“都是些胡扯，先生，最好是连听都不要去听。”

“别信那些。真是太奇怪了。我倒真想知道，像我这样一个老百科全书派，到底是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慢变成一个危险的巫师的。”先生说。

天哪，我也真想知道呢。我谈到他卧房里午夜以后还亮着灯，庄园里用去的蜡烛，年终一算还是相当一大笔钱哩。他静静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说：

“对。有一点儿就够了……三百年前，一位已故的女修道院院长圣洁地显灵，对她的女儿们说她有罪。‘有一天，’她解释说，‘我双手合十作祈祷时，突然发现我的手很美……’”

我提醒他，教会不相信那次显灵。

“我知道。可是，有许多人相信，并且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来对一个只是夸耀了一下自己的手的可怜修女进行如此残酷的惩罚。玛多·科洛玛戴的圣牌，确实是共济会的。”

“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顿了一下，终于说：

“因为那是许多年前我送给她的。”

“送给玛多·科洛玛？”

先生忧伤地笑笑。

“那时玛多·科洛玛还年轻。而我呢，常常到法国去，在那儿加入了共济会。安静点儿，胡安，别沉着脸儿。我只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共济会会员。我不知道以前共济会是

什么样子的，我加入的那个却是太可笑了。科洛玛喜欢上了这块圣牌，我就连金链子一起送给了她。我还给了她那所茅屋。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

一阵巨大的沉寂，我不敢打破它。玛多·科洛玛，简直被认为是个圣女，难道也是个不正经的女人？先生像通常那样以敏锐的洞察力识破了我的心思，便想安慰我：

“别往坏处瞎想，胡安。”他慈祥地摸摸我的脖颈。“除了送过她圣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五十多年了，天哪……”他又重复了两次：“什么事也没有过，没有过……”然后他的声音变得极低，像是只说给他自己听，我似乎听到他加了一句：“……或者说，几乎没有过。”

我抬起头来。

“为什么那天我们在她家见到她时，您把她比作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呢？”

“你很懂礼貌，这能使你显出高贵的气派。很少有像你这样英俊健壮的男人们能够如此谦恭有礼。你呀，说来说去，到底还是年轻。”他说得很慢，刹那间我闪过一个想法，他不是说我年轻，本来是想说我不过是个佣人的。“时光会告诉你，一切都有些相似，而且一切都是必要的。”

我请求准许我离开，先生却指着一把椅子对我说：

“你坐下，听着。你从没问过我。大约二十多年前，夫人和我和好的时候，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有一段时期显得极端焦虑不安。谁也没发现，因为我们遮掩得很好。比恩镇出过一些神经失常的人。”堂菲力普十八世纪的形象，天

蓝色的骑兵制服，手握一枝玫瑰，宛如范洛画上的一般，显得英俊潇洒。“她签字的时候，总是写成埃克西玛。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她开始狂躁，最后变成神经衰弱。城里的医生束手无策，我便决定给查科特写信，把情况从头至尾详详细细的告诉他，包括由于互相认识并且总去巴黎而对堂娜埃克西玛和我略有所闻的那些事情。我还把夫人的照片寄去了，一张正面的，一张侧面的。查科特回信说（我早就料到的）我妻子的失常是由于精神受到打击（英语叫“休克”），还说（这我却没料到）病人怕失去我，便觉得自己就是外甥女了，‘她和外甥女形体相似，精神合拍，就像底片和照片一样。’”

“您相信这些说法吗？”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她也没那么多顾忌了。你没看见嘛，她自己亲自问我她和堂娜埃克西玛到底像在什么地方。”先生答。

“这位巴黎医生不见病人就敢诊断，尽管是在巴黎念的书，他也必定是位十分轻率的人。”

先生瞧瞧我，然后以十分地道的比恩人的方式平静地说：

“明天如果不下雨，我们可以去打棕鸟。”

我站起来，这一次他没拦我。我需要休息和祈祷。随着时光的推移，正如堂安东尼奥所说的那样，矛盾之中有那么多相似、统一的东西，我仿佛看到了回到东方宿命论的危险。

那桩罪案，那些神秘，那些混乱，同比恩镇表面的宁静形成强烈的反差，使我有一种预感。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不是一种总动员的前奏呢？先生刚刚向我表示只愿谈棕鸟了。哪怕是他不转移话题，那天下午我也不会问他，是否相信上帝和魔鬼是一致的。因为我怕他给我一个胡说八道的、荒诞而又断然的回答。

十八

有时我觉得我对他不公平，可一想到捉摸不透他，我又大伤脑筋。我把他最后的一些古怪言行归咎于他年事已高，我心里还是得不到一些安慰。他越来越聪明，随着激情的减弱，他对人和事物的了解却日臻完善。因此，他的错误便益发难以原谅。我觉得，他最后几年的平静更显得是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这和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恰恰相反。她垂着暮老的情形（比先生那有些古怪的智力高峰更为人道一些）被丈夫怀着柔情带着嘲讽看在眼里，可是对教士来说也是一种快意。

“今天的报纸真有意思。”有时我们吃早饭时她对我说。“你知道都登了些什么东西吗？《登上月球是可能的》，《一条狗救了游客的命》，《伊斯兰教国家的女人身价昂贵》。我是说，所有这些我都要看看。”

然后她又不看那些报纸，或者是因为忘了，或者是因

为她自己在那儿想当然。挨着有壁炉的大客厅的卧房的舒适，使她十分知足。

“这儿我要什么有什么，什么也不缺。”她常这样说。想不出什么更重要的事来说时，她便会拉开窗帘：“瞧，这儿有根横杆，最方便不过了。”

她甚至乐陶陶地说她解决了把圆变成正方形的难题。

“你们觉得这个真是那么难吗？我看用不着去请希腊的什么学者。在一块板上用线摆个圆，再用四根别针慢慢拉这根线，直到把它拉成一个方块……”

她的真知灼见超越了理论和理想方面的困难。到她临死时，她已经完全垮了，甚至说出一些凄凉骇人的话来。我不知道先生的怀疑主义是否同她这种反常有关。

“胡安，我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比恩家族的人。天哪，出过多少事情啊……我是我父母的女儿，因为我母亲是个正经体面的人。但是，对于祖辈我知道什么呢？有那么多传闻……先生肯定读过家谱的档案，只是他不说而已……他太口是心非了……”

我们在那快要变成野林子的花园里。那天早上雾气濛濛。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靠着我的臂膊，深情地望我一眼。她是昏了头呢，还是故作卑贱以免我感到屈辱呢？也许，她以为自己死亡将至，想在自己的灵魂里保留那种曾经给过我的亲情（毕竟是很人道的）。另一方面，她也变得有些倔强，对那些不公平的事愤慨满胸，不时地对丈夫的客观性表示毫不妥协。我记得她因为土耳其皇帝的事而最后——

次大发脾气的情景。

“土耳其皇帝有一种特殊的礼节。”先生对我讲。“当一名大使要求接见时，皇帝便把大臣叫来，对他说：‘给这位大使喂点吃的给点穿的。’然后命令说：‘让这条狗过来。’”

在壁炉旁边似乎睡着了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一下子抬起头来。

“托内特，你把这个也叫做礼节？可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玩艺儿呢，能告诉我吗？我不信，永远也不会相信，一国之主，尽管是个异教徒，竟然会说出这么难听的话来。如果他真的这么说了，你也不该重复。我不信，我就是不信。”

她气得满面通红，我们只好转移她的注意力，谈起罗马来。

“托内特，那是怎么回事，我没和你们一起去见教皇？”

“因为你感冒了。”先生泰然自若地说。

“我记得。真遗憾。”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尾声，除了我刚刚讲到的少见的出格之外，她的生活越来越显得平静。我说过玛多·科洛玛之死，在这山区里是一种正在筹划的结局的前奏吗？放马后炮是轻而易举的事。真正的情况是那几个月平静得出奇。最后一个冬天（上帝啊，你的安排真是高深莫测）是这儿有史以来最温和的冬天。在本书第二部份开头我就指出，当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放松自己时，由于做得十分有节制，她的杂乱无章也会显得像一种新的秩序。先生夫妇越

来越起得晚，作息时间乱了套，早饭几乎到午饭时间才吃，午饭则推迟到午后，也就是以前夫人喝茶吃饼干的时间，这样一来，要么取消点心，要么取消晚饭。时间从我们的指缝里溜走了，我们既未离开楼上的房间，也未接待什么来访的客人，却总感到时间不够。

我是在直角形大厅给你写这些的。大厅左侧通先生的卧房，右侧通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卧房。我说过，直角两边面对门厅的最长那面墙是壁炉，壁炉两侧各有一个阳台对着花园。米格尔，我必须提醒你，这是故事结尾的点缀。九点钟，托梅乌（为不影响他干地里的活，有时是我）生着了壁炉。然后我就去干我的神职工作，直到先生起床。壁炉上方是一面方形大镜子，镜框是古典式的，使人想起特里亚农的装饰或者蒙克洛亚别墅的装饰。镜子正对门厅，一个人在壁炉前烤火，不必回头就能知道进来的是谁。同时，透过装有玻璃的阳台可以看到正在变成野林子的花园，用不着挨淋，用不着受外面的寒冷，便能远远地看到是否下雨。大厅三扇豪华的门和阳台都有黄缎子的窗帘。蓝色的椅子都有法国式的弹簧。你一定会奇怪，先生夫妇天天就住在这样的大厅里。我曾想劝说他们搬到被当作藏书室前厅的小屋里去住，那儿的椅子是藤条的，没有蓝缎子的那么精致，因为先生有个怪癖，总爱把墨水弄得到处都是。我未能办到。现在我觉得他们做得对，没有子女，又想保持自己的矜持，理当享受属于自己的舒适。因为，米格尔，你应该知道，就在这间大厅里他们差点儿忍

饥挨饿。早在几个月之前，比恩庄上就只有蚕豆可吃了，我们和雇工佣人吃的一样，先生夫妇只多一盘点心或一杯陈酒，那是我费尽心机给先生夫妇弄来的。

我一边祈祷，一边为他们的起身做些准备，他们还在睡梦中就感觉到了。

“时钟响过九点了吧，托内特？”从左边传来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还未醒过来的声音。

“好像响过一阵子了。”先生的声音从右边回答。

一片静寂。过了一会儿，只听夫人低声自语，似乎又生气又高兴。

“啊，天哪……时钟跑得多快呀……躺在床上有多舒服……魔鬼诱惑我们变懒惰……啊，我的天哪……没法子，只好起来啦……”

听得见瓶子碰到大理石床头柜的响声，然后飘来一股香水味儿。夫人用香水擦着两颊，以便完全清醒过来。壁炉上的镜子映出修长、黝黑的托梅乌走过来，靠近右边那扇门。

“先生，想喝咖啡吗？”

“喝咖啡”的说法（是一种方言）是我们未能给他纠正过来的一种毛病。“牲口才‘喝咖啡’，”先生总是对他说。“人是‘用’咖啡。用咖啡，用牛奶。看看什么时候你才能记得住。”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们已经放弃要求他改正了。

“进来，托梅乌。天气怎么样？”

“下雨呢。”托梅乌说。

他双手捧着杯子就像托着几十公斤重的东西从右边消失了。他那非洲式的鬃头发和黑皮肤，似乎是马略卡酷热的阳光透进卧室，全存到托梅乌身上去了。卡特丽娜向左边的门走去，问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要不要早饭。

“噢，我还没吃早餐？我以为你给我送过巧克力鸡蛋卷了。”

“没有，夫人。那是昨天。”

“昨天？”

“还有蛋卷。我给您送上来吗？”

“进来，把阳台打开。我想我要蛋卷了。我的闺女，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想要呢？”

托梅乌简短地向先生汇报当天的情况。

“那头小母骡发脾气，干草不吃，苜蓿也不吃。”

“那它要什么？”

“它只吃粮食。”

“这头母骡真够娇气的。进来吧，把窗户打开。”

金黄头发、皮肤白皙的卡特丽娜端着给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早餐飘然而至，她一边把托盘端到夫人面前，一边笑容可掬地问夫人，尽管离狂欢节还有好几个星期：

“夫人，您准许我参加化妆舞会吗？”

“比那些绅士还要狡猾还要坏。”从右边传来托梅乌铿锵的男声。“都怪您，还给它糖块吃呢。”

“怪你，你不拉它出去溜溜。”

“因为您不愿意我揍它。”

“你愿意让别人揍你吗？”

“假如我该揍，那当然是的，先生。”

“说得好。那你就当心些。”

一阵停顿，我又专心致志地祈祷起来。

“那你喜欢化妆成什么呢？”夫人问，“你要是愿意，我把我的结婚礼服给你。你瞧，我不要蛋卷。”她忘了蛋卷是她要的，“告诉托梅乌，让先生替我吃了它。”

卡塔利娜故意十分神秘地说：

“夫人，先生什么都不吃，光喝咖啡。”

她爱上了托梅乌，而且已经没办法让她改正错误的说法。通过这对恋人的手，蛋卷到了堂安东尼奥卧室里。在一片沉默中，我辨出先生低沉而清晰的声音：

“蛋卷？我连想都没想。你自己吃了它，什么也别说。快点，夫人马上就要叫你了。现在她要问你天气怎么样了。”

“托梅乌，天气怎么样？”堂娜玛丽娅·安东尼亚叫道。

卡塔利娜企图帮她的心上人一把。

“下雨啦，夫人。”

“我没问你。我想听托梅乌回答。他是哑巴啦？天哪，多不幸。我们该派人去请个城里的医生来。”她顿了一下，像演戏似地自言自语道：“都以为我是傻子，我还没那么蠢，还没老到不中用的地步。”

她有时候十分清醒。

“瞧，我们没什么问题，一个问题也没有……”她对我说。

刚过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用她那从罗马回来后就已习惯使用的疑问口气说：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她这样说并非出于害怕，而是希望我们肯定地给予相反的答复。当时感到害怕的是我。再明显不过的是，日子过得这么幸福，准有什么可怕的事在等着我们。如果它自身不出现，那就会由我们自己造成悲剧。不幸将会怎样降到我们头上呢？疾病，不和，战争，还是彻底的破产？达摩克里斯的剑不仅威胁着暴君：整个人类生活在邪恶的恐怖中，而这对于获得永恒的解脱似乎是必要的。

十九

壁炉旁边漫长的时刻……他们的生活过得多么甜蜜，简直像永恒的安息，我不是指葬在墓里的那种宁静，而是指那些得天独厚的少数人的洪福。回忆有时像天空，像金碧辉煌的客厅阳台北面高耸的普依格山那样雾气濛濛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把日期、外出旅行及发生过的事情全都记混淆了，因此她讲述事情总带有朦胧诗的味道。先生常常帮她纠正错误，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这又使我从另一方面感受到按照毕达哥拉斯的说法脱胎于数字和星星的诗。面对普依格山，面对那两个力图挽留时光以求得永恒的生命，迷雾不时地把它的帘幕拉上又打开。先生多

次对我说过，没有什么比常规的东西更绝对的了，保存在梅乌顿的白金米尺也正因为这个道理才成为我们所确定的米尺。人类再一次成为宇宙的创造者。他认为那些记忆、旅行和事件其实是想象的结果。

“事实上谁也没有看见明星广场和从那里通向四面八方的十二条放射形街道。只有设计它的建筑师能看到它，在一张铅笔画的图纸上加以想像。站在广场上的人想看它却看不到全貌，只能看到它毫不连贯的局部。只有闭上眼睛明星广场才是美的。”他总这么说。

我垂下自己的眼皮，回想着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底层的炉子旁边，先生看到了身穿一袭白衣的堂娜埃克西玛怎样走进剧院的一个包厢。“就是说，托内特，”那位有罪过的女人喃喃地说，“你只有离得远远地闭上眼睛才能看清楚我吗？”

米格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与先生夫妇曾经住过多年并且我还将继续住下去的这间大厅，已经面目全非了。当我再次环视它时我已经无法辨认它了，只有夜深人静或者凌晨的时刻，我才能在孤寂的房间里重新想像到它过去的样子，重新在梦里听到那逝去多时的先生夫妇的对话：

“托内特，皇宫里的那只雉鸡是谁向我们收的钱？”

“是维福餐馆。里面装潢全是红色。”

“托梅乌说那头小母骡不愿吃东西。”

“我信不过威尼斯的船夫。”

“罗西尼剽窃莫扎特的作品。”

“你怎么知道的，托内特，你怎么知道椅子编了号？”

普依格山阴云密布，暴风雨的前兆使紧闭的客厅显得更加宁静。

“是下雨的时候了，我们该用壁炉啦。”先生说。

我睁开眼睛想吩咐托梅乌添柴，一下子又回到现实里：从此再也不必生壁炉了。我又昏昏入睡，那些可爱的幻影超越了时间又在我面前谈起话来：

“……现在你愿意听一曲《曼农》吗？”

“霍亨索伦从来就不是国王。”

“我不认识他们，所以我才对他们那么客气……”

“胡安，给他们举行婚礼吧。”

“……一想到我们不欠谁一个生丁我就很满意。”

“十二点了。我们来念福哉玛利亚好吗？”

“点蜡烛吧。”

我们在那里用完午饭以后，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又打起瞌睡来。我趁机要先生履行教规。

“您有多长时间没有忏悔啦？”

“按照我们所说的忏悔，那我是没有间断过。另外，我的回忆录是尽可能准确如实的。”

我对他指出，忏悔不是简单的罗列犯过的错误，而是要有痛苦之心悔过之意。他滑得简直像条鱼。

“像我这把年纪？现在你还想叫我同一个外甥女去巴黎吗？”

“不过，要是你年轻三十或者四十岁呢？”

“年轻四十岁……噢，亲爱的，有些事你是想像不出的……”

“我呀，先生，我从小就被关进神学院里。”

先生瞧了我一眼，从椅子上慢慢直起身来。

“我明白我自己是个利己主义者，可是要我替别人设身处地实在不容易。因此，我永远也成不了我最喜欢当的人：一名好小说家。我难以想像像你这么一个男子汉，又强壮又年轻，身材那么匀称……”先生说。

他不是头一次提及我的体格优势，我觉得必须打断他：

“您忘了我是个教士。”

他抓住我一条胳膊，用力摸起来，仿佛要给我做按摩似的。

“我相信你是个真诚的人。人总能学到新的东西，哪怕就是到了八十岁，我的孩子。”他说着松开了我的胳膊。

我觉得他是那样得意，乃至我都不敢对他说什么。我们两人都在想那场轩然大波，想那位曾几何时轰动世界之都的光艳照人的绝代佳人。

“你知道皇上把明星广场附近的一座旅馆赐给了她。她把坎波·福米奥弄得倾家荡产。这两大胜利都为时不久，不到一年帝国就垮了。”

“您最后一次在巴黎时，就没想她吗？”

“我尽量没去想。我们已经好久互不通信了。”

我十分惊讶，因为我一直以为，打同夫人和好以后，他

又给她写信了。他猜到了我吃惊的原因。

“她偶尔给我写写信，告诉我一些消息，向我要钱。那些革命派一把火烧光了土伊勒里宫和明星旅馆。我在回忆录里写了她离开巴黎的情况。你猜不出她是怎么逃脱的吗？……她是同欧仁妮·德·蒙蒂霍一起逃走的。这件事尚未公开，出于对欧仁妮的敬意，也不宜传播，她是阿尔巴家族的婶婶。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今日的闲话将会成为历史。”

我还是感到惊奇。先生继续往下讲：

“这事只能在你我之间说，皇后当时怕得要死。她不想离开土伊勒里宫，可那是因为她走投无路，‘公社’的人把皇宫包围了。这时，埃克西玛来了，她们乔装打扮，从圣日耳曼广场溜出去，乘上一辆马车，到了皇后的牙医：一位美国人伊文斯家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已经载入史册。史册里没有讲到的，只是伊文斯把她们救出巴黎并非出于对欧仁妮皇后的忠心，而是因为他是堂娜埃克西玛的情人。这一点，胡安，眼下可是一个字也不能透。”

“可是，皇后……”

“她什么都知道，”先生打断我的话。“她们都是人间的奇迹。”

然后，他第一百次开始对我讲《浮士德》的首演，讲古诺的荣耀。

“在我们这个音乐家辈出的时代，人们会说古诺不是什么革新者。对我来说，这种说法无足轻重。古诺富有灵感，构思巧妙，善于利用别人提供的素材。瓦格纳无疑在许多

方面都有新意，却不如他裁剪适度，虽然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则不可收拾，却不懂得去掉多余累赘的部份。有些人把这称作天才，我则称之为蠢才。面对像小特里亚农这样巧夺天工的大厦，想一想加布列尔为什么连一根柱子一块玻璃都没有使用，这有什么要紧呢？正是因为所有那些材料早已被发明出来，早就很熟悉，所以加布列尔使用起来才那么得心应手。”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睁开眼睛。

“别说那些工程好不好？我不喜欢见泥瓦匠，因为他们把到处都弄得尽是灰尘。”

“那我们就谈谈歌剧。”

她含嗔带笑地不让自己的丈夫讲下去：

“托内特，托内特……我不爱听你谈歌剧。”

“你别又跟我来老一套了。”

“老一套？我可不知道这一套是不是老了。”

“你不觉得我们都已经相当老了吗？”

她很快又陷入迷糊的梦境，一边喃喃低语：

“我已经知道他后悔了……因为他已经山穷水尽……”

二十

狂欢节的星期天，经过使我内心动荡不宁的一个星期以后，不幸终于具体化了：有人散布消息说堂娜埃克西玛

刚刚来到城里。我托辞说要去本堂神父先生，急急赶去。天下着雨，路上积水成河。可以说我问遍了所有的邻居，结果是越问越糊涂。过路的客商带着消息瞬间便消失了，无法知道他们到底去赶哪个集。他们这么一传，消息就走了样。两个老太婆对我说，她是先生夫妇的一位穷亲戚，别人又说是法国皇后。

我痛苦地回来了。尽管消息矛盾百出，显然她就是堂娜埃克西玛。整整一夜我都未能合眼。现在她会是什么样子呢？在巴黎我曾梦见她不同的样子，后来她就化作一位太太倒在圣罗什教堂前面。“我欠了二十四法郎的房钱，”她对我说。她穿着一双旧鞋，鞋跟都歪了。我看见她的布袋子里露出一些莴苣叶子。法国皇后……一个女乞丐……就是她。假定她决意回马略卡的话，显然她是想见见先生夫妇。五十岁了，该她来玩一出后悔的闹剧啦。可是，我有权猜度她的后悔一定就是闹剧吗？我们当代最伟大的一位诗人曾经写下令人心碎的怀疑主义的诗句：

激情熄灭之后，
我惊奇地看到它们
变成基督教的品格和美德。

诗人的全部聪明才智也磨灭不了这样的事实：确实存在真正悔过的罪人，并得到上天的宽恕。一般来说，上天的宽恕总是在人死去之后才姗姗来迟，这又成了不信教者的笑料；但是，教徒们都知道肉体是暂时的，灵魂才是永

恒的。

星期一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骄阳像盛夏时那般耀眼酷热。我起了床，心如止水。痛苦已深深埋在我心里，什么都不可能使我激动。我相信上帝的意志。我打开窗户，把头探向窗外。卡塔利娜和托梅乌正在院里聊天。

“夫人说我们应当化妆成新郎新娘，”姑娘说。

“你就会信口胡说。”托梅乌顶她，“先生已经知道我不得不开那个玩笑。真让我难堪。”

“你以为他不知道你的底细吗？”

“他当然不知道。”

“你当心点儿。他会把你当成一个漂亮小姐的。”

“漂亮不漂亮，我蒙上脸能让他乐一阵子。”

“瞧你这双手，还有这两个肩头……趁你现在还有柳条细腰。”

“滚你的吧。别烦我了。”

我想起卡塔利娜曾经神秘地把托梅乌的打算都告诉了夫人。

“不，我不愿意拿他开心。”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回答她，“这还不到时候，现在他很安静……你为什么不化妆成新娘呢？你穿上我的结婚礼服，到院子里转一圈去。我在上面看着你们。”

她这番好心的话有些冒失。先生一眼就看穿了这套把戏，他当着我的面训那小伙子：

“你对卡塔利娜可得留点神，回头她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的，我可不愿意知道这些……”

“我向您起誓……”

“别起誓了。你总是那么大大咧咧，连门都不知道关。”

这简直是含蓄地同意他们尽可以胡来。幸亏托梅乌缺少悟性，还不明白这一点。但他天生就爱为所欲为，不管准许不准许。不止一次我只好去告诉先生，但是正如先生刚刚所说，他不想知道那么多。

没过多久，尽管不情愿，先生还是什么都知道了，因为闭上眼睛不等于看不见。我们坐在壁炉旁边，夫人带着卡塔利娜走进来。

“看看你们认不认识这位新娘，她是来看我们的。你们必须从头到脚仔细地看看她。”

她很漂亮。一身白色礼服，目光低垂，一副纯洁的样子。她那金色头发上的橙子花环比不上她的皮肤白。先生打量了她一阵子，突然说：

“我觉得你的衣服在地上拖得太长了。”

“托内特，这是我的衣服。”夫人答道，“你不记得啦？”

“亲爱的，我非得记着吗？托梅乌呢，他在哪儿？”

姑娘低下了眼皮。先生开心起来。

“喂，你若是没有新郎的话……”

“我不需要什么新郎。”姑娘答道。

“你可别这样说，别以为我不知道……”

姑娘差点儿哭出来。她又伤心又生气。堂娜玛丽娅·安东尼亚赶紧插话；

“托内特，你别难为她了。

“难为她？让她干事正经些吧。”先生悄声嘀咕。

姑娘放声号啕起来。

“托内特，看见你干的好事了吧？我真不明白，你干嘛要去招惹这孩子。”

“那好吧，我要责备她的话，我就用英语说：像样点儿，假如办不到的话，就当心些。”

先生说完就出去了。卡塔利娜简直要神经错乱了；她哭得呼天抢地。

“胡安，我实在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茫然无措地叫起来，“你呢？”

“我懂，夫人，”我难过地回答，“不过我现在不能给您翻译。”

夫人不耐烦起来。

“好啦，别哭了。你听都没听懂，哭什么呢？”

“我太懂啦！”卡塔利娜嚷起来。

“可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别以为他不知道……这全是瞎说。”

姑娘像孩子似的直跺脚。花环从头上掉下来。

“先生说的根本不是真的！”

“可是，傻瓜，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

这时托梅乌进来了。

“过来，托梅乌。”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

新娘子简直像发疯似的嚷起来；

“别叫他！我不想看到他！”

夫人见她歪着脖子。她是那么脆弱那么细小，仿佛是一只旧的玩偶。

“唉！这是什么样子嘛！”夫人平静地说，“我让你穿我的结婚礼服就为的这个吗？真是不知好歹……胡安，”她把脸对着我说，“你陪这小蠢驴到棚里去，叫厨娘到我这里来。她该有三天没见我，再也不给我送早餐来了。”

真的，我的天哪，再也不必给她送早餐来了。我把姑娘送到厨房，向托梅乌走去，把他拉到一旁问：

“说吧。现在该你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不可能的。”

先生微笑着从他的房门口探出头来。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已经不见了。

“我什么也没干啊。”托梅乌喃喃地说。

“谁说你干什么啦？”

“好吧，让我们知道一下你起誓的事吧。”先生说。

“我……”

先生似乎很开心。

“胡安，盘问盘问他。我真想知道……”

我突然点到了要害：

“你和卡塔利娜之间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也没有。”

“那么她为什么哭呢？”

“我不知道。”

“你也没猜出为什么吗？”

“没有。”

先生坐到灯前。

“胡安，”他剪着烛花说，“也许这个蠢货确实不知道。不过，以防万一，”他冲着托梅乌说，“你们最好结婚。胡安，给他们主持婚礼。”

“可是……”

“现在你没看见他们是没喝喜酒先进了洞房了吗？”

先生眼睛里闪过一种奇怪的令人茫然的狡黠。他在本子上记了些什麼，一招手让我跟他出去。（后来他记的东西都被涂掉了，我连一个字也未辨认出来。）我把托梅乌带到一间小屋里，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什么也没问出来。

“那好吧，你愿意同她成亲吗？”我最后说。

“她说我们没有衣服。”这是他的回答。

我见他这么愚蠢，这么无知，或者说这么坏，我绝望了。

“如果你们生出一个孩子来呢？”

“也许不会。”托梅乌说。

“啊！那就是说……？”

但他什么也不愿说，一点儿也不说。我瞧瞧他。他很漂亮，高大匀称，黑黑的皮肤，刚毅果敢，卷曲的黑发盖到额头。他越变得漂亮，就越显得愚蠢。这使人想起胸像与狐狸的寓言。（十五天以后，印加来的医生澄清了我的疑问，我立即主持了他们的婚礼。）这时，夫人进来了。

“你为什么还没有化妆呢？”她说，“啊，天哪，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敢这样蓬头散发的来见我，你像个什么样啊。现在我才明白卡塔利娜不愿听见你的名字。你走吧，不梳理打扮好别来见我。”

她说完这些话，便向我提议玩纸牌。

“我觉得先生玩牌时老捣鬼。不能太相信他，最糟的是他还振振有词，让你把白的当成黑的。我太了解他了，你不知道。小时候有一次他吻了我一下。你看他坏不坏。我从来没讲过这件事。那是在一条走廊里……”

先生坐在沙发里打瞌睡，似乎没听我们说话。这时他像说梦话似地呢喃着：

“亲嘴通常都是在走廊上……”

她接着说：

“他常常到比恩别墅来同我玩。他又黑又小又坏。我真不知自己爱上他哪一点了，胡安。当然，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两家就决定要我们结婚了。由于财产都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人们都说我们要是不结婚，就得吃一场可怕的官司，到头来大家都两手空空。瞧瞧这有多荒唐，非得要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可你知道许多贵族都这么干。何况，比恩别墅和庄园重新合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弄不懂，要好好想一想。一旦死了，又没留下子女……”

我觉得她没必要为子嗣的事瞎操心，因为那些债主会把一切都占去的。

“另外，我不同他结婚又和谁结婚呢？我们过得很幸福。

那么长时间里，我们从未闹过什么大的别扭。他太好了，尤其是现在。你瞧，上帝安排得有多好，我们老了就让我们都变好了，互相都有照应。我觉得托内特能升天享福，对吧？你怎么看呢？”

这是她在和我谈话时，头一次直呼她丈夫的名字而不称先生。她奇怪地望着我，目光里含着一种急切感。她需要别人安慰她。假如不这样做，我觉得那简直是犯罪。

“先生是个好人。”我答道。

她只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但是人人都有过失。他对自己的过失会悔过吗？”

这个问题使我难过。

“是的，夫人。”我说。

她兴奋得脸上放出异采。

“瞧！这样一切都可以抹掉，我们就能死得安心。这才是重要的。我只祈求上帝让我们一起死。”

先生早就在沙发那打起瞌睡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怀疑他是在装睡。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她笑了。

“托内特，你听见我们说的话了吗？”

他轻轻打着呼噜，毫无疑问他是醒着的。

“他没听见我们说话，”夫人说。“今天我已经守完了九日斋，求上帝保佑我们好死，因为我们活不了多少日子啦。”

我说他们身体都很好，还可以活许多年。

“这得看上帝的意志了，”她答道，“我现在活干得少，少得等于什么都没干。玩玩纸牌，这是一种毛病，到花园里走走，祈祷祈祷……啊，我的天哪……我不知道多少年前就开始织这条床罩了，大概是同托内特和好的时候。”她第二次直呼托内特的名字。“看看我在死之前能不能把它织完。”

她始终没有把床罩织完。她再也没有去碰它，但是上帝满足了她的请求，让她与丈夫一起离开了世界。

二十一

临近中午时又下起雨来，午饭后我们都躲到壁炉旁，先生夫妇在那里蒙蒙眈眈地睡着了。我打开《日课经》准备祈祷。我不时抬起头聆听这一片静寂，这片静寂如此奇妙，奇妙得随时都可以驱除晦气。“假如你拥有财富，”肯皮斯说，“别因此而沾沾自喜，财富总有尽时。应该为拥有上帝而自豪，因为上帝赏赐一切。”我期待着这种静寂被打破，我相信一定会这样的。所以，当楼下传来喊声时我丝毫也不惊奇：

“堂胡安，有人来找。”

我划了十字，离开大厅。楼下堂娜埃克西玛等在那里，可那是副什么模样啊！她浑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一双鞋上沾满泥巴。她比我在巴黎圣罗什见到的时候消瘦多了。乍

一看，她显得苗条了，似乎也年轻了，可她已经一无所有。她脸上有疱疹似的红斑。她一见我，想强装笑脸：

“这是出乎你意料的造访，胡安。舅父舅母好吗？”

我怔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我总算找到了话来说：

“您是步行来的……”

她不合适地向我飞了个媚眼，仿佛她还以为自己是个迷人的女人。

“走来的。”她用英语说。“我把马留在镇上了，免得车夫们也挨淋。我很喜欢雨。”她哼起小调来：

“雨啊雨，牧羊女，

快抓住你的白色羊羔……”

她化妆得很浓。说起话来极不连贯，歪着嘴比划，好像神经有毛病。在二十年前当她还年轻漂亮之时，恰恰是那种反复多变和缺乏常识使她令人着迷(使我们被感官所驱使)并跻身于第二帝国的法国上流社会。她一笑，嘴部就痉挛得很厉害，表情便显得十分痛苦。

“请您等一下，我去告诉先生和夫人。”

堂安东尼奥已经醒了，奇怪地望着我。我的脸色一定有些反常。

“出什么事了吗，胡安？”先生问。

“楼下有人来找，是堂娜埃克西玛。”

“你说什么？堂娜埃克西玛？”

我示意他小声点儿，并且指了指夫人。

“不，不。还是让她知道的好。现在还有什么好遮掩的呢？玛丽娅·安东尼娅，埃克西玛在楼下呢。”

夫人突然惊醒过来。我看见她的脸色顿时大变，样子很吓人，所有肌肉一下子又松弛下来。我从没想到过一张面孔会这样变化。

“啊，托内特，”她的声音尖厉刺耳，使我觉得很陌生，“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你说了算。”

“啊，多么不幸啊！最糟糕不过了。他们已经告诉我了，想同你开个玩笑……”

“可是……”

“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多安静……呆在家里，用不着离开这个山区……”

她眼里满含着泪水。先生瞧瞧她又瞧瞧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到了我们这种年纪……”

年华流逝，企图冲刷掉他生活中的奇妙之处，而此刻妙不可言的东西却要报复，要给他一个无法理解而又确凿无疑的结局。为什么堂娜玛丽娅却像事先有所觉察似的？诚然，这是实实在在的结局。唯有上帝才是永恒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完结的时候，现在完结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夫人挨近她的丈夫，显得弱不禁风，小巧玲珑。

“他们又要把你带到巴黎去吗？”她小声地问。

先生怜爱地吻吻她。

“胡安，告诉她，让她走吧。她是走来的吗？”

“是的，先生。而且是冒着大雨。”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止住哭。她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津津乐道于细微琐事。

“走来的？那她要那么多马车要那么多仆人干什么呢？”

“马车？”先生说，“她现在可是一贫如洗了，你不知道吗？”

“埃克西玛一贫如洗？不，我不知道。托内特，倾家荡产的不是我们吗？她是怎么啦？”

“可我们不是已经议论过不知多少次了嘛……共产党人烧了她的房子，皇帝也死啦。坎波·福米奥……”

“噢，可怜的埃克西玛，我真是一无所知。胡安，你知道吗？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她淋湿了吗？”

“全身上下都淋透了。”

“这可太糟糕了，让她上来暖和暖和。”

“你要她上来？”先生问。

“那我们把她搬在门厅里吗？让他们拿瓶雪利酒和一块蛋糕来。一贫如洗？我真的不知道。马略卡最有风度最美的女人。啊，我的天哪……”

忽然间，她的伤感一扫而光，她把一只手按到丈夫的背上。

“亲爱的，你的眼光总是那么不凡。”

我让堂娜埃克西玛进来，便去祈祷了。但我怎么也专不了心来祈祷。半小时后，当我回来想看看他们是否需要

什么的时候，发现他们三人心满意足地在炉火旁边一起交谈。他们面前的小桌上摆着酒和蛋卷。他们在谈巴黎。

“那个十分有名的餐馆还在吗？……我已经记不得了……它叫什么餐馆来着，托内特？”夫人问。“就在卢浮宫旁边。你不知道？我们要了雉鸡，他们是用它的羽毛给我们端上来的……”

“叫维福餐馆，在皇宫大厦。”先生答道。

“那儿有两名侍者，是孪生兄弟，长得很俊。”

“什么孪生兄弟！穿一样的衣服罢了。”

“发式和衣服都一样，是礼服。他们还在那里服务吗？”

堂娜埃克西玛端着一杯酒，笑了起来

“这个么，如果真长得那么俊的话，我想他们是不愁没地方服务的……”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似乎没有觉察到这种别有用意的回答。她忽然问道：

“告诉我，皇帝真的死啦？”

外甥女一下子怔住了。先生微笑着帮她解围：

“那么现在你是失业啦？原来你不是给他当秘书来着嘛。”

“谢谢，托内特。”堂娜埃克西玛飞快地小声说道。然后提高声音说：“我负责西班牙方面的信件。”

“我还是搞不明白，”夫人慢吞吞地说，“你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跑到巴黎去。”

堂娜埃克西玛歪了歪嘴，竭力地想挤出一个笑容。她

猛然站起向我走来，仿佛要对我说什么，却又立即回去坐下。先生问她，皇帝是怎么死的。

“他受不了这种失败。”

“你指的是什么失败？”

埃克西玛像年轻时那样眨眨眼。

“托内特舅舅，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那位二十岁的龙骑兵又怎么样啦？”

堂娜埃克西玛唱道：

“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长眠于拉查斯神父公墓。”

“什么？”

“死啦。”

“谁死啦？”夫人问。

“路易·拿破仑的一个助手。”

堂娜埃克西玛擦干眼泪。

“那么，坎波·福米奥呢？”先生问。

“他又重振旗鼓做起生意来了。现在是社会党的首领。他根本不想理我了。”

“还有奥芬巴赫呢？你以前嗓子挺好的，也没演演小歌剧？”

“我的嗓子已经不行了。我的外貌、青春都不行啦……”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亲切地看着她。

“啊，天哪……你还是个孩子呢，埃克西玛。”

“您是偏爱我了。”

“可你还确实是个孩子呀。那么漂亮，风度翩翩……”

外甥女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起来。

“您别说了，玛丽娅·安东尼娅舅妈。我破产了，一无所有，谁也瞧不起我，没有人理我。我早该去死啦。”

“可是，我的孩子……”

冷静下来后，她开始比较连贯地讲她的情况。在城里，由于付不出房钱，她被人从旅馆里赶了出来。熟人都不愿同她打招呼。头一天晚上，她是偷偷躲在教堂的忏悔室里过的夜。

“啊，天哪！”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说，“可这怎么可能呢？连付旅馆的钱都没有？因为付不出钱就把你赶出来？不过，你不该再去住旅馆了。难道你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吗？你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了吗？以前你有珠宝首饰……”

“是的，舅妈。我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钻石了。战后法郎贬值，大家都说买珠宝是最好的投资。”

“那就把钻石卖掉吧。”先生说。

“我早就把它们卖掉了。”

最后几年对她来说简直太可怕了，她无法忍受，只想自杀。为此，她总带着一只小盒，里面有三粒毒丸药，那是她从一名歹徒那里搞到的。她说，只要有这三粒巧克力毒丸，她就绝不至于饿死，因为只须把它们吞下去，她就会长眠不醒了。

“玛丽娅·安东尼娅舅妈，您闻闻，挺香的。这巧克力看来还是挺棒的呢。”

她把毒丸拿出来，似乎要给人似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捡起一粒。而我，莫名其妙地抓住了她的手。

“我没想自杀，胡安。”她说，“我在人世间活得很好。”

堂娜埃克西玛不知为什么又变得高兴起来，哼着小曲。我也不知为什么会想到她是要毒死先生夫妇。这种想法未免太荒唐，我又打消了它。埃克西玛忽然谈起经济方面的事来。一位医生向她建议共同开发给病人注射马血来治疗肺结核的计划。为此，先得让马染上肺结核。这需要一笔钱……

“啊，天哪，真是胡说八道！”夫人叫起来。

先生认真地听着。

“何以见得是胡说八道呢？”先生问。

“这不就是说，一个人得了痨病，还要给他注射也得了痨病的马血？这和向掉在水里溺死的人继续灌水一模一样。”

“那时我若有一万杜罗的话，舅妈……”

“那医生叫什么名字？”先生问。

“我觉得他不是医生，可他懂得很多……”

“养一些得痨病的马，一些又高贵又有用的畜牲……”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接着说。

“可那是为了给人治病哪，舅妈。”

“喂，这个我不喜欢。”先生说道，“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办

法吗？”

“是的，我想过。我想开个旅馆。现在城里英国人多起来了，特别是冬天。”

“这还差不多。要是我啊，我就在波尔内附近开个旅馆，但必须是好旅馆，有浴盆，什么都有。我们可以帮你一把，对吧，玛丽娅·安东尼娅？”

“那当然。这是个好主意。在巴黎，卢浮旅馆就有浴室。不过，我认为你只能让单身女士住。”

堂安东尼奥提醒说，旅馆是男女都可以住的。

“我可不喜欢，”夫人答道，“埃克西玛一直是位好姑娘，现在更不能让她被别人说三道四了。”

舅父和甥女互相瞧了一眼。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继续往下说：

“单身女士，若知道她们是谁，打哪儿来的，那还可以。只要她们去望弥撒就行。”

“假如一开始就定这么多的规矩，我不知道生意会怎么样。客人们都不愿意……”

“那就让他们到别的旅馆去好啦，又用不着求他们住。埃克西玛干嘛要去受那些无赖的气呢？留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还可以陪陪我们。”

堂娜埃克西玛吻了一下她的手。

“啊，太谢谢您了，舅妈。可这样不行。”埃克西玛似乎真的很激动。

“这样不行？为什么？”

“您会常常想起……”

“住嘴，”先生小声喝住，“我看她不会记得。”

“可你不是说你一无所有了吗？既然如此，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何况，我觉得一位年轻姑娘不该去开旅馆。总之，我们得问问胡安。堂胡安。”舅妈赶紧改口说。“你知道，我们叫他胡安，因为我们从小就看着他长大。”

堂娜埃克西玛带着一种世俗的傲慢打量了我一眼。

“玛丽娅·安东尼娅舅妈，您放心好啦，对我来说，他永远是堂胡安。”

我觉得热血顿时涌到我的脸上，我望着她。

“夫人，我，以前不过是庄园的猪倌而已。”

正在随手翻看旧报纸的堂安东尼奥抬起头来：

“胡安，别那么傲气啦。有些谦卑，我是丝毫不喜欢的。”

“胡安，各人的祸福都是自己造成的。”夫人说。

“这个，也未必全对。”先生应道，又埋头看报。不一会儿，我听见他在嘟囔：“真见鬼，国王都死了不知多少年了，报上还登他出去打猎的消息。”

二十二

晚饭后，我回到自己房里。几乎一天都没有祈祷。等到我刚刚做完，堂娜埃克西玛就来敲门。我看了一下表，都

快半夜了。我一打开门，她就扑倒在我脚下。我不能把她对我说的话写出来，虽然不是什么忏悔中的秘密，我还是不能写出来。她吻我的双手，泪水哗哗地流到我手上。在把我弄得筋疲力竭的这种激动场面中，她似乎十分难过，她的懊悔像是真诚的。她只是一股劲儿地夸赞先生夫妇的善良，称颂上帝的仁慈。

“从今天起，我就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我宽恕她之后，她说。

我心甘情愿地上了她的当，大概是因为这种欺骗是那样令人舒服。我觉得这位罪人的悔过酝酿着一种不仅对她的灵魂而且对我们自身来说都是极大的危险。

“现在既然您的生活得到了解决，您也决心不再去想那些荒唐事了，您就该把那些毒丸毁了。这些毒丸曾经差点儿让您不情愿地死去，让您永远受到诅咒。”

她说她已经想到了，打算把它们从窗口扔出去。可是，我说，这么重要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必须搞得稍微隆重一些。此外，我还担心把毒丸扔出去会危害人畜。

“明天领完圣体后您把毒丸交给我。七点半我在小教堂等您。剩下的时间您对着那只小盒好好考虑考虑，领完圣体就把小盒给我，我要亲手把它扔到火里去。”

我们分手时天已经放亮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埃克西玛没有到小教堂来，我等了她很久，当我发现她在壁炉边同先生聊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我简直惊讶不止。我立在门口。逆光看去，她是那样清秀苗条，显得依然年轻。有时

她闭上眼睛得意忘形地笑得前仰后合，不禁使我想起她很早以前在门厅的炉灶边说过的一句话：“啊，托内特，你知道我不过是一只正月的猫……”我正想离开，先生把我叫住了：

“进来，坐下吧，你那么高大，穿着一身黑，别把堂娜埃克西玛吓着了。”

她用手势向我打了个招呼。

“堂胡安，”她说（我觉得她用堂字的时候略带讽刺意味），“您得给我一件道袍，好让我化妆。”

我装作没听见她说什么，坐到另一头去，打开我的经书。他们继续聊着。

“我想知道的，”先生说，“是皇后在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怎样打定主意和你一起逃走的。你呀，一直就是那么爱骗人，埃克西玛。”

“我，托内特？”

“对。你把一切都当儿戏。在回忆录里我被你骗了，我真难过。”

她突然唱起来：

“既然一切已经平静，

我的信念又有何益？”

先生接下去说：

“你们从圣日尔曼广场出来。”

“从那里我们上了一艘小艇。”她说。

先生生气地打断她：

“你们上了一辆马车。”

她继续哼着小曲。这时托梅乌抱着一抱柴禾进来。

“这个无赖把我们的一个姑娘迷住了。”先生站起来说。

堂娜埃克西玛以一种奇妙的表情望了那杂役一眼。那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脸上似乎焕发出一种异采。

“你们这些女人总是这个样子。你瞧他那丑样子。”

“可他长得实在是俊，托内特！”

他没听见，因为他已经进了他的房间。堂娜埃克西玛向那杂役转过身去。

“你是比恩庄的吧？”她笑着说。

“是的，太太。”

“你多大岁数啦？”

“到圣诞节我就满二十四岁了。”

“那么，现在是二十三。干吗要往老里说呢？你真的迷住了一位姑娘？”她挑逗地看着他说。

托梅乌低下头，没有回答。尽管知道我在场，她还是厚颜无耻地继续东问西问。

“你喜欢住在这儿吗？”

“是的，太太。”

“你干什么工作？”

“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每天都要早起？”

“天一放亮就得起来。”

“你没当过兵吗？”

“我是寡妇的儿子，免啦。”

“你从没到过城里吧？”

“我要去拉莫斯。”

“有未婚妻了吗？”

“没有，太太。”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没有衣服。”

“你愿意到城里去住吗？你可以去当侍者，那制服可神气啦。”

“当什么？”

“当仆人，但是用不着干活。”

“这？”

“可漂亮啦，还有金缎带……”

“可是，要干些什么呢？”

“向人问好。有人要吸烟时，你给他点火。”

“就这些？”

“有人向你打听什么，你就回答他。”

“要是不知道呢？”

“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回答时笑容可掬，让人愉快就行。”

对话变得越来越危险，使我茫然失措。不过五个钟头以前，就是这个女人，跪在我的脚下，声泪俱下，信誓旦旦地保证洗心革面，悔过自新。我咳了一声，表示我还在

场。但她脸不改色地瞧了我一眼，根本忘记了她的决心。

“笑着回答？”托梅乌问。“要是人家生气呢？”

堂娜埃克西玛似乎在想入非非，一副飘飘然的样子。她显得美丽而且幸福。突然间，她朝托梅乌扑过去。

“你怎么少了一颗牙呢？我得让人给你镶上假牙。”

她把他的头捧在手里，定定地盯着他。他迅速挣脱了，叫道：

“这可不行。人家都说假牙是从死人身上弄下来的。”

二十三

事态发展得很快。星期二吃过午饭，那些乔装的人便开始陆续到达。我前面说过，已故本堂神父不同意搞这种狂欢节的庆典，先生和他达成一种默契，收留这些前来参加狂欢节的人。现任本堂神父堂弗朗西斯科比较宽宏大量。不过，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在庄园举行狂欢节庆祝舞会，谁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种习惯。

下午天气晴朗。从我房间的窗口望去，渐渐变成野林子的花园一派春意盎然。天空就像一幅绸缎。天哪，多么晴朗的天空，多么灿烂的阳光。其美无比的大自然对其余的一切又是何等的漠然……我们简直是置身在初夏。蜜蜂嗡嗡地忙碌着，树木的嫩枝条上开始绽出小芽，细小的花朵已经开遍大地，圣栎树上有一只小鸟陶醉地婉转娇啼。从

远远的另一棵树上，传来知音的回应。花草，蜜蜂和鸟儿，一切都是那么有节奏，那么融洽。在这种表面的和谐之下掩藏着深深的不幸；鸟儿在捕食昆虫，羊儿在吞噬花草。在高高的空中隐约可见一只苍鹰在捕捉一只鸽子。在这种无法避免的不幸中，大自然依旧保持着它的微笑。侵略者在笑，受害者也在笑，直至其生命在一声惨叫中宣告结束。一个这样的下午，在各各他^①，耶稣曾经灰心丧气了一阵子：“上苍啊，你为什么抛弃我？”

结局渐渐临近了。我确信无法改变这种结局，便全力以赴祈祷起来，弄得筋疲力尽，眼睛慢慢闭上了，终于睡着。待我做了一个恶梦醒来，已经是漆黑的夜晚了。田野沉寂下来。家里却到处都是戴假面具的人像楼燕那样尖声吱吱喳喳。我探头望望院子，那里挤满了人群。家里怕只剩下老弱病残了。其余的人全都戴着假面，裹上床单被单，分不出男女老幼来，很容易造成错觉。我们这些在幕后也就是在小教堂里观看狂欢节的人，对它的危险性瞭如指掌。先生从来不考虑这些危险性，一提这些他就厌恶地板起脸来。有一年狂欢节过后，少了两只烟灰缸和一把银勺子，但他对此依旧不以为然。其实，丢这点东西是小事，可怕的是有人偷盗，心术不正。

我在家里转了一圈，发现比恩庄一团凌乱，仿佛是压轴的精彩场面。厨房里灯已经灭了，厨娘不知去向。我只

^①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看见桌上还有两块火腿，早上还满满的几皮袋子好酒已经被喝光。我上楼去把情况报告先生，他正在壁炉边打瞌睡。

“过来，我的孩子。”他听见我进去。

我对他讲了酒的事，他耸耸肩。

“让他们稍微尽兴吧。”说完他又打起瞌睡来。

“您不舒服吗？”

“舒服极了。”

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心满意足地款款而来。

“楼下多热闹啊……托内特，你睡了吗？”

“睡啦。”

“噢，先生……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睡着了还会答话。你不喜欢听化装舞会的声音吗？辟里啪啦的，真像鸟叫。”

一群人怪叫着向客厅里伸头探脑，要糖吃。

“去吧，”先生连眼都没睁，“你们到厨房去，去那儿喝陈年酒。”

一听此话，那群人一哄而散。一些戴假面的人不仅敢爬上楼去，还敢闯入别人的卧室。我发现有一对竟然钻到先生的房间里，他们肯定是利用从花园通上来的旋梯进来的，我只好加以干预，斥责他们的行为。

院子里正在组织舞会。有一个家伙十分高大，肯定不是庄园里的人，正给在场的人分火腿和红酒。他们点燃了一堆篝火，又笑又叫，好不热闹。他们不仅大吃大喝，瞎闹一气，更让我不安的是那些成双成对的人到处乱钻，形迹可疑。我回到客厅，由于对先生说什么也是白费力气，我

便坐到一个角落里，尽量让人看不见。三个戴假面的人到了门口，停住了。他们的穿着打扮都一样，不过，其中一位显得单薄一些，可能是个女人。她娇声娇气的十分做作，其实是在主动挑逗人家。我在墙角差点儿骂出声来。

“这些家伙在唠叨些什么呢？……”我听见先生低声说。

说的到底是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就像午饭以后听到的麻雀叫，吱吱喳喳报告春天即将来临。

“你们跟我来嘛，你们要带我去跳舞吗？”姑娘模样的那位说。

“我们先得看看你是不是个雌的。”另外两位嘻笑着粗着嗓门答道。

一阵沉寂。然后便听到偷偷的笑。

“瞧瞧……伸出手来。好一条汉子……”

他们又笑起来。先生半睡半醒，自言自语：“好一条汉子，你们还摸……”先生含糊不清地说。“他们该知道害臊了吧，却一点儿也不脸红。”先生又睡着了。

我站起身来。他们一见我，立即顺着楼梯逃到楼下。我假装追赶他们。在门廊里我发现一个戴假面的人正拿着一具银烛台往衣服里面塞。我一把就将银烛台夺了过来。堂娜埃克西玛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

“胡安，托梅乌在哪儿？”

“您干吗要问他在哪儿呢？”

“因为他答应要同我结婚。”

她激动万分。起初我以为堂娜埃克西玛神经有些不正

常，现在我确信她已经疯了。

“别说这些话，太太。”我轻轻答道。

“我们马上就去见舅父舅母。”她说完就跑开了。我不敢跟她去，坐在门廊里，拭目以待，要看事态会怎样发展。不出我所料，片刻之后，先生便叫我。

“胡安，堂娜埃克西玛在胡说些什么啊？”

埃克西玛满面通红地喊叫起来，说话断断续续。

“你用不着喊，我又不是聋子。你不能同托梅乌结婚，因为他不爱你，我也不同意。”先生说。

这一下可不得了，她靠壁炉站着，破口大骂起来，气势汹汹地像要朝先生扑过去似的。在她刚要换口气的时候，从楼下传来托梅乌又响亮又清晰的声音：

“这个从外地来的老太婆真是个疯子，简直像个巫婆。你们听不见她在那儿扯着脖子尖叫吗？”

堂娜埃克西玛顿时脸色煞白，托梅乌这番冷酷无情的话似乎使她清醒过来。我觉得她迟疑了一下，便从怀里掏出装毒丸的小盒子来。我及时赶到，没让她把毒丸往嘴里送而是逼她放到壁炉上面。在抢夺的过程中，盒子盖掉了下来，但我不敢肯定盒子里是否装着头天下午她拿给我们看的那三粒毒丸，其中是否少了一粒。她狂怒地和我厮打着，泪水涟涟地喊着托梅乌的名字。我紧紧抓住她。眼见脱不了身，她便疯狂地扭动挣扎。我一松手，她就飞也似的逃走了。我们再也没见到她。后来才知道，巡警在马路上发现了她，把她送到帕尔马医院时，她已经死了。这是我关于

堂娜埃克西玛最后的记忆。亲爱的米格尔，好好记下来吧，比甘迪亚公爵要不幸得多，在那个不祥的星期二，我失去的不是堂娜埃克西玛，而是纯洁美丽的形象。今后，这种形象将永远同可怕的一幕联系在一起了。

娇小玲珑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边说边走进来：

“啊，托内特，你要是伸出头去瞧一眼……全比恩镇的人都来了。你不想看看他们跳舞吗？卡塔利娜在厨房里哭呢。让她哭吧，哭吧。”她心满意足地说，“她再也不会给我端早餐来了。”

顿了一下，她又接着说：

“明天我把这只手镯送给她。你说呢，托内特？啊，天哪，念《玫瑰经》的时间都过啦……”

我看到她在壁炉上面找什么，此刻她一定又失去了记忆。她准是捡起了堂娜埃克西玛的毒丸。不一会儿，她便显得睡意蒙眬，我一时也未加以注意。可是当我发现她该去睡了却没有动弹时，我就告诉了先生，我们想把她叫醒，却怎么也叫不醒她，我们才明白事情不妙了。这儿没有医生，代替他的理发师前一天又摔断了一条腿。已经很晚了。参加舞会戴假面的最后一批人也已经离开，家里笼罩着一片绝对的静寂。我不想吵醒谁，便到厨房去煮一杯浓咖啡。等我回到大厅，发现她躺在丈夫的怀里。

“胡安，这一切都结束了。”先生悲哀地说。

我们让她喝了滚烫的咖啡，她终于醒过来了。先生却又显得有些昏昏欲睡，我想他是受了刺激。然而，他是轻

易不会失去理智的。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一清醒过来就问我们，她是不是要死啦。她毫无不适之感，状态很好，“就像在天堂里一样”，她说。我们安慰她说，她只不过昏迷了一小会儿（我自己也很想这样认为）。她似乎又镇定又勇敢。我以为我的话骗过了她，其实不然，因为她抓起先生的一只手，急急地说：

“可是，以后你怎么办呢，托内特？”

她那明亮的眼睛变得像玻璃球，干涩而忧伤。我们的心都凉了。她立即又恢复了常态：

“那么，你还可以继续写你的东西来消遣。”

她想拥抱他，笑了一下。死神已经攫住了她。可是，死亡是存在的吗？奥维德不承认它的存在，对教会来说这不过是“升天”而已。她临死时的拥抱使我想起了《变形记》里的诗。有一瞬间，我觉得她那颤巍的两条纤臂，宛如鲍西斯寓言故事中的两根树枝。莫非这是蜕变过程中的一种惯例，在最终瘫落在躯干边之前它必须用力摇晃？她的眼睛慢慢闭上了，安息在冥冥之中。这时我想起去数数那些毒丸：小盒子是空的。我瞧了瞧先生，他也睡态蒙眬，征状与他的妻子一样。

“先生！”我喊叫起来，“您都干了些什么啊？”

“什么也没干。”他闭着眼睛呢喃了一声。

“堂娜埃克西玛留下的盒子里原来有三颗毒丸的呀。”

他没有回答。我到厨房去的那段时间里都发生什么事啦？可以肯定，先生见到自己的妻子突然神志不清，便和

我一样想到要察看一下那装毒丸的小盒子。一看盒子里少了毒丸，他就痛不欲生。他是不信教的人，想到自己已经年迈，不可能再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新的情爱，与其孤单寂寞地度日，倒不如自杀了此残生。我想起几天以前在散步的时候他说过：

“我想，今天我再交给你一些稿子，我的回忆录实际上也就算写完了。该说的全说了，而且是以最好的方式写出来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当你发表它的时候（他从未想过我可能不发表它），你当然会发现文体不太注意，有些地方也许不太合文法。孩子，你要修改的话可得当心。你要知道，严格说来我不是学者也不是作家，而是一个没有子女（他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胳膊）而又想多活一些时间、想让自己在生活中所爱的一切流芳百世的人。我尤其想把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如实地描绘出来，写下她有趣的童年，成年后的才能与沉着，以及她晚年的记忆紊乱。她这种记忆上的紊乱，有时又重现出我就在这里与之玩耍的活泼的八岁女孩来。这正是我所想要表现的。正是为此，我才不得不在有些地方牺牲文法和道德观念，目的是力求准确贴切。我不准你（他笑着说）过多地修改病句而影响原稿的意思。还有什么难拼的那些字母的问题，我一概不感兴趣，在意大利早就取消了这些麻烦。至于句法，必须用我的。千万别忘了，只有我的句法才能表达出我的要求。总之，我给你的作品是完成了的。我知道，我给你的钱够印书了，我不希望印得怎样精致漂亮，但求正确而已。到巴黎去印。”

我发现他很伤感，我能猜到个中缘故。不必张口问，他自己就主动对我说了：

“现在我的生活缺乏目标。”

“有夫人在呢。”我说。

“那是当然。”他答。

夫人已经不在了，回忆录已经写好了。关于自杀的看法我更坚信了。

“先生，”我喊道，“盒子已经空了。您若服了毒丸，您就必须马上说实话。您想自杀吧？”

他没有睁眼，但我认为他不为人觉察地笑了一下。他的呼吸愈来愈弱。他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自杀……”他喃喃道。

“您是否吃了壁炉上面的巧克力啦？您要是无法回答，就做个手势好啦。”

他含糊地摆了一下手，可以被理解为否定的回答。我心里又生出一丝希望。

“快说实话，您是不想自杀吧？”

这一次他的手势明确了些，表示否定。

“您请求上帝原谅您的一切过失，您为自己的这些过失后悔莫及，您准许我从回忆录里删去道德家会议认为不利于为上帝服务也不利于您的灵魂的那些内容吗？”

我没有说下去，因为他已经人事不省。一直到凌晨，他都处于昏睡状态。后来他半张开眼，暂时又能说话了。我想让他忏悔，他却像往常一样又津津乐道地说起他的作

品来。

“胡安，我写的就是我的忏悔。我不害怕。”他笑了笑。
“上帝太好了。”

我现在还记得他说这些话时的口气。

“尽管您犯过严重的错误，您的一生还是美好的。您要悔过，请求宽恕……”

“你瞧，”他欠着身子打断我的话，“我承认我嫉妒过哈科沃·科耶拉。”

我发觉他浑身发抖，便把他抱在怀里。他已经咽了气。

终 曲

昨天午后，当我写完前面那些内容时，有人告诉我有几位绅士想同我谈谈。那是“普鲁士皇家共济会与神学研究中心”的成员。他们的名片上印着古老的玫瑰十字徽，就是说，徽章中心是一个十字，周围是一圈玫瑰组成的花环。其中一位长得健壮结实，叫作瓦斯曼博士。另一位的名字我没搞清楚，介绍时说是前者的秘书。他们声称，获悉比恩庄庄主亡故，他们受俾斯麦亲王委托前来见我，想了解一些殿下感兴趣的情况。

我被这种罕见的事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我请他们进了蓝色客厅，请他们喝了几杯陈年好酒，又关上了所有的门窗之后，他们说明了来意。他们讲的一口西班牙语十分地道准确，只是从口音上才能听出他们是德国人。他们带着两包文件，一边说一边查阅这些文件。文件记载的都是堂菲力普的往事，他们给我看他的出生证，他于一七八〇年四月十九日生于马略卡城。

“在十八世纪末，”他们说，“玫瑰十字章是共济会的八级徽章，您一定知道比恩镇的堂菲力普是共济会会员。”

我连眼都不眨，硬着头皮听他们说。

“比恩家族中，”瓦斯曼先生接着说，“出过好几位共济会会员。亲王殿下……”

我抬起头，一下子打断他：

“我出生在这个家庭。我半辈子都钻在这个家族的档案里，我太熟悉了。亲王殿下创立了帝国，他日理万机，哪里顾得上马略卡一个不幸的家庭呢。”

我讲这些话时，口气一定过分激烈，因为我的对话者慌忙解释：

“请您原谅我们，请您相信我们不是信口开河。您所了解的庄园的档案，曾被比恩镇的堂安东尼奥删改过。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他查了一下文件，“那是在一八六六年，大约在您进了神学院之后几年。不过，我们还是别谈这个吧。我们只限于研究堂菲力普本人。”

“既然档案被清理过，”我插话说，“我觉得对你们的研究来说，这儿不是最合适的场所。此外，我必须对你们说明，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同共济会合作。”

“有许多共济会会员都是基督徒，关于我们这个教派，我们以十字架作为教徽。”

“你们可以自认为基督徒，但你们不遵守教规，因此，你们是异教徒。”

“这倒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刚刚得到我的称赞。

我怎么也不明白，一位像俾斯麦那样的右翼人士居然会同共济会有交往，也不明白亲王刚刚辞掉总理职务又与

年轻的德国皇帝关系不睦，竟然会以“普鲁士皇家共济会与神学研究中心”的名义说话。那两位博士对我的疑虑付之一笑。

“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亲王于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宣布帝国成立，在凡尔赛的冰宫为威廉一世加冕。那一天，哈布斯堡宫遭受了一次猛烈的震动。色当在维也纳引起的反响远比在巴黎深沉得多。霍亨索伦家族欠这位老臣太多，普鲁士欠他欠得就更多了……”

他们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谈话显示了非凡的文化修养。然而，这种谈话并非总是使其中的论断显得连贯有意义。我甚至还想到，威廉二世皇帝与俾斯麦之间的敌意是否只是表面的，俾斯麦是否在幕后依然当着他的总理。

“这就太离谱了。皇上是自由派，亲王是保守派。俾斯麦不只是位军人，掌握军权，他首先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使拿破仑三世上了当，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威廉一世本人上了当。您是了解历史的。作为保守党人，亲王是陈腐守旧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敌人，这里不存在任何矛盾。信仰是一种可以依据环境地点的不同而以千变万化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力量。在德国亲王是保守党，因为他想保持在凡尔赛建立的帝国，但他支持会使奥地利解体的共济会。”

他们恬不知耻地加以解说的这种实用主义令我十分反感，但我未予评论。威廉二世与俾斯麦虽然不和，但在摧毁奥地利王朝这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心照不宣。不过，我

还是不完全信服。

“对于德国皇帝来说，”瓦斯曼博士接着说，“摧毁奥地利必须通过与殿下唱反调的途经来实现，就是说，通过能使国家元气衰竭的一种陈腐的保守主义来实现。看起来，哈布斯堡王朝确实愈来愈落伍，适应不了时代的需要。”

我越听越觉得糊涂。

“那么，”我啜囁着，“皇上为什么支持……”

“皇上不是支持共济会，而是领导共济会。他作为皇帝和最高主宰，承认共济会的存在，无须直接去鼓动它。”

“但也不去打击它。”

“如同不去打击互相竞争的铁路和驿车一样。另外，这个问题不仅仅具有两面，而是有很多方面。威廉二世认为要搞垮奥地利就必须增强哈布斯堡家族的个人权力，这种看法诚然不错，过分的权力会使他们更加腐败，一旦加速了王朝的覆灭，也可能会引起奥地利人民的起义。而这一点是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避免。”

博士一口喝干杯里的酒，我立即又给倒满，因为我发现酒能让他多说话。他接着往下讲：

“相反，这个问题在法国的情形又不一样，色当之败以后法国崛起太快。思想自由的共济会也许能加强奥地利帝国的团结，但对于堕落放荡的法国人来说可以成为一种分裂因素。这种想法并不荒谬。对年轻的意大利来说，情况也一样，对它也不能忽视。”

博士停了一下，我浑身一阵战栗，因为我想到这些所

谓普鲁士保守派与自由派的计划实际上是要毁灭欧洲。他的谈话越来越使我不安。

“为此，”博士的秘书叫道，“玫瑰十字派，共济会及烧炭党之间保持着密切接触。”

“亲王，请原谅，先生，”瓦斯曼向我点了一下头，接着说，“亲王一直坚持被称为文化运动的反对教会（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的宗教战争，这是使我们与他结盟的又一原因。这种文化运动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民族主义的，纯普鲁士的，倾向于‘铁与火’中崛起的日耳曼帝国的绝对权力。正如您所见，乍看起来，它与我们玫瑰十字派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相去不远，虽然另一方面，普鲁士霸权（不过，这一点与我却有万里之遥）建立在一种直觉的、生死攸关的、纯粹神奇的基本点上。您知道，在近二百年里，我们被叫做‘隐身人’。我们玫瑰十字党的首领罗森克鲁兹本人就从事巫术，并且在十五世纪初成了实用物理学的先驱。”

博士见我脸上露出惊异之色，便急忙对我解释，虽然我没有那样要求。

“现代科学是从幻术中派生而来。而且，实质上，它仍然是纯粹的幻术。譬如，关于电这种我们不断使用的能，其生成原因我们一无所知。宇宙充满了种种神秘的力量，上帝时而把人从这些力量中解救出来，那也只是在人值得被拯救或者，”博士笑了笑，“当人敢于征服它们的情况下。关于这一点我想提醒一下，一位德国教士曾经利用火药的发明从神的手里盗取了闪电。我们这些自由思想派主张人类民

主和自由的原则，如果必要的话，不惜通过暴力来获得，什么也不能使我们后退半步。我们是反天主教的，我们与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比肩并进。天主教教义（再次请您原谅）是俾斯麦帝国的主要敌人。皇上和亲王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盟友。不过，也仅仅是在这一点上。共同的敌人一旦消失，那么，这种所谓的友谊将会如何呢？”

由于酒也由于他自己的演说，博士激动得脸上充血。他又停顿了一下，虽然我依然保持沉默，但这一下我似乎明白了，一旦敌人被打败，普鲁士之火要毁灭的将是它自身。

天晚了，又下着雨，我不得不请他们吃晚饭。我打定主意什么也不问他们，既然刚才他们对于比尼萨莱姆的陈年好酒不是无动于衷，那么我想，在吃晚饭时他们自然也会侃侃而谈。

“马略卡的这些古老建筑，”瓦斯曼博士说，“真够迷人的。比恩庄真的要出卖吗？”

我三言两语地解释了一下，说这对谁也不是秘密。

“您，神父先生，离开这儿不感到难过吗？”

“我生在这儿，也想死在这儿。”我说，“可是，上帝已经作出了另外的安排。”

博士的目光在我脸上探询着。

“也许不。关于这方面我们也有些话想说。”他一口喝完杯里的酒。“如果不介意的话，能否告诉我，庄园欠的债务一共有多少？”

“总计达六万杜罗。”

秘书掏出一支铅笔，在一张名片上写了一堆数字，然后递给博士，凑近他耳根说了些什么。我好像听到马克这个词。

博士对我说：“堂菲力普这个人物在德国引起非同凡响的兴趣。我们在撰写《共济会史》。”

我再次重复说家里的档案中没有这方面的任何重要材料。

“我们说过了，我们清楚，由于几种情况，档案曾被清理过……我们只对玩偶厅感兴趣。真正的档案就藏在那儿。”

我无法抑制自己，站起来想结束这次会见。

“真奇怪，你们连这都知道。先生在世时是禁止提及这一点的。我从未进过玩偶厅。至少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包括堂安东尼奥在内，踏进过那间房子。”

博士对我的冲动根本不予理睬，我又坐了下来。一阵沉默之后，他慢条斯理地说：

“自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六年，比恩镇的堂安东尼奥一直同普鲁士的玫瑰十字党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他就同我们及共济会分道扬镳（直至七十年代之时我们还并肩战斗），他被指责为可疑分子，当然就处于被监视之下。就他那方面来说这并非什么激烈的决裂，我之所以说‘就他那方面来说’是因为共济会绝不忘记背叛行为。我给您唸一段一八六六年一月八日的最后来信。信是这样说的：‘……我决定

把自己从你们的组织中抹去。切勿把我当成你们的一个敌人，我不过是一个失望的人。我对你们的信念深表钦佩却不能苟同。至于你们的机密，尽管放心好了。从今天起所有这些密件都锁在玩偶厅里，与阴险邪恶的堂菲力普的文稿和信件放在一起。他的灵魂大概已经到了净界啦。恰如卡塔罗尼亚人常说的，对于我们不懂的事情千万不要瞎说。只要我活着，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会进那间房子。但是，对于那些文件我一件也不想销毁，因为今天被当作闲言碎语的东西，明天也许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我是没有希望了。我死后，我相信堂胡安·马约尔，今日的神学院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上帝的保佑，他会知道怎么办的。’您也看到了，这完全是逃避一切责任明哲保身的多心人的做法，这在我们的教派里是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已经调查清楚，堂安东尼奥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把共济会的教徽归还，而是将它送给了这儿的 一个村妇。这个……这位姑娘已经……”博士说到这儿已经有些激动，忽然放声大笑起来。他似乎还想添上一句，却又忍住了，接下去说，“亲王对堂菲力普很感兴趣，因为这个人物很复杂，同本世纪初的几个王室都有瓜葛。夏尔科的年轻门生，那位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教授也曾向殿下打听这位令人迷惑不解的比恩人的情况。这位比恩人同西班牙的玛利亚·路易莎关系暧昧……同时却又和当时英俊潇洒的曼努埃尔·德·戈多依打得火热。”

我满面羞赧却依然保持沉默。

“我们有拉巴斯亲王的一些私信，其中提到堂菲力普离

开军队、隐退到这个庄园的原因。我们也有堂安东尼奥的书信，我们刚刚读过他的最后一封信。我们通过可靠途径当然知道真正的档案并非您所熟悉的那些，而是藏在玩偶厅里。因此，神父先生……”

秘书用德语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便转移了话题。

“您肯定已故的先生二十五年来从未进过玩偶厅？”

“我相信这一点。”

“很好。既然如此，我以殿下名义必须向您提个建议：我们可以把这座实际上属于债权人的庄园搞到手。既然您这么舍不得离开它，我们就任命您为庄园的终身管家……”

“要我把玩偶厅交给他们作为交换条件。”我的心怦怦直跳，“博士先生，别的不说，比恩庄虽然典押出去了，按理还是属于那些侄辈们的，他们可以赎回它……”

“您知道他们身无分文。我们全都清楚。不过，假如您愿意我们去找他们，那也没有什么不便之处。请您想一想，我刚才对您的建议也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事情会更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会接受这些建议的。”

确实如此。草率、轻浮加上贪婪，会使堂娜玛格达莱娜兴高采烈地把比恩家族的隐私拱手送给共济会的。我发觉了这个巨大的威胁，明白必须争取时间，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生意告吹。

“您的建议太慷慨了，我做梦也没想过。无须烦劳大驾去见侄辈们了，我和他们一样高兴为你们效劳。”我的客人

们相视而笑，我佯装未见。“不过，我现在心里一团乱麻，请你们给我几个小时考虑一下……”

接着我又暗示了一下，一旦达成协议，最好正式签一份书面合同。他们马上提出到公证人那里存上一笔大数目作为信用押金。我喜在心里却不露声色，利用我内心的激动，装出鱼儿在钩饵面前委决不下、不知所措的样子。他们把我当作一个贪心的乡巴佬，这样，我没作出任何承诺，他们便以为我忘乎所以地接受了建议。因此，正如我所料，他们也没有想到要将玩偶厅的门贴上封条，直到正式签合同为止。

“您可以考虑到明天早上，十点整我们来听您的答复。”博士满心以为我会答应，便应允了。

“我将十分荣幸欢迎你们。晚上无法查阅那些文件。明天，光线好，我们可以把里面藏的东西全部检查一遍。现在还不算太晚，假如你们愿意，我想我们可以再来一瓶酒。”

他们立即显得热情备至，以为我的提议是要举杯相贺，或者是对他们的要求的一种认可。何况，他们对比尼萨莱姆的陈年美酒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对之极尽赞美之词。我虚与周旋，甚至不惜称赞他们国家的黑啤酒。谈话在一片虚情假意之中进行，至今我犹觉汗颜。我的客人们开怀畅饮，为了给他们助兴，我也不时举杯，不过我很有节制，一刻也不让自己失去控制。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誉和教会的利益，有意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乡下人在今天晚上打败两名不同寻常的人物，两名显赫的历史学家和俾斯麦的心腹，我还

依稀记得，不知是因为酒的作用，还是因为以为我已落入他们的网中而洋洋自得，他们谈兴大发。

据他们所说（上帝知道这些说法给我精神上以慰藉），堂安东尼奥是于一八六六年初同共济会断绝关系的。假设他是在一八六二年左右加入共济会便开始同玫瑰十字党人保持通信的话，那么他仅仅当过四年的共济会会员。这一结论与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是相符的：“我当过共济会成员，不过时间极短。”我曾向瓦斯曼博士打听他是否知道堂娜埃克西玛的往事以及她是否也同玫瑰十字党有联系。博士哈哈一笑。

“那是自然喽！她是普鲁士的伟大朋友拿破仑三世的心上人。不久以前她确实带着一项秘密使命来过马略卡。”

他嘲讽地瞧了他的伙伴一眼。我心里陡然一惊。

“一项秘密使命？”

“它是那样秘密……我只好请求您原谅我不能透露。”

“那就是说，堂娜埃克西玛也属于你们这个组织啰？”

“确切地说她不是玫瑰十字党，倒是共济会成员。”

“还有人会对一个女疯子委以秘密使命？”我接着往下问，希望能了解更多的情况。但是博士并不糊涂，他笑着答道：

“不少人都认为有时候疯子……”

“譬如你看到的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秘书叫道。

“还有那些今日我们称为狂妄之徒的文体优美的作家。”

“还有那些劣迹昭彰扮成异性的人。”

他们完全把我撇在一边，像踢球似的你一言我一语地轮番说。原先那些虚情假意一扫而光。

“扮成异性的人？”我问。

“还有那些专门给玩偶穿衣服的军官。”

“还有那些爱上皇后的人。”博士又说。

“还有……”

我不容秘书把话说完，便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博士笑着抱住我，一方面是想拉开我，一方面是想大事化小。

“您真强壮，神父先生。”他拍拍我的臂膊说。

“请你们原谅。”我不知所措地呢喃着。

这场插曲使我迷茫。我想悔过，却无法镇静下来。一时间，我眼前浮现出我那无所作为、完全被禁锢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具备不易集于一身的天赋（聪明、力量、青春和教养，所以魔鬼引诱我），我对自己说，我牺牲自己的一生是不公平的，我在痛苦绝望中，对上帝和先生都产生了怀疑。我觉得和客人扭打一番也能使我产生肉体上的快感，但是，就连这种任何一个俗人都能享受到的快感对我也是被禁止的。“为什么？”我对自己说，“我既然没有绅士的姓氏，为什么不去当个骡夫呢？”或者比恩庄的杂役。有时，我可以见到女人们对我并不鄙视。你所了解的那次不幸火辣辣地困扰着我。然而，我那所谓尘世间最美好的角色其实也不过是一名杂役的角色。马略卡的大路小径上，随处可见黑眼睛、髻头发的乡下人，他们粗野的神态也正是我的特征。

假如面孔便是灵魂的镜子，那么我就应该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像托梅乌那样生在这片山区也将死在这片山区……我沉醉在这些思索之中。至此，我的回忆便清晰起来。瓦斯曼博士及其秘书的话是断断续续的，但其中蕴含的暗示使我战栗。

他们一走，我就跑去叫醒托梅乌。点起一堆火以后，我们便穿过小教堂，沿着托梅乌打开的秘密便梯到玩偶厅去。我们往上爬的时候，小伙子脸色发白。我从不知道玩偶厅里的情况，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里面收藏的东西全都扔到火堆里：玩偶、纸张和卷宗。仅仅半个多小时，火焰就吞没了所有这些东西，为了这些东西，俾斯麦的亲王宁愿拿比恩庄——我在世界上所最钟爱的东西——来交换。我在作出这种牺牲之后，浑身觉得十分舒坦泰然，因为我实现了先生未了的遗愿。

这天早上十点钟，殿下的使者准时来到。他们那一本正经的样子让人根本无法联想到几小时之前的放浪形骸。我呢，冷淡地迎接他们，把他们带到堂菲力普那间房子。经过小教堂时，我凝神片刻，为我头天晚上所作的决定而在心里暗暗感谢上帝。玩偶厅里连一片纸都没有，来访者见状大吃一惊。他们拉开所有的抽屉和橱柜，全都空空如也。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是，这该怎么解释呢，神父先生？仅仅九个小时以前，您还向我们保证说谁也没有进过这间房子。对这种神秘莫测的事，我们该起个什么名字呢？”

我奚落他们说：

“在埃及，这该叫作《伊西斯的面纱》。”

他们怒容满面，紧接着便破口大骂，骂我骗了他们。我让他们骂，等他们骂够了，我说：

“昨天晚上我对你们保证说没有任何人踏进过这间房子，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点也不错。我没必要再对你们说什么了。”

已经到了门厅，瓦斯曼博士高声对他的秘书说，显然是存心要说给我听：

“这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把那狗杂种的证据全给毁啦。”

马戏团的魔术师刚刚把盖着一位仙女的布突然揭开，仙女已经不见了。

他们在哈哈大笑中消失了。

* * *

《伊西斯的面纱》……玩偶厅已经被清扫一空，我想搞清楚是真的存在无法揭示的难懂的奥秘，还是在面纱后面只戴着一堵墙，都只能是枉费心机了。先生曾经写道，堂菲力普已经到了净界。不过，他真是这么认为的吗？我说过，他对待正经事儿的那种故作轻松的做法是骗不了我们的。这位面对任何大胆想法都从不退却的杰出人物，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比恩家族的成员由于有给玩偶穿衣裳的怪癖而被开除军籍。堂菲力普不是缺乏天赋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在欧洲宫廷里所引起的轰动便说明了这一点。使玫瑰十

字党和夏尔科的门徒们依然放不下心的那个迷团被永久地遗忘了。围绕着先生和他的死的那团迷雾更加显得凄凉不幸。对他作出评价简直太难了。就连我这个与他朝夕相处的人，有时也轻率地把他当作一心追求享乐的人。在痛苦的时刻我也曾将他那开心的生活同我的生活相对照。而他这种幸福生活最后也只是落得个藏书被烧、让人讥笑的结局。事实上他只能在回忆录里给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情况并不比我妙到哪儿去。在那些包围着他迫使他抛弃自己品质最纯真部分的各种意外情形下，他到底泰然自若到何种程度，我的笔实在难以描述。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自己寻的短见。我问他：“说实话吧，您不想自杀，对吧？”他只是以一种否定的表情作答，我可以认为是对我的问题的后半部分的答复，但也可以看作是对问题前半部分的答复。也就是说，先生（已经永远无法弄清楚）也许是对否定的否定，意味着他是自杀的。另一方面，瓦斯曼博士昨天晚上暗示共济会没有原谅他并且提到堂娜埃克西玛的特殊使命，又使人产生别的猜想。谁还能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呢？先生没有说出真情就去世了。他的灵魂与肉体的命运已经有了定论。他的灵魂和肉体有一天都要到上帝面前去接受判决。他的精神问题，他那注定要像柏拉图学说那样流芳百世的精神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他在回忆录里体现了这种精神。多少年来他只是为了写回忆录才活着。我这样说并未忘记他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深切的爱，因为妻子和回忆录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确，回忆录里也写了

别的女人，但他说他那些风流冒险不过是为了最后的占有而进行的排练。（“无论是费莱蒙的幸福还是伊波利托的纯洁都缺乏反差的凭证，”他在第二十一章里这样写道。）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有些章节是如此伤风败俗，但从整体上看却是为他妻子树立的一座丰碑。如果我们毁了它，也就毁了夫妻恩爱的最忠实的明证，从而肯定了那种认为善与恶形影不离的异端邪说。堂安东尼奥·德·比恩的品格无法捉摸。有理由推测，他在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偏爱圣奥古斯丁教派。然而，他真的公开推崇过这一教派吗？米格尔，我看无论是谁也无法在先生的手稿中找出哪怕是一处反教义的说法。他确实有不少罪过，但不能说他的死就是违背教规的。

我正是带着这个疑问（我看它比许多深刻的信念要真诚得多）结束我的故事的。阿门戈尔神父圣诞节要调职到贵处去，我托他把回忆录的副本交给你，以便你有时间从容审阅，并请你转呈给主教大人，如果主教大人的裁决违背死者遗愿的话，我将保留到罗马求助的权利。假如罗马也没有人倾听我的呼声，那我在这个世界上便求告无门，但这种不容选择的命运将给我以力量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的孤独中度过我的残生。失去比恩庄这片土地以及它那迷人而又可怖的秘密之后，掩埋了先生想以他的作品传给我们的那种精神之后，我还留有一种安慰，那就是我相信：有朝一日上帝是会作出公正的最高判决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比恩庄

作者=（西班牙）洛伦索·维利亚隆加著江山 锦康译

页数=322

S S 号=10338429

出版日期=1991年01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